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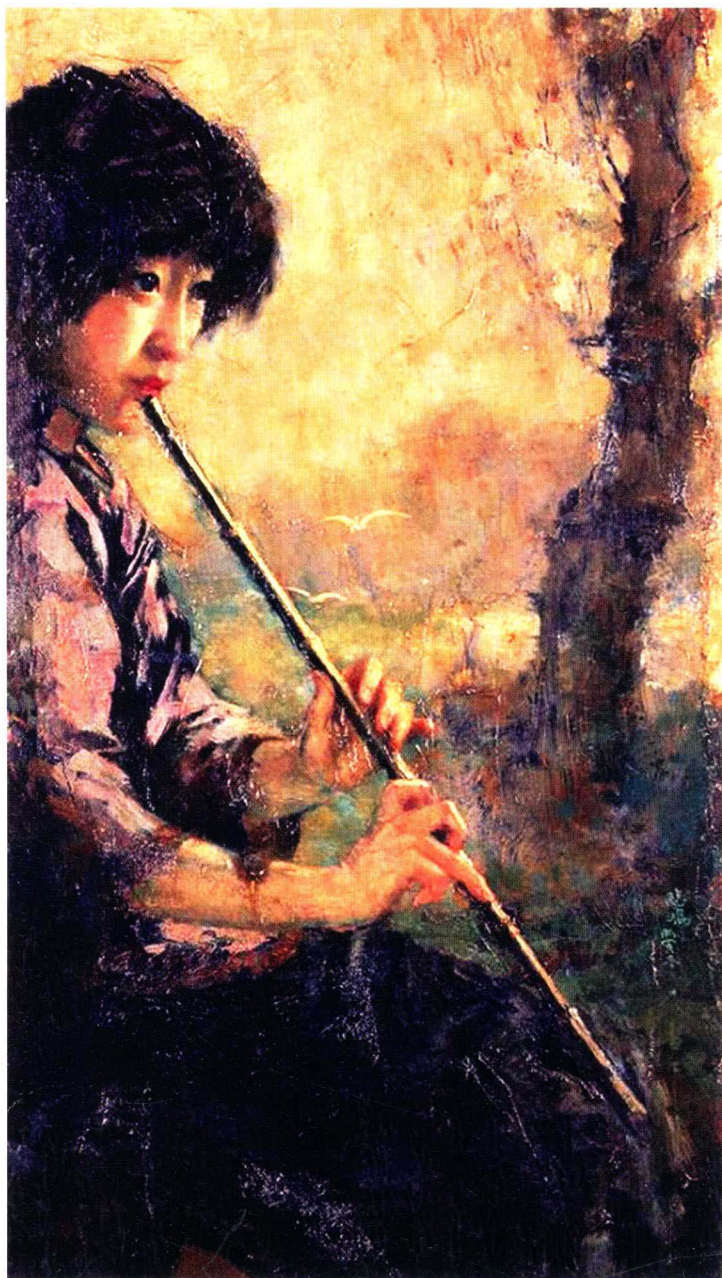
图文版

蒋碧微回忆录

上

我与徐悲鸿

蒋碧微——著



在传统与自由之间挣扎，行走在婚姻与爱情的边缘

民国才女蒋碧微与著名画家徐悲鸿和国民党高官张道藩之间的爱情传奇

风靡海峡两岸数十年，一部女性追求心灵自由与解放的史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蒋碧微回忆录

◆

我与徐悲鸿

蒋碧微—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蒋碧微回忆录 / 蒋碧微著.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 - 7 - 5675 - 2564 - 1

I. ①蒋… II. ①蒋… III. ①蒋碧微 (1899 ~ 1978)
— 回忆录 IV. ①K828.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9922 号

蒋碧微回忆录

著 者 蒋碧微
项目编辑 许 静 储德天
特约编辑 邱承辉
审读编辑 王国红
封面设计 吕彦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 - 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 - 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电话 021 - 62869887 (邮购)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6 开
印 张 37.5
字 数 63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 - 7 - 5675 - 2564 - 1/K. 411
定 价 78.00 (全二册)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代序

人生是悲痛的，但是悲痛给予我很多启示，使我受到了教训，得着了经验，认清了途径，增强了勇气，而没有被它所摧毁。

二十五年来所想写的，如今总算是写成了，好坏不论，但它确是最真实的记述，由于力求真实，如果有牵连到别人的地方，还请原谅，因为这是难以避免的。



▲山鬼（徐悲鸿，1943年）



▲松马（徐悲鸿绘，本图由徐小阳先生——徐悲鸿之孙提供）

母亲最后的岁月

徐伯阳

母亲 1958 年底离开张道藩后，一直到她 1978 年 12 月 16 日在台北病逝，有整整 20 年是孤独地一个人过日子。老佣同弟曾陪伴她一段时间。在母亲去世前半年，我曾给她写了一封信，这是我们母子间自 1947 年 8 月在南京相处了一个月后，第一次联系。这封信的内容大致是：我已结婚，有两个儿子，大儿子 19 岁，小儿子 10 岁。我看了她写的回忆录，回想起许多儿时的情景。我很想带了我的全家陪伴在她的身边，陪她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希望她能再写一封信来，说明我们在香港见面，我就可以带着全家人到香港和她聚会。

写完后，我先寄到一位一年前从北京移居香港的友人、马来西亚华侨骆新民先生家中，再由他的一位亲戚家的兄弟（当时正在台北市台湾大学念书）从马来西亚亲自带到台北，找到母亲家，交给母亲。母亲见到我的信后，心情十分激动，立即给我写了一封回信：

伯阳：

收到你的信和你们全家的照片，看了以后，我有无限的感慨和伤痛。三十多年的离别，你的容貌，似乎已不是我所记忆的儿子了。你为什么这样瘦？你身体不好吗？数年前沈宜甲先生回国，率领你和你的妻儿们到你父亲墓上去吊祭，他曾把所摄的彩色照片寄给刘大悲先生，刘先生拿来送给我。看过以后，我就觉得你瘦得和以前完全不同了，至于你的妻儿，那都是我没有见过的。我只觉得你的小儿子很像你十几岁的模样，可爱极了。我怕的是今生今世还能不能再见到你和我从未见过的媳妇和孙儿一叙呢？因为我已经八十高龄，身体多病，还能活多久是不能预料的。我只希望你夫妇和两孙能申请到香港一行，我也会到香港去和你们欢聚。这是我有生之年唯一的希望了。

同弟现在有一个儿子，名叫史南仲，已经28岁了，他的父亲史坤生，我想你一定也记得，他不幸在1942年（注：应是1953年）去世了。史南仲已经结婚，而且也有了两个女儿。同弟已经再婚，她的丈夫就是王瑞忠，我想你也会记得老王这个人的（注：老王一直是张道藩的司机）。同弟、老王他们看了你的相片，都高兴得不得了，他们也希望见到你。

你的来信说你读了我的回忆录，令我非常惊奇，你从哪里得来的？我很好奇想知道（注：一次吴作人出国访问时，一位美籍华人女作家送了一本《蒋碧微回忆录》给吴作人，但在入境过海关时被海关没收了，后来这本书到了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那时方丹正在编写一些画家的生平经历，就将这本书借了出来，并借给继母廖静文馆长看，因她正在写《徐悲鸿一生》，她看完后就借给我看了）。不再写了，祝你们全家快乐健康！

母字 1978年10月17日

同弟、老王喁笔问候你们。

可以看出母亲写这封信的时间，距离她去世的时间，仅仅两个月。据台湾的一位表兄刘勋谏说，母亲从看到我的信后，就整天焦虑、担忧、烦躁、着急，一直到她去世。现在看起来，是我这封信要了她的命。

1979年3月，接到盛成在美国的女儿的来信，告诉我母亲已于1978年12月16日在台北病逝，接着收到马来西亚骆新民弟弟的来信，也是同样的内容。又接到住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沈宜甲（是我的干爹）的来信，除告诉我与前两封信相同的内容外，并附了一张台湾《联合报》的剪报，内容是“蒋碧微生前藏画，放在家中被窃”。我接二连三地收到了报告母亲病逝的消息，本想和她再见面并陪伴她度过晚年的愿望彻底破灭了。我脑子里突然“轰”地一下一片空白，我应该怎么办？等到冷静下来，我才想起干爹寄来的台湾《联合报》关于母亲藏画被窃的剪报。我立即写了一份申请赴台湾继承母亲遗产的报告，并附了那份剪报。交上去后，才知道我的这份申请，当时我所在的单位还要请示统战部，该部的张副部长很爽快地就批了。因该年年初我国和美国建了交，对台湾提出了“三通政策”，我正好赶在这个火头上，所以不但批准了，而且只等了两月就拿到了“港澳通行证”，这是极特殊的情况，当时一般正常的都要等两年。

我拿到通行证后，立即申请办理离职手续，单位又要请示民政部，由该部部长批了。我得到了一笔退職金——1700多港币。接着向诸位老画家一一告别，有吴作人、李可染、黄永玉、黄胄、范曾、蒋兆和、叶浅予、李苦禅……他们每人都送

了一张画作为留念。我的大儿子小阳和我一起申请的，妻子和小儿子仍留在北京，因此这次就我们两人先去香港。

在我和这些老画家们一一告别时，其间曾经给我留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经历：这就是我去李苦禅老师家向他告别时，他听说我要去香港了，即刻显得特别高兴，并随手拿起一张已完成的画，题上了我的名字，给我留念。随后他便从他站的画桌旁，快步走到我的右侧身边，用他的嘴，附在我的右耳上，念出了我在抗战前上小学时就会背的话：“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说完后，他又跑回到他的画桌边，看着我，我即刻对他作了一个会心的微笑。我们两人共同的经历使我们不约而同地怀念这话。这时重新听到它时，却对我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也使我对我苦禅老身上保留的我们民族传统知识分子刚正的风骨产生了极大的钦佩。这一段经历已经深深地刻在我的头脑中，终生难忘了。这也是我离开北京时的一件最有价值的纪念。

5月26日，我和小阳从北京乘火车到广州，换火车到深圳，住了一夜。次日清早起来到罗湖排队，等了七个多小时才过了关。到了罗湖火车站站台上，肚子饿得受不了，可是在站台上找了半天，就只有一个卖鸡腿的。我和小阳一人吃了一只鸡腿，上了火车。香港的好朋友骆新民约了七八位朋友早已在事先约好的旺角站等我们了，所以当火车到了旺角站，我和小阳立即把所带的行李搬下车。一出站就见到骆新民和老同学陈荣侨，还有五六位没见过的朋友在等着我。原来他和陈荣侨租的房子就在火车站附近，走不多远就到家了。我们就和他们住在一起。

我到了香港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台湾。刚到香港的第三天，台湾《联合报》的美术女记者陈长华小姐就从台北打了一个越洋电话到我的住处，对我进行了电话采访。次日该报就刊登了这篇采访报导，接着就不断有台湾、香港两地的记者访问我。当时我一心只想赶紧进台湾，所以对这些采访并不感兴趣。

当时有一位老新闻工作者，名叫卜少夫，是香港《新闻天地》周刊的社长，也是我父母的老朋友。他知道我的情况后，主动提出帮我办进台湾去，不过他提出要我写一篇文章，供审批机构考虑时的依据。这时已是80年代初，我于是回去动笔准备写这篇文章。但写什么内容呢？考虑了一下，就将我过去的经历如实地写出来。写好了交给卜少夫。他接过这篇稿子后，就在二月初的一期《新闻天地》全文刊载了，约一万字。后来美国《世界日报》总编辑来香港办事，他和卜老是好朋友。两人见面后，卜老就把这篇文章推荐给那位总编辑。他将它带回纽约，在《世界日报》上全文转载。

我要赴台一事同时也惊动了台湾一批曾和母亲相熟的国民党元老。当时我的入台申请，由于赵少昂老伯的全力相助（他的一位女学生的丈夫是处理这类事件的主

管)，终于获得通过，但还剩下最后一关，即必须找一个担保人。这是最关键的一关。找谁呢，我想起母亲的一位好朋友：端木恺老伯，他在台湾党政界的地位是不用怀疑的。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请他做我的担保人。果然不出我所料，端木伯伯立即亲自找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蒋彦士，对他说：“我用我的性命担保他。”

于是不但顺利地进入了台湾，而且享受到一项最最特殊的待遇。这就是台湾有一条规定：凡是从大陆出来的移民，要申请入台，必须在第三地住满五年。这一条规定是从未有人能破例的，即使想提前一天都不准，而我当拿到入台证时，距我抵港的时间才两年零几个月。不过台湾机构要我答应三个条件：1. 不许公开露面，2. 不许接受媒体采访，3. 住满三个月必须离境。我当即全部答应了。

1982年2月初的一天，我从香港机场乘坐赴台的飞机去台北，那天正好是顺风，途中只飞行了一小时零五分钟就到了中正机场。同弟的小儿子史南仲早已站在飞机舱门口迎接我，并带我走了特殊通道。未经任何检查就出了关，看到了同弟和其他一些亲友早就在那里等候了。我和大家久别重逢，心中的感触真是一言难尽，当时也只能一一问候握手。走出机场，坐了南仲的车，直奔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母亲的家。

在家休息了两天，即去母亲的墓地上拜祭，事先买好了香烛、鲜花、纸钱等用品，坐了汽车直奔位于阳明山第一公墓内的母亲的墓。阳明山第一公墓面积很大，占了很大一片山坡，母亲的墓在最高一排中，墓碑上写着“蒋碧微女士之墓”。到了墓前，大家（同弟、刘勋谔表哥等）放上鲜花，点上香烛，烧了纸钱。每人跪下磕了三个头，照了相。呆了一会，就回来了。

看了母亲的墓碑，上面没有儿、女、孙儿、孙女的名字，说明她去世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是那么孤独地走了。刘勋谔表兄告诉我，她生前客厅里一直挂着父亲在我八个月时画我的那张素描像，她的床头柜上一直放着我穿着军装戴着军帽的半身照片，说明她一直在思念着我。假如我当年和母亲去了台湾，母亲也不会度过20年之久的孤独生活了。可能这是命中注定的，只能认命吧。

2005年10月7日

目 录

CONTENTS

我与徐悲鸿

代序	001
母亲最后的岁月 (徐伯阳)	003
我与徐悲鸿	001
1 (001) 2 (045) 3 (069) 4 (110) 5 (141) 6 (156) 7 (180) 8 (197) 9 (212)	
附录	229

我与张道藩

楔子	001
我与张道藩	001
1 (001) 2 (002) 3 (006) 4 (007) 5 (009) 6 (011) 7 (012) 8 (015) 9 (019) 10 (022)	
11 (025) 12 (028) 13 (031) 14 (035) 15 (037) 16 (040) 17 (045) 18 (049) 19 (053)	
20 (066) 21 (070) 22 (072) 23 (077) 24 (079) 25 (084) 26 (091) 27 (094) 28 (098)	
29 (101) 30 (105) 31 (109) 32 (112) 33 (118) 34 (124) 35 (130) 36 (132) 37 (136)	
38 (140) 39 (146) 40 (150) 41 (153) 42 (156) 43 (165) 44 (168) 45 (174) 46 (176)	
47 (183) 48 (187) 49 (192) 50 (194) 51 (196) 52 (198) 53 (200) 54 (202) 55 (204)	
56 (205) 57 (207) 58 (209) 59 (212) 60 (214) 61 (216) 62 (218) 63 (221) 64 (223)	
65 (226) 66 (229) 67 (231) 68 (234) 69 (237) 70 (240) 71 (242) 72 (243) 73 (246)	
74 (254) 75 (256) 76 (259) 77 (260) 78 (261) 79 (263) 80 (267) 81 (272) 82 (277)	
83 (280) 84 (282) 85 (285) 86 (287) 87 (289) 88 (294) 89 (300) 90 (302) 91 (307)	
92 (309) 93 (320) 94 (326) 95 (333) 96 (334) 97 (337) 98 (343)	
后记	348

我和徐悲鸿先生，都是江苏宜兴人。宜兴县城很小，绕城一周不过三华里多，可是它有四乡八镇，东西两泖，自古以来，它被称为鱼米之乡，还有“金张渚，银湖汊”两处大镇，稻谷产量极丰，毛竹遍地都有，尤以张渚为最。竹制品像凉垫、几椅、箩筐，价廉物美，农民们的副业收入相当可观。

以宜兴砂壶和陶器来说，每年都给宜兴带来大量的财富。除砂壶外，如日用品缸瓮坛罐，都外销各地。据说春秋时代，陶朱公范蠡就在宜兴制陶，以后到了明朝，传闻有个和尚路过宜兴某村，叫卖富贵土，村民们纷纷地对他加以嘲笑，他说：“贵土你们不想买，就买富土如何？”于是陪着几位老年人，分别到白矜、青龙、黄龙各山，指点山里产陶土的洞穴，发掘开来，但见五色灿烂，如霞似锦，从此村人用来制缸盆碗钵。

明朝正德年间，宜兴人欧子明创窑烧陶，产品越来越好。当时在县城东南四十里的金沙寺，一位不知名的和尚能制砂壶，这才是宜兴砂壶的起始；他制作砂壶的程序是抻捏细土，先做圆壶的胚胎，再挖剖中空，加上壶嘴、壶柄和壶盖，然后入窑烧制，由于全系手工制作，壶上留得有手模指印。明朝学宪吴颐山先生当时恰在金沙寺读书，他有一个书童名叫供春，偷偷摹仿老和尚的手艺，或作龙蛋，或作方形。他手制的砂壶出来呈栗色，有点像古铁，壶上不但有螺纹，还有手指手掌的腠理，古朴典雅，大方自然，可惜传世很少。清末民初，听说全中国只剩下两把，其中一把还是缺少了壶盖的，这种茶壶，便叫供春。想不到由于供春的一时好玩，他制作出来的茶壶竟成了稀世之珍。

和供春同时的制壶高手，又有时大彬，他再创新意，朴质坚实，不求妍

美，制壶时运刀成字，书法很好，这是一般人所不能和他相比的。供春壶和大彬壶在宜兴砂壶中最名贵，昔人曾有诗云：“宜兴作者推供春，同时高手时大彬。”就是指的这两种名壶了。



▲山鬼（徐悲鸿，1943年）

宜兴茶壶天下闻名，而且绝少有仿制的相似品，原因是别处没有这么好的陶土。另外它的特点是，除了能够保持茶汁的色香味外，夏天茶叶冲泡久了，还不会发霉发馊。嗜爱品茗的福建人，所用的多半是宜壶，茶泡了后，再用大碗盛滚水，将茶壶放置滚水中，让茶汁内外受热，据说这样泡出来的茶，味道特别香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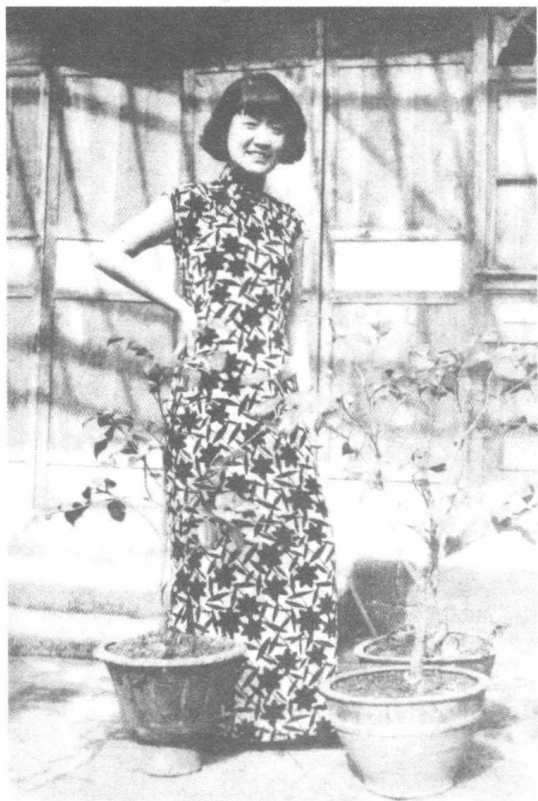
宜兴风景以山水秀丽著称，而且附会着许多生动有趣的轶闻传说。拿最著名的善权、张公两洞略作介绍。善权洞又叫善卷洞，传说帝尧驾崩，帝舜要把天下让给卷，卷说：“我逍遥天地间，心意自得，要天下干什么？”从此入善卷山遁隐，善卷的名称即由此而来。又说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也发生在宜兴。善卷洞口有梁祝读书台，山下有祝陵庄，也叫祝家庄。宜兴到今还有黑黄两色大蝴蝶，既大且美，宜兴人叫黑蝴蝶为梁山伯，黄蝴蝶为祝英台，相传就是梁祝的化身。此外，乡人传说古时善卷洞口有红门寺，里面有花和尚广设机关，据说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里的火烧红莲寺，就是以此作背景。

善卷洞深邃曲折，阔大无比，入门处两旁石壁上有青狮白象的天然形象，走进去是一片平阳，四周逐渐升高，仿佛戏院里的包厢，可以俯瞰正厅。洞里到处钟乳悬垂，玲珑剔透，尖端常见涔涔的滴水。早年没有电灯，游洞要手持火把，一路摸索。高低不平地走了一小时许，路忽中断，乃见一泓池水。水中备有小船，游人乘船前进，桨槽咿唔，发出回声。传说洞内有毒蛇巨蟒，潭水深不见底，而且还远通浙皖江海，的确是有点心惊胆战。行行重行行，好不容易望到一线微光，等到船身往侧一转，眼前豁然开朗，原来已到了洞口，这真是一番奇妙的经历。

张公洞比善卷洞还要高大宽敞，相传张道陵曾居此求仙，张公洞的名称是为了纪念他的；宋朝刘商亦曾仙隐于此。游人一进洞门，便有上不见顶，下不及底之慨，顿觉自己的渺小。钟乳石就像瓔珞四垂，形势相当壮观。洞中黝黯，伸手不见五指，成千累万的大小蝙蝠栖息于此，吱呀怪叫，颇带点恐怖气氛。内有一处名鲫鱼背，上缘一条狭窄鸟道，才可承足，两边窄岭直泻，颇像鱼背，故有此名。胆小的游人，只好手脚并用，爬过背去。俯看两侧犹如无底深谷，一旦失足，那就非常的严重了。自从京杭国道通车以后，国内寻幽采胜的人士，到这两洞来游玩的很多。

宜兴的东西二洿，其实是两座大湖，东洿在东门外，形长；西洿在西门外，形圆。西洿面对铜官山，远远看去只见一片汪洋，有如浩瀚大海。沿洿风光绝佳，且可直通浙皖，商船过时，红帆如画，京杭国道有一小时许的公路旅程，就沿洿而行，夹道垂杨，烟笼十里，一派江南风光。

历史上有名人到过宜兴，或与宜兴有过渊源的，实在是不可胜数。楚霸王项羽原是下相人，即今苏北宿迁附近，但当他叔父项梁杀了人后，便避仇吴中，亦即以阳羨为中心的江东地带。阳羨是宜兴的旧称，楚霸王起兵吴中，那是历史上有记载的。他带了八千子弟纵横天下，后来垓下兵败，大叫“无颜见江东父老！”确与宜兴有关。至于眉山学士苏东坡，更曾在宜兴留下一株手植木本铁梗海棠，和一则阳羨买田的佳话。东坡手植海棠现存闸口镇邵树棠先生旧宅，老干可二三抱，子根孙枝几已合为一体，海棠盛放时不知几千万朵，这可以说是东坡先生从眉山带来，赠给邵先生先祖的最佳礼物，这事县志族乘都有记载。东坡居士官拜常州太守时，常到宜兴游山玩水，蛟桥石碑“晋征



▲蒋碧微像

西将军周孝侯斩蛟之桥”，据说就是他的手笔。又宜兴蜀山宋朝以前原称独（獨）山，去彡改蜀，也是为了纪念苏东坡和宜兴的深厚友谊。谈到阳羨买田，更是历史上的著名掌故：某次苏东坡在独山一带畅游，盛赞那儿的山水幽雅，曾经出资买田数亩，村屋一栋，预备将来告老致仕后在此耕读；当晚酒后步月，听到附近有哭泣之声，循声往寻，见一老妇悲戚不胜，上前寻问，原来她儿子因为家贫而把祖屋卖了，明日迁出，便将无处容身。苏东坡问明买主就是自己，哈哈一笑，当面把卖契烧掉。

精忠报国的岳飞，跟我们宜兴人也有一段轰轰烈烈的掌故。南宋康王即位于南京，改元建炎，时金兵南下，铁骑践踏大宋半壁河山。四年金兀术攻常州，宜兴县令迎接岳武穆率兵驻屯，利用宜兴的山川形势，一口气连胜六仗，把金兀术打得败回淮西，岳飞再邀击于静安，这才奠定了南宋的偏安局面。

金兀术兵败溃退北行时，岳将军亲率大军掩杀，赶到西泅，金兵早把湖中船舶搜劫殆尽，宋军一时无法渡过。是宜兴老百姓一时自告奋勇，一夜之间，筑成了三百多米的一条长堤，使岳飞大军飞渡，把金军杀得血流成渠，直到现在这道长堤还叫岳堤。

宜兴县城在东西两泅之间，运河贯穿县城中心，将县城一分为二，建有大桥三座，中间的一座名蛟桥，最高大，也最有名，传说是晋朝周处除害斩蛟的地方，现在还有“蛟桥夜月”一景。

我家住在城南，提起南门大人巷蒋家，宜兴人大概都晓得。蒋家住宅是宜兴最大的一幢房子，是我曾祖父在江西做官多年，回乡时一手建造的。合抱的栋梁柱子，还是他特地从江西选购的良材。房子一共五进，进门有门廊，两旁木架排开全副执事，包括肃静回避牌；院口有两座石马墩，三间轿厅；后面便是大厅，正中高悬匾额“诒德堂”，堂后进内宅的门，题额“吾爱吾庐”；往后三进住屋，一律是七开间的楼房，二进和三进之间有一个大花园，侧门通到另外一座院落，十几间平房，那是佣人的下处。

院子北角是后门，后门正对着学前巷文庙，一池泮水，上面架着石桥，宜兴文庙是庄严的学宫，也是有名的胜迹。鹅黄色的雕墙，占据了整条学前巷北，东西两端各有一座大牌坊，一额“道冠古今”，一镌“德配天地”。民国以前，官民人等到此都要下马步行。

蒋家是宜兴大族，始祖汉丞亭侯，传至远祖世昌公，元祖敷文公，高祖凤逵公，都封赠通奉大夫，那是由于曾祖父蒋诚公的功勋治绩得来。曾祖父的事迹，《宜兴县志》上有详细的记载。

蒋诚公，字致斋，在前清咸丰初年，因为作战立功，选授江西临江府樟树镇照磨，他把地方上治理得很好。当地有一条长堤，屏障清江下乡和丰城上乡的山。清江上乡水流壅塞，常有灾害，因此两乡乡民年年械斗，打官司，不知冤枉死了多少人命，把附近一带闹得民穷财尽。曾祖父亲自勘察河道，增筑

堤闸，将争执多年的水利问题彻底解决。同时他又选拔当地的壮丁，编训团练，保卫乡土。不久广东来的太平天国军攻陷丰城，知道樟树镇的团练厉害，不敢来犯，整个地区幸获保全。后来曾祖父升任江西新淦知县。当时新淦失陷已经两年，曾祖父用水军克复县城西岸，据河扼守，乘太平军不备，渡河会合官军，一举克复新淦和临江府城，这时离他受命视事还只三个月。正要安抚地方，清廷又派后来做到两广总督的张鸣岐接替他的职务。张鸣岐刚刚抵境，谍报吉安方面有溃匪流窜，他闻讯匆忙逃走。曾祖父亲率团练五百人，迎头痛击匪军，俘虏匪徒多名，并且生擒他们的首领，余匪绕道逃走，张鸣岐这才再赶回来就任。入夜，潜伏的匪贼击杀湘军，曾祖父力促张鸣岐快去弹压查办，他不听，接连五天，被杀的湘军已达八十余人。张鸣岐惧罪，于是谎报上峰，说这事发生在他未接任前，企图把责任推到我曾祖父身上。但是湘军方面仍然据实报告，张鸣岐的谎言不攻自破。

论功行赏，曾祖父应该升任监司，可是江西巡抚派人向曾祖父示意，索取一笔贿赂，曾祖父不理，巡抚恼羞成怒，于翌年转任广东前，将曾祖父牵连在新淦大狱中，弹劾罢官。幸好沈葆楨继任江西巡抚，知道曾祖父的冤屈，替他申报复职。这以后曾祖父又做过吉水、南丰、萍乡各县的知县，明慎庶狱，以德化民。吉水白沙乡积年抗不缴纳田赋，曾祖父晓父老以大义，惩罚村妇丁壮中叫嚣捣乱的人，从此革除陋规。在南丰，当地保甲倚仗财势，交结官府，占人妻女，前任官员置之不闻不问，曾祖父把他抓来痛挞，一县为之称快。早年洋人在我国传教，神父的势力很大，凡有教民跟别人打官司，神父就遍为关说，然而曾祖父不买洋人的账，一向据理立决。凡此种种，都表现出他持正不阿、勤慎严明的作风，因此他在每一处任职，都极受民众爱戴，离任时送行的络绎不绝，连被他判过刑的也都感悟远送。

此外曾祖父更能孝友尚义，小时候高祖母生痔疮，他曾剜肉疗亲，果然奏效。他平时自奉俭约，但是对于施与助赈，却从不后人。《宜兴县志》上说，他捐助善款，先后不下万金，虽子孙亦不得而知。

曾祖父有四个儿子，我的祖父居长。祖父讳萼，字醉园，小时候聪明颖悟，从储炳煥先生读书。他随曾祖父在江西南昌任职，应书院课试，每次都得冠军，因此文名大噪。光绪二年中举人，时人认为他的才识学问不仅为诗人文

人而已，又推许他的诗为迦陵以后第一人。后来他任高邮州学正，丹徒县教谕，一生清廉自守，绝口不言贫。辛亥革命，满清官吏走避一空，他把丹徒任所的礼乐器具、管钥印信一一封存，交给地方绅士典守，自己飘然回家。他的著作有《醉园诗存》廿六卷，《醉园齋白词》一卷，《阳羨唱和集》二卷，并曾分修《宜荆县志》。

二叔祖讳彬若，字次园，工诗词，才华敏妙。光绪十二年和祖父祖母的诗词合在一起，印行了一部《爱吾庐集》，另著有《次园诗存》六卷，《替竹庵词》五卷。

三叔祖讳联庚，字弋香。他是一位读书着重实际功用的人，性格机警敏锐，光绪初年以通判职衔分发湖南，负责督审局的工作，判案每能当机立断，历任按察使都很倚重他的才能。当时湖南人上北京打官司的风气很盛，有些讼师一个人到北京可以提控二三十件案子，因此光是湖南一省的京控，一年就达三百余件。北京湖南距离遥远，交通不便，被提往北京受审的人，旅途客死、监狱痍毙的不计其数。三叔祖为了改良风气，革除苛政，力请巡抚卞宝第下令重案仍由省鞫，一般案件则请巡抚亲自审断。这样一来，湖南的京控案件，立刻便减少到每年不及十起。

三叔祖在湖南做了二十年的官，先后任过桂阳知县，凤凰厅同知，湘潭知县，所到之处，政绩昭彰。凤凰厅的民众为他立长生牌位，祀在当地的傅公祠里。他对于审案断狱，最具特长，湘西一带流传着许多他昭雪冤屈的传奇性故事。宁远有某甲和某乙有世仇，某乙将铜便顶和带钩秘密埋藏在附近山谷，某甲耕田掘了出来。乙便诬称是他康熙年间的远祖某生员的殉葬之物，因此控告某甲盗坟。按照清律，盗坟要判死刑。当地知县刑逼某甲认了罪，案子送到三叔祖处，他根据《学政全书》，指出便顶服制是在雍正朝代才有的，康熙年间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揭穿了某乙的谎话，同时也救了某甲的一条性命。在武陵县，有两家人先争田后来控告谋杀，甲的田契是康熙年间发给的，乙的田契则发于雍正朝，知县把田地判给乙，不久甲再控告乙谋杀了他的儿子，知县用刑，将乙屈打成招。三叔祖审理这桩案子，他立刻指出两次断狱全属错误，因为根据《赋役全书》，雍正年间田契已改为印纸，所以断定乙的田契伪造；此外甲控乙将他儿子强按水中淹死，三叔祖一查那孩子身上并无撑拒捆绑的痕



▲红梅（徐悲鸿，1943年）

迹，同时水塘距离乙家很近，他认为谋杀仇人之子，决不会引到自家附近。于是他审定这死尸不是甲的儿子，而是他人自溺，其结果，竟然完全正确。

三叔祖晚年宦途不很满意，后来又罢了官，因为没有钱，回不了家乡，死在湖南，连殓葬的费用都筹不出来。

祖母储慧，字啸凰，是祖父业师储炳焕先生的女儿，自幼读书，深明大义，闺中喜爱作诗，时有佳句。二十岁嫁给我的祖父，两人都善吟咏，志趣相投，夫妻感情弥笃。我家虽然是世家，但守寒素风，崇尚节俭。祖母和二叔祖母举凡刀匕、井臼、针线诸事都要亲自操作，所以《宜兴县志》列她为才淑第二位，但却说她持家有健妇名，事亲更有孝妇声。

她督促伯父、父亲的学业非常勤恳。伯父、父亲读书读到深夜，倦极想睡，她就念几首诗词，吩咐他们写下，她并且说：“我倒不是自己不会写，而是想叫你们多认识些文字的用法，久而久之，将来自己做诗做文章，就不觉得难了。”我伯父九岁能

诗，便是祖母亲授。

后来曾祖母因为久病不愈，两腿瘫痪，随时需要人扶持侍候，祖母的身体虽好，毕竟日夜辛勤，过于劳瘁，她逝世时只有五十七岁。祖父敬重她的贤孝，写了将近一百首悼亡诗，祖母自己则有《哦月楼诗存》三卷刊布于世。

祖母逝世以后，祖父因为伉俪情深，始终没有续弦，仅在六十三岁时娶了一位苏州籍姨太太，负责照料他的生活起居。

祖父生两子两女，伯父南笙公讳兆兰，在晚清至民初的词坛上，颇负声名，存有《青藜庵诗词集》，这里录下他的词二首：

蝶恋花

忆昔儿家楼上住，邂逅君来，楼下开朱户。巫峡峰高云不渡，声声步履关心数。众里相逢频笑语，道是无情，心比秋莲苦。可奈今生缘已误，明珠和泪还君去。

记得仙源同饮宴，手酌琼浆，含笑殷勤劝。博箸欢娱嫌夜短，灯前媚眼频流眄。别后思量千万遍。今日重逢。翻等寻常看。一缕情丝双婉转，来生愿作同功茧。

两位姑母，长姑因为祖母逝世，决心不嫁，奉侍祖父。次姑则婚嫁同县的任氏。

祖父自光绪三年侍同曾祖父返籍，八年任高邮州学正，不久又升迁镇江府教授，他到高邮，父亲侍他同行。那时父亲（蒋梅笙）已经十二岁，由于襁褓逃难时受过风寒仆跌，身体稍弱，但他勤于攻读，文章琅琅上口，而且就在那时，已经开始抄存诗稿。

父亲在光绪十四年再回故乡，当时宜兴知县万肖园先生对他的学问非常赏识，他曾应全县士子考试，获得第一名。万肖园先生从此亲授学问，指示治学门径和书家运笔的方法，甚至从他的薪水中给予奖励。二十五岁，初应科举考试，县试和院试都是第一，后来又从古文大家上元颐石公先生习业，曾把《韩昌黎全集》熟读六七遍，从此学业猛进。乙巳岁试再考一等第一，然而就在那年满清政府废除科举，父亲从此断了做官的念头。兴办学校，从事著述，到七十二岁逝世为止，他为学术教育工作尽瘁四十余年。

光绪十六年，父亲二十岁，和我的母亲戴清波女士结婚。

母亲系出名门。外祖父戴裕源先生，字鉴泉，宜兴画溪里人，咸丰己未科举人，同治辛未大挑，选为广东知县，先后权知澄海、新会县事，他是一位能吏。

他当澄海知县的时候，当地风俗，有所谓降童，说是神降其身，大说“神话”，迷惑民众，其实是无赖之徒跟庙祝串通，他们叫民众张灯结彩，扮演戏文，不说的话，就会发生疫病，因此家家户户焚香捐钱，年年轰动全城，劳民伤财。外祖父明知这是无聊的迷信，派人把降童抓来，重重地打板子，他果然说出了个中秘密，从此把这迷信风俗全面禁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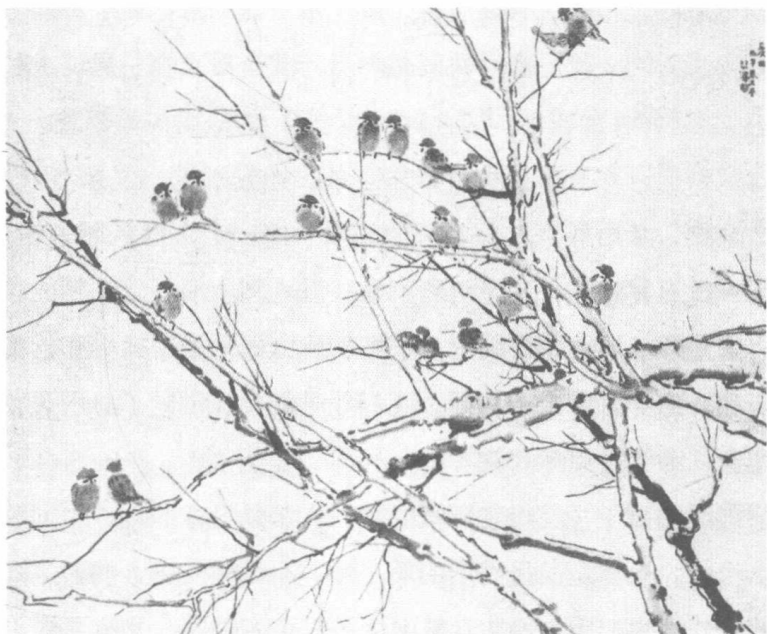
同治甲戌年，日本人攻占台湾，兵船窥伺广东海口，外祖父因为澄海是潮州门户，乃在崎嶇海旁建筑炮台，以备大敌，闽粤的方面大吏赞叹这位江南书生居然懂得兵法。他做新会知县，当地有陈、林二族，都是住在海边捕鱼为生的，姓林的有钱，姓陈的穷，林家侵占了陈家几十里海界，官司打了许多年，换了几位知县都不能决断。外祖父亲到现场勘察，利用县里的史乘参证土名，为他们立界，并且嘱咐他们今后互不相侵。早年广东民间风气好械斗，遇有讼事官府不能公平裁判，就聚众互相争杀。外祖父所到之处，械斗总是无形地消灭，那是他公正严明，民众翕服的关系。某次澄海有同村的两族，突然反目生仇；两族建起栅栏，筑就炮台，用大炮往返轰击。外祖父听到消息，立刻邀同营将，各乘一艘炮艇，轻装简从，驶往制止。没有料到两族把关的人不但不加理会，反而发炮吓阻。外祖父屹立不动，厉声呵责他们大胆狂妄，同时晓谕他们：求福求祸，就在一念之间。苦口婆心地说服了他们。再进村一看，却只剩下一些白发老翁，问起话来，都说对方的不是。又到对方据守的前村，情形依然如此，仅有一个壮汉，挺身而出，侃侃争辩。外祖父说：“只怕你就是罪魁祸首吧？”转脸喝令两个衙役，把他捉住。然后他向营将说：“给我两把钢刀！”营将把钢刀递给外祖父，他再吩咐衙役说：“路上如果出事，你们给我立刻杀掉这个人，否则的话，我就砍你们的脑袋！”

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外祖父押解壮汉刚一出门，四周立刻涌出无数壮丁，把外祖父一行团团围住，叫嚣暴跳，扑过前来要夺下那个壮汉。衙役奉命正要挥刀，那壮汉连声大叫，制止他的手下不可造次，然后他自己跪在地上向外祖父磕头，请求饶他一死，暴乱的民众也都成排地跪下，外祖父方才命令他

们从此息争，把军械缴出来全部投入海中。两门互击的大炮，便载在炮艇上带回县城，结束了这场大规模的械斗。

外祖父急流勇退，年纪不到五十岁便辞官回乡，优游林泉。他离任时，县民怀念他的治绩，攀住他坐骑的辔勒不放，希望他能够继续留任。

他在宜兴家乡安享余年，因为家境富足，门第又高，晚境过得十分闲适自在。他也喜欢做诗，和我祖父是时相唱和的诗友。



▲晨曲（徐悲鸿，1936年）

蒋戴两家联姻，是当年宜兴一件盛事。母亲嫁妆里的衣服够穿一生一世，陪嫁的黄金用秤称。母亲容貌端庄，气质高贵，为人精明能干。她结婚时才十七岁，处在那么庞杂的大家庭里，她能处得上和下睦，实在很不容易。

母亲小时候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她领悟力强，且又好勤问，自从嫁到我家后，由于我父亲的指点，以后便也学会了做诗。当时我父母住在楼上，他们居室题名为“引凤楼”，我还记得父母房里挂着一幅《吹箫引凤图》，画的是男女二人并坐吹箫，天空中飞翔着一只凤凰。是何人手笔，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列仙传》载：“春秋时有人名萧史，善吹箫作凤鸣，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遂教弄玉吹箫，后弄玉乘风，萧史乘龙，飞升而去。”大概父母亲因为自己都会吹箫，所以才引用这个典故，来命名所居。因此他们所唱和的诗，也名

为《引凤楼诗草》。

一九三九年八月，父亲寓重庆沙坪坝，任教重庆大学，曾两度遭日机轰炸，他老人家以为这卷未曾印行的诗稿早已付之一炬，每每表示痛心惋惜。不料最近我为了写回忆录，整理资料，竟从箱篋中寻出原稿，以及母亲唱和作品的全部。二三十年前父亲的遗憾，到今天却奇迹般地珠还合浦；但父母逝世已久，墓木早拱，走笔至此，不禁黯然。

父亲和母亲心志相投，恩爱逾恒，读了本章末附录他们唱和的诗后，可以想见当时夫妻生活的一斑。有时我回想起当年父亲母亲在引凤楼上的那些旖旎风光，常不免悠然神往，以为可为《浮生六记》的故事先后辉映。

父亲母亲都很喜欢音乐，吹箫弄笛之外，还爱唱歌。父亲有很好的嗓子，后来还学会京剧，亲朋集会，总要请他高歌一曲。上海商务印书馆开业不久，从外国运来一批风琴发售，父亲听到消息，派人到上海买来，就放在我们的楼上。父亲母亲无师自通，弹得很好，姊姊和我大概是受了遗传和感染，一直都对音乐有兴趣，由于父母亲的教授，我们儿时便会弹钢琴了。后来我到欧洲一住多年，也曾拜师学过提琴和钢琴。

早先中国歌曲很少，父母亲所唱的歌，大都是日本曲调，中国歌词。

光绪十七年，也就是父母婚后的第二年，祖母储太夫人病逝。光绪十九年五月，我的大姊诞生，因为她生在五月，所以取名榴珍，又字文楣。二十年冬月底母亲又生一子，不三天便夭折。二十三年春三月十八日，我的哥哥钟灵出世，父亲非常喜欢他，手记中形容他丰面伟躯，满月时便懂得嬉笑，当年十月跟母亲到外婆家去，得了吐奶呕血的怪病，又殇。父亲曾痛心地记述：“反躬自问，不识何事获罪于天，而夺吾爱之酷也，呜呼，伤矣！”

我出生于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二月二十九日，正巧我家东书房一棵海棠盛放，祖父为我取名棠珍，字书楣；小时候我每到东书房，便指着海棠说：“这是我的花。”三年后弟弟天麟诞生，不到两岁，竟又夭不假年。父母伤心之至，都曾做了殇子长诗，尤以母亲的八首《哭亡儿天麟》，一字一泪，沉痛万分（见本章末附录）。

在天麟弟以后，还有丹麟、润麟两弟，因此我一共有五兄弟两姊妹，只是长大成人的，仅姊姊、我、丹麟三人而已。润麟弟最小，三岁时因痘症不治。

丹麟弟字景彭，小时候便懂得笃志向学，性情又温和，许多人都夸他像父亲。在校读书，对数理化兴趣很高，同时并喜爱英国文学。不幸于十九岁时染患肺病，辍学养病，但仍致力于国学研习，曾选辑历代名作，编了一部二十多万言的《天地间有数文字》，类别凡六：文、骚赋、诗、词、曲、小说。识者以为“搜罗宏富，抉择精严”，认系希有之作。

丹麟并能作诗，刻图章，尤其写得一笔好字，有许多父执辈对他期望甚高，总以为像他这样好学多才，应该可以继承父亲治学的衣钵。然而他却在一九三〇年病逝牯岭，得年廿六岁。自此，白发椿萱，就剩下我们姊妹二人。

我家和我同辈的兄弟姊妹一共有二十多人，在姊妹中有三个长得比较丑，我是其中之一，加以从小体弱多病，还爱夜哭，似乎不大讨人喜爱；只有父亲怜我，每在深夜，抱我绕室而行，直到我重新睡着为止。有一回祖父在家，很偶然地抱我一次，我却不知趣地在他身上遗尿，从此他老人家就不再抱我了。

童年时代印象最深刻的是过年，那么大的房子，那么多的人口，过年真是令人兴奋无比之事。过年是从腊月二十四送灶开始，以后家家户户便忙着做米粉团。团子分红白绿三种，有馅，馅也分甜、咸、肉三种，色香味俱佳，人人都爱吃。此外还要做年糕、炒花生，花生一炒便是好几箩。最麻烦的是制供果，全用手工，以米粉抻捏而成，涂加彩色，做得就像鲜果一样，柿李橘桃，色色俱备，这一项工作，向例由我父亲担任。至于桃片、胡桃、酥糖，各种细果茶食，更是成批成批地买进。从前的大家庭采办年货，数量之多，那是现在所无法想像的。

大年三十，父亲伯叔们在黄昏以前，便将峨冠博带、花钗大袖的祖宗神像一一挂好。这些立轴画像，栩栩如生，孩子们看了不仅肃然起敬，而且心里更是兴奋异常，因为这时大人们乐意向我们一一介绍祖先的生平事迹，这是我们一年之中听故事的最好时机。

祭祖的时候，红烛高烧，香烟缭绕，全家大小齐集，长幼有序，垂手肃立，由年龄辈分最长的祖父率领，开始行礼，以下顺序上前磕头，这是除夕向祖先辞年的隆重典礼。祭供完后，家人便开始吃年夜饭，吃年夜饭必须全家团圆，在外地的人，无论如何都得赶回。饭桌上，祖孙父子婆媳妯娌兄弟姊妹笑语殷殷，那是天伦之乐的最高潮。饭后一些辈分小的，再前前后后地向长辈磕

头辞年。

小辈辞年以后，接着是长辈分发压岁钱，所以我们这些小辈虽然头磕得很多，但是收入确也不少；而且当年的压岁钱不像现在，只是一个红包，每人还有一红漆盘的花生，上置各种干果和糕饼，最上面才是用红头绳串的制钱，因此有吃有用，孩子们皆大欢喜。

除夕要守夜，可是孩子们必需睡觉。守岁守到子时，该封门了，封门的任务由父亲伯叔们执行。睡觉前孩子一人一袭新衣，和寸糖糕片一起放在枕头边，母亲再三叮咛，明天元旦，一觉醒来便换新衣，吃糖糕，取其除旧更新，称心如意，步步高升。

元旦，什么时候开大门，要先查黄历，算时辰，看方向，开门也是父亲他们的事。一开门就要请利市，放鞭炮，以三牲祀天。这里的所谓三牲，是一刀肉、一条鲤鱼、一只鸡，供案摆在院子里，大人照样上香磕头如仪。从初一到初三，大门连开三天，因为要布施，发饭。白米饭一大箩一大箩地搬出去，有些人家也做无馅的米粉团发放，叫作财主园子，取其便利。来领饭的不一定是本县贫户，大多数还是逃荒的饥民。这三天里不管领饭的人有多少，士绅家里绝对不可供应不继，讨饭的人川流不息，周而复始，所以这是一笔很大的消耗。贫民或灾民把饭讨回了家，米饭晒干贮存，团子磨成粉，讨得多的，可以供应一家大小三四个月的粮食。

家里面，从元旦起算是开了赌禁，孩子们掷状元筹，玩升官图。反正大家的压岁钱很多，输点赢点都不在乎。

年三十那天必需处处打扫得干干净净，因为年初一开始不准扫地浣洗。初一起身先要磕头拜祖宗，再一房房地去向长辈拜年，年初三再向祖宗上一次供，撤下供菜，糕点照旧。年十五元宵节夜再供一次，到了正月十六方才把祖宗的神像取下收藏起来，新年欢乐，也就到了意兴阑珊的时分。

儿时无忧无虑的黄金时代，便这么浑浑噩噩地度过，但是也有几件难忘却的往事，到现在还能很清晰地记得。

祖父的性格，刚直方正，思想守旧。辛亥革命那年，他辞官回家，七十多岁的老人，居然身体壮健如常，每天早晨，伯母、母亲带领我们去他房里请安，他老人家早已盥洗完毕，吃过早餐了，记忆中他始终没有衰老龙钟的模

样。祖父最喜欢花木，因此我们家的庭院经常青葱满目，花团锦簇，每年玉兰桂花开放时，浓郁的香气，远播宅外。这两种名花的花瓣，都可以做成甘美的食品。玉兰花可以煎饼，桂花可以腌花酱，孩子们眼望着这么好吃的花，不免馋涎欲滴。可是平时祖父将摘花悬为厉禁，直到落英缤纷时节，方才叫人摘取，亲自监督，绝对不许伤及枝桠。就这样，玉兰花和桂花瓣聚成一升一升的，分送各房，制成美食。

祖父做过清朝的官，当然他是忠于满清的，而父亲锐意求新，满清鼎革，许多人都把脑后那根长辫子剪掉，但父亲唯恐祖父责怪，一时还不敢剪，又怕出门在外被人笑话，迫不得已，央请母亲做了一顶法兰西式鸭舌帽，把长辫子盘在头顶，戴上帽子。后来父亲觉得麻烦，干脆把辫子剪掉了。可是在家的时候，仍旧戴上帽子，祖父以为他的辫子还盘在头上呢。

祖父对孙儿女辈一视同仁，只有我的堂兄，因为他是长房长孙，而他的亲生母亲又死了，所以一直把他带在身边，并且指定大姑母负责照料他的饮食起居，后来堂兄考取两江师范，一切费用，也都是由祖父负担。

我们家各房的兄弟姊妹很多，于是便设了一所家塾，请一位吴老师为我们授课，束脩由各房自送，并且轮流供应伙食。家塾中除了我们的八叔，和老师带来的两位路姓、任姓附读同学年龄比较大一点，其余都是七、八、九、十岁的儿童。每天在书房里大致六七小时，一人一张小桌子，咿咿唔唔地念书。我是七岁进书房启蒙，开始认方块字，描红，写九宫格，以后慢慢读《千字文》。因为父亲不赞成女孩子读那些《论语》、《孟子》，所以我所读的是《世说新语》、《虞初新志》那一类有故事的书。同时他又从外面买来新编的课本，请老师为我讲解。

我小时候相当顽皮，在书房里坐不住，便和一位堂妹借故溜出来，到大厅的院子里捉蜻蜓，拍苍蝇，拿来喂蚂蚁；看蚂蚁列队搬运，觉得津津有味。有时老师在睡午觉，我们便到大门口学那些小贩的叫卖声，拉开嗓子叫嚷一番，一旦被老师发现，不是挨打，便是挨骂。不过老师对待女生比较宽容，从来不打我们，倒霉的都是那些哥哥、弟弟。

在书房里读书这段时间，我一直患着疟疾，每三天发一次，六十年前治这疟疾没有特效药，宜兴的迷信，说这种病是有鬼附身，可以躲得了的。于是母



▲蒋碧微像，摄于南京

亲常叫一个老女佣，在我疟疾将发前，把我背到城隍庙里去玩上几个钟头，因为据说小鬼不敢进城隍庙的；说也奇怪，有时候竟真的把病躲过去了。但是隔了不多久，它又会再发，这样时发时止，这一场疟疾整整把我折磨了三年。但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几十年来，我就没有再害过这种病。

度过了两年多的家塾生活，到了宣统元年，父亲在家设立女子两等小学，自任校长，我便成了第一届的学生，正式进学校读书。学校设在南门大街旧书院，和家里距离很近，上课下学，都是步行来往。

念了几年书，字认得多了，我便开始看小说，而且看得很入迷。有一次在病中说胡话，居然都会是满口的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在十二三岁那些年，我已读了《三国》、《水浒》、《西游记》、《七侠五义》等说部。还有一部《安邦定国志》，我会用宜兴腔调念给母亲听。奇怪的是，我对于姑母的一部《红楼梦》，当时竟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宣统三年，我长姊文楣出阁，嫁给同县程伯威先生。姊夫的父亲蛰庵公讳肖琴，是宜兴的名士，文章诗词冠于一时，门人弟子，不知有多少。在他六十大庆时，及门弟子为他在西沅边建一别墅，题名“雪堂”，取程门立雪之意。姊夫在民国初年，毕业于复旦公学，后来又去日本留学，中英文根底都深，因为出生世家，孤高自傲，故从未出外做事，只在宣城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合办一所“精一中学”，在家乡颇负盛名。

宜兴旧日婚俗，自有它一套礼制。先是男家请媒作伐，如果双方家长认为合意，便将男女二人的八字送请算命先生推算，要是没有冲克，便即交换八字，也就是将生年月日时辰，写在红庚帖上，套以红纸封套，装进精制的朱漆木盒，送到对方家里，这叫下定，也叫小定。小定以后，男女的终身大事就算定规。这种方式定亲，并无年龄限制，小至指腹为姻，大至婚嫁之前，当事人是从不过问的。

男女到了结婚之年，照例还要有一次定亲，俗称大定。大定的时候，男方送往女家的有聘金、首饰、衣料等，此外还有花生几箩，桂圆、荔枝、核桃等干果之类无数，女家回赠男方的是新郎的衣料、靴帽、鞋袜等，另有鸡蛋数百乃至千枚。这些喜果喜蛋有用红绒线扎缨络，垂着穗子，看来十分美观。双方收到订亲的赠与，马上就把喜果喜蛋分送亲友，表示喜期已近。

婚期要选黄道吉日，由男家向女方提出请求，商议好了，双方也就密锣紧鼓地开始准备起来。直到结婚前三天，女家便把妆奁送到男家去。大致新房里的家具，除掉一张床由男家置备外，其余一切都是女家送过去的，此外女家还需制备绸面棉被若干条，因为凡是新娘的长辈，都要送上一条棉被，这叫做抬被，其余便是新娘的衣箱首饰等。

结婚前一日，女家在中午时分，大张喜筵，邀请亲友女眷，吃“待嫁酒”，以示告别。

到了结婚那一天，先由媒人和“领轿人”引领龙凤花轿到女家去，这叫“发轿”；领轿人数最少四位，请的都是英俊漂亮的少年。花轿到了女方门前，女家的大门一定是关上的，这时男家就把早预备好的红包请媒人转交女方，女家才打开大门，这名叫“开门钱”。女家将花轿迎进中堂，摆好香案，再由媒人回到男宅，等到吉时已近，才引领新郎，乘蓝呢官轿，全副执事，鸣锣开道，到女宅行亲迎礼。这时便要举行古老的“奠雁礼”，奠雁礼之由来已有两千多年，其意义是表示新郎对新娘的爱情坚贞，永矢不渝，即使将来万一丧偶，他也将和孤雁成单一样，永不再娶。仪礼规定需用鸿雁一对，因为鸿雁难寻，所以改用家鹅瓜代，新郎郑重其事地向花轿三跪九叩首，算是立下了誓愿。

新郎穿的是官服，花翎粉靴，身上负担既重，心情更是紧张，行礼时不但一点错不得，而且还要提高警觉，以免触犯了习俗忌讳。譬如新郎迎亲，一路

走到正厅，重门叠户，靴尖却绝对不可碰触门槛，否则便算是有辱女家门楣，大不吉利。记得姊夫迎娶我姊姊的时候，由于我家门槛既高且多，姐夫虽由媒人扶持，迈开步子依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就怕一不小心脚底下闯祸；而我的堂兄堂弟，更是虎视眈眈，全神贯注地盯着姊夫足下，他要是稍稍地碰触一下，堂兄堂弟会毫不客气地抄起门闩，打他的腿。

新娘上轿，例由哥哥或弟弟从闺房里抱她出来，送上轿子，这一路上新娘脚不沾地，上轿要照预先定的吉辰，新郎自己登上他的蓝呢官轿，遥遥前导。这一行列很长，鸣锣开道，乐声扬，街头行人纷纷驻足观赏。

花轿抬到男家，也是停在吉堂，新娘这时先不下轿，凤冠霞帔地端坐轿中，男家事先请好两位有福气多子多孙的太太，先拿剪刀与尺，递到轿里给新娘过一过手，再用一只熨斗，熨熨新娘的衣角。这两项仪式都有用意，“新娘衣工秉刀尺”，那表示她已参与夫家的家事，熨斗熨熨衣角，意思是要她守礼服帖，顺侍翁姑。

然后便把新娘扶出轿来，和新郎在礼堂正中并肩而立，在祖宗面前行礼磕头，再互相交拜。拜堂之礼是从唐朝就有的，王建曾有句云：“双杯行酒六亲喜，我家新妇宜拜堂。”交拜更见诸《通礼》，是夫妇相拜，交拜过后，用红绿绸两幅，由新郎新娘各执两端，新郎在前，新娘在后，徐徐地从礼堂走向洞房，宜兴人叫这为“红绿牵巾”。一路需铺陈红毡，新人们足不沾地。

一进新房，先要坐床撒帐，新婚夫妇男左女右，面朝里并肩坐在床上，媒婆和喜娘信手抛掷铜钱喜果，说吉利话。相传这一个仪式始自汉武帝和李夫人，武帝预嘱宫女遥撒五色同心花果，乃与夫人以衣裙盛之，说是盛多得子也多，因此媒婆和喜娘都把铜钱和喜果向新人的怀里抛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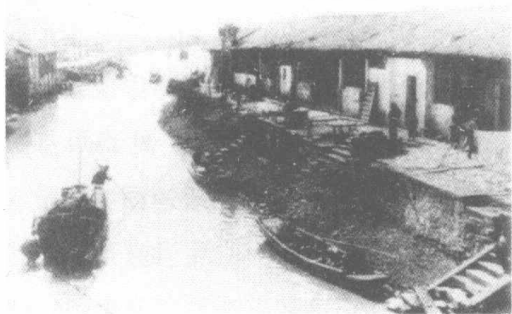
新娘头上兜着红罗巾，四角有穗，例由新郎轻柔地挑开，直到此刻，新郎才算是见到他床头人的庐山真面目。这时礼节已成，新郎便退出房外。媒婆将房门关上，让新娘略事休息，并重新整装。

男家这一晚请的喜筵，在宜兴叫做“送诸房酒”，全部都是男宾。当席散后，一些年轻的小伙子便簇拥着新郎把他送入洞房，而诙谐杂陈、恶作剧连连的闹新房，也就于焉开始。等到客散后，新郎新娘再举行合巹宴饮交杯酒。

新婚翌日，新郎要陪新娘回门，在岳家吃过午饭，再回家里。第三天，男

家又大开盛宴，举行所谓的三朝酒，请的全是亲友女眷。筵席开始以前，先要举行见面礼，从翁姑起，凡是亲属，新娘都必需见面行礼，而且还要叫唤一声，这叫做“开金口”，从这时起新娘的名分才正式确定。见面礼行过以后，由预先选出的四位最美丽的少女，替新娘安席。

安席开始，丝竹齐奏，细乐悠扬，厅里厅外早已挤满了想要看安席小姐的少年儿郎。因为六十年前，闺阁中小姐多半足不出户，男士们想见到年青少艾，只有这么一个理想时机。等小姐们从后堂出来，有的鼓掌，有的喝彩，评头论足，形成十分欢欣热闹的局面。安席小姐走到厅前，左右分立，由媒



▲徐悲鸿故乡宜兴纪亭桥小镇门前河流

婆递杯于左，送筷于右，小姐们用兰花指姿，高举杯筷，直和两眉相齐，然后按照音乐的节奏，轻移莲步，倒退而行，走到新娘席前，为她安好杯筷，再用绣帕轻轻地拂拭椅子，象征性地拂去灰尘。最后是由媒婆代表新娘，向安席小姐回敬席礼。这以后是新娘出堂坐席，喜筵才开始。宴后，新娘回房另换新妆，等到黄昏以前，新娘出来坐在大厅上，以便随时送客。这时任何路人都是可以走进来看新娘子，一直到客人散光，大门关上，这一场婚姻大典，也就宣告结束了。

我姊姊便是采取这种婚姻方式结婚的。

女子两等学校毕业以后，父亲把我带到上海，住在西门外林荫路增祥里卅八号。一座大门，内有两幢房子，邻里就是父亲大同学院的同事平海澜先生。在上海住了些时，故乡宜兴两等女子学校增设初级师范，由我姊夫的母亲潘逸如女士担任校长，我为了继续升学，再回宜兴。

一九一一年，我才十三岁，竟由父母之命订了亲，这是我一生中的大事。可是我当时什么都不懂，后来听说是我的一位堂姊做的媒。堂姊是我四叔的女儿，嫁到苏州查家，她有一个小叔查紫含先生，年貌和我相当，于是趁着一次归宁的机会，和我母亲提了这门亲上加亲的建议。

查家原籍浙江海宁，和我家是世交。查紫含先生的父亲查亮采先生，曾做

过荆溪知县（荆溪和宜兴后来并成一县），能诗善文，也是风雅中人。在宜兴的时候，和我家几位长辈都很投契，暇时并与我祖父、伯父、父亲时相唱和，做了不少诗词。我有两位堂姊，先后许配查家，只是一位四姐还没过门男方便先夭折。因此当堂姊向我父母提起这门亲事，他们毫不犹豫，一口答应下来。我自己却并没有把这件事搁在心上。

一九一五年初，祖父的面颊上突生一瘤，当时祖父已经八十一岁，父亲闻讯和母亲弟弟回宜兴觐省，但父亲因为学校上课不能久缺，又在三月一日返沪，留母亲在家侍奉汤药。延到四月初，病势渐渐沉重，五日，家里打电报给远在上海的父亲，请他即速回家。父亲在深夜接到电报，第二天就向学校请假，并且筹措川资，忙乱了一天，七日赶到家中，祖父已经过世一天了。以后父亲每次提起这件事，都感到非常的憾恨和悲恸。

宜兴人办丧事，繁文缛节，相当隆重。祖父逝世后，第一件事，便是叫来“百家奴”，即刻向亲友们报丧，这时从祖父所住的那进屋子起，所有的中门大门一齐打开，以便接待望丧的亲友们。第二天请阴阳先生来推算大殓时日，定在当天酉时入殓，幸好祖父的寿衣寿材老早就准备好了，入殓的大事，咄嗟可办。

大殓前先要为死者净身，然后殓棉，这些事都由请来的“百家奴”代办。净身的水不能用家里的，必须孝子带着香烛，到河边汲取，或者向别人家买。取水的时候孝子还得磕头行大礼，这叫“买水”。殓棉是用做成套子的丝棉，将死者全身套起。据说丝棉不易腐烂，可以保持尸骨完整。然后再穿上衣服，衣服必需单数，祖父穿的是前清的官服，从里到外，一共是九件。大殓时只有近亲至戚来送入殓。大殓后，便在灵前供上香案牌位，并设一张靠背椅子，把死者生前所穿的衣服挂在椅背上，仿佛生前穿着的样子。以后逢七都要上供，到五七那一天，宜兴的习俗，是由女儿女婿出面开吊，叫做“做五七”。那一天，窗扇门槛一律拆卸，从大门到灵堂，白篷白幔，一片缟素。吊客络绎不绝，一批一批地来到，手里或提几盒银锭，或拎两串纸镪，一进大门，司阍先擂一通鼓，进二门击一次磬，到了灵堂，又有吹鼓手奏起细乐。行礼的时候，孝幔里便传出哭声，这是雇来的“哭丧人”代劳的。

吊客在灵前行过了礼，招待便把他请到大厅席上，吃一碗鸭面。宜兴是水乡，鸭子又肥又大，这一碗鸭面的做法是相当讲究。

为了超度亡魂，还要拜忏七日，到最后一天晚上，便是“放焰口”。正厅上挂满了彩色的菩萨画像和经文幡帜，当中搭起台来，台上放两张八仙桌，面对着天井，俗话说这是给鬼唱戏，天井里面大概都是鬼。大和尚坐在台正中，两旁各坐两位和尚。这一台焰口要做一整夜，必须念完两卷经文。父亲唯恐和尚念经偷懒，自己端坐在和尚身边，一页一页地翻对经文。

祖父的葬礼是在他逝世后七个月，当年十一月二十日举行的。父母都从上海赶回家里，落葬前又开过一次吊，吊客约五百人，他老人家归葬于清泉乡金鸡山祖茔。

我第一次见到徐悲鸿先生，是在宜兴家里。那时徐先生在初级师范教授图画，和我的伯父姊丈都是同事，那时我已离开了初师，只听到大家都在说他的名字取得怪，以及许多有关他的轶闻轶事。如像他服父丧，白布鞋里却穿双红袜；又说什么他兼授和桥镇始齐女学的课程，天一亮由城里步行三十里赶去上课，中途过家门而不入。在那时候，他被看做与众不同的特殊人物。

有一天他到我家拜访我的伯父，在大厅上坐着谈话。我听说这位闻名已久的大人物来了，一时好奇，借故走过大厅去看了他一眼，但是我对他并没有深刻的印象。

一九一六年，张勋大闹复辟怪剧，想把已经推翻的满清皇帝拉上台，他所率领的辫子兵骚扰江南一带，宜兴城里风声鹤唳，一夕数惊。某一天一大群辫子军冲进我们家来，我大哥挺身而出厉声喝阻，辫子兵居然说要找花姑娘，后来虽然把他们撵走，可是人人担心骇怕，因此我在六月间又去上海。这时候父母已经搬到哈同路民厚南里五十号，父亲则在复旦大学任教。

当时有一位同乡朱了洲先生，和我们还有点亲戚关系，他在上海务本女校教体育，常来我家向我父亲请教学问，称我父母为先生师母。他是我们宜兴的一位名人，年轻时为了破除迷信见庙就打菩萨，弄得地方上的善男信女十分恨他。他体力充沛，食量惊人，据他自己告诉我说，有一次他从宜兴乘小火轮到无锡，和许多男女学生同桌吃饭，他一时兴起，跟一位女生赌吃饭的东道，女生吃一碗他就吃两碗，讲好谁输了谁付账。他以为一个女孩子饭量大不到哪儿去，哪晓得那女生吃了九碗还在添，而他已经吃到十八碗了，实在不能再吃，于是只好认输。然而这一顿十八碗饭听听也是吓坏人的。

后来他到上海，追随陈英士先生从事革命工作，英士先生壮烈成仁，还有一批朋友经常跟在他身边，有饭吃饭，有粥喝粥。那时候有个笑话，说朱先生想洗个澡都得筹一笔钱才行。徐先生到上海以后，第一次来我家拜访父亲，便是朱先生引见的。

徐先生一到我家，就给大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因为他外貌英俊，态度落落大方，不拘小节。那时候，他对我们一家都非常亲切随和，父亲作一首诗，他会击节称赏；母亲烧一道菜，他也会夸赞一句“天下第一”。父亲母亲都十分喜欢他，同时念他独身在外，难免另眼相看，多加照顾。没有多久，他简直变成我们家里的一分子，只要有空，他总是耽在我们家里。通常星期四下午他学校没有课，吃过中饭他便来了，到星期五早晨才赶去学校；星期六下午来后，更要到星期一早上才走。

相处久了，我们渐渐地知道他的家世，以及他从小到大的奋斗历程。那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徐悲鸿先生原名寿康，是离宜兴城十八里的屺亭桥人，他的父亲徐达章公能诗工书画，一共生了三子三女，因为家境贫寒，一家八口都靠他的父亲卖画鬻字为生。中年达章公信佛，常在寺庙中住，四十多岁便逝世了。徐先生是长子，九岁从父学画，十七岁时父母为他娶亲，由于他不满这门婚事，离家出走，后来他被父亲抓回来结婚。十八岁那年生了一个儿子，他为他取名劫生，意思是“遭劫而生”，但是家里的人为他改名为吉生。

在这段期间，他不愿住在家中，跑到上海念了些时书。到十九岁那年，父亲死后他身为长子，当然要负担家庭生活。

迫于无奈，只好回到宜兴，一口气接了三家学校的聘约，一是宜兴城内的



▲徐悲鸿父亲徐达章所绘《课子图》

初级师范，其他两校在离城卅里的和桥镇，一为彭城中学，另一为始齐女学。

宜兴是水乡，船舶四通八达，交通一向便利，可是徐先生喜欢走路。轮到上和桥镇的课，他黎明即起，健步如飞，一口气跑三十里路，他不觉得苦，每次经过自家门口，也不进去看看家里的人。

教了整整两年的书，他不愿被家累拖住，想要进修，于是悄悄地跑到上海，结识了一位好朋友黄做寰先生。黄在商务印书馆担任外务，交游广阔，热心慷慨，记忆力特别强，三教九流的人他都熟，当年在上海也小有名气。黄还没有结婚，单身住宿舍，徐先生便住在他那里，住的问题虽然解决，但是生活费用一无着落，往往一天仅吃两个粢饭团充饥。最穷的时候，脱下布马褂，当过四十个铜元，赎时付了十四个制钱的利息。

正在走投无路，毫无办法的时候，忽然看见哈同花园在报纸上登广告，公开征求画仓颉像，据考证仓颉有六只眼睛，徐先生画了一张去应征，获得录取。哈同花园总管姬觉弥，派周剑云坐汽车去迎访徐先生，把他接到哈同花园，和姬觉弥一谈，深获赏识，就此请他担任园中美术指导一类的工作。当时哈同花园设有仓圣明智大学，以及新式舞台，徐先生曾经为“文明戏”画过布景。后来，姬觉弥知道徐先生有意去法国留学，攻研美术，想先把法文学好。于是姬觉弥答应帮忙，由哈同花园供给一切费用，徐先生因而进了震旦大学法文专修科，生活问题同时也得到解决。

徐先生从家乡出来的时候，是瞒住他家里的，当时他在学校改名换姓叫黄扶。老太太晓得他到了上海，曾派人去找，结果是没有找到，幸好他家里还有几亩薄田，勉强可以维持一家的衣食，后来他的二妹招赘了一位木匠师傅，干脆把前面的三间门面打通，开了一爿木匠铺，家里的生活就靠木匠铺的收入维持。等到徐先生进了哈同花园，他才和家里恢复了联系，不时地还寄点钱回去，贴补家用。

徐先生的故事确曾使我感动，并且使我对他产生了一种钦佩和同情兼而有之的复杂感情。那时候我只十八岁，刚刚从古老守旧的宜兴，来到五光十色的上海，在这接受新潮流思想最快最多的中国第一大都市，我的生活天地仍局限于一楼一厅的家里，我所接触的人物只有家人邻居和至好的亲友，我对我自己的生活目的懵然无知。

徐先生这时闯进我们的家庭，给我带来了新奇的感觉，秘密的喜悦。我觉得他很有吸引力，不仅在他本身，同时也由于他那许多动人的故事，以及他矢志上进的毅力，都使我对他深深地爱慕和钦佩。

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因为在我那种守旧的家庭里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也从来没有交谈过一句私话，即使有偶然的机，我和他都会尽量地避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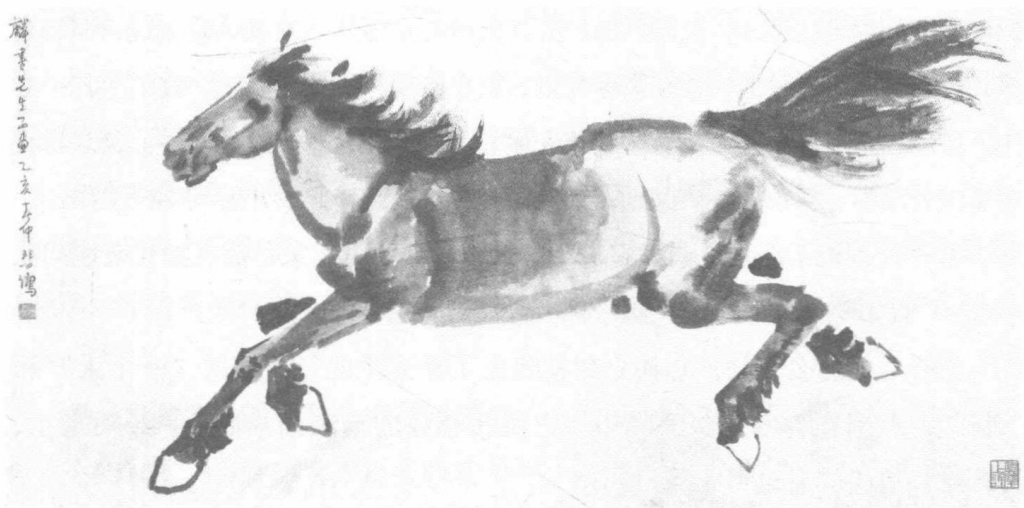
▲1915年，徐悲鸿20岁时照片

后来他的太太在家乡生病，病势沉重，徐先生家里不断来信催他回去，他却踌躇不决。当时有一位在哈同花园结识的朋友，很通人情世故，一再地劝他，说是不论你爱不爱这位太太，万一出事，你将来终生都会感到遗憾。徐先生听了他的话，这才决心回家，到家后，不料家里已把他的太太送去常州看病了，是雇了民船去的，一来一回，大概要好几天工夫，徐先生没有等待，便又折回上海。据说他的太太看了病回家，不久便逝世了。因此他们夫妇始终没能见到最后一面。留下一个儿子，由祖母带领，几年后也因为出天花而夭折，才只七岁。

有一天我听到父亲在母亲面前谈他，我表面上装做若无其事，其实我正聚精会神地在听。父亲夸奖徐先生，认为他的人品才貌都难得，他断定他是一个可造的人才，母亲默默地听着，不时嗯啊两声，或者是颌首同意。那时候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最后，父亲慨叹地说：

“要是我们再有一个女儿就好了。”

在那一瞬间我仿佛受了极大的撼动，父亲的话意说得太明显了。虽然徐先生不曾为死去的妻子而伤心，但在他老人家的想像中，少年丧妻毕竟是很悲哀的事，而且他以后也总要再结婚的。为什么要“我们再有一个女儿”呢？因为父亲母亲的两个女儿，我姊姊已嫁到程家，我也和查家订了亲。如果再有一个女儿又将怎样？很显然的，他希望能有这样一位才貌出众、画艺高超的女婿。



▲奔马（徐悲鸿少年习作，本图由徐小阳先生提供）

就在这个时候，查紫含先生，也就是父母为我订的那位“未婚夫”，忽然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这个错误的本身如今看来已不足为奇，但是我从来没有和他见过面，尤其不曾听到有关他的为人性格，于是我便举一反三，否定了查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查紫含先生原来在苏州求学，大概是因为他知道了父亲在复旦执教，特地转到上海复旦大学来念书。他有一个弟弟，那时还只十一二岁，也在上海读小学，正好和我的幼弟丹麟同班，这位查小弟时常到我们家里来玩。

那一年暑假，大考之前，查小弟来找我的父亲，说他的哥哥叫他来，想要一份父亲所出的国文试题。我当时觉得很难过，很不满意，因为我认为他不应该这么没志气，想作弊，这件事给我心理上极大的刺激，从此以后，我对他便有了不好的印象。

一天早晨，母亲为我梳辫子，徐先生坐在一边看，嘴里在和母亲聊天。母亲随便地告诉他说：查家明年说要来迎娶了。我听了不觉一震。后来梳好了头，母亲下楼做饭，徐先生也告辞离去，剩下我一个人在楼上，思前想后，不禁悲从中来，就伏在桌上饮泣。这时忽听楼梯急响，徐先生又匆匆地跑回来了，原来他到弄堂口，才想起忘掉了一条手帕，回转来拿，正好撞见我在那儿哭着。他像是很了解我的心情，伸手拍拍我的肩膀，说了一句：“不要难过。”然后折身下楼。

那年，父亲在复旦大学的一位同事林天木先生，他的夫人便是大名鼎鼎的薛锦琴，他们都是广东人，民国以前，薛夫人曾在上海张园发表革命演说，慷慨激昂，轰动一时。这时他们住在民厚北里，就在家里办了一间小学，收了十几个学生，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有一天林先生和父亲谈起，想找一个助手。父亲看我在家闲着没事，学校的距离又近，因此就推荐了我。自此我开始到学校工作。

有一天，朱了洲先生到我家来，父亲和母亲都不在家，他突如其来地问我一句：“假如现在有一个人，想带你去外国，你去不去？”

我听了他这么一问，心头立刻就映出了徐先生的影子，这“一个人”和“外国”，同时在构成强烈的吸引，它使我心底的暗潮汹涌澎湃，不可遏止，耳畔仿佛响起嘹亮的叫喊声：

“去呀！去！你为什么不去！难道你想等着查家来迎娶？”

其时，房间里是极端的静默，朱先生正凝神地瞪视着我，他的目光好像要穿透我的心胸。我茫然地站着，衡量自己一生中最严重的问题，去？不去？都将决定我未来的命运，然而当时我只有种紊乱与无助的感觉。

也许是朱先生已经猜中了我的心意，他开始低声地告诉我说，这个人就是徐先生，他在最近时期要到法国留学，他很想带我一同到法国去。

我当然听说过徐先生要到法国的事，可是我连做梦也不曾想到，他竟要带我一同去！

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徐先生带我去究竟是什么用意，由于我一向对徐先生的好感和爱慕，以及逃避查家的即将迎娶，我在那么紧张急迫的气氛里，禁不住朱先生一再连声地催逼，竟脱口而出地说出了我的答复：

“我去。”

朱先生很满意，可是他一再地叮嘱我，这件事千万不可泄漏，否则将会有很大的祸事。最后他又说：关于出国的一切准备和手续，徐先生自会替我办理。我的神志逐渐清醒，想起自己是一个已经订婚的人，在当时的社会风气是绝对不能解除婚约的，所以只好默许秘密出走。

这以后徐先生便私下为我取了一个名字：碧微，还刻了一对水晶戒指，一只上刻“悲鸿”，一只镌着“碧微”。他把碧微的名戒整天戴在手上，有人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很得意地笑着回答：

“这是我未来的太太的名字。”

人家追问他未来的太太是谁呢？他神秘地笑笑，不再答复。

不久，徐先生便开始积极地准备一切。他通知所有的朋友，说他就要动身到法国去，姬觉弥先生送了两千元的旅费，我们家里都给他钱过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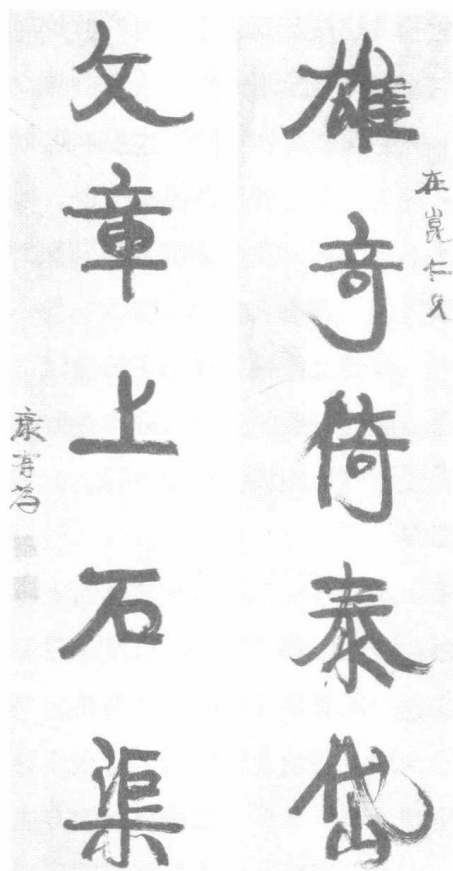
他扬言某月某日启程，其实他仍旧留在上海，为我申请护照，办理出国手续，购买必需的日用品，还做了许多衣服。花色料子和式样，全都按照他所喜爱的挑选，而我后来看了也很满意。因为他是艺术家，懂得色调的配搭和式样的合宜。

那一段时期他匿居在辛家花园康有为先生的家里，当时康有为已经收他为弟子。他的秘密，除了康家，就只有朱了洲先生和我知道。

他和我必需通消息的时候，信就寄到林家的学校去，想不到林家的学校，在这时帮了我很大的忙，成为秘密通信的地方。也曾有过两次，他叫我到辛家花园去看他，我便向学校告了假，悄悄地前往。

一九一七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由上海到法国的航线不通，出走的事已经决定了，时间非常紧迫。徐先生决定带我先到日本，再看风色。他把一切出国事项都办好了，便订了日本船博爱丸的舱位，博爱丸定于五月十四日清晨驶往长崎。

十三日我接到了徐先生的秘密通知，他知道我从来没有单独出过门，在信上指点得特别详细。他要我当晚天黑以后，悄悄地离开家，雇一辆黄包车，到爱多亚路长发栈去找他。他并且叮咛我，雇车要找留辫子的车夫，因为那种人比较老实可靠。



▲康有为书法

由徐先生和朱了洲先生密商定计，到了我离家出走的那一天，朱了洲先生故意来邀请父亲、母亲和二姑出去吃晚饭，饭后再去听戏。他们一走，家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当时大概是傍晚六点多钟，我看看天色将晚，暮霭已沉，便竭力使自己镇静，把早先预备好的一封信，放在母亲摆钱账的抽屉里面。我知道母亲每夜一定要打开这个抽屉，她不会看不到我的留书。我那封信故意写得含含混混，大意是说我深感人生乏味，颇有想去自杀的意味。信放好了，我就两手空空地离开了家门。邻家已经亮起了灯火，弄堂里还有小孩子在笑闹游戏，我心慌意乱地匆匆迈着步子，走到巷口，按照徐先生的嘱咐，叫了一部黄包车。把地址告诉了车夫，他拉起来就跑，就这样，我离别了鞠我育我十八年的父母，开始走向艰苦人生的旅途。

到了长发栈，徐先生已经等候得很着急了，他一见到我如约而至，不禁大喜过望，但是我们还没有交谈，他又领着我另外换了一家栈房。

那一夜，我戴上了那只刻着“碧微”两字的水晶戒指，从此我的名字也改成了“碧微”。

博爱丸徐徐地驶出了黄浦江口，一出海，便碰上了恶劣的天气。从窗口外望，层层叠叠的云霭，堆砌在海天之间，风高浪急，波涛冲击着船舷，船身立刻便剧烈地颠簸。一阵头昏，只想呕吐，一会儿，徐先生也和我一样地晕起船来。

四十八年前第一次从事海上旅行，记忆中只是痛苦的回味和一片渺茫的空白，因为一路上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航行时间多半躺在舱里，呕吐得胃中空空如也。风浪小时才能勉强挣扎起来，到餐厅里进食。西餐味道不好，刀叉更不会使用，我怕人家笑话，暗暗注意别人的动作，心摹手追，依样画葫芦。徐先生却不理这一套，他用自家的方法吃大菜。

由于晕船，无法欣赏海上风光。船到长崎，身体仍然觉得虚软，脑子里也是昏昏沉沉的。乘火车到达了东京，我们找了一家旅馆暂时住下。

每每我望着这个极其熟悉却又像是非常陌生的男人，我内心喜悦，但也有如梦似幻的感觉。我经常在问自己，这一切，难道果然是真实的吗？

语言不通，举目无亲，初到东京的时候，处处都感到不便。幸好不久以后，徐先生遇见几位熟朋友，其中有一位是无锡人龚先生，他介绍我们到他所

住的“下宿”，租了一间六席小房。房东是日本人，楼下除了自家住用，把另两间余房分租。我们的右邻住着一位日本小姐，她大概是在上班，每天早出晚归。楼上三间，住的全是中国学生。其中一位杨先生，是新疆督军杨增新的儿子。他大概有意于我们隔壁的芳邻，因此我们常听到他在向那位小姐说：“あなたは美しいですね”，意思是：“你很漂亮。”

我们所住的那间房实在嫌小，唯一方便的是左邻盥洗室。一日三餐，由房东太太亲自送来，通常是两菜一汤，白米饭一小桶，放在一只小方漆盘中，盘下有四只矮脚，落在地面就是一张小几，吃饭时席地坐在榻榻米上。我们对于这种吃法很不习惯，尤其菜肴虽然是中国做法，口味却相差不可以道里计，于是我们常去中国饭馆吃饭。当时唯一感到高兴的事，便是秋凉时分在东京也可以吃到淡水蟹，滋味还很不错。据说这种蟹是早年中国水手移植过去的。

我在生活方面最感困扰的就是洗澡。日本盛行男女同浴，大家都赤身露体地共浴一池之内，他们习惯了当然不以为奇，但在我们中国女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我们的“下宿”里没有浴室设备，要沐浴一定要上澡堂，就是日本人叫做“风吕屋”的。在我们附近的一家“风吕屋”，总算是男女分浴，可是中间只隔一道薄薄的木板短墙，女池的隔壁就是男池。我第一次进去，一见浴室里有那么多人，吓得真想回身逃走，却是不好意思，只好硬着头皮，用最快的动作脱衣入池；殊不知又被同浴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然后半用手势半说明，教我怎样洗东洋澡：先在池外用肥皂擦身，冲洗干净以后，再下池子去泡。我一一遵照做了，这才下水；一转眼，又看见仅在腰上系条毛巾的澡堂男工，提着水壶，登登登地在池边木板上跑来跑去，他对于浴室里的女人固然是视若无睹，但我却已羞得无地自容。从此以后，我是再也不敢去澡堂洗澡了。买了一口瓦缸，请房东替我烧水，就在缸里解决清洁问题。

房租伙食，每人每月日币二十一元，以当时国内物价比较，算是相当贵的，不过那时我根本不懂家务事，倒也不觉得生活程度高了，会有什么了不起。

然而，不通日语总归不行，于是请了一位老师到家里来教，徐先生和我一道学习。这位老师当然不懂中国话，授课的时间就用笔谈，可惜的是化了半年的工夫，却什么都没有学到。上日语课以外，徐先生又教我练字，临的是

《郑文公碑》，每天要写好几张。我很喜欢日本的习字纸，写好逐日保存，记得回国时一扎扎地放在地上，已有二尺多高。

刚到日本的时候，因为人地生疏，又是初次离开家庭，精神上很感苦闷，徐先生不大了解我当时的心境，因此他不能给我多少安慰。我万分惦念着我的母亲，不知道他们在我离家出走以后，会怎样的着急？更忧虑他们将怎样处理这件大事？是不是亲戚朋友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出走？种种问题，都使我日夜难以安宁。最感烦恼的还是我和徐先生私自离家，悄然出走，就怕人家知道，我为此改名换姓叫做碧微，因此常有不见天日的感觉，在精神上负荷很重，时时都在担心被人家发现我的行踪。每次有人来看徐先生，我就必须躲躲藏藏，可是屋子只有一间，无处匿身，只有避到盥洗室里去。要是徐先生和客人谈得高兴，那我就得长时间地站在厕所里，大受其罪。

楼上三位中国同学，可能已经知道了我们的秘密，龚先生有时就会调侃地从楼上朝下喊：“老徐，你们宜兴有位蒋梅笙，你知道吗？”梅笙是我父亲的号，他这样提名道姓，显然别有用心。我听了以后，心中更加难受。

三个月了，姐夫从复旦大学毕业，东渡日本留学；他找到了我们，使我得到无比安慰。因为我只有一位姊姊，所以我一直把姊夫当做我的长兄，他在东京，我就等于有了亲人，经常来往，心情渐渐地宽松。但是也正由于他的叙述，使我知道了在我离家以后父母的焦急与紧张，以及出走事件在上海与家乡如何闹成轩然大波，父母为我蒙受了多少冤枉指责，讥讽嘲笑，使我这颗彷徨的心，更会无限地疚愧和忏悔。

原来那天夜里，父亲母亲听完了戏回家，看到我的留书，知道我已离家出走，当时是万分惊骇忧伤，焦急彷徨；但是他们认定我决不会去自杀，而且马上就联想到这件事一定跟徐先生有关。

于是两位老人家连夜去找朱了洲先生，因为他们料准朱先生一定知情，可是朱先生矢口否认，甚至于装做情急无奈的模样，在两位老人面前赌神罚咒，说他倘若知情不报，来日一定会被炸弹炸死。父亲母亲不得要领，废然返家。全家紧张会商的结果，事关蒋家的声誉，无论如何父母是坍不起这个台的，问题实在是太严重了，追不得已，只好决定通知亲戚朋友，说到苏州去探望舅父，忽然得了急病，不治身亡。

第二天，母亲专程赶到苏州，去找吴绂卿先生商谈，绂卿先生是父亲的结拜兄弟，同时也是我的义父。他老人家心思细密，说是光这样掩饰还不够，就怕查家以为我真的死了，按照古老世家的习俗，他们可能会向我家要求把我的“灵柩”归葬在他家的祖茔，因为我既然已与查紫含先生订亲，在名分上就是查家的人。母亲着急地说这可怎么办呢？义父说事到如今，也只好假戏真做了。他叫母亲先预备一口棺材，以防万一。

母亲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瞒天过海”之计策，果真在苏州买了一具棺材，可是棺木是空的，舁抬的时候必然会被人觉出。母亲向义父问计，义父只好偷偷地叫人在棺材里装些石头，然后抬到一家寺庙里，暂时寄厝。

一方面还得通知亲戚朋友，说我不幸夭亡，听到消息的人不免将信将疑。这件事多亏母亲和义父，总算暂时地掩盖下来。不过，家乡、苏州和上海。认识我家的人都在暗底下议论纷纷，因为事情来得太突兀了。

“噩耗”传到了姊夫家里，姊姊信以为真，手足情深，立刻便痛哭起来。倒是姊夫知道这件事必有蹊跷，他请我姊姊莫哭，他说应该探听一个究竟。

伯父那边也接到了我父亲的通知，但是伯母绝不相信，她一向和我母亲不大和睦，难免在伯父面前说了许多挑拨的话。同时我和徐先生出走的事也在渐渐地传播开来，这一下闹得满城风雨，讥评四起。伯父写封长信大大地教训父亲一顿，骂他管教不严，竟让订了亲的女儿跟人逃走！

父亲母亲为了我的事情，不知遭了多少气恼，受过多少委屈。民国初年，一般人还很守旧，我家又是宜兴望族，书香门第，出了这种从所未有的事，那简直是地方上天大的新闻！好事的人渲染附会，消息越传越广。不久以后查家也听到了风声，他们当然是非常的愤懑，不过痛定思痛，也晓得真相如果揭露，对于他们自家同样的是大失面子，所以他们也就不再深究。只是后来，我的那位堂姊夫，也就是查紫含先生的胞兄，曾经在穷极无聊的时候，两次向我母亲借钱。

几年以后，查紫含先生也结婚了，母亲还特地赶去吃他的喜酒。

由于我的事情，又牵涉到一桩公案。我的堂妹玫君不顾伯父伯母的反反对，竟自作主张地嫁给了朱了洲先生，使大人巷蒋家一连出了两个大逆不道的女儿。这桩公案本来和我无关，可是伯父伯母在盛怒之下，居然把这笔账也算到了我的头上。



▲黄震之像（徐悲鸿，1926年）。徐悲鸿早年生活艰难，曾得到黄震之救助

朱了洲先生在家乡的时候，曾在一次学校运动会上，得罪过我的伯父，伯父对他的印象一直很坏。偏偏伯父的第五个女儿，我的堂妹玫君，竟会爱上了朱了洲。玫君生来娇小玲珑，天真活泼，是朱了洲先生将她从宜兴带到上海，考进务本女校，住堂读书。早年的女校管理学生生活，非常严格，平时不准外出，只有在星期天才准出来，而且必须有家长的请假信。可是有一次，朱先生用我父亲的名义，把玫君带出学校，一宵未回。

那一年的暑假，玫君回家，口口声声要嫁朱先生。伯父伯母不允，可是她的意志十分坚决，两位老人家一怒之下，声言一文陪嫁也不给。后来，玫君果然嫁给朱先生了，可是两夫妇以后感情并不好。

十一年后，到了一九二八年，徐先生应邀到苏州艺专讲演，我也同行。那时伯父伯母就和朱了洲夫妇住在一起，外表看来似尚融洽。不过有人告诉我，朱了洲又另结新欢了，他那个女人也住在苏州，因此他们夫妇时生龃龉，后来还是离了婚。

听了姊夫的种种叙述，我觉得万分的惭愧和难受。父母生我育我，我不但没有报答亲恩，反而给他们带来如此深巨的打击和伤害，思前想后，我不禁痛哭失声。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才鼓起勇气写信回家，向两位老人家请求饶恕。

父母爱子女的那一颗心，真像汪洋大海一样的深邃，我以为父母的复信一定会对我痛加指责；或者他们将余怒未息地根本不回我的信，只当我这个女儿真的在苏州暴病死了。可是，我接到他们的回信时，双手捧着信纸，几至哽咽不能成声。啊，慈祥的父亲母亲，尽管我罪无可逭，他们毕竟还是原谅了我。

日本的印刷术优美精良，他们所出版的艺术书籍相当丰富，还有许多仿印的原画，都是徐先生视为至宝，爱同拱璧的。于是他经常到各书店去浏览观赏，碰到合意的便毫不考虑地买它下来。有时候他也要我陪他同去，当时我太年轻，对于艺术简直一窍不通，根本就不发生兴趣，往往是坐在一旁等他，一坐就是半天，那种滋味实在不大好受。

然而我当时还没有想到，更不好受的滋味还在后头。我们在东京住了半年，旅费和生活费用花得不多，倒是徐先生大量地买书买画所费不貲，因此我们带来的两千块钱很快地就要完了。东京居，大不易，再拖下去就得挨饿，于是我们只好在当年十一月间，又从东京黯然地回到了上海。

一到上海，起先还不敢回家，找一家旅馆住了几天。母亲闻讯赶来探望，她见我们住旅馆既不方便，花钱又多，因此就在民厚里一位朋友家里替我们租了一间厢房，要我们搬过去住。这地方离我们家只隔几条弄堂，我们每天都可以到家里吃饭。

徐先生再去拜见康有为，康先生说现在欧战正酣，你们既不能启程赴法，最好还是先去一趟北京，看看能否弄到一个官费，将来出国，两个人的生活可以过得宽裕些。他又说，如果我们愿去，他将给我们介绍几位朋友，请他们帮忙。

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十二月间，我们又踏上了北行的航程。从上海到北

平，照说应该走津浦铁路，但是徐先生为了要省钱，他决定乘海轮到天津。

我们乘的船很小，也不知道徐先生买的是什么舱位，一上船，便发现舱房里一片黝黯，上下铺位共有十个之多，而且男女混杂，我们舱里就只有我一个女人，其余都是做小生意和做工的。处在这种环境里面，我内心非常苦恼，可是又不好说什么。挨过了几天漫长的日子，船到天津塘沽口，那里居然没有码头，上岸的时候，中间有一截路必须涉水而过，我没有办法，只好雇一个工人把我背上岸去，当时真觉得难过，满心委屈，只是连一句怨言都不敢说。

由于朋友的介绍，我们认识了住在北平东城方巾巷的华林先生。华林先生住的是一座四合院，两进深，各有两列厢房，华先生住后进，一排三间。他让出一间正房给我们，中间客厅公用，租金呢，一家一半。

徐先生拿了康有为先生的介绍信，去看罗癭公先生。罗先生是康有为的大弟子，和樊樊山先生、易实甫先生，同为当时北京的三大名士，在政教两界，说话都很有力量。罗先生夫妇对我们非常好，一口答应帮忙，随即写信介绍徐先生去看教育总长傅增湘，请他给徐先生一个公费名额。傅先生看了罗先生的信，立刻答允照办，不过当时欧战未停，航线不通，他说只要停战开航，他马上就派遣徐先生以官费生的资格，去法国留学，继续深造。

这样，我们就在北京住下，一心一意等待世界大战结束。希望虽然有了，生活还是艰困，华林先生看出我们的窘迫，便推介徐先生去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蔡先生也是热心而爱才的人，北大没有艺术系，他便专为徐先生设立了一个“画法研究会”，聘请徐先生担任导师。北大同学中凡是对艺术有兴趣的，都可以参加研究。“画法研究会”有一位干事陈邦济，浙江东阳人，他和狄膺先生是同学好友，由他的介绍，我们认识了狄先生，以后他便常来我们家走动。当时狄先生在北大很活跃，身兼好几个会的总干事。

北大给徐先生的薪水是每月五十元，但是要搭发什么交通票，拿到市面上要打七折或八折，所以实际收入只有三十多块。另一方面，由于华先生的关系，我们又认识了李石曾先生夫妇，李先生刚刚开办孔德学校，请我去教音乐。孔德学校就在我们住处的附近，来往倒也方便。

时值民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小康局面，国家无事，北京城重又恢复了歌舞升平的气象，罗癭公和易实甫两位先生都很热中于捧戏子。他们先捧梅兰芳、尚

小云等男角，后来易先生捧仙灵芝，罗先生捧刘喜奎，这两位就都是坤旦了。一次罗先生偶听到程砚秋演唱，大为激赏，认为他将来必定是可造之才，前途无量。可是当时的程砚秋还没出师，他师傅也在想把他培养成一株摇钱树。于是罗先生半用金钱半用压力，为程砚秋“赎身”，替他租房子成家，全力捧场，程砚秋就此一帆风顺，走红氍毹。



▲鱼父（徐悲鸿，1926年）

罗先生他们为戏子捧场，每天都要包下戏院头几排座位，拿了戏票到处请朋友看戏，徐先生当然也是被请者之一，因此他每天都要出去看戏。散场回家，时间已近午夜，我必须深夜等他的门。那时没有电铃，也没有电灯，我们住在后进，从房间里摸黑到外边开门，要经过两座院子，走一大截子路，黑幽幽的，心里不免害怕，同时每天晚上独自枯坐几个钟头，也感到非常寂寞。于是我请求徐先生，可不可以别再去听戏了，但是他不答应。为了心中不平，一气之下，我也去听戏。谁知当年北平戏院男女分座，男客在楼下，女客在楼上，座位都是条凳。这一下散戏自己回家，路上更害怕，经此一窘，我便不敢轻易尝试听戏的滋味了。

罗瘦公捧程砚秋，同时也捧梅兰芳。《天女散花》新剧排演成功，首次演出，轰动遐迩，一般“梅迷”大为兴奋。于是由罗先生出面，请徐先生为梅兰芳画一幅像，画中服饰就用天女散花的戏装。徐先生欣然应允，化了好几天工夫，画了一张《天女散花图》，这是一帧立轴，长约四尺。画成之后，罗先生十分赞赏，他并亲笔题了一首七绝，我依稀记得是：

后人欲识梅郎面，无术灵方可驻颜。

不有徐生传妙笔，焉知天女在人间。

我初到北京，不但乡音未改，而且还听不懂那种地道的北京话，平时既没有谈话的对象，朋友中女性更少，因此我觉得非常寂寞。往后几十年里，虽然经常听朋友在说北京住家怎么理想，可是我就从来不曾想过要到北京去住。因为在我记忆里，我那北京一年的生活，只有苦闷和贫穷。

方巾巷住了半年，转眼间到了暑假，北大有许多教授和学生，集体到西山碧云寺避暑，我们也参加了这个小小的集团，把方巾巷的房子退掉，两个人搬到了故都名刹碧云寺。

碧云寺殿塔亭台，重门叠户，规模相当宏大，内部十分幽深，我们和顾孟余先生夫妇合住一进屋，李石曾先生夫妇住在另一进，此外还有许多教授学生，同住在另外一个院落。碧云寺有厨子，专门为我们烧饭，每月伙食费大约是每人七块钱。生平第一次吃番茄，就在碧云寺里，北京人叫番茄为西红柿，红绿相间，鲜艳欲滴，不过我们所吃的西红柿多半是塞着肉的。

这一群人住在一起热闹极了，因为四周风景优美，彼此又很谈得来，加以

谁都没有固定的事情要做，所以情绪上特别感到轻松愉快。每当月明星稀，大家三三两两，坐在碧云塔下，石台阶上，听钟声梵唱，谈生平抱负，海阔天空，无所不至。同学中我能记得姓名的只有两位，一位是罗家伦先生，另一位是四川人杜岑先生，抗战时他在重庆银行界服务。

碧云寺住持聚林法师，是个好人，但却不是好和尚，他不茹素，而且还喜欢喝两杯，曾听人说他在北京城里还养着女人，他和我们这群人处得很好，跟徐先生也成了好朋友。两个月轻松愉快的避暑生活过完，徐先生要和我下山时，他听说我们没有住处，自动把他碧云寺的下院吉祥寺方丈室借给我们，地点在后门大街，距离什刹海不远，盛情难却，于是我们便搬了进去。那座方丈室在大殿后面，单独一个院落，房子是一排三间，搬去以后，我们雇了一个老妈子，自己起伙。这位老妈子姓程，有个女儿，嫁给当时的骈文大家通电圣手饶汉祥做姨太太，我们背后开玩笑地说她是饶汉祥的丈母娘。

有一天我在东边房间发现墙上有一道秘门，门嵌在墙里，门扉同样的糊纸粉刷，所以一时不容易看得出来。推开这扇秘门，赫然别有洞天，不但有一间小房，而且还有一个三角形的天井，方丈室里要这道秘门干嘛？是否就是和尚的藏娇金屋，我们不敢妄加猜测，不过正好，程妈有了合适的住处。

这时候有一位吴先生，得到李石曾先生的帮忙，在碧云寺大殿前面一排侧屋里，开设了一所专练中国武功的学校。吴先生和我们成了朋友，我常去参观他们打拳练功夫，到也觉得有趣。

十月间，同在北大任教的朱家骅先生，从北京启程第二次赴欧洲，徐先生一听朱先生动身了，马上去见傅增湘先生，问他为什么朱先生走了我们还不能成行？傅先生劝他说：欧战还没停止，你又何必那么着急呢？徐先生回家，为这件事还很不高兴。

自从到了北京，我们一直很穷，徐先生通常都在北大吃饭，或者是参加应酬，碰到家里青黄不接，他也多半不大在意。有一回我身上只剩下了两个铜元，折算起来还不到一分钱，正在发愁，程妈来说先生不在家吃饭，我们马马虎虎买半斤面下了吃罢。我问她半斤面要多少钱呀？她说四个铜子。我一时拿不出来，只好叫她先垫一下。第二天逼得没法，想拿母亲给我的一只金镯去当掉，但是徐先生不肯上当铺，他的理由是一个男人拿着女人的首饰去当，人家会怎么想呢？

无可奈何，我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去。一出门就是后门大街，大街上有当铺，门口挂着厚厚的棉布帘，我在门口逡巡许久，一方面缺乏勇气，一方面又怕熟人碰见。最后，我想起不进去不行，这才在四望无人的时候，一头钻进了棉布门帘，抬眼一望，当铺柜台比我的人还高，我举起手将金镯递给朝奉，他接过掂量一下，说是可以当四块钱，我一声不响，拿了四块钱和当票就回家。

这只手镯，分量不重，雕刻的花纹却还美观，呈月牙形，嵌着一朵四瓣的花。镯子后来由徐先生赎回，我一直戴在手上，到巴黎后，不知怎么弄断了，结果还是卖给了法国银铺。



▲抚猫人像（徐悲鸿，1924年）

徐先生和我们都喜欢猫，在北京养了三只小猫，夜里同一个被窝睡觉。罗癭公先生的长女公子，有一只猫高大肥壮，毛皮是黑白两色的，光泽洁亮，站着可以垂到地面，样子长得极为神气。罗小姐在结婚之前病死，罗家上下看见这猫就要想她，一想她就会伤心，但是猫儿实在太好，又舍不得丢掉，于是就把它转送给我们。我们高兴极了，离开北京的时候，更不忍和它分离，便带了它坐火车回上海。时值冬天，气候很冷，我把它用条毯子裹起，抱在怀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抱的是孩子呢。但是到了上海，还是因为弄堂房子太窄，养这只猫不方便，无可奈何便把它寄养到康有为先生那边，歇几天去看它，哪知它被狗咬了一口，我们都觉得心里很难受。这只猫后来也就留在康家了。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徐先生再去见博增湘先生，傅先生开口第一句话便是：“好了，你们现在可以出国了。”然后他立即派徐先生以官费生资格赴法国留学。徐先生领到了治装费和旅费，带我回到上海，积极进行出国的准备。

在这一段时间，徐先生曾和我到哈同花园，去见哈同总管姬觉弥先生。姬先生对待我们很好，大家谈得十分高兴，他还称赞我是福相，对于徐先生的前程一定会有帮助。他听说我们要去法国，送了我们三千元的程仪，并且亲口答应，以后每两个月给我们寄三百块钱。徐先生因为欧洲路途太远，把他在日本所买的艺术品和书籍字画，全部寄存在哈同花园。后来这批东西就此不知下落，而且，姬先生从我们到巴黎后，一直都不曾实践诺言寄过钱来，因此我们在欧洲，才会遭受到无数穷困苦难的日子。

附 录

引凤楼本事诗

宜兴蒋梅笙兆燮

画楼轩敞纳凉颺，四壁图书位置宜。
长日清闲何所事，焚香理曲赋新诗。

梅子黄时午夜凉，梦回酒醒合欢床。
云裳花气薰山枕，簷卜清于茉莉香。

微茫曙色透晶帘，软语喁喁眼媚添。
解事梁间双燕子，呢喃语尽晓风尖。

天中佳节敞离筵，艾绿蒲青总黯然。
小别不须成瘦损，藕花香里泛归船。

一钩新月乍升霄，四拓琼窗爽气招。
向晓征帆留不住，凭肩私语可怜宵。

鸿毛遇顺喜还乡，绮阁花浓劝玉觞。
半醉风情增旖旎，媚波流眄逗春光。

海国红衫制作殊，短襟窄袖称娇躯。
兰汤浴罢迎凉坐，阵阵清风透雪肤。

每逢三五月团栾，问字添香到夜阑。
斜照半床人似玉，洞房便作广寒看。

吴绫新制凤头鞋，花叶玲珑样最佳。

惯倩萧郎拈彩笔，画眉窗下替安排。

日暮金飙拂槛凉，余霞散绮近昏黄。

一轮皓月圆如镜，恰与佳人照晚妆。

感逝伤离几度悲，镜鸾尘掩意慵窥。

今宵双照秦楼月，领取春风一展眉。

飘轮飞渡画溪来，一笑花枝照玉台。

忘却霜天寒料峭，锦屏香暖早春回。

凝脂比滑雪输妍，夏癖冬靴总可怜。

翻是蔡经勤乌爪，柔乡修到便登仙。

偶听深宵诵读勤，倦来香梦入梨云。

旋开锦帐移红烛，一朵娇棠睡夕曛。

佳晨欢笑弄宁馨，喜上眉峰两点青。

纤手自捻丝五色，为他系臂祝遐龄。

岁岁鸳针帐独穿，今宵牛女妒团圆。

画屏银烛情如许，知是前生密誓坚。

萍踪端不厌风波，又唱阳关可奈何。

我比双星已侥幸，秋期展得一宵多。

春风庭院百花妍，赢得佳人爱惜偏。

碧碗银瓶多供养，梦为双蝶藉花眠。

风箫合奏唐宫曲，明月窥帘风入帟。

慧质灵心能协律，不嫌尘世赏音稀。

三生石上宿缘良，月夕花晨乐事长。

廿首房中新乐府，珠喉玉管按宫商。

秋夜玩月联句

遥夜漏声沉（梅笙），溶溶月有阴。
露荷涵晚镜（清波），风筱韵秋琴。
皎洁同千里（梅笙），团栾照两心。
良宵耽胜赏（清波），何惜冷鸳衾（梅笙）。

引凤楼诗草

荆溪戴澄珠清波

七夕

独上针楼别恨新，银河皎皎隔红尘。
怪他灵鹊无情甚，只渡神仙不渡人。
瓜果中庭拜女牛，几家欢乐几家愁。
阿侬愿乞天孙巧，绣出鸳鸯总并头。

夜雨

绣阁深深夜未央，梦回冰簟暗生凉。
无情窗外芭蕉雨，不管离人欲断肠。

题画四首

绿罗衫子白霓裳，爱向松阴倚晚妆。
手把一编吟咏久，等闲忘却绣鸳鸯。
芰荷风尽晚凉天，垂柳丝丝碧似烟。
纨扇轻携曲池上，折腰偷采并头莲。

小山丛桂自芬芳，我所思兮在远方。
激徵流商弹一曲，风飘金粟落琴床。

绰约丰姿画不成，霓裳缟袂最轻盈。
红栏斜倚娇无那，人比梅花一样清。

春 闺

帘枕寂静篆烟微，恼煞春归人未归。
燕子不知依意绪，双双时傍画楼飞。

连朝风雨酿春寒，万紫千红总未阑。
寄语花开姑缓缓，殷勤留待主人看。

对 月

兰闺寂寞锁清秋，香冷金猊篆霭收。
一样团栾好明月，今宵偏解助人愁。

哭亡儿天麟

荆溪戴澄珠清波

本来生性太聪明，两载怀中无限情。
玉折兰摧刚一夕，便教抛掷向荒莹。

痴望神灵好护持，不将医药苦寻思。
如何恶候重重见，惨杀喉啞绝乳时。

忆从元日哺床前，细语依依尚可怜。
盼汝平安身再健，簸钱蹴鞠过新年。

夙世应无母子缘，如何恩爱苦萦牵。
临危握手尤怜汝，为我伤心一息延。

慧黠无双笑语稠，终朝嬉戏解人愁。
从今闺阁清如水，惟有晨昏泪暗流。

人人夸汝是佳儿，短折天心不可知。
七十衰翁难自遣，夜阑犹作悼孙诗。

夫婿英年抑塞多，秋风桂子已蹉跎。
无端更失宁馨物，搔首青天意若何。

怀思无已转疑猜，未必精魂没草莱。
倘念劬劳恩未报，识环仍望汝重来。

2

欧战方停的时候，想回欧洲或去欧洲的人太多了。徐先生到各大轮船公司一打听，几乎所有的船票都已经预订到一年以后，于是他非常着急。后来听说第一批勤工俭学留法学生九十三人，在高鲁先生的照料之下，将搭乘日本轮船到欧洲，不日就要启程，徐先生赶紧托人，从他们那里分到了两张三等船票，不但解决了行不得也的困难，而且船上都是中国学生，彼此便于照料。不过那是一条相当小的船，载重只有七千多吨。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日，动身的那天，父亲向我说了许多勉励的话，因为他要到学校上课，就由母亲送我们上船。三个人上了船一看，船只陈旧设备简陋不说，那日本船的二等舱，只能用欧洲轮船的四等相比，一百多个人挤在一间大舱房里，光线不足，空气混浊，乘客大多数是单身男人，还没启碇，嘈杂的声浪便已震耳欲聋。母亲看看眼前这种环境，想起自己娇生惯养的女儿，要在这里捱受一个多月的苦，一时伤心，不禁流下了泪来；离情别绪，原已无处宣泄，看见母亲一哭，我也不由自主地哭了起来。高鲁先生这时正走过我们身边，看见我们两母女哭成一团，连忙赶过来安慰道：“时间过得快得很，几年工夫一下子就过去了，她不是就要回来了吗？”

同船的学生中，有两位看到我们母女哭得这样伤心，似乎很了解我们的困难，他们自愿将二等铺位和我们交换；徐先生很高兴，也很感激他们，立刻将二三等票的差额补付给他们，那笔差额当时要合到法币四百余元，但是我们总算住进了二等客舱，八个人一间房，分上下铺，和三等舱一比，当然要强得太多了。

这次遥远的旅程，路上一共走了七个星期，对我来说，又是一次痛苦的经验。因为船小浪大，波涛险恶，轮船有时就像在太平洋中载浮载沉的落叶，所以我晕船晕得厉害，简直不能下床，唯有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才能到甲板上去走走。与此同时又碰到一件窘事，那便是我在东京所曾遭遇过的洗澡问题，这条日本船上的浴池，当然又是男女同浴，像我们中国女人怎么能够走进浴室去呢？实在没有办法，我就跟徐先生商量好，探望清楚浴室里面没有人，赶紧溜进去用最快的速度洗一次澡，而请徐先生替我在浴室门口把风。



▲蜜月（徐悲鸿，1924年）

船经香港，停留一天，这是我们第一次路经香港，曾经上岸游览，吃中国菜。四十六年前的香港，没有今天这么热闹繁华，而且范围也不若今天这么大。街头熙来攘往的，都是我国同胞，但是交谈起来，却又是语言不通，因为他们讲的是广东话。

第二站到西贡，那时的越南还叫安南，是法国的殖民地，轮船大概是因为装卸货物的关系，前后停泊了三天。徐先生是画家，对于风景名胜、异国风光很有兴趣，我们免不了要趁此机会到处观光。西贡的动物园和植物园都是很有

名的，奇禽异兽，名花异卉，在在引人留连难舍，尤其是我们初见青葱蓊郁的热带风光，更觉得非常的喜爱。

这以后船经新加坡，入印度洋，到亚丁港，通过了东西方的交界处；驶进红海，穿越苏伊士运河，绕过西班牙、葡萄牙的南端，整整四十九天，五月八日，方始安然抵达伦敦。

船到码头，有几位留英的中国同学来迎接，使我们精神一振，高兴非凡。留英同学把我们九十五个人接到英国学生会，安顿下来。吃饭之前，负责招待的黄国梁先生，手持全套西餐餐具，站在一张凳子上面，高声向我们讲解餐具的用法，以及进餐时的规矩和礼节。他讲解得极为详细，并且还做动作示范，一再叮嘱我们吃西餐最忌发出声响，不但刀叉不能“叮当”作响，喝汤尤其不能有“嘘嘘”之声，等等，不一而足。

讲解完了，九十五个人一哄而进餐厅，上菜的都是英国女学生，头一道菜便是汤，一开动，唏哩呼噜之声四起，使接待我们的同学全都愕然失色。原来绝大多数的同学，都把黄先生刚才的一番讲解给忘了。

说来也是难怪，因为当年中国只有上海、北平、天津、广州……几处通商大埠有西餐馆，而第一批勤工俭学的同学，多数来自四川、湖南、湖北等内地各省，出国之前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对于西洋礼俗，当然一窍不通，临时讲授，实在是嫌不够。

我到伦敦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洗头发，自己不会讲英语，请一位耿先生陪着我去。因为我的头发长可及地，英国理发师大概从来没有见到过，所以对我这一头乌油油又多又长的黑发，声声赞美不置，使我感到柔长的黑发并不比蓬松的金发逊色。在伦敦住了两天，江苏无锡人陈源先生陪我们参观了皇家博物馆，他对我们夫妇俩招待得十分周到。

五月十日渡过英法海峡，转车赶到巴黎，当时吴稚晖、李石曾诸先生在巴黎设有“华法教育会”，会中的几位执事先生特来照料，把我们送到一家旅馆安置。招待人员之中就有刘大悲先生，他是在欧战之前便到法国留学的。

一部分同学因为要转赴外埠，在旅馆里休息了一天就由招待人员带走，剩下来留在巴黎的同学，则被分配在好几家旅馆分别住下，这些旅馆靠近巴黎大学，也就是所谓的拉丁区。拉丁区一带像这样供给学生住用的旅馆很多，规模



▲持扇女像（徐悲鸿，1920年）

都不大，但是设备倒很齐全。中国留学生多半集中在这儿居住。我们最初住的那家旅馆，是在苏美拉路十三号。

旅馆里都是弹簧床，上面有一两张毛毯，包着床单，铺得平平整整的，而且把床单和毛毯的三面塞进绒垫褥底下，睡时只要掀开上端往里面一钻，天冷时加一条四方形的鸭绒被，给旅客盖在脚头。有好些同学以为那条鸭绒被才是被窝，床上铺的是被单，鸭绒被短，盖住了上身就盖不了脚，于是第二天大为抱怨，说是法国人怎么会不盖被窝的？此外，每一房间的床头柜里，总有一只瓷器的溺盆，洗得干干净净，一

尘不染。有一位同学肚子饿，出去买了面包回来，因为找不到容器存放，看到床头柜里有一只洁白的磁盆，也不知道是作什么用的，便拿出来盛放面包，逢人就端着请客，惹得大家掩口葫芦，笑痛了肚皮。

中国内地各省，男人的厕所多半是蹲坑。因此有一些同学用不惯抽水马桶，干脆就双脚蹲在马桶上面大便。一次竟然有人发生惨剧，大概是马桶已有裂痕，两脚一蹲，身量过重，那只马桶顿时就哗啦一阵响，四分五裂地垮了下去，这位闯祸的同学臀部被碎片割破，受了重伤。

语言不通，入境而来不及问俗，所以像这一类笑话，早期的中国留学生，发生得很多。只是当时确实也是无可奈何，刚到海外异域，什么事都要靠自己暗中摸索。

我们在十三号住了些时，又搬到同街九号的另一家旅馆，同船来的夏安修先生仍旧住在十三号，等于隔壁邻居。这些旅馆都是五层楼，那时谢寿康先

生、苏希洵先生也和我们住在同一旅馆，他们的房间在后面，只是当时我们还不相识。后来据谢先生说，他当时很注意我们，说我们俩夫妻什么都好，就是徐先生走路未免太快，总是把太太抛在后头。于是谢先生曾想留个字条给徐先生，劝他以后走路不妨慢一些，因为按照西洋礼俗，男女二人同行，男士一定要好好地照拂女士，即使不挽臂搀扶，最低限度也得齐肩并步。但是徐先生始终没有改过来，和我在一起走路时，还是健步如飞，因此别人就送他一个绰号，叫做“飞毛腿”。

夏安修、沈宜甲两位先生和我们往来很密，早在由上海到英伦的船上，我们已经很谈得来。沈先生对我的外表，观感很不错，认为像我这样的女人出国，可以为中国人争面子，因为普通中国女子都生得娇小玲珑，只有我身材较高，肤色也比较白皙。夏安修先生是北京大理院长夏寿康先生的公子，系出名门，平时享受惯了，自然吃不来苦。他到巴黎不久，便得了失眠症，常常睡不着觉，夜里以数火柴棒来打发时间。此后勤工俭学的学生一批批地涌到，几乎每条从东方开来的轮船，总有中国学生。后来的一批中有一位舒之锐女士，湖南人，她父亲是革命先烈。舒女士人长得很漂亮，谈锋很健，也住在夏先生那家旅馆里。她的居间，经常是高朋满座，夏先生当然也是常客之一。

我们这一群人三天两头见面，当然我们也看得出，夏安修先生和舒之锐女士已经陷入热恋，亲亲密密，出双入对。最妙的是不久舒女士有了身孕，可是连我这个女人都看不出来，什么时候进医院，什么时候生的孩子，朋友们都被瞒在鼓里。孩子生了以后，寄养在乡下人家，隔了很久，他们才告诉我们这回事。我们之间的友谊历数十年不变。后来夏先生夫妇回国，在上海定居，我在国内的时候，每次过上海，一定会到他们家里去盘桓一番。

拉丁区是学生出入最多的地方，因为巴黎大学和其他许多学校都设立在这一区域，因此到处都是小饭店，售卖定食。法国大菜是世界闻名的，定食虽然简单，但是口味不坏，菜肴也很丰富，通常都是一汤一鱼一肉一点心，面包无限量供应，此外还有四分之一瓶红葡萄酒。像这样丰盛的一餐，当我们初去时只卖三法郎七十五生丁（一法郎合一百生丁），折合当时中国法币两角半钱，后来涨到了五法郎，可以说得上经济利便。不过当时正值第一次欧战结束，法国虽然是战胜国，然而兵燹之余，物资相当的缺乏。有许多食物，在供应不继

的时候只好利用代用品，所以我们吃的牛排往往是马肉；咖啡里搁的糖，也是化学方法提炼出来的糖精；一杯咖啡放那么两小粒，放下去咖啡会突突地起泡，吃起来总觉得不是味道。

住旅馆，吃定食，虽然方便省事，可是天长日久，想想还是很不合算，于是我们租好了房子，立刻自己开伙。

早在船上，徐先生就开始教我法文字母和拼音，到巴黎住定，又请了一位法国老先生，到家里单独教我法文。从一九一九年五月抵达巴黎，直到同年冬天，足足有半年多的时间，我都在埋头勤习法文，徐先生则每天到各处博物馆看画。巴黎一地，大小博物馆林立，搜罗之丰，度藏之富，一向闻名世界。

我们到达巴黎时，刚好法国一年一度的全国美展在市中心区的大小二宫举行，这两幢大建筑物是专供展览用的。底层是沙地，那是为了便于陈列雕塑品。国家美展展出了全国艺术创作的精华，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其展品之多，规模之大，参观者绕行一周不知道要走多少路，看一天都看不完。有多少人宁愿饿着肚皮，徘徊不忍离去。那天徐先生去参观的时候，衣服穿少了些，路上又碰到一场大雨。回家马上洗了一个澡，大概是把寒气逼进去了，因此胃部剧疼；这以后就得了胃病，时发时止，而且常常呕吐，消化不良。直到两年后去德国小住，张季才太太提醒我们，说是吃姜可以治胃寒。徐先生买了德国的糖姜吃，方始渐渐地将胃病治愈。

那年冬天，有位朋友杨仲子先生，南京人，在瑞士洛桑城学音乐，娶了一位瑞士女郎，听说我们到了巴黎，一再写信邀我们到瑞士去。瑞士早有世界公园之称，徐先生对于那里的幽美风景十分向往，便答应杨先生去盘桓几个月。杨仲子先生的金石书法，造诣非常精深，但是他的作品很少传世。

杨家住在洛桑，洛桑位于日内瓦湖北岸，群山叠翠，湖水澄清，街道依山而筑，高低参差，层次分明，尤其清洁整齐，纤尘不染，看来令人赏心悦目。

我们在瑞士整整住了半年，杨仲子夫妇非常好客，瑞士人都都殷勤和蔼，在这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中，我们过得十分愉快。唯一的遗憾是因为经济的不宽裕，没有机会欣赏一下闻名天下的瑞士雪景，只不过在附近的名胜地区走走罢了。

一九二〇年春天，预备回巴黎去了。瑞士是法治国家，税制极严，政府规

定外国人入境的时候，必须缴出护照，到离境之前，估计他在瑞士每个月的化费，发单课税，然后方可领回护照。徐先生接到税单，想想有点舍不得缴纳这笔税金，便跑到中国驻瑞士使馆，重新申请护照。按照规定，申请新照必将旧照缴销，可是当时我们的使馆办事还很马虎，竟又发给我们一张新的。我们拿了新护照买票离境，居然逃掉了这笔税金。这事算起来也有四十五年，恐怕我们的那张旧护照，至今还在洛桑市政府的档案中保存着呢。

回巴黎后，徐先生进了法国国立最高艺术学校，我也经过法文程度的甄试，进入当地一家女子学校五年级读书，照法国学制，五年级大约相当于我们学校的初中一年级。同班都是十二三岁的法国女孩子，唯独我这个外国人鹤立鸡群，年龄要比同学大上七八岁。好在我是外国人，又不计较学籍和文凭，我唯一的目的是把法文学好，足以应付日常的需要。

徐先生刻苦好学，努力奋斗向上的精神，是我一直都很佩服的。他进艺校之初，先在素描班画石膏，平时都是自己临摹，每星期三、六才有教授到班上来看他们的进度，并且加以指导解说，批评修改。画素描期间没有时间限制，如果教授认为程度够了，就可以升到模特儿班去画人体，模特儿有男有女，每周更换。经过了

这个阶段，再从名师学绘油画。徐先生在赴法国以前，绘画艺术已有相当造诣，入学后更废寝忘食地潜心攻习。他每天上午都在学校绘画，下午学校没有



▲杨仲子书法

课，他便去叙里昂研究所去画模特儿。研究所是私立的，雇个模特儿给作画者描摹，进去要买门票，门票每张一法郎，不限资格，人人都可以买票进去。除了上下午勤学不辍，他一有空又到各大博物馆流连徘徊，欣赏古今画苑的珍品。此外他最喜欢在回家途中绕道塞纳河边，那里是法国旧书、古版、印画的集散地，他经常游览搜求，一耽搁便是好几个钟头。

由于他既有的根底，以及他的辛勤努力，徐先生很快地完成素描和画模特儿两个阶段。那时法国艺术学校聘请的教授都是当代大师和著名画家。学校有许多大画室，每一间画室聘有一位名画家教画，而画室亦即冠以教授的名字。徐先生对名师佛拉孟极为崇拜，便选择到他的画室学习。

外国的高级学校，大都是进去容易，而毕业很难，不像我国的大学，进去很难，却没有不毕业的。巴黎国立艺术学校的绘画的部门，也很容易进去，因此有许多外国学生为了那里设备完善，环境自由，又有名师传授，所以都想进这学校去画画，不过这样的学生并不能算是正式生。艺校的正式学生，一定要经过理论科目如解剖、透视、美术史等考试及格，才算结业，而徐先生是中国学生中唯一通过理论考试的人。

国立艺术学校有许多古老的传统和有趣的故事。旧生与新生之间，根据他们的不成文法规定，新生进教室，一定要请客，把全班同学迎到咖啡馆里，美酒咖啡，饮料点心，让大家喝个痛快；这笔开销，往往相当的大。请了这一次客，还并不能够使新生获得平等的地位，因为平时在学校里面，旧生多半会装出盛气凌人的模样，把他们呼来叱去，颐指气使，新生简直就成了学徒和小工，什么事情都要替他们做，稍微反抗一下，凌辱就要来了。有一次，一位中国同学，姓赵，他个性倔强，不甘受旧生的指挥奴役，竟敢抗命，当下只听到有人大叫一声：“脱呀！”转眼之间，老资格们一涌而上，七手八脚，把他全身衣服剥得精光，拖到模特儿台上，当众展览；最谑的是一位旧生，用些黄色颜料，从他臀部直到股间，曲曲弯弯地画了一条粗线，乍看起来，就像是他在泻肚子遗矢，于是全室哄堂大笑，使得那位赵同学羞惭万分，无地自容。

还有一次，一位法国军官太太，兴冲冲地去参观艺校，不料竟被开惯玩笑的学生们把她塞进一只大空酒桶，抬上马路，摆在中央，猛踢一脚，让它一路滚去；那位太太在桶里尖声呼救命，警察看到大桶自滚，弄得莫名其妙，赶紧

上前把桶拦住，一看，原来还有人在里面，赶紧把她救出来。军官太太气愤之下，声言要向法院提出控告，结果当然是无从告起，不了了之。

艺术学院的学生是这样的调皮难惹，但是徐先生在他们之中，却是较严肃的一位，他不参加同学们的那些戏谑和恶作剧，当然这些事情也不会临到他的头上。相反的，学校上下都对他表示敬重，许多老同学，纷纷地自动和他结交。

法兰西举国上下，尊重艺术，尊重艺术家，更尊重艺术家思想言行的自由。法国一年一度的艺术节，通常都在五月份的某一天举行，全巴黎的艺术家如癫如狂，尽情欢乐，节日的怪诞，行径的荒谬，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今天，都不是任何常人所可想像的。但是上自法国政府，下至平民百姓，不但不引以为怪，而且还用崇敬的目光，羡慕艺术家们在那儿做惊世骇俗之举。

到了这一天，艺术家们的血管里，仿佛注入了疯狂放肆的血液，下午开始盛大壮观、多彩多姿的化装游行。所有的艺术家和模特儿一律参加，奇装异服，袒裼裸裎，有人骑马，有人骑象，人人别出心裁，装扮成古今中外各色各样的人物，总之以越新奇越好，越古怪越妙。曲线玲珑的模特儿们，干脆全身上下一丝不挂，露出丰满健美的身体，任人欣赏。有钱的艺术家订制古代帝王全套服饰，穷些的就套上纸制的彩衣，还有的就在自己身上画上许多鲜艳图案或色彩，高歌长啸，招摇过市。年年此日，巴黎万人空巷，途为之塞，市民们麇集街头，参观这一年一度最狂热的盛会。穿制服的警察跑来跑去，他们并不是忙于取缔，而是在为狂欢的游行队伍维持秩序。

晚餐的舞会，照例在巴黎最大的餐馆举行，山珍海味，征歌逐舞，醇酒美人，尽情享受。一到午夜，人人醉了光了，什么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有一对美国夫妇，很向往法国艺术节的热烈欢腾，乘赴欧洲度假的机会，在参观了新鲜的游行以后，兴高采烈地跑到聚会地点，要求准许参加。主事者一口答应，但说必须收取门票美金若干，那位男士很慷慨地立刻照付，于是两夫妇分别被引到两个门口，男的七弯八拐，不知道被他们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女的却被带到会场，可是一进会场便有人叫她脱衣服，她大惊失色，竭力推拒，哪晓得有几位画家冲到面前，强制执行，动手便撕，直把她身上的衣服撕掳得寸缕不存，然后被人推入舞池，婆婆起舞。

徐先生在巴黎一住五年，他始终不敢参加这样的热闹场面。



▲徐悲鸿老师达昂（素描）

当时有一位大画家达昂先生，徐先生对他极为崇敬，很想拜在他的门下，只是苦无机缘。最后他不计一切地登门拜访，拿出自己的画作请他指教，果然获得达昂先生的青睐，收他为入门弟子。以后每星期天便到他的画室去面聆教益，渐渐的我也成为达昂先生的座上客。那时达昂先生的一位朋友，他也是每星期天必到达昂先生的画室去的。他是巴黎和平街最大服装店的老板，他收藏达昂先生的画最多，我们曾到过他家去参观，他的

整座住宅，就像是一所博物馆，徐先生曾画过一幅画，题名《远思》的，拿去向老师求教，被他看见，他立刻出一千法郎买下。

由于达昂先生的关系，我们又结识了法国当代最伟大的雕塑家邓甫脱 Dampt 先生，邓甫脱先生两夫妇都很慈蔼好客，后来这一对夫妇和我们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很欣赏盛成先生所著的《我的母亲》一书，曾在我的纪念册上写了一段，说是由于读了他的书，使他们认识了中国的文化和礼教。还有一位贝奈尔先生，他曾做过国家艺术学校的校长，也是徐先生所崇拜的。我们第二次到巴黎的时候，他已八十四高龄，我们去拜访他，他还在我的纪念册上，为我画了一幅素描像。

我一生走的地方不算少，也曾在国内许多大都市长期住过，在我来台湾以前，除了故乡宜兴，就数在巴黎住得最久。我先后两次旅欧，住在巴黎的时间共计在九年以上，因此我对法国人的了解也比较深。根据我当时的看法，法国始终是一个很守旧的国家，并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么浪漫放荡。社会习俗方面，古老的传统很难改变。以法国女孩子来说，她们的境况恐怕还不如现代的中国女性。由于法国女多于男，女孩子受高等教育的真如凤毛麟角，少之又少，普通念到高中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且受专业训练的也不多，因此就业机会很难，没有陪嫁或者没有继承遗产可能的女郎，多半难于嫁人，更加以根据

法国的法律，出嫁以后的女人，假如在银行里存钱，必需丈夫共同签字才能领用，在这种种的情形之下，法国女孩子的地位是很可怜的。

法国人对于有色人种毫不歧视，这是他们的一大优点。由此，在巴黎街头通常可见黑人臂上挽着如花似玉的法国女郎，巴黎人司空见惯，也成为了她们一条很好的出路，所以我在四十多年前便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外国留学生到巴黎，要是想娶一位法国太太的话，那应该是很容易的事。不过我已经离开法国三十年，现在是不是有所改变，我就不得而知了。

一九二一年，徐先生和我趁暑假之便，到德国去游玩，早年的中国留学生，趁假期出游，已经成了风气。因为除了一笔旅费开支以外，食宿费用到处都差不多，花少数旅费多到几个国家，又何乐而不为呢？尤其徐先生是位画家，他应该多观摩各国艺术馆的名画，多欣赏世界各地的风光。

从巴黎乘火车到柏林，下车以后，第一个印象便是战败国的首都，要比战胜的法国整齐得多；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街道更比法国整洁壮阔。德国人的脸上虽有几分沮丧，但是个个勤奋坚强，能够忍辱负重。

我们最先拜访的是孟心如夫妇，孟氏夫妇年前赴德，途经巴黎，我们由此认识。他们贤伉俪见我们到了德国，非常高兴，殷勤接待之余，第一件事便是引导我们拜访我国驻德公使馆。

当时我国驻德公使是老外交家颜惠庆先生，但颜先生这时正返国述职，馆务由一等秘书张允恺先生代理。张先生号季才，出身名门，他是前清两广、两江总督张人骏先生的四公子。季才先生一看见我，脸上便有愕然的表情，后来时常往还，大家都很熟了，季才先生这才告诉我们，原来我和他的一位胞妹容貌酷肖，而他的令妹，却在十多岁时便已夭亡。

季才先生夫妇都慷慨好客，张夫人尤其烧得一手好菜，于是张公馆也就座上客常满。那时候常到张家去的一些朋友，有朱骝先夫妇、黄伯樵夫妇、孟心如夫妇，有一时期还有黄膺白夫妇，以及胡世泽（时任使馆二等秘书）、谭伯羽、沈怡、曾垂祺、杨度先生的两位公子杨公庶、杨公召等诸先生。

季才先生夫妇把我看作自家人一样，有一天，他们大开筵席，把所有的朋友全都请到，席间他便宣布，要认我为谊妹，在场的人当然都热烈赞成。于是季才先生便叫他的一子一女向我行大礼，磕头，叫姑姑，从此我也改口称张季



▲双饮马（徐悲鸿，1943年）

才夫妇为八哥八嫂，因为大排行他是老八。

沾了这一层光，徐先生和我后来才不至于在德国挨饿，真可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因为那时是一九二一年，直奉战争已经开始，北平政局一夕数变，所有留学生的官费全部发不出来。我们原先打算在柏林玩两三个月的，岂知一拖便是整整二十个月。二十个月里面，季才先生夫妇对我们帮忙不少，这份隆情盛谊，数十年来我时刻不忘，总以未能好好地报答他们为憾。

中国驻德公使馆坐落在一条繁华的大街，张季才先生起初携家带着住在使馆，后来另找房子搬了出去。他在柏林的官舍排场相当的大，他是带了一妻一妾赴任的，还有太太生的一子一女，年龄都在二十左右。女儿神经有点不正常，儿子也是不肯读书。那位江阴籍的大太太温柔贤慧，热心诚恳，季才先生碰到外国人来访，姨太太不好介绍，便说她是女儿的家庭教师。

季才先生夫妇唯恐我们住不安定，同时也为了徐先生作画方便，替我们租了一间小小的画室，另外还有一间卧室，厨房里备有瓦斯炉。搬过去定居不久，有一天，忽然接到巴黎方面寄来的一份通知，原来在巴黎的一些老朋友，暑假期中不甘寂寞，居然别开生面地组织了一个“天狗会”。那封亦庄亦谐，妙趣横生的通知写的是：

敬启者：

天狗会于昨日开成立大会，当场投票选举会长，赵君××得多数票，被选为会长，当场欢呼，“天狗会万岁！”“赵狗会长万岁！”赵狗会长“致词外，略有演说，已载旅欧周刊与巴黎各报”，余兴为江小鹤先生客串《杀圣劝妻》，为警世名剧。近日同人正从事起草本会简章，不日即函奉呈。今日又开第三次会议，选派代表出洋考察狗种，当场谢君次彭被选出使德国，于礼拜四首途，又公举吴君（此人新自中国来，具有狗性）出使英国伦敦，审察一切英狗，均于同日首途，已电驻德驻英狗公使接待一切，此本狗会成立后之近状也。近仍不得先生函电，引以为憾，候次彭狗使到德后，面陈一切，必能洞悉本狗会宗旨与趋向，并向先生磋商本狗会一切事宜。此二人所以出使，亦为邀请先生而来也，惟会中有一事急欲奉知者，本会简章第一条，忌用狗字，除天狗会用狗字外，凡遇狗字苟音均以圣字代之，如“狗屁”，即曰圣屁；如“苟有用我者”，亦以圣字代之；如江先生前串“杀狗劝妻”，即以圣字易之，以示尊重。先生以后用字务宜注意，必需一体遵守，则天狗会幸甚，狗会长幸甚，同仁幸甚，顺请狗安！

天狗会谨启 八月十日

隔不几天，被“天狗会”奉派出使德国的谢寿康（谢先生号次彭）翩然

驾临，他一直找到我们在柏林的临时寓所。当晚我们请他吃饭，他滑稽突梯地说出“天狗会”组成的经过。有一天，几位好朋友在咖啡馆里谈天，有人提起上海组成了“天马会”，我们又何妨来上一个“天狗会”？就这么，一个海外留学生的小团体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组织起来了。

“天狗会”没有宗旨，也没有什么组织，但却定了很严格的章程，这个章程经常更改，因为无论是谁另外想到了一条，经过大家同意，立即便可以补列。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天狗会”会长系由会员公选，而他本人却可以毫不知情，这是由于“天狗会”会员们不满国内某些人士的作风，一有组织成立，大家则拼命钻研想当首领。于是我们规定“天狗会”会长的唯一资格必须是个屁精，谁愿意当屁精呢？是谁也不会来争夺这个职位，甚至于暗中选定了会长也不能通知他。

“天狗会”的会员经常聚会，我们选派一位“驻德公使”，接继谢寿康先生回巴黎后的重任，“驻德公使”是敝同乡朱一洲先生，他便是朱了洲先生的介弟。

天狗会的会员常玉、孙佩苍，后来也到了柏林，为了表示团结，同时谢寿康先生又一向喜欢烧饭做菜，他看中了我们的瓦斯炉，由他一建议，我们就此组织了小型伙食团，开始自己做饭吃。

合伙的份子，就是谢先生、徐先生、孙佩苍、常玉四位先生和我，做饭烧菜由谢先生跟我两个人负责，徐先生洗碗打杂，只有常玉袖手旁观，什么事情也不做，每天十一点多钟才来，谈谈笑笑等吃饭，吃饱饭拍拍肚皮就走，有时更弹奏几曲曼陀铃，这伙食团没有维持多久也就解散了。

这时俞大维先生和陈寅恪、登恪两先生都在柏林，他们也很喜欢到我们家里吃饭，谈笑风生，极为欢快。陈登恪先生是陈散原老先生的八公子，文章才华，冠绝一时，他也是从巴黎来小游柏林的。

战后柏林，人心不安，社会未复，脆弱的经济基础风雨飘摇，德币马克每天都在贬值，十百千万亿兆，钞票越印越多，物价扶摇直上，通货膨胀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这一来苦了德国老百姓，却大大地便宜了当时旅德的外国人；因为外国人有的是英镑法郎，兑价一日数涨，不说赚钱，最低限度可以保值，德国人称外国人为“外汇持有者”，多少有点嫉恨。

德国币值不稳，谁都不肯将马克留着过夜，因为今天用五千马克能够买到一枚鸡蛋，到明早一枚鸡蛋也许要卖一两万，为了避免损失，我们只好算计每天的用度，该用多少钱，就兑换多少马克。

由于马克贬值，使我们能够在柏林撑过了二十个月，这期间朋友帮了很多的忙，黑市的差额也增进了我们的“收入”。徐先生利用机会，还买了不少的原画和典籍。买原画在以前是我们不敢向往的事，但在这段时期，徐先生却在每笔交易上都占了很大的便宜，通常是他看中了一幅画或者一件艺术品，问明价格，他便先付一点定金，隔几天备价去取；到那时候，马克可能已经贬值好多倍了。与此同时，孙佩苍先生也搜购了不少好东西。

只有谢寿康先生闹过一次笑话，因为当时抢购的风气早已形成，人人见了东西就要买，有一天谢先生买了大批的头发水和化妆品，扎成一包，拎在手上。通过大街的时候，不知怎样绳子断掉，瓶瓶罐罐摔到地上，全部砸碎，谢先生却头也不回，赶紧走。因为他怕路上的德国人看到，会幸灾乐祸地讥笑他。

一九二二年我曾害过一场严重的病，说来好笑，直到四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仍不知道我那次害的是什么重症。想像中大概是肠胃发生了问题，因为我在日本不习惯蹲坑，于是渐渐地感染便秘，以后严重到不吃菜就不能大便，而且胃纳日减。谊兄张季才先生请来特约德国老医师为我诊治，他坚持送我到医院开刀，至于开刀割除的是什么，我自己根本就不清楚，只晓得上了麻药，全身麻醉，动手术前后，足足有五个钟头。我人事不知，昏迷不醒，徐先生和朋友们都很惊慌。主治医师看看不对，便叫他们高声用华语喊我。待我醒转，觉得小腹上有砂袋压住，当我需要转侧时，便痛彻心肺，因此好几天使我不敢动弹，幸好不久就康复了。

康复后，我在柏林买了一具小提琴，从一位德国琴师，开始练习。

暇时，我们也曾四处旅行，饱览日耳曼的山川景色。某次，我和谢寿康、常玉、陈登恪三位先生往游柏林附近的方济湖。湖面辽阔，两岸距离相当遥远，但是那时我们的兴趣很高，轻舟小桨，我和谢先生挥汗划行，居然抵达了对岸。煞风景的是到岸以后突来一阵骤雨，四野无处躲避，人人都淋成了落汤鸡，在那么狼狈的情况之下，我们仍然扬声大笑，意兴遑飞。



▲熟睡中的蒋碧微（徐悲鸿，1926年）

又有一次，谢寿康先生、孙佩苍先生、徐先生以及一位东北籍的张先生，和我五个人集体旅行，远游德国东部的莱比锡和德莱斯顿，来往都是乘的火车。德莱斯顿位于易北河上游，扼德国通往捷克的门户，为萨克森首府，乃美术、工艺、音乐的中心，景物佳

胜，早已脍炙人口。尤其是它的深山密林，直矗云天，极为壮观。我们去时正值秋深，落叶离梢，缤纷飘坠，满山满谷，好像覆盖着一层黄金。积厚的地方，足有一尺多深，踩在上面软绵绵的，如铺茵陈，如在云端，非常舒服，使我们徘徊留连，久久不忍离去。

在德莱斯顿的山间旅社，平台上眺望远山近树，不论从哪个角度欣赏，都可以看到美丽动人的画面。何况旅社还有特产佳肴，那是价廉物美、爽脆可口的竹鸡，这在柏林是很珍贵的肴馔。

一路上，谈谈笑笑，诙谐并陈，闲来无事，就玩纸牌，打法是法国式的，约略仿佛今日盛行的桥牌。

德国制的照相机举世闻名，价格相当便宜，我们几乎人手一架，尤其孙佩苍先生还买了照相馆通用的那种大型相机，可摄十二寸及二十寸原版照片。孙先生用来拍摄原画，方便得很。

我们请了一位德国人，来教授摄影，从对光学到自己冲洗。由于朋友之中，只有我是唯一的女性，因此我便成为男士们拍照的模特儿。在柏林时期，真不知拍了多少照片，其中颇有一些佳作，可惜抗战时都在南京遗失了。

陈登恪先生比我们先回法国，返法后，写来一封信，他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战败后的德国“人穷志短”的可晒情状：

返法已一星期，一言不发，柏林舆论，当为之大哗，故急草此书，以安人心。当动身离柏林之晨，孙刘两公建议，谓从动物园车站上车，恐人

多无车位，不如去前一站，较为妥便，于是遂从多数通过，以时间迫促，遂未及通知诸公，窃谓车过动物园时可相见。不意管车人喝了两杯（天狗会的行话），竟迟到四十分钟，大约诸公认为“他们今天动身也是假的”，遂各散去矣。江先生（画家江小鹤）之画，竟未带来，深为歉疚，且劳公等在站久候，也应当说几句“对不起，对不起”。好在江先生今年不能回国，如有便人来法，尚希为之设法带来，以赎吾过。

二等车无一隙地，遂入头等，验票人来，告以二等车无一空位，三人共给以马克一千，钱可通神，使得这位黄胡子舅子（他学郭有守先生的四川话）笑逐颜开，低声说：俟过一站后，即为我等所坐之头等改为二等。

车厢中除我三人外，尚有二位洋人，都是蹲蹲对对的（他学谢寿康先生惯用的赣州话，意思是真正不假的）头等票，验票舅子得了贿，忙得狗颠屁股似的，不知在何处腾挪出两个头等座位，低声下气地求这两位洋人搬出去，替他们驮行李，提皮包，弄得汗流满面。这两位洋人既去，于是头等车厢硬改为二等矣！诸君如不信，有门外挂的牌子为证！这个舅子向我们表示劳苦功高的样子，似乎再想一点好处，三人身边一共尚有二千马克，索性都给了他了。

出德境未验护照，大约也是喝了两杯吧！税关上的舅子拿一条白粉笔，在箱子上画了几个叉，一语不发地走了，大约也是喝了两杯吧！我们三人的行李堆积如山，几乎将一个房子都占满了，然而入法境时，只将一只小皮包打开，他老人家（法国关役）只轻轻地临去秋波那一转，向皮包里略一瞄就走了。隔壁房里有几个中国佬——不知是谁家的儿子，带有仪器一大盒，胆小不敢搁在箱内，取出藏于座椅子下面——大约是初出门的，不知道查完箱子后，要乘客都出去，让他们细细地翻桌搜椅地查——果不其然，搜出来了！端端正正地捧在手内，对着阳光细看，可不是一大盒蹲蹲对对、崭崭新新、光光亮亮、明明白白在德国新买的犹太货吗？

诸公要知道，仪器是犯禁的，这回既被查出，非同小可，不是玩的，这位黄面先生不是糟了吗？然而不然，关役先生恭恭敬敬地送还给他，口称这是用过的，还“上了锈呢”；但是下次要小心点。

这位关役先生与那位中国先生，非亲非故，又无师生关系，何以如此

破格徇情？于是议论纷纷，有的说他是亲华派；有的说他敬重斯文，看见我们学生，所以另眼相看；有的说现在是冬天，所以不及夏秋严禁；有说他喝了两杯的；有说他是社会党党员的；有的说到底法国人好说话；有的说他们来势汹汹，扬威耀武，磨拳擦掌，其实也是假的。

在德境晚餐，有鸡有酒，三人共去二千余马克，但是身无一马，将法郎折算，娘乃头（汤葆光先生爱说的湖北话）的舅子，硬生生地算了我们十二个法郎去。次日早餐多少钱，一时记不清，不敢妄说。午餐无鸡无酒，三人共去了三十多个法郎。到巴黎之日，即在萧家饭铺遇见汤公宝山（谑称汤葆光先生），当即将悲老（指徐悲鸿先生）嘱转致之事告之。是日倦极，遂在巴黎与孙先生同榻。次日大雨倾盆，狂风怒吼，又不思回乡，乃模模糊糊地在巴黎睡了一夜，遇见赵会长（天狗会会长，他本人并不知道有此荣衔），遂将孙军师（天狗会军师孙佩苍先生）嘱转致之十法郎予之，有专使在旁作证。此间时雨时晴，不如在柏林之冷，然寒舍仍日日烧火，独居寡出，极力收心，作预备上课读书工夫。初时心惶惶然无所主，如青春少妇，甫嫁而骤寡者，近略觉有所安顿，仍不大宁静，颇似绝妙名姝，嫁一鸡皮鹤发之大腹贾者，一笑。此间新闻甚多，不欲再事饶舌矣。匆颂 近安。

巴黎物价似觉略低一二，如我昨日购米只一法郎二十生丁一公斤，但房价大增，且不易觅，悲老之画册谨为代存封存锁箱中，既无污损之忧，复无水旱之灾也。

登恪启 五日

一九二三年的春天，我们正为费用不继，而在日处愁城，忽然接到驻法大使馆的通知，大意是教育部已经补汇全部积欠官费，叫我们前去领取。涸辙之鲋，绝处逢生，这一喜真是非同小可！徐先生立刻写信到巴黎，请使馆将钱汇到柏林。钱到之后，把所有欠款还清，和朋友们殷殷道别，我们重回巴黎，继续学业。

在回巴黎之前，我买了一件黑色兔皮大衣，那在一般皮货里面，要算是最便宜的了。我一向不讲究衣饰，买这件大衣，实在是因为兑汇的关系，价格要

比巴黎便宜得太多。

当时徐先生并没有什么表示，不料在四十多年后，忽然引起了一桩公案。徐先生在大陆逝世，香港的《新闻天地》周刊，登出了一篇文章，追记徐先生的往事。其中有一段记述徐先生批评我对学习不大热心，说我曾把他叫我买提琴的钱，拿去买了一件皮大衣。不久，《新闻天地》发行人卜少夫先生到了台湾，曾来我的寓所，我提起这事，他表示如果我有所说明，他愿意刊载，我当时只一笑置之。因为我想这段记载一定有错误，我在柏林所买的提琴，后来使用多年，在巴黎的时候，徐先生还曾为我画过一张油画，画的就是我凝神奏琴，这张油画，至今我还悬在客厅。

张季才先生夫妇设宴为我们饯行，临别依依，无限怅惘。后来到一九二八年北伐成功，季才先生挈眷回国，一九二九年、三〇年之交，我们再到北京，他已在故都做寓公，儿子结了婚，在一间学校教授德文；姨太太不幸死了。伪满政权成立，听说他已出关投奔溥仪的小朝廷，从那时起，我们才中断了联络。

在巴黎的那些年，我始终没有进过什么学校，一方面固然由于生活困难，我要做家务；另一方面也因为我一向是个不思进取的人，因为我所受的旧式家教，以及当时社会的环境，都不鼓励一个女人去开创事业，所以我向来少有积极进取的计划与决心。徐先生对我的学业问题更是不闻不问，一切听任我自己作主，所以在巴黎一住五年，我只学过一阵子音乐，拜的老师是巴黎国立歌剧院的提琴手比松先生。他每周教我两小时的提琴，比松夫人则教我两小时的乐理，两夫妇待我非常亲切友好。比松先生领导的一个管弦乐队，每周一次在埃得来戏院公开演奏。比松先生总是送票请我去听，这样我就等于一星期上六小时的音乐课程。

我们回到巴黎，先住旅馆，后由朋友介绍，在凯旋门附近的第八区，租了一间画室。巴黎市容整齐美观，因为政府规定所有的房屋不得超过六层，我们所租的画室，便在六楼，可以算是巴黎最高的寓所。据说，这幢房子的女主人从前也很喜欢画画，她自己住在五楼，所以便在六楼开了一间画室，后来她自己没空画了，就以低廉的价格出租。这使我们感到非常的合适，因为徐先生最需要的便是画室，于是我们在市面买了些简单的家具欢天喜地地迁入新居。



▲箫声（徐悲鸿，1926年）

这时我已经学会做家务事，因为徐先生向来对于家务琐事不大管的，所以我只好挑起这个重担。可是住在六楼，画室算是有了，然而我却在为上楼下楼大吃其苦头。

提起那些苦头，常使我有愤懑不平的感觉。巴黎的房子，四层楼以上一定有电梯，我们的住处高居六楼，而且就在凯旋门附近的所谓高级住宅区，这座楼当然是有电梯的。可是电梯在前面，只通到五楼止，因为六楼是专供住户的佣人居住的，只有楼梯可走。从楼下到六楼，足足要爬一百多级，而我却常常为了缺少一根火柴，来回爬这一百多级梯子。

回巴黎不久，刘纪文先生、张道藩先生和邵洵美先生，他们也都由伦敦转来法国。天狗会组织扩大，于是会友们公推谢寿康先生为老大，徐悲鸿先生为老二，张道藩先生为老三，邵洵美先生为老四，军师是孙佩苍先生，郭有守先生是“天狗会行走”，江小鹁为专使，我呢，因为“天狗会”只有我一个女性，他们戏称我为“压寨夫人”。这一阵子的生活，可以说是过得轻松愉快，欢欣热闹，会友们情谊亲切，有时候一天要坐好几次咖啡馆。

一九二五年北京的政局波谲云诡，变幻莫测，官费起先是断断续续地汇来；然后竟宣告中辍，这一下使我们大为狼狈，经常捉襟见肘，用费不继。记得有一次，眼看第二天就要断炊，徐先生彷徨无计，叫我到一位刘先生家里去借钱。刘先生是湖北人，时任中国驻巴黎领事馆随习领事，是我们最要好的朋友，他带着一妻一女住在巴黎，两家时时来往。我到了刘家，大概是下午四点多钟光景，他们一家看见我都很高兴，谈谈说说，不知不觉就到了晚餐的时间，于是他们殷勤留我吃晚饭。吃过晚饭后，坐下来再聊，几次三番，我踌躇再踌躇，考虑再考虑，一直到夜晚九点不得已而告辞，我仍然鼓不起勇气开口借钱。可是时间却已整整耽搁了五个多钟头。

回到家里，徐先生已经上床睡觉，听见我回来的声响，他翻身坐起，问我借到钱没有？我无可奈何，只好坦坦白白地告诉他，我实在缺乏向人开口借钱的勇气。他听我这么说，一语不发，躺回床上继续去睡了。

第二天起来，两个人预备一道到朋友家去吃饭，可是身上只有一个法郎，算一算，买两张地铁车票需要八十生丁，剩下二十生丁刚好买一张日报，于是我们走下楼去。

当我们到了楼下，经过门房，刚要走出大门的时候，门房忽然喊住我们，递给徐先生一封信。徐先生边走边拆，突然他欣然地笑了，将信递给我看，原来是公使馆的通知，教育部寄来了一个月的公费，请徐先生到公使馆领取。大旱逢甘雨，绝处又重生，我看完了信，当然很高兴，想着向人借钱的苦痛，真是如释重负。

徐先生也很兴奋，他叫我仍然按照预定的计划，到朋友家去吃饭，他自己先到使馆领钱，领来了钱，再跟我到朋友家里会合。

人在穷困的时候，灾祸反倒来得特别的多，这也许就是我们中国俗谚所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的道理。那一年夏天，巴黎突然大降冰雹，奇怪的是满天冰雹单单第八区落的最多最大，我们所住的顶楼，为了有充分的光线，屋顶有一部分镶嵌着玻璃，冰雹一来，玻璃多半打破，画室里更是一片狼藉，我们想请房东修理，可是一看合约，那上面明明白白地规定，房屋如遭天灾人祸而致损坏，修缮之责概由租客自负，而我们此时又是最穷困的时期，徐先生和我简直懊恼焦灼得不知怎样是好！

正在面面相觑，忽然来了一位访客，访客是我国驻巴黎总领事赵颂南先生。赵先生一进门就说：我听说你们这一带冰雹成灾，恐怕你们受到了什么损失，特地赶来探望一下。

赵颂南先生是江苏无锡人，崇尚洋习，爱好艺术。他带着一家人住在巴黎任所，膝下有两位公子，常常邀请我们到他府上吃饭。他府上富丽堂皇，陈设布置极为讲究，收购的原画珍品也多，一家大小的生活习惯全盘欧化。他有两句批评中外人士的异同之点，他说：“中国人为吃而活，外国人为活而吃。”

他大力提倡幼童留学，就是把知识初开的儿童送到国外，直接接受西方教育。他对于自己的构想，有他的一套理论。他说：“现在我们中国的建设，处处要用外国人，诸如工程、机械、邮电、交通，以至于军事和教育，请外国人不但高薪优给，而且还把国脉民本统统抓在外国人手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不能选拔聪明优秀的学童，送到外国留学，学成以后，回国服务，就当外国人用，不也是一样吗？”

赵先生从不徒托空言，尽唱高调，他为他这个理想化费了不少的心血和金

钱，不但让他的两个公子接受西洋教育，而且还运用私人的力量，在家乡选拔亲友子弟，送到外国从根本学起。赵总领事的两位公子会说无锡话，中文大概读得很少，洋务方面则是学有专长。家乡弟子被他带到外国以后，造就了许多出类拔萃的人才，譬如后来在上海开业的名医师徐宝怡，就是赵先生的内侄，幼童留学成功的范例。

那天赵先生到我们家里，看出了我们狼狈的情形，他立刻送了我们一笔钱，这才解除了我们迫在眉睫的困难。他这种雪中送炭的友好表现，至少在我个人是终身难忘的。

朋友只能救急，不能救穷。

起先官费的汇寄时断时续，我们尚可以咬紧牙关，勉强维持。后来官费像断线的风筝一样，毫无着落；那就不仅是痛苦，而且更面临着断炊的莫大危险！

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想到去做工，用劳力换取顶起码的生活费，只求不致成为饿殍就行了。但是在法国找工作谈何容易？他们自己的失业问题正在严重关头，哪有工作给外国人做呢？

奔走了不知多久，才找到了两种临时工作，我给罗浮百货公司做绣工，徐先生替书店出版的小说画插图。绣工是粗糙而简陋的，在制就的外衣或睡袍上，按照预先画好的图样绣一朵花，几道花纹，有的用粗丝线，有的干脆用毛线。当时和我同做这种工作的，还有夏安修太太、袁浚昌太太和四川籍的李琦小姐，我们轮流到公司去领衣服，拿回家来做，做好一批再换领一批，工资是



▲蒋碧微像

按件计酬，大概绣一件可以收入五个法郎。

两种临时工作不但待遇菲薄，而且为时短暂，要想靠它维生，那是痴心梦想。我们苟延残喘地拖了一段时期，终于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在巴黎确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再不另想他法，那么只好束手待毙。

“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呢？”深藏在内心里的恐怖和隐忧，迸出了焦灼痛苦的声声呐喊。

3

靠徐先生一个人的留学官费，我们在欧洲撑过了六年光阴。一九二五年，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留学生官费停发。我们在巴黎进退维谷，一筹莫展，眼看就要流落海外。在这紧急的时候，徐先生和我商量，由他返国一趟，设法筹措款项，如果成功，再回法国继续学业。我呢，只好暂时留在巴黎等他的消息。

在无可奈何中，我同意了他的建议，不过，我也有一点补充意见，我说：

“如果你筹到的款子，不够维持我们在巴黎两年的生活，那么你就干脆寄旅费给我，让我也回国算了。”

他答应了，于是我们忙着安排他动身。

由于赵颂南总领事的介绍，我们认识了一位黄孟圭先生。黄家是福州望族，孟圭先生是四兄弟里的老大，他的二弟曼士先生，侨居新加坡多年，在华侨社会名气响亮，很有地位。孟圭先生把我们的困难写信告诉了他，曼士先生立刻复信答应为我们设法。他请徐先生到新加坡去住一些时，他可以介绍徐先生替几位侨领画像，可能会得到一笔相当数目的报酬。因此，徐先生改变计划，预备先去新加坡。

结婚八年，这还是我们第一次分离，尤其想到他走了以后，我将孤零零地留在巴黎，家乡和亲人，都远隔了半个地球，而且来日的生活究竟怎样维持？简直无从想像。因此我内心里难免有恐怖和凄凉的感觉，但是我不会向徐先生表露，因为八年以来，我觉得他从来就不会在感情上对我有所了解和关爱。

朋友们陪我送走了他，紧接着我便把所租的画室转让给别人，自己在—一个法国女人的家里，租了一间房子。搬去以后，连伙食也由房东包办。这样，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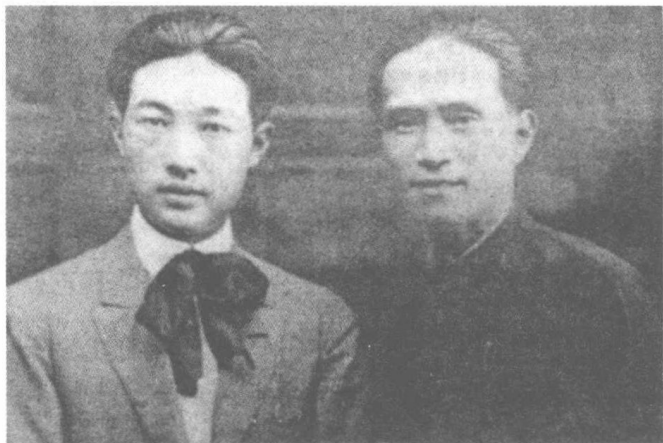
经济又省事。

起先以为他走了我一定会寂寞无聊，因为这时我已无需再做洗衣烧饭的日常家事，长日悠悠，除了拉拉提琴看看书，我是很清闲的。想不到正相反，以后的日子竟过得十分愉快轻松，因为天狗会的一群友好，张道藩、谢寿康、邵洵美、常玉各位先生，经常在一起坐咖啡馆、聊天、看戏、看电影，而且我还学会了跳舞，有时也出席晚宴和舞会。

另一方面，还有许多位要好的朋友，像李璜先生的胞姊李琦女士、袁浚昌夫妇，以及夏安修夫妇，这些人平时也和我很谈得来，所以我们走动得极勤，有什么事大家都相互照应。

九个月以后，徐先生又回到了巴黎，当天晚上，听到了他回国以后的种种切切，就使我感到万分的失望和惆怅，甚至于我内心还有点愤怒，因为，生活困难的阴霾，随着他的归来反而更形加深！

原来他到了新加坡，便住在黄曼士先生家里，由于曼士先生的推荐和介绍，他给几位南洋富商画像。在半年的期间中，他得到了法币六七千元的润资，除了他的来回旅费而外，剩下来的，如果全部兑换法郎，数目应当在七万以上，这么多的一笔钱，尽够我们在巴黎再过两三年。然而，“钱呢？”



▲1925年徐悲鸿与黄曼士合影

“我回了一趟上海，”徐先生得意洋洋地说：“这一回可真买了不少好东西。”

“又是金石书画？”

“当然。”

“那我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我又没有花光，”他振振有词地说：“还剩得不少呢。”

不错，他是剩了一笔钱回来，可是我们苦撑了十个月，便又陷于山穷水尽，无计可施的地步。

“这一次又怎么办呢？”

“最好，——”他顿了一顿：“让我再回国去。”

我却在想，回国，哪里再去找像去年那样的机会呢？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这儿，我们心里都明白，即使让他回国筹钱，旅费呢？当时我们连一趟单程的旅费都凑不出来。

借钱，人家也是自顾不暇，找工作，根本就没有可能。异邦沦落，就像迈入泥淖流沙，越陷越深，最后，必然是灭顶无疑。

徐先生抱着“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想法，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我的性子比较急，简直不知道怎么样好。有一天，“天无绝人之路”的老话居然应验，我们再度绝处逢生。

中法大学教务长李圣章先生，突然到我们家来拜访。这位热心慷慨的老朋友，是第二次来法国考察教育。他在闲谈之下，知道了我们的困境，并且明白徐先生很想回国再筹费用，目前所缺乏的是一笔旅费，于是他自动地提出借钱给我们。这样，一九二七四月，徐先生才又匆匆就道东去新加坡。

我一直患着慢性盲肠炎，医生教我鱼肉鸡蛋面包统统不能吃，只准吃蔬菜，可是外国的蔬菜那么少，因此我所吃的东西便极为有限。徐先生走了不到一个月，一天早上我忽然发高烧，连忙请医生来看，经过诊察，他竟说了一句使我极为惊诧错愕的话，他很肯定地说我怀孕了！

当时我还不相信，因为我和徐先生结合九年，一直都不曾生育，怎么现在突然有了喜？而且，推算时间，一个多月的身孕，这位医师怎么看得出来？

怀着忧喜参半的心情，由同学孙逵芳先生介绍，到巴黎圣路易医院，请一位医学院教授为我检查。教授说目前还不能确定是不是怀孕，不过他劝我不论怀孕与否，最好先把盲肠割除，因为如果真是有孕，孩子在肚里越长越大，将来就没有办法动手术。

于是我决定住院开刀，割盲肠。

动过手术，大事不好，我竟日日夜夜地呕吐，吃什么吐什么，肚子里吐空了便呕出胃液来。每次吐后，唇干舌燥，护士小姐用菩提树叶泡水，放点儿糖，给我当作解渴的饮料。可是一吃下去，仍然照吐不误，往往吐出来的时候，菩提叶汁还是热的。病人不能吃东西，缺乏营养，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可是三十多年前的医药，哪有今天这么发达？保持体力的营养剂要从肛门里滴进去。一个人留在外国，生了这么严重的病，徐先生又远在新加坡，当时我凄凉痛苦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开刀的情形倒还好，八天之后便拆线，创口既没有发炎，体温也很正常。两星期后，我请求医师准我回家休养，医师认为开刀手术一点没有毛病，呕吐可能是怀孕的现象，他们负不了责，因此准许我可以出院。

两个礼拜的大吐特吐和不吃不喝，使我的身体趋于极度的衰弱。第二天早上准备出院，从病床上爬起来穿衣服，两脚落地就像踩在棉花堆里一样，衣服刚刚穿好，我便一阵天旋地转，晕倒在地。于是有人把我用担架抬进升降梯，再抬进汽车，到了住所，连人带担架抬上楼去，然后由房东侍候我睡下。房东太太为人非常慈祥和蔼，她给我很妥善的照料。朋友们听到消息也纷纷地赶来探望，其中包括夏安修夫妇，他们殷勤地问我吃什么？我不假思索地说：“我想吃萝卜炖肉汤。”

第二天，夏太太果然炖了一大锅汤送来，交给房东太太，请她每餐热一小碗给我。我吃得津津有味，倒把房东太太吓呆了，她说我怎么可以吃这种油腻的东西？然而奇迹却出现了，这一天下午起，我居然停止了呕吐，而且没有好久，健康也迅速地恢复。

医师既已证实我有了身孕，我连忙写信告诉徐先生，请他筹寄旅费让我立即返国。当时徐先生还在新加坡，他得讯后很快地复我一信，要我准备启程，他说他将在新加坡等我，要和我同船回上海。但是他所寄的钱，还不够我作旅费，于是我一直等到八月里，我父亲为我寄来了三百元，方才能够成行。

去国八年，吃尽了千辛万苦，如今总算可以返回国门了。虽然不是载誉而归，至少，徐先生和我双双旋里，多少可以冲淡一些当年私自出走所受的讥讽和嘲笑。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忙于在做动身前的准备工作。因为徐先生第二次回国走得很匆忙，他只带些简单行囊，有那么多的书籍画件、衣服用品，都必

须我亲自加以处理。我把可以装箱的东西装了几个大木箱，交给转运公司代运。剩下的衣服和油画画卷，单片图画等，我也一一妥善包扎，大大小小，随身携带的行李，还有七八件之多。

我所搭的法国轮船是从马赛启碇，由巴黎到马赛要坐火车，路上要走十几个钟头。沈宜甲先生当时在念巴黎矿科大学，他坚持亲自送我到马赛，因为那条船上还有七八位回国的中国学生，都是学工程的。其中有一位熊天祉先生，四川人，还有一位福建人陈先生，沈先生和他们都很熟，他要为我介绍，请他们在路上给我照料。

早先，我手背上长了小小的脂肪瘤，开过一次刀，不料几个月后又长了出来。我恐怕回国以后治疗不便，所以动身前再去开了一次刀，麻药的效力刚过，我便带了一大堆行李上了火车。因此，一路上疼痛难耐，整夜睡不着觉，那次手术缝合的药线，还是轮船上的医师代我拆除的。

坐了一夜的车，在碧空如洗、海天一色的晴朗早晨抵达了马赛，没有时间游览这座法国的第三大城，因为轮船当天便要开了。沈宜甲先生赶紧送我上船，介绍了同船的那几位中国学生，我们在船上相处一个多月，彼此都很熟稔。可是非常抱歉，如今除掉熊、陈两位以外，其余几位我已全部忘却他们的尊姓大名。

法国邮轮吨位较大，设备也好，我买的是三等票，舱房里面有四张铺位，卖出去三张。和我同舱的，有一位白俄女子，一位战后由德国归还给法国的阿尔萨斯省女人。

远洋轮船上，洋溢着罗曼蒂克的气氛，船上有欧洲人、安南人、中国人，甚至还有从非洲上岸的黑人土著；六七百个种族不同、肤色各别的乘客，从开船的那一刻起，便有一个多月的时光聚在一道。一些男士们为了寻找刺激，或是排遣寂寞，往往会选定一个对象，向她展开追求的攻势。于是乎不消几天，根据我的冷眼旁观，便有许多陌生男女，变成了出双入对的亲密情侣。晚上如果到甲板或船头船尾走走，经常都会发现卿卿我我的情侣们在散步、佇立、拥抱，甚至接吻。他们尽找那些偏僻阴暗的角落去谈情说爱，有好几次我一直走到他们的眼前，方始惊觉他们的存在，吓得我心里怦怦地跳，从此，晚间我就很少再出舱房了。



▲鹰扬（徐悲鸿，1939年）

这是我第五次航海旅行，居然一点都不晕船，因此旅途生活过得很愉快，胃口也很正常。航程中，多一半的时间是看书，看那些我在动身以前所预备好的音乐理论和著名音乐家的传记。除了看书以外，我还有同船的几位中国同学作伴，闲来无事，大家谈谈说说，打打纸牌。谁输谁赢，记在账上，等到了有中国饭馆的码头，大家一齐上岸观光，由赢家做东，吃一顿中国饭。

船过红海，要走三天三夜，站在甲板上面，四望都是无涯无际的海水，极目所视，不见岸线。一天夜晚，船上忽然发生火警，浓烟四起，警钟急鸣，我们三人在睡梦中被嘈杂声惊醒，舱房里已是烟雾腾腾，使我们呛咳不已。这一惊非同小可，我们急急忙忙披上衣服，便往甲板上跑。甲板上正乱成一团，水火无情，我们却在大海里失火，岂不吓死人？正在不知怎样是好，忽然听见有人大声地喊，火已扑灭了！全船一千多人的生命总算幸获保全。我惊魂甫定，才听说起火的地点，居然就在我们的舱房里。因为我们的舱房上头是甲板，靠船舷有一个小圆窗，面对着大海，小圆窗有一尺多厚的窗台，可以摆些零碎东西。那天晚上睡觉之前，同舱的白俄女子，顺手把她的纱头巾抛在窗台上，大概甲板上有人吸烟，抛烟蒂的时候，被海风卷进窗来，烧着了头巾，由于风势很大，于是迅速地燃烧到舱板，就这么酿成了一次有惊无险的火警。

警报过后，船长到我们舱房里来调查，靠船舷的舱板都烧焦了。问来问去，问不出结果，因为我们三个人谁也没有成为火首的可能，我们既不吸烟，又哪里来的火柴呢？

四十年前，欧洲的富丽繁华和非洲的贫瘠荒凉，形成极鲜明的对照。船过红海出口处的吉布地，远眺岸上只有几幢简陋的建筑物，然后便是和大海一般的平沙无垠，映在灿然的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反光。这一处非洲要港，居然没有船只停泊的码头，轮船在距岸百丈左右的海面抛锚。我伏在船舷的栏杆上，只见有几只舢舨小舟，飞也似的向大船划来。我正纳闷，俄而从小船上跳下无数皮肤黝黑的孩子，他们就在海面上载浮载沉，举起双手，嘴里喃喃有词地在念叨。我心想他们一定是讨钱的小乞丐，我倒有心给他们一些零钱，却在踌躇怎么个给法。这时，又见身旁的人，纷纷掏出硬币，毫不犹豫地抛向水中。一时之间，但见硬币像雨点一样地洒落，而那些孩子，便一个个地翻身钻入水底，不一会儿，他们又一一地浮了上来，手上高举着硬币，脸部露出了欢欣的

笑容。我唯有摇头叹息，佩服他们的本领实在是太大了。船上的人更告诉我说，这是土人谋生的方式之一，一到岸上，还有更多的乞丐，像苍蝇似的围集在旅客身畔，要那些赤脚戴红帽子的安南巡捕，用皮鞭猛力地鞭笞，才肯让开一点。我听了不仅感到匪夷所思，同时更深深地为这些土著人悲哀，因此我也把我所有的零钱抛下海去，让他们入水捡取。

船到新加坡，我挤在甲板上的人群里凭栏眺望，在我的想像中，徐先生一定会如约在码头出现。可是无论我怎样极目搜索，都看不到徐先生的影踪。我心里正在暗暗地着急，忽而看到了黄曼士夫妇，他们正从码头上迎上船来。寒暄过了以后，黄先生交给我一封信，说是徐先生留交给我的。我连忙拆开来看，这才晓得，徐先生已经先回上海去了，他说他要先到上海去为我布置一个新家。我看完信，心里有无限的失望和怅惘，期待了一个月的相见，盼望了好几年的双双归国，如今竟成了泡影，这使我受了很沉重的打击。

黄曼士夫妇非常殷勤地招待我，接我下船到他们家吃饭。黄家在新加坡的房子恢宏华丽，庭园满植奇花异卉，热带树木挺拔高大，显得很有气派。一间宽敞的客厅，全部中国式布置，红木镶嵌螺钿的桌椅，古董字画，琳琅满目。这一座大厅，便是新加坡有名的百扇斋，被誉为最足以代表中国文化的客厅，因此许多外国记者，常来他家参观拍照。斋名百扇，顾名思义，可以想见他珍藏的扇面之多。

吃过了饭，曼士先生再送我上船，我向他表示深切的谢意，然后继续航程。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那天，我终于回到了一别八年半的祖国。

父亲、母亲、徐先生和他的二弟寿安、我的弟弟丹麟，都在码头接我。骨肉重聚，一家团圆，回首前尘，心情分辨不出是喜是悲。不过看到父母健康如昔，丹麟弟已长大成人，使我得到无比的安慰。

徐先生允诺为我布置的新家，要到三星期以后才能迁入，因为他在法租界霞飞坊订租的房子，还没有落成。他和我先借住在黄震之先生家里。黄先生和徐先生是忘年交，在上海有许多房地产，很富有，早年徐先生在上海困苦无依时，他帮过徐先生不少的忙。

徐先生一生和姓黄的人很有缘分，除上述的黄震之先生外，以后又有黄傲寰先生，也帮过他忙。所以徐先生从家乡逃到上海那一段时期，为了躲避家人

寻找，曾经改名换姓，叫做黄扶，意思就是有姓黄的在扶助他。后来又认识了黄孟圭、曼士昆仲，他们所给予徐先生的帮忙，更助成了他艺术的发展。

在黄家住了二十六天，霞飞坊的新居造好了，我们立刻搬进去，并且迎我的父母同住。这幢新居是三层楼的建筑，另有两个大亭子间，新式卫生设备一应俱全。当时我父母住在二楼，我和徐先生住在三楼，两间亭子间，则由丹麟和寿安分住。

寿安是徐先生的二弟。当我们在欧洲的时候，黄傲寰先生有一次到宜兴去，看见寿安已经十三岁，既不读书，又没有学手艺，住在家里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他觉得这样会耽误了他的前程，于是就热心地把他带到上海，原意是想把他送进平民习艺所，学一门手艺，将来也好谋生糊口。到上海后，黄先生把寿安往我娘家一送，从此他那边就没有了下文。那时我家住在西门恒乐里，亲戚朋友来往，见我家突然多了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好事的不免要问声究竟。这一问倒使我家里的人难以回答，因为我和徐先生出走，家里一直都在瞒着外人，现在又怎么好告诉人家，寿安就是徐先生的弟弟呢？想来想去，没有办法，父母只好收寿安做义子，而两位老人家以后也真的把他视作己出。

寿安自己很想求上进，刚来我家的那一年，他只略为认识几个字。于是由父亲和丹麟弟每天教他读书，衣食住都由母亲照料，渐渐地他文理通顺，也很懂规矩了，母亲才托邻居卞先生，把他介绍到爱多亚路一家纱布交易所当学徒，薪金每月大洋一元，不过他在家里吃住，只求有个出路，用不着计较待遇。

熬了几年，由一个月拿一块钱的薪水，一步步升到每个月拿几十块钱，年终的分红，也在逐年增加。到他二十一岁，由母亲做媒，将我三姑母的女儿佑春表妹许配给他。我们回国之前，他已经订婚，后来结婚成家，都是母亲一手包办，因此母亲曾经感慨地说：“即使我再生一个儿子，我待他也不过如此了。”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们的长子伯阳诞生。清晨三点多钟，我开始阵痛发作，七点钟徐先生把我送进广慈医院，由一位法国医师接生，直到下午三时，胎儿方始呱呱落地，母子平安，一切顺利。在广慈医院住了十二天，伯阳的脐带脱了，我们才回到家里。

伯阳的出生，给全家带来无比的欢乐和兴奋，朋友们也为我们非常高兴，纷纷跑来送礼道贺。结合十年，才有这个儿子，大家都认为应该大事庆祝。徐先生却不过亲友们的盛意，满月那天，假一家饭店大开汤饼之筵，到贺的亲友极多，劳累了名摄影家郎静山先生，义务担任摄影记者，也不知道拍了多少照片，此外他还送了伯阳一个金锁片，作为贺礼。

徐先生对于伯阳钟爱万分，我更是自己喂奶自己带，把全都心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哺育三个月后，我偶然上街买东西，在电车上，望着对面坐着的乘客，觉得他们个个都是巨人，心想难道我的眼睛花了不成？再一想，方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几个月里，眼中只见孩子，突然看到了许多大人，竟然使我产生了错觉。

回到祖国，父母姊弟夫妻大团圆，又生了伯阳这个全家人当作宝贝看待的孩子，生活过得安定，精神十分愉快，有时回想过去十年的苦难艰辛，仿佛是一场惊骇恐怖的恶梦，而目前的欢欣快乐，就如一叶轻舟，徜徉在风平浪静的海洋里，两相比较，真有天渊之别。我常常想，像我这样结合十年方始有“家”的女人，在世间恐怕不多，此后，上天总不会再把我的幸福快乐剥夺了吧？——如今徐先生是一位声誉鹊起的画家，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他就像一位精神抖擞的斗士，站在他未来康庄大道的起点，用他这支如椽画笔，辟出他的远大前程，那时，我将分享他的成功果实，并且为他骄傲。

过了一个欢喜热闹的年，转瞬间江南三月，莺飞草长，母亲央人择了一个黄道吉日，她要给寿安和佑春表妹完婚。婚礼决定在宜兴城里举行，我们全家出动，浩浩荡荡地回到故乡，租了城里最大的一家旅馆，访亲探友，徘徊儿时门巷，使我觉得非常的兴奋。

寿安的婚礼举行过以后，第二天，我们包了一条木船，从城里开往屺亭桥，回徐先生和寿安的家。船上除了寿安佑春一对新人，我们两夫妇，还有伯阳，以及一个女佣。

屺亭桥是一个小镇，座落在屺山脚下，通航木船的小河两岸，散散落落有一两百户人家，锡宜公路就从这儿经过。徐家在小河之滨，有一排三开间的铺房，后面还有一楼一底居室。可是屋浅楼窄，后门外就是阡陌纵横的田野。

徐先生家庭境况不好，他的父亲达章公，仅有的财产只是那几间矮屋和几

亩薄田。达章公工书善画，但是那时候书画卖不出大钱，他中年信佛，经常住在和尚庙里，和徐先生的母亲貌合神离，感情不太融洽，不久以后，也就死了。从此老太太把全部希望都放在徐先生身上，可是徐先生长大成人，对他的家根本不关心，教书时过门不入，出国八年连信都没有一封。徐老



▲保护后的徐悲鸿故居

太太茹苦含辛地自家撑立门户，她替二女儿招赘了一个木匠女婿，就靠他做些粗工木器，赚点钱来养家。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徐老太太的心情和生活当然是痛苦困难的，尤其是乡邻之间对她不但不加敬重，反而有点冷讽热嘲，她听了只有默默地忍受。因为在乡下人看来，她是被丈夫和儿子所遗弃的。

这位老太太从来没有受过教育，但却精明能干，她的一生全在贫穷、苦难、伤心和绝望之中度过。假如说她生命中还有一笔绚烂的色彩，那就是我们和寿安新夫妇回籍的那一天。长儿长媳从海外返国，又给添了孙子，现在她已是做祖母的人了；二儿子在上海有很好的职业，如今更娶了新媳妇回家，这许多体面风光的事，在闭塞的乡间看来是很了不起的。因此乡邻们对她的态度整个改变，马上就有人跟她老太太长、老太太短地奉承起来。徐老太太苦苦地熬了几十年，到了这一辈子最光彩荣耀，扬眉吐气的一天，她要大大地铺张一下，实在也是很入情入理的。

当天她把木匠家生材料收起来，将三开间的铺面改成一间大厅，请了厨子来办酒席。她要不惜花费地大宴宾客，让大家来看看她“荣归故里”的儿子媳妇和长孙，这不但为她大争面子，而且还能够提高徐家在地方上的声望。对于她，真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個转折点，如果儿子能够照顾她，她从此不就可以享福了吗？

我们的船一直开到徐家门口，还没有钻出舱门，便听见爆竹声响彻四野。

船家搭了跳板，我们鱼贯登岸。徐老太太早已笑得合不拢嘴地站在门前迎接。在她的身后有一大群人，男女老幼，尽在我们的前后左右挤来挤去，岷亭桥镇市只有这么一点儿大，可能是附近的人全都跑来看我们了。

这是我第一次到徐先生家里，同时也是十一年来头一遭拜见我的婆婆，我和表妹向她恭敬地行礼，她却把我们当做贵宾一样地招待；一个劲儿绕着我们身旁转，一会儿小心翼翼地摸摸佣人怀里的伯阳，一会儿看看我，看看表妹，又看看徐先生和寿安。然后大声地吩咐她三个女儿拿这拿那，端座奉茶，嘴唇在不停地哆动，不是说话，便是在笑。

坐定了以后，我才有机会辨认一下我婆家的人，我发现徐先生跟他母亲相像的地方不多。这位老太太身材矮胖，皮肤黝黑，一只眼睛因为生白内障而失明；三位小姑和徐先生的三弟寿恺都穿着得很朴素，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还有些忸怩羞涩。至于那位木匠妹夫，则完全是一个诚实的工人模样，往后我每次到宜兴姊姊家去时，他总会带点乡下土产到城里来看我，我倒是觉得他为人很不错。

祭祖，宴客，大厅里乱哄哄的一片，老太太跑前跑后，忙得团团转。有人敬酒，耳朵里只听到她老人家一一介绍的声音，这一顿饭，大家都吃得高兴快乐。

散席后，老太太带领我们谢客送客，我从她爽朗的笑声里，发现她内心是何等的得意；人生在这一刹那，向她展现了美妙的一面，使她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辛劳和疲累，她的精神状态是在极端的亢奋之中。

那时候大概有两点钟了，她先在一片凌乱的大厅里给我们安排好坐处，然后又大声地呼喝指挥，叫三位小姑赶快把杯盏碗筷收拾清楚，好让大家围坐叙家常。因为从我们抵步直到这时，她还不曾和我们好好地说上三句话。

三位小姑子手忙脚乱，老太太仍在满头大汗地发号施令，一大堆孩子挤在门口噉噉喳喳，我的耳鼓里，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清静过，蓦地——

“砰！”

一声尖锐的枪声，来自距离很近的地方，突然我听觉里所有的声音戛然而止，可是此刻的寂静却又令人难耐，正在惊疑不定的时候，接着又——

“砰！砰！砰！”

“强盗来啦！强盗来啦！”

枪声和喊声在四面八方响，门前的孩子们一哄而散，我和表妹吓得面无人色，不知所措。这时，老太太、寿安、寿恺和三位小姑，连忙把我们两个以及伯阳和佣人，前呼后拥地拖着往屋子后面逃。一逃逃到了一间小小的柴房，我们被塞进了稻草堆里，小姑子们用稻草把我们的头都盖住；稻草掩盖得这么严密，简直使我们窒息。

佣妇怕伯阳受不了这样的窒息，可能会哭，万一哭声被强盗们听见，我们将遭遇到不可想像的噩运。于是她急中生智，敞开胸脯，把她没有奶水的奶头塞进伯阳的嘴里。

这时候我猛然地想起了徐先生，他到哪里去了？

为自己和孩子的处境害怕，又在为徐先生的安全担心。我正在踌躇，是不是应该跑出去找他一趟。就在这时，突然之间又听到杂沓匆促的脚步声，我们在柴堆里吓得一动都不敢动。步声渐近，才知道是老太太和小姑，她们想起我们躲在柴房里还是不妥当，又来把我们拖出草堆，急急忙忙从后门出去，向田里面跑。三月春寒，风摇麦浪，田塍小径，高低不平，我和表妹从来没有走过这种路，一路上又非得快地逃，情势危殆，不容我们休息停留，一口气跑了四五里方始跑到了邻村，投奔到徐先生的姨母家里。事后回想起来，在这一次惊骇事件的过程中，老太太和三位小姑，可以说从来没有一分一秒顾及她们自身的安危。

一想起徐先生，我就忐忑不安，心乱如麻，急切中又无从打听消息。焦灼紧张地等到了傍晚时分，门外传来人声：说是这下好了，徐先生他们也来了。我连忙站起身来往外看，只见徐先生和寿安一前一后地走进来，他的神情很狼狈，头发里，衣服上，粘附着许多谷粒。

“你到哪里去啦？”

我忙不迭地问他，但是他摇头苦笑，默不作答。后来我才听说：徐先生的反应和动作太快了，枪声一响，他跳起来就跑，自家一个人跑到屋后谷仓，打破了气窗的木条，钻进去躲在谷子堆里。

当天夜里怎么睡法？又发生了问题，因为姨母家里的房子太小，一下子来了这许多人，连被窝褥子都不够分配。后来只好搬来大批稻草，在一间小楼上

铺了一个大地铺，大家睡在稻草上联床夜话。

据寿安说，这批强盗打劫的目标并不是我们，而是河对过的油坊。从前在农村里油坊是最有钱的，强盗得手以后，呼啸而去，根本就没有过桥到我们这边，却让我们饱受一场虚惊。

城里得到了圮亭桥被抢的消息，那是轰动一时的大新闻，于是有人说：圮亭桥徐家不是出了一位大画家吗？夫妇双双从外国回来，还有二儿子在上海做生意，刚在城里结了婚，两对夫妇包了一条船回圮亭桥，强盗晓得了，当然不肯放过这个好机会。如此这般，一传十，十传百，宜兴城里谣言满天飞，说什么徐家两个媳妇被抢走了，身上的衣服都剥得精光，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谣言传到我们家里，可把父亲、母亲、三姑和姐姐给急坏了，连夜雇船，派得力家人，下乡来接我们进城。圮亭桥离城十八里，强盗明火执仗地抢劫，城里风声鹤唳，也得戒备，因此不但四门紧闭，而且水关也下了巨闸，四下交通全部断绝，包船出不了城。于是姊夫请他父亲程肖琴老先生写条子，嘱警察局开闸放船。第二天清早，船抵圮亭桥，我们也从邻村赶到，连家门都没有进，匆匆下船，起碇返航。

老太太把我们送到船上，眼看船只带着她的儿子、媳妇和孙子，缓缓离去，没有挥别，甚至于连徐先生和寿安，也始终不曾说一句什么时候再回来的话。知子莫若母，以她对徐先生的了解，我知道她心里不会有多大的指望。我从船窗探出头去，回望徐家破旧简陋的门庭，以及木然站在河边的那个矮胖身影，我仿佛见到她又恢复了持续几十年的忧愁面容，一喜一惊，她一生的快乐高潮，仅仅只有迎接我们抵达和开宴欢饮的那三四个钟头。现在，绚烂又复归于平淡，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忽然觉得我极同情她，我为她非常地难过。

丹麟自小文弱，读书又过于用功，在我们回国的前两年，就已经得了咯血的毛病，一年要发两三次。三四月里正是他可能发作的时期，母亲便陪他留在宜兴舅家养病，父亲带了我们一大批人，仍旧回到了上海。为了便于徐先生作画，我把三楼腾出来，替他布置了一间画室，我和伯阳搬到丹麟的亭子间，楼下给寿安夫妇做新房。父亲还是住在他原来的房里。

回国以后我们的经济情形一直不好，因为不但没有收入，而且我们两个人

回国的旅费还是借来的。这时吴稚晖先生和李石曾先生都在上海，徐先生拜见他们二位长者，李先生就以世界社的名义，聘请徐先生为几位国民党元老绘像，前后花费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徐先生为吴老先生、张溥泉先生和张静江先生夫妇画了四幅画像，每幅得到两百元的报酬，其中以吴老先生的像画得最好，吴老先生非常满意，自己化钱五彩制版，复印了许多张，分赠友好留念。

一九二八年二月，设在南京的中央大学，邀聘徐先生担任艺术系教授。徐先生表示愿予考虑，不过他有条件，因为我们家居上海，他说他每月只能余出一半的时间在京任教，中央大学也答应了，从此徐先生才有固定收入，中大的薪金是每月法币三百元。

我们在上海定居后，田汉便常来找徐先生，这位戏剧界名流是湖南人，他的本行似乎应该是话剧编导，不过他很活跃，样样事都想插一脚，但却一件事情也没有办成功。他找徐先生是为了商谈筹组南国社的事，拉徐先生和欧阳予倩同为发起人。南国社究竟是学校，还是研究所？我不清楚，只知道社里有戏剧美术等科。有一天欧阳予倩到我家里来拜访，徐先生不在，欧阳便和我谈天，说起田



▲钟馗饮酒（徐悲鸿，1929年）

汉做事只凭一股冲劲，既没有办学经验，也不懂得什么规章条例。欧阳对于南国社另有他的主张，田汉却不愿听他这一套，于是他决计不参加。我听了他的话，心想徐先生也是凡事没有计划没有定见的人，他要是跟田汉这种人合作，怎么能办得成事？我开始暗暗地为他担心。

徐先生在中大任教，半个月在南京，半个月住上海。然而自从他被田汉拉到了南国社，田汉便给他在社里辟了一间画室，徐先生把他的画具全部搬过去，从此徐先生就变成了半个月在中大，半个月在南国社了。除了回家睡觉，我整天看不见他的影子。

徐先生整天和南国社的人混在一起，把霞飞坊家里当做旅馆一样，为他的前途事业和我们家庭的幸福，我觉得我再也不能不闻不问。尤其是当欧阳予倩和我一次长谈以后，使我对于田汉产生了不良的印象，徐先生和他常在一起将来不知道会闹到什么地步？再三考虑，我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决定采取行动。有一天，趁徐先生到南京授课，我叫寿安陪着我，雇车到南国社，在那间乱糟糟的画室里，把徐先生所有的东西全部搬走，同时我正告南国社里的人，说我们就要搬到南京去住了。

不久，徐先生由南京回到上海，听说了这件事，他当然不好意思再到那边去。南国社知道徐先生回来了，派学生到家里来请愿，要求徐先生再去教他们画画，徐先生由于我曾经宣布过要搬南京，只好婉言谢绝。

为了这一件事情，两个人心里都不大痛快。徐先生想陪我出去散散心，于是他应允苏州艺专校长颜文梁先生的邀约，到那里去演讲一次。趁此机会，游览一下苏州的风景名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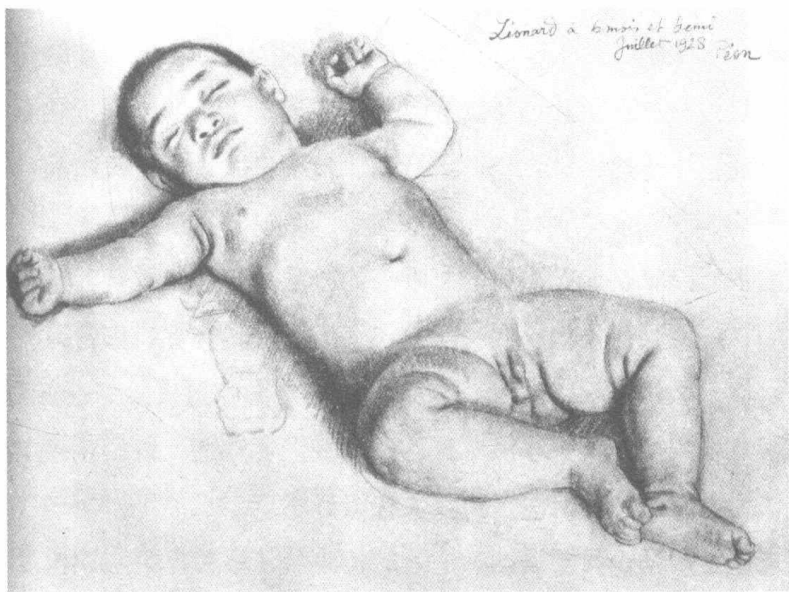
苏州和我们家乡宜兴毗邻，儿时我曾随父母到过，只是印象毫无，这一次算是旧地重游。想起当年我跟徐先生私自出走，母亲在焦急忧伤、慌乱无主的心情下赶到苏州，和我义父商议遮盖的办法，又想到苏州的一家庙宇里还存放着我的一口假棺材，里面装的都是石头，这使我感到自己当时的胆大妄为，遗留给父母这么多困扰和烦难，不禁兴起无限的愧疚。

伯父伯母都在苏州，和我的堂妹婿朱了洲住在一起，我们去看过他们，发现了洲夫妇相处得并不融洽。后来在抗战初期，这两夫妇果然宣告仳离。

在苏州住了几天，游遍了各处胜迹，我们曾登临虎丘，攀援灵岩，直上天

平山颠的一线天。印象最深的是在天平山麓，轿夫竟是清一色的女性，她们很会兜生意，跟在我们身后一再地说：“太太，你侬现在弗坐，晏些你侬从山上坐轿子下来，我侬是要骂山门格欧！”

一九二八年七月，老朋友黄孟圭先生任职福建省教育厅长，他知道我们已经回国，来信邀我们到福州小游，顺便要请徐先生画几张大幅的油画。徐先生很高兴地答应了，带着我和伯阳，以及一个女佣乘船南下。这次我们搭的是一只中国船，吨位很小，船入台湾海峡，风高浪急，波涛汹涌，轮船倾斜颠簸。除了船员水手，几乎人人晕吐，而伯阳却跟平常一样不停地翻身爬滚，我在自顾不暇的时候，还得小心翼翼地照拂他，因此这一段旅程又是辛苦万分。



▲睡儿（徐伯阳）（徐悲鸿，1928年）

到了福州，孟圭先生就在教育厅里，为我们准备了两间卧室，吃饭也在那儿，还指定了照应侍候的人。于是徐先生开始安心作画，其中最重要的是《蔡公时济南被难图》。一九二八年北伐，日本军阀在济南横生阻挠，蔡公时以外交特派员的身份办理交涉，竟被日军惨杀，酿成历史上有名的五三惨案。蔡烈士是福州人，因此孟圭先生请徐先生将那壮烈的一幕绘成油画。

这时候伯阳极获徐先生的钟爱，经常抱他逗他。一天伯阳在床上小睡，徐先生抽出纸笔为他画了一张素描；神来之笔，使睡态可掬的伯阳，活脱纸上。

我们在福州先后住了两个月，孟圭夫妇招待十分周到，天气好时，还陪我们漫游榕城胜迹。其中以鼓山最有名，山在福州东郊三十里外，大顶峰上有一块石头，很像一面大鼓，此山因而得名。东侧可以望到大海，山中名刹很多，中外人士每每到这儿避暑。最高处的大庙名涌泉寺，因为寺里有一股清冽的甘泉，其大无比，流向各处，山中寺庙，都用竹管导引，取水饮用。

徐先生在福州作画两月，教育厅送了三千元的润资，得到这笔钱，我们才把积欠的债务偿清。九月间回上海，徐先生接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聘书，请他担任院长，于是一个人又匆匆地赶去北平，但是才做了三个月，学校发生风潮，他便辞职南回。

当年十二月，我忽然喉痛发高烧。起初不知道病势的严重，伯阳正在周岁，我还自己喂奶，后来请了广慈医院的法国医生来诊视，才晓得害的是猩红热。猩红热是一种很危险的传染病，必需隔离，于是我立刻把伯阳交给母亲带领，可是他自小吃惯了母乳，一离开我，就不肯服食任何代用品，这使他的健康很受影响。

从前害猩红热是无药可医的，唯一的办法是替病人打营养剂增强体力，我咽喉肿痛，热度高得可怕，混身都发出红疹，辗转病榻，痛苦万分，发烧最厉害的时候，一心只想吃冰。有一次徐先生在外面吃过了饭，想起我渴望冷饮，曾经在腊月里满街为我找冰淇淋；这件事被记者知道，曾经在报上登出了花边新闻，认为徐先生伉丽情深，对我实在太好了。

说来也是奇怪，我罹染这么危险的传染病，不曾住医院，也没有经过特效药物治疗，居然会慢慢地痊愈了。不但我宣告痊愈，而且还没有传染给家人，这件事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猩红热虽然好了，病后的情形依旧吓人。我全身蜕皮，皮肤就像纸张一样，一大片一大片地撕下来。后来听说猩红热的细菌都在那些蜕皮里面，我们一家人没有受到传染，实在是命大福大。

我从年轻时起就火气旺盛，喉部的疾患特别多，平生睡觉被窝不能盖到喉头，否则会疼痛发炎。猩红热，也是喉部的重症之一，我国俗称烂喉痧。

一九二九年春天，天狗会老大谢寿康先生从巴黎归国，住在老四邵洵美先生家里。我们是多年好友，故国重聚，十分欢愉。谢先生去国十八年，在海外

的时候常常记起留在国内的夫人，每每是感慨欷歔，不胜怀念。他曾向我们说了许多他俩有趣的故事。谢太太是童养媳，小小年纪便到了谢家，成亲以前为了避嫌，小两口在人前经常不理不睬。然而有一次，谢先生被人恶作剧地关在一间空房里，急切不能出来。谢太太事事留心，晓得他受窘被困，悄悄跑去把门扣打开，却又怕被人发现，赶紧一溜烟地跑掉。谢先生说得有声有色，我们推想当时的情景，觉得这确是动人而有趣的一幕。谢太太在家乡苦守十八年，于是有人戏称她是现代的王宝钏。



▲1928年，徐悲鸿与蒋碧微在福建省教育厅住处

谢先生一到上海，立即写信回江西，请太太出来团聚。不几天听说谢太太已经到了，于是我和徐先生便到邵洵美家去看她。

一看，原来这位谢太太竟然既矮又丑，站在桌子旁边，肘子刚好够到桌面，她穿一身土布短打，梳一个巴巴头，十足的乡下人模样。

朋友们为她洗尘，请他们夫妇吃饭，地点是邵洵美选的“沙利文”。这一着实在不太高明，因为沙利文是上海有名的西餐馆，座上经常冠盖云集，衣香鬓影，请谢太太去简直是教她受罪。邵太太看她身上的衣服不雅观，好意借衣服给她穿，但是她人虽矮小偏偏腰身很粗，连邵家老妈子的衣服都穿不上，无可奈何，只好就这么上了沙利文餐厅。谢先生对她倒很好，恩恩爱爱的，和她一路携手同行。

我们回到家里，徐先生一直在唉声叹气。我问他：“你是怎么回事啊？”徐先生愁眉苦脸地说：“我真为老谢难过，这以后的日子，他怎么过呐！”我

听了不禁大笑，我不是在笑谢太太，而是觉得徐先生一本正经地为谢先生发愁，着实令人发噱，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我说：“只要老谢觉得她好就行了，与你有什么相干嘛！”

谢先生接受中央大学的聘约，担任文学院院长，我们两家就在一九二九年五月一同搬到了南京。在中大后门外的石婆婆巷，谢先生租了几间房子和太太住。我们则住进一幢大杂院式的宿舍，同住的都是中大同事。我们分配到两个房间，家具不全，佣人也找不到，和谢家合在一起吃饭，前后大概有一个月光景。



▲南京傅厚岗新居，

20世纪50年代为傅抱石买下

最初一段时期，谢先生对谢太太确实不错，但是日子一久，由于两个人无论外表或内涵，一个乘云，一个行泥，距离实在太远。谢先生开始摇头叹气，坦白承认他和太太相处不来。到了暑假，他请我们帮忙，把谢太太送到上海，寄住在我的娘家。

自从我们迁居南京，父亲母亲带着丹麟和寿安夫妇，因为人口减少，同时觉得霞飞坊的房子租金也太贵。于是就在马朗路振华里三十七号，租了一间正楼和一大间统厢

房，母亲请谢太太住在正楼，谢先生按月津贴房租饭钱。

这时，谢先生经常在上海，可是他不和太太同住，也很少去看她，偶而去一次，他会给她买些衣料，或食物补品。从这时起谢太太开始懂得打扮和修饰，并且对于谢先生的行踪渐渐起疑，她每次问起谢先生到上海没有？我家里人只推说不知道。

一九二九年五月，刚搬到南京的时候，我们的环境实在不好。当时伯阳已经一岁多，会走路了，为了怕他摔跌碰撞，我一步也不敢离开他。家里没有佣人，所有的家务都要我自己动手。徐先生因为中大有画室，晚上都可以点起煤油灯画画，所以他经常整天整晚的不在家。而且偏在这时，我发现我又怀孕

了，生理变化加上操作过度，害喜的老毛病来势汹汹，想来想去实在支撑不住，经过徐先生的同意，我买了打胎药回来，决心堕胎。记得是谢先生看到了那种药，一把抢过去丢掉，并且指斥我们不该有这样的想头。

在石婆婆巷住了两三个月，我们又搬到丹凤街的中大宿舍。这幢宿舍是两层洋楼，每层有大小房间八个，分配给四家居住。我们和谢寿康先生分在楼上，楼下是贵州人留法同学何兆清先生夫妇，以及曾昭抡先生。曾先生是曾文正公的嫡孙（曾国藩之弟曾国潢的曾孙——编者），他的夫人俞大綱女士，就是俞大维先生的令妹；那时候曾昭杰先生还在中大读书。

谢先生在上海的时间比较多，他那儿几间房始终空着。后来他的弟弟谢建华先生从江西到了南京，便住在他的房子里，和我们比邻而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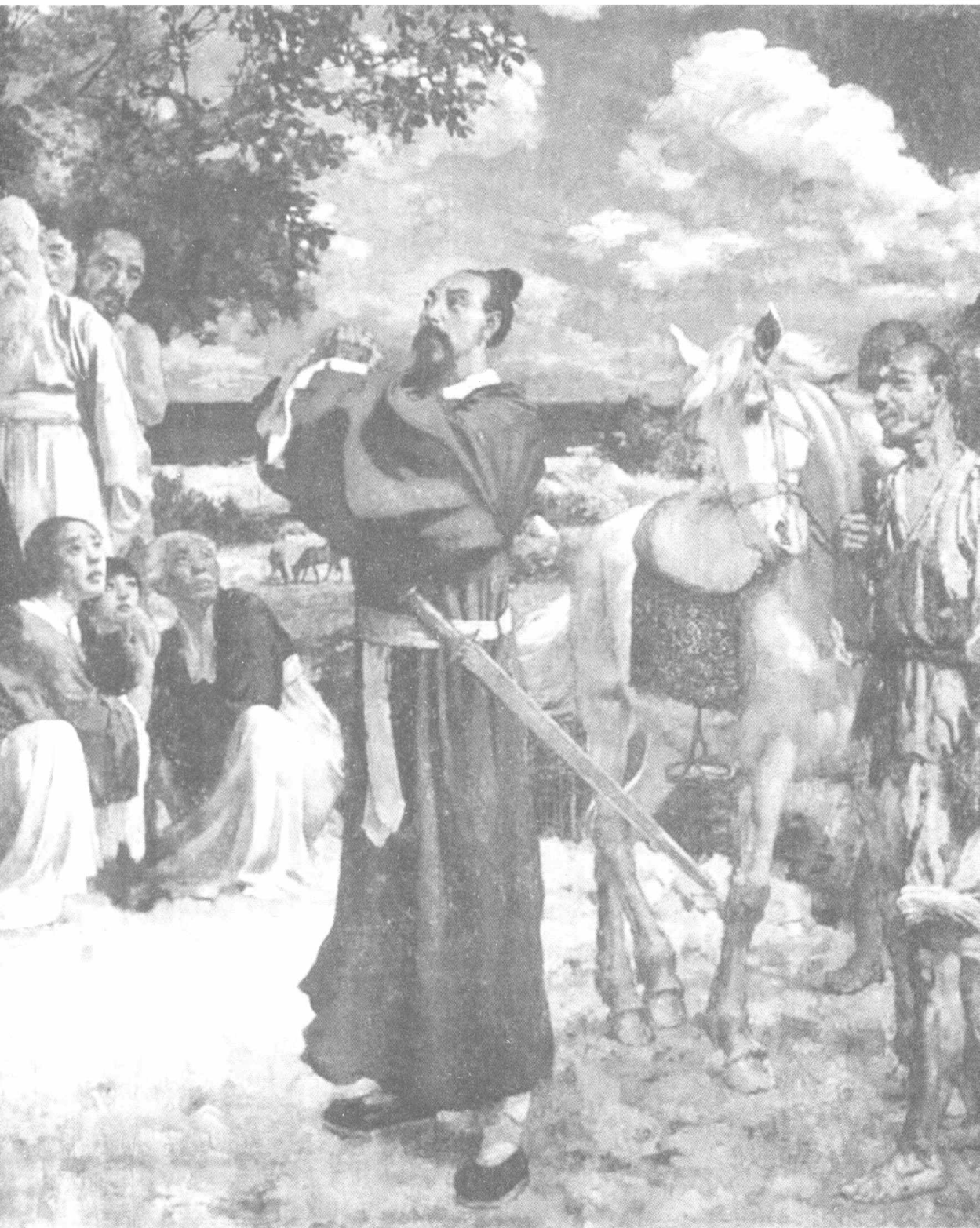
一九二九年八月，父亲来到南京，就任金陵女子大学教授，母亲和丹麟弟也跟着来玩，便住在我们家里。十一月二十日，我陪母亲和丹麟弟坐马车去游明故宫，回家吃过晚饭，就觉得肚子痛，母亲说可能是动了胎气，于是连夜把我送进鼓楼医院，可是一直到了第二天晚上八点还没有生。据医生说，胎儿受了震动，已经脱离胞衣，当时的情况是胞衣在前，胎儿在后，所以生不下来，必需动手术。动手术的结果是可以保全大人，由于孩子才七个月，多半保不住。徐先生问：“如果不动手术呢？”医生说：“那么大人孩子全有生命的危险！”

徐先生听医生这么说，只好答应签字，请医生动手术。上过蒙药，用钳子将胎儿取出，这就是我的女儿丽丽（徐静斐——编著）。呱呱坠地的时候，她的体重只有四磅。宜兴同乡宗大夫当时在场照料，事后他告诉我，手术进行期间，连他都感到害怕，因为我流血太多。

天寒地冻，丽丽的体重太轻，三十多年前的医院，当然不会有育婴的特别设备，只好用四个热水袋，把先天不足的孩子团团围住，藉以增加她的体温。到第三天的夜里，突闻人声鼎沸，嘈杂喧哗，我一惊而起，正在发慌，护士进来告诉我不关事，原来是皮作琼太太把孩子生在汽车里，引起一阵忙乱。

另一个奇迹又出现了，医生说多半保不住的丽丽，居然一切正常，奶也吃得很多。徐先生和丹麟每天都到医院来看我，丹麟来时总是问长问短，陪我说说笑笑，告诉我一些家中的琐事。徐先生呢，他经常一语不发，一来就坐在椅子上看报，坐上个把钟头。看完报纸，便又匆匆地起身离去。





▲田横五百士（徐悲鸿，1928—1930年）

住了十二天医院，回家，丽丽一点毛病也没有，按时吃奶，吃饱了睡觉，不哭，也不闹，谢寿康先生看了奇怪，不时地提醒我：“你们的孩子恐怕不对吧，怎么老是不哭呢？”依我的想法，一定是因为不足月的关系，所以丽丽仍保持着胎中的生活习惯。

此后，她的身体一直很好，发育也很健全，她聪明伶俐，又肯用功读书，偏偏徐先生始终不大喜欢她，听她偶然的哭几声，还会大声地斥骂。

一九三〇年春天，谢建华夫妇在南京租了房子，他们便把谢寿康太太，也就是他们的嫂嫂接到南京来住。因此母亲便将马朗路的房子退掉，叫寿安他们另租房子成立小家庭。父亲在金大住宿舍，母亲陪丹麟弟去牯岭养病。

谢寿康先生辞去了中大文学院长的职务，收入没有了，经济相当困难，谢太太当然也拿不到生活费用。谢先生这时已决定和谢太太离婚，他请我去和她商量，当时我就说：“你们见面的时候，你对她这么好，时常还买些东西给她。在她的印象里，你们的情感始终如一，现在我突然去跟她提起离婚的事，你说她怎么会相信？”

但是谢先生一再要求我帮忙，我也渐渐感到，像他们这样拖下去，双方都很痛苦，这种不相称的婚姻，无疑将使两个人都被牺牲。谢太太本人，反正是旧式婚姻制度的牺牲者，她的命运已经毫无挽回的希望，如果他们能够离婚，起码谢先生也许还能重获幸福。两害相权取其轻，牺牲一个人总比同归于尽好些。因此我每次见到谢太太，总是朝这个方向对她加以开导，我说：“谢先生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照目前的情形看，你不但得不到丈夫，而且一个钱都没有。与其如此，反倒不如干脆离婚，最低限度，你还可以拿点赡养费。”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我国上海闸北，十九路军英勇抵抗，这就是有名的“一·二八”事件。双方在上海相持一月，我军虽然屡次获胜，可惜援兵不继，又没有空军的支援，三月二日敌军从浏河登陆，迂回进攻，我军退守昆山。南京一时风声鹤唳，于是由中大农学院院长刘伯量先生，借来该院一部交通车，开到我家门前，载乘了刘伯量、郭有守和我们三家妇孺，以及谢寿康、谢建华两位太太，决计由京杭国道驶往宜兴。车快开了，中大心理学系艾伟先生带着他的太太孩子，临时赶来参加我们的行列，大家挤出几个位子，让给他们一家三口。

到宜兴后，我请郭太太和两位谢太太住在我姐姐家里，刘艾两家住旅馆。闲居无事，我不免又为谢先生做功夫，和谢太太讨论他们的离婚问题。这时候谢太太仿佛已经明白，谢先生许久以来一直都在躲避着她，因此，她的心里渐渐地有点活动。

郭太太在宜兴小城住不惯，几天后动身去苏州，回她的娘家。而我们在宜兴也没住多久，战事終了，我们一群又都回到南京。

受了这一次兵荒马乱的惊吓，听到许多人细细地分析和劝告，谢太太终于同意和谢寿康先生离婚。于是由我出面，替谢先生办理一切手续，我心里虽然很难受，但是为了朋友，却也是无可奈何。第一件事便是托刘克俊先生介绍律师。刘先生是立法委员，也是谢先生的好朋友。记得当时我还曾暗暗地告诉刘先生，谢先生手里没有钱，请律师最好是义务帮忙。找到了律师，我还得向他解说一些令人困扰的问题，最麻烦的就是谢先生不肯和谢太太面对面地办手续，他坚持要“缺席签字”。律师听了我的话不禁笑笑说：“谢先生既然还念旧情，那他又何必要离婚？”

签字离婚的日子到了，谢太太准时上我家来，谢先生则躲在丹凤街苏希洵先生的家里，和我家只隔了几十步路。谢太太不识字，但是她很细心，事先向我要了一份协议条文，请她所信任的人念给她听。因此当时她内心已有准备，起初神情倒很从容镇静。记得那天到场的亲友是刘克俊、谢建华、徐悲鸿三位先生，他们都要在协议书上签字盖章，保证谢先生遵守条款，按期付给赡养费，否则的话，就由他们负责照付。

我在那种场合，眼见这一幕的演出，心里有深切的感慨。谢太太拿笔画了个十字，放下笔，想想伤心，忽然当众哭了起来；这一哭，使在场的每一个人全都为之黯然。

离婚协议书上订定：签字离婚以后，谢先生应该即刻付出一笔旅费，让谢太太回到江西原籍，仍旧住在谢先生的老家。可是谢先生正处困境，他拿不出钱来，于是我又得为他张罗，分别向友好筹借，到处打电话的结果，总算筹到了一笔不大不小的款子，给谢太太做旅费动身。她仍回谢家去住，由谢先生按月汇寄出几十元的生活费用。

后来谢先生出任我国驻罗马教廷公使，在抗战时期，还从罗马寄了一笔钱

给我，转交给在江西的谢太太，那笔钱足够她维持相当的时间。而且我们还听说谢先生有一位侄儿，把她接去同住，奉之如母，所以她的后半辈子总算有了依靠。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谢寿康先生由于张乃燕先生的介绍，认识了前上海道台袁树勋的孙女儿。当时谢先生任职立法委员，不久便在上海举行婚礼，请吴稚晖、孙科两位先生证婚，婚后迁到南京石婆婆巷居住，我们经常往来。他们夫妇一共生了三个男孩。嗣后谢先生转入外交界，一九三七年十月再度出国赴欧，先后任过我国驻比、瑞公使。后来到罗马教廷开馆，担任我国第一任驻教廷公使，把太太留在上海外家，胜利后谢先生返国述职，迨一九五四年再度应命派驻教廷，不久升任“大使”，以至于今。

谢先生的三位公子现已长大成人，有两位在美国，一位随父母在罗马。他们的家庭幸福美满，谢先生的事业也很成功，如今回想，当年我们的一番“多事”，总还算有点收获。

我们搬到南京的头三年，都是住在中央大学的宿舍里。宿舍的房间很小，徐先生也就没有可以供他挥洒作画的地方。一向爱护我们的吴稚晖先生，觉得我们的住处实在不够宽敞，同时，徐先生也必需有一间工作室。于是他请朋友们留意，看看有什么合适的地皮，买下来给我们造幢房子。



▲中央大学艺术系师生合影（右起第五人为徐悲鸿）

一九三一年的时候，谢建华先生在南京市民银行服务，他认识许多地产商人。听说高楼门傅厚岗有十几亩地皮出售。吴老先生和我们都去看过，那一带

地势平坦，交通方便，早先是人家的墓园，杂花野草之中，还有几座荒冢。拔地而起的两棵大白杨树，枝叶参天，躯干修长，亭亭然有如华盖，此外还有七八棵柏树，树龄都在百岁以上。我们对于那个亦城亦郭的环境，感到十分满意。于是吴老先生便付出三千块钱，为我们买了其中的两亩，余下的部分由郭有守、段锡朋、陈泮藻、杨公达和李晓生诸先生购下，以后大家都造了房子，我们成为很亲密的邻居。

买好地皮，又在报上登广告，请坟主来迁坟，这些事颇费了不少手续。只是地皮弄好，盖房子的钱仍然没有着落，因此闲来无事，我常爱带着孩子和女佣，到那片空地上去留连徘徊，幻想着未来的楼台庭院，如何在这一片荒芜中建造起来。

到了一九三二年，吴老先生发起，为我们募款建屋。承蒙钮永建、李石曾、黄膺白等诸先生的热心帮忙，几百一千地凑了一笔数目，作为我们的新屋建造费用。这时候，有人替我们介绍了一位卞工程师，他太太毕业于中大艺术系，也是徐先生的学生。卞工程师很慷慨地说：造这幢房子他一定尽义务，把所有的建筑费用全部花在工料上面。

建筑图样画好，得到我们的同意，新屋开始鸠工建造。可是刚刚造了一半，因为卞先生缺少周转资金，拖欠了工人的工资，从此便宣告停工。当时我们都急于看到房子早日完成，逼得没有办法，我只好亲自出马，利用还不曾交给卞先生的建筑费，自己买材料，自己监工，继续未完的工程，这样我们的新居才算落成。十二月中，一家人便欢欢喜喜地搬了进去。

双扇大门，竹篱围墙，新居一进门就是一座很大的前院，铺着如茵的草皮。房屋是西式的两层楼，有三十尺深，右边是徐先生的画室，深三丈，阔二丈五，室高一丈六，这间画室，完全照着他绘画时的需要而设计。

左边是二楼二底两层房屋，迎门一座楼梯，楼上两间卧室和浴室，楼下前客厅后餐厅，佣人的下房有两处，一是门右边的门房，一是后院兴工时期所建造的临时工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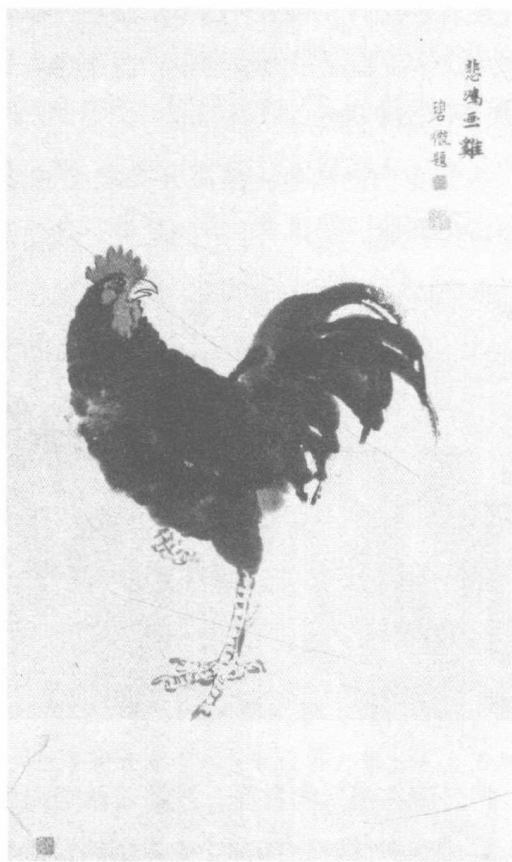
两株大白杨树，正好就在画室的右面，遮掩着西晒的太阳。后来据吴老先生调查，说这样的大树，全南京一共只有三棵，我们家便占有其二，另外一株是在城南。由于树身高大，目标显著，从京沪路乘火车绕过玄武湖，将抵下关

车站的时候，坐在火车上远远地便可以看到它们。

白杨是北方所产的落叶乔木，高达数丈，因为它的叶子呈圆形，相当阔大，也有人叫它做大叶杨；尤其它叶柄细长，容易摇动，偶有微风，都会发出声响，所以有白杨萧萧的说法。

我从小就喜欢花木，如今有了这么好的房子，和这么大的庭园，使我对种花种树的兴趣更加浓厚。我在前院后院，亲手种植了无数的梅、桃和蔷薇、碧桃等花卉。由大门通往正屋的水泥路两边，栽植了几株垂柳，再在沿马路和左右两边的围墙里面，相间地种着洋槐和梧桐。这些树木和花草，把我们的庭园点缀得苍翠蓊郁、姹紫嫣红。

早在一九三一年春天，从家乡来了两位佣人，从此跟随着我，一直不曾分离，数十年如一日，就像是自己的亲人一样，成为我处理家务的得力助手。这西位佣人是刘妈和她的女儿同弟。她们是苏北人，落籍在宜兴，因为家境不



▲ 鸡（徐悲鸿绘，本图由同弟家人提供）

好，到我宜兴老家帮佣。那时同弟还只几岁，她母亲总把她带在身边，所以同弟等于是在我家长大的。

我从欧洲回国，到宜兴小住，刘妈就很想跟我出来。一九三〇年我们在南京定居，一九三一年春刘妈带了同弟也到了南京。同弟那年才十五岁，她六岁订亲，男方死了，婆家扬言要抢亲，把她改配给第二个儿子。刘妈一急，只好带她逃来南京，我正好叫她负责带领一岁的丽丽。从此她们母女二人，便一直在我家工作，那时我们还住在丹凤街。后来搬到傅厚岗的新居，因为庭园很大，需要一个门房兼任打扫庭院的男工，我知道刘妈还有一个儿子；因此便和刘妈商量，叫她儿子也到南京来，这样他们一家人住在一起，不是很理想吗？刘妈很高兴，立刻写信到宜兴，把她的儿子叫来了。但是刘妈这个儿子实在太懒，懒得连他自己的母亲都皱眉头，早上送牛奶的按半天门铃，才能催他起床去接，而且他又笨头笨脑，腿上生的烂疮总是医不好。刘妈一气之下，又打发他回宜兴去，于是我们家里仍旧缺少一个男工。

一九三三年一月廿二日，我和徐先生出国举行展览会，男工的问题也就搁置起来。一九三四年夏天，我们回国之前，母亲到处打听有没有合适而可靠的人，于是姐姐便推荐了史坤生。

史坤生的身世相当凄凉，他父亲是个种田的，因为儿女太多，妻子又出走失踪；他一个人照顾不过来，便把坤生和他的妹妹送给一位船家张三大。张三大是做撑船生意的，本身也很穷。姐夫的父亲程肖琴老先生每年出去收租，都是包他的船，因此史坤生便认识了程老先生。坤生因为船上生活太苦，他自己又有志向上，人也聪明，所以他就跑到程老先生家里，希望能做程老先生的跟班，可是程老先生却早就有了侍候的人。

姐姐想为坤生找出路，同时也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于是便叫坤生到南京来。坤生来了以后，努力勤奋，在我们不曾回国之前，他希望把花园弄得漂亮，等我们回来欣赏。因此，他一天要挑几十担水，灌溉草坪花木，真是辛苦万分。

我对于他的工作态度十分满意，可是我们回国没有多久，刘妈就常说同弟身体不舒服。同弟来我家时只有十五岁，这时已是十八九岁亭亭玉立的一个大姑娘。有一天留法同学袁浚昌夫妇到我们家来玩，我想起袁先生是医生，就请他顺便给同弟看看。不料袁先生为她检查过后，问清楚同弟时常呕吐，他马上

就说她并没有生病，而是害喜了。我等袁先生一走，便把刘妈叫来，告诉她袁先生诊断的结果，刘妈听后非常生气，而且明白表示她不喜欢史坤生。

我到这里方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对少年男女，相处日久，终于发生了私情，然而想想问题发生了总得解决，于是我就劝刘妈说：“事已如此，还是让他们结婚算了！”

但是刘妈坚决不肯答应，我只好说：“如果你肯把同弟嫁给坤生，我可以负责主持婚礼；如果你想同弟打胎，那我就不管了。”

第二天，刘妈想想没有办法，又来找我，说是她同意让他们结婚；不过她要坤生写一张字据，说明他永远对同弟负责，坤生当然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于是婚事就这样决定下来。

我有言在先，当然要替他们积极筹备，并且亲自主持。先将婚期订在中秋节，再请徐先生替坤生写字据，保证他将来善待同弟，一切负责。然后替他们买床、买家具，把门房布置一下，作为新房，还替同弟做了一件深红色的结婚礼服。徐先生送了他们一幅画，一幅对联，下款署的是伯阳、丽丽的名字。

中秋节那天，在湖南馆子曲园叫了两桌菜到家里来，贺客全是我们经常来往的好朋友，而且中外人士都有，证婚人是德国朋友李田丹，介绍人为顾了然、吕斯百两先生。



▲徐悲鸿与诗人陈散原及学生摄于南京郊外

两桌酒席，大概花了不到二十元，可是贺客送礼，多半是每人五元、十元。所以坤生和同弟还赚了一点钱。

第二年，同弟生下一个男孩，程老先生为他取名“史南元”。大家对于这个小生命的出世，都很

高兴，因此史南元的幼儿时期，要比一般孩子淘气，光是小床，就有两张。其中一张是李田丹太太亲制的软床，连带着一顶小帐子。天气晴朗，史南元便躺在软床上，放到花园里面晒太阳，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接着，同弟又生了一个

女儿，取名元英，就这样，刘妈三代人都在我们家里。直到抗战爆发，我决定到重庆避难，因为他们一家有五口之多，我无论如何负不起这个重责。和他们商量的结果，由刘妈带两外孙儿女回宜兴，到坤生家去住，同弟夫妇跟我到重庆。

恢宏的新屋，美丽的庭园，得力的佣人和舒适的环境。徐先生从事他所感兴趣的艺术教育，在绘画方面也获得了崇高的声誉，正所谓日正中天，前程似锦。我给他安排了一个温暖和乐的家庭，不使他有内顾之忧，膝下又有一对活泼可爱的儿女在承欢色笑，以一个中国画家来说，在当时，他的境遇应该算是很好的了。

然而这个外表上看来幸福美满的家庭，实际上，正有一股暗潮，在起伏不定地扩展，这是任何人没有料到，而且绝对无法想像的事情。这一切，似乎必须从头说起——

自从谢寿康先生辞去中大教职，就任立法委员，他在我们对面的宿舍，便分配给中大法文教授邵可侣先生。邵先生是法国人，当时年纪不到四十岁，他是李石曾先生的朋友，由李先生邀来中国，先在劳动大学任教，后来转到中大。他在法国有一妻一女，太太的年龄比他大许多，女儿只有六岁，夫妻间没有经过正式结婚手续，因为他们都信仰无政府主义。

徐先生看他是外国人，单身在中国，生活不便，尤其是吃饭问题很难解决。彼此既然是同事兼邻居，语言又相通，因此便请他在我们家里吃饭，并且声明不收费。

邵可侣有学者风度，待人接物彬彬有礼，谈吐也很风趣优雅，我们在一起融洽相处，亲切自然。他知道我对音乐有兴趣，每次到上海，都要买些唱片带回来送我。我很喜欢他所选的唱片，因为他不但懂音乐，还弹得一手好钢琴，他买的唱片全是古典音乐作品。

他一个人住不了四间屋子，于是我们就利用他的两间小房，一间改为盥洗室，另一间则堆置徐先生的书籍字画和杂物。我早晨起来穿过走廊去梳洗，常常会碰到他夹着皮包出门上课，他总是面露惊喜的表情，赞美我一句：“你今天真是容光焕发！”“鲜艳得像桃子一样！”我在法国住过八九年，知道这是男士们表示礼貌的恭维话，所以我只是向他笑笑，说声：“谢谢。”

有一次徐先生去上海，我和平时一样，到时候请他过来吃饭。我和他默默地进餐，突然间他脸上出现激动的神情，一把抓住了我的手。我知道这是他感情不能克制的表现，我很惊骇，同时也很诧异，因为以他平时的为人来说，他不可能会有这样的举动。我尊重他是位君子，原谅他一时的失态，于是我不动声色地轻轻把手抽回。按西洋习俗，女人有权先行离座，我平静地站起来，退出餐厅。

第二天我装着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照常请他来吃饭，但是我嘱咐佣人只摆一副餐具，我请他自己一个人吃。他很了解我的用意，从此以后，每逢徐先生不在家的时候，他便到外面去进餐。就这样，我们继续维持良好的友谊，历时将近两年。有一年暑假，邵太太到中国来看他，盘桓了两三个月，我们也给她热烈的招待。后来邵先生又转到北京教书，他有一本著作，名为《大学初级法文》。

不久徐先生就闹师生恋爱，新闻传遍远近。一九三五年暑假的时候，邵可侣先生由北京旅行到南京，曾来傅厚岗看我们。那一天徐先生不在家，他知道我和徐先生的情感这时已濒破裂边缘，于是他向我说：“你为什么不到北京来，你知道那里有一个朋友，他愿意照料你和安慰你。”我当时只向他苦笑，没有作答复，他离开的时候，说是第二天再来看我。

到第二天早晨，我向徐先生说：“请你今天下午不要出门好不好，因为邵可侣还要来看我。”徐先生是知道过去这一幕的，便只好留在家里，等到邵先生来了，和我们坐谈了一会，就告辞而去，没有再作任何表示。我对这位异国朋友给我的诚挚热情，非常同情和感激，同时由于徐先生的别恋，我们的夫妻关系也到风雨飘摇的境地，但是我觉得异族通婚，要想幸福美满，是万无可能的。不知道是我这个人的特殊想法，还是我们中华民族固有的旧观念所使然。

一九二九年八月，父亲接受金陵女子大学的聘约，担任国文及中国哲学史的课程，他带丹麟弟同到南京。那时候丹麟的肺病已很严重，我们接他到家里来养病，就住在邵可侣先生前面的那间小房。

对于我个人来说，一九三〇年是一连串不幸的黑色岁月，许多重大的事故，都在那一年里发生。四月间，丹麟弟病势沉重，咯血不止，我们请王苏宇医师为他诊治。稍微好了一点，于是决定送他到牯岭普仁医院疗养。五月七



▲蒋碧微像，摄于宜兴故居雪堂前。雪堂在西氿边，是文化名人程适的学生为程适所造

日，母亲陪他同行，我们送到码头，真想不到这竟是最后的诀别。同年暑假，我们到宜兴避暑，住在西氿边程老先生的学生们为他所建的“雪堂”。三个多月以后，八月十九日，聪明好学的丹麟终告不治，病逝庐山。噩耗传来，徐先生立刻赶到牯岭，帮忙母亲料理丧葬事宜。办完丧事，再陪母亲回到宜兴。我因为这时静娟姑母也病得厉害，所以便留在宜兴侍疾，徐先生则在开学前独自返回南京。到了十一月初，姑母病重，父亲赶回来照料，延到十五日，她老人家竟一病不起，与世长辞。姑母为了尽孝，矢志不嫁，一直侍奉着祖

父。祖父死后，她就住到我们上海家里，她是我最亲近的长辈。儿时有一段时间，我也是由她负责照料生活起居的，她和丹麟弟的逝世，使我伤心万分。

正在心情沉重的时候，接到徐先生的来信，催我回南京。他在信上说，如果我再不去，他可能要爱上别人了。我没有理由怀疑徐先生会移情别恋，我想可能是他急于要我回家，所以才不惜写这样的信，因此我仍然等到姑母落葬以后才动身。

我带着孩子到家的当晚，徐先生坦白向我承认，他最近在感情上有波动，他很喜欢一位在他认为是天才横溢的女学生，她的名字叫孙韵君。

徐先生毫不隐瞒地告诉我：孙韵君今年十八岁，安徽人。她曾在这一年的暑假投考中大文学院，没有考取，于是就到艺术系旁听。她一开始作画，就获得了徐先生的特殊青睐，赞赏有加。当我在宜兴的时候，他约她到家里，为她

画像，有时也一同出去游玩。有一次正在作画，孙韵君忽然提起她的身世，她说她父亲原是孙传芳的秘书。一九二八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孙传芳的军队土崩瓦解，全部溃败，她的父亲曾被关进监狱，因此他们的家庭一直笼罩着痛苦与不安。徐先生并且承认：他听了她的话很受感动，曾将双手按在她的肩上，告诉她说：“无论如何，现在有一个人在关心你！”于是吻了她的额头。

我听了他的话，犹如焦雷轰顶，心里有说不出的委屈和伤心，一时无法遏止悲痛的情绪，于是就哭了起来。徐先生连忙安慰我说：“你已经回来，我想以后再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了。”他并且郑重地向我承诺，让我们设法到外国去。但是，谁又想到，这一件事竟从此把我推入痛苦无边的黑暗深渊。

尽管徐先生不断地向我声明解释，说他只是爱重孙韵君的才华，想培植她成为有用的人才。但是在我的感觉中，他们之间所存在的绝对不是纯粹的师生关系，因为徐先生的行动越来越不正常。我心怀苦果，泪眼旁观，我觉察他已渐渐不能控制感情的泛滥。

从这时开始，徐先生便很少在家，他总是一清早去上课，下午再去画画，晚上还要到艺术系去赶晚班。因为他初到南京时，中大曾经在艺术系给他预备两个房间，这两个房间他一直保留着，后来就做了他的画室，学生们当然也常到他画室里请教。但我明明知道，他每天早出晚归，并非完全由于教学上的需要，其中还夹杂有感情的因素，因为在那充满艺术气氛的画室里，还有那么一个人。——当丈夫的感情发生了变化，每一个女人都会有敏锐的感觉。

有一天，盛成先生陪着欧阳竞无先生到我们家来拜访，坐谈之下，欧阳先生提起想要参观徐先生的近作；徐先生便请他到中大画室去，欧阳先生也邀我同行，我没有理由拒绝，就陪他们到了那里。一进门就感到非常惊异，因为我一眼就看到两幅画：一幅是徐先生为孙韵君画的像；一幅题名《台城夜月》，画面是徐先生和孙韵君，双双地在一座高岗上，徐先生悠然席地而坐，孙韵君侍立一旁，项间一条纱巾，正在随风飘扬，天际，一轮明月——

台城，是南京的名胜之一，和鸡鸣寺毗连，登临其上可以远眺玄武湖全景。我看到这两幅画摆在那里，未免太显眼了，趁着他们在看别的画，暗中将它们取过，顺手交给一位学生，请他替我带回家里。回家以后，我把《台城夜月》放在一旁，孙像则藏到下房佣人的箱子里面。我并且向徐先生声明：



▲南京台城（徐悲鸿，1928）

“凡是你的作品，我不会把它毁掉，可是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这幅画最好不必公开。”徐先生听了，也就不便开口向我要回去。

但是，以后只要我不在家，他便翻箱倒篋地寻找，却是一直都没有找到。后来抗战军兴，我们一家都逃难到了重庆，佣人当然不会把这幅画像带走。胜利回京，家里的东西都已搬空，不知这幅画落入何人之手。至于那幅《台城夜月》，是画在一块三夹板上的，徐先生既不能将它藏起，整天搁在那里，自己看看也觉得有点刺眼。一天，徐先生要为刘大悲先生的老太爷画像，他自动地将那画刮去，画上了刘老太爷。这幅画，我曾亲自带到重庆，三夹板裹上层层报纸，不料被白蚂蚁蛀蚀，我又请吴作人先生代为修补，妥善地交给了刘先生。

半年多的时间，都在痛苦煎熬之中度过，我们两夫妇本来就没有什么话可谈，如今更是分外的疏远。为了徐先生的名誉和前程，我不敢将徐先生师生相恋的事告诉任何人，只希望有一天，他会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以及他对妻子女子的责任，迷途知返。何况师生相恋，在当时那种环境，又怎能得到别人的赞成和同情？我想我只要竭力地容忍，也许问题自会圆满解决的。然而却没有想到，到了第二年暑假，我得到消息，孙韵君投考中大艺术系，竟以图画一百分的空前成绩，获得录取。我一听之下，立刻便有大祸临头的感觉，因为孙韵君考进中大，一念便是四年，这四年里他们朝夕相处，是不是会发生什么问

题，谁都不敢预料，这时候我才明了不能再期望奇迹了，我决定向徐先生表明态度。

当天，我向他说：“你和孙小姐的事情发生之初，你曾亲口承诺，让我们设法再到外国去，现在，我请你实践诺言：辞职，出国。”徐先生听了非常的生气，但是他有言在先，无话可说；只好写了一封辞职信，交给我，意思是要我去送给当时中大校长朱家骅先生。

当晚，旅法时期的好友郭有守先生请我们吃饭，因为他刚和杨哲子先生的女公子在上海结婚，这天回到南京来欢宴亲友。我们虽然心情不好，但是这个宴会却不能不参加。郭先生请了两桌客，记得我和徐先生是分桌而坐的，吃到一半，徐先生忽然向邻座说他胃痛，要先回家休息，便不声不响地走了。我一转眼就看不见他，忐忑不安地坐到终席，时间已经八点多钟。谢寿康和徐志摩两位先生自告奋勇送我回家，徐志摩先生还买好了车票，当晚就要搭车到上海去的，我请他不必送我，但是他坚持不肯，他说他要顺便看看徐先生，他的胃病好了没有。

回到家，佣人刘妈迎上来，劈头就告诉我们说：先生刚才回家，拿了一只小箱子，装些衣服什么的，一句话也没说，下楼就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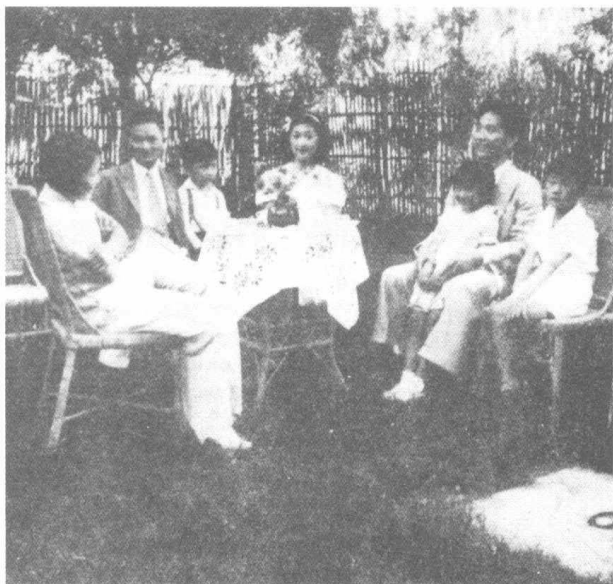
我们三个人听了，不禁相顾愕然，他正在胃痛，为什么又匆匆地离家出门？还带了箱子衣物，他会到哪儿去呢？

研究讨论了半天，仍旧是毫无结果。这时候徐志摩先生急于要到下关赶车，他只好先走。留下谢寿康先生陪我，谢寿康先生越想越不对，便正色地问我：“碧微，最近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我颓然地坐下，默默沉思，自从徐先生和孙韵君有了不正常的感情以后，我咬紧牙关，忍受着生平最大的痛苦，不在人前透露片言只字，不使亲戚朋友看出破绽，以我明朗爽直的性格来说，这是很难想像的。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爱护徐先生：万一这件师生相恋的新闻传开，对他声名的打击，一定会很严重。

但是现在事态愈演愈烈，徐先生的行动更进一步地超出常轨。谢先生是我们倾心相交几十年的知己朋友，他紧紧地追问，使我再也无法隐瞒，我只得把一年来所发生的事情，向他和盘托出。

谢先生听完我的叙述，非常惊骇与着急，他说当前最要紧的事，是把徐先生找回来。他猜想他一定去上海，于是他请我跟他赶到下关车站，因为那时候到上海的夜车还没有开。



▲顾了然（左二）、程静子（左四）、吴作人（右二）、徐伯阳（右一）、徐丽丽（右三）在傅厚岗新居院落

怀着焦灼慌乱的心情，急急忙忙地赶到下关车站，谢先生买了两张月票，夜快车升火待发，旅客们纷纷登车，我们也攀上车去，从最后一节车厢，一直找到最前面，可是没有看见徐先生。无可奈何，谢先生又把我送回家里。孩子们睡了，房子里暗无人声，浓重的凄凉和悲怆，沉沉地压在我的心上。

第二天下午，谢先生乘五点钟特快车，到上海直扑邵洵美家，果然被他找到了徐先生。谢先生立即打电报给我，让我安心。原来徐先生料准家里会找他，所以他在下关车站附近，住了一夜旅馆，第二天才坐早车去上海。他到了上海，立刻写给我一封信，信上说：他默察我，近来唯以使他忧烦苦恼为乐，所以他不能再忍受；他说：“吾人之结合，全凭于爱，今爱已无存，相处亦已不可能。此后我按月寄你两百金，直到万金为止。两儿由你抚养，总之你亦在外十年，应可自立谋生。”我接到了这样的信，除掉悲伤痛心而外，实在想不出什么挽救的办法。这时谢先生知道一时难以劝徐先生回京，因此便提议：趁

着暑假，不妨到庐山牯岭陈散元先生府上，小作盘桓。

陈散元先生一家，都跟我们很熟。散元先生的六公子寅恪先生，是我们在德国柏林时结识的好友，八公子登恪先生留学法国，在巴黎和我们时相过从，也是天狗会会员之一。徐先生住到陈府，对于他本人，我倒是相当放心的。

然而，痛苦悲痛的却是我自己。当年在南京，我们的交际已很广阔，朋友、同事和学生，经常都来往很勤，平时应酬也多。徐先生这次突如其来的出走，在精神上给我的刺激极深，可是我还要应付亲戚朋友的关怀询问：徐先生到哪儿去了？你和孩子为什么不同行呢？各式各样的问题，都必需我用谎话来



▲ 孙多慈（孙韵君）像（徐悲鸿，1936年）

搪塞。我生平最怕说谎，偏偏在我心情顶沉重的时候，事实逼我非撒谎不可。因为我总不能说是徐先生跑了，离开了这个被大家认为美满的家庭吧。

旅法时期的好朋友孙逵芳先生，他每次到南京，总邀我们和郭有守先生陪他到玄武湖去钓鱼。这时孙先生又翩然而来，徐先生不在，他仍邀我去湖边垂钓，可是他哪儿知道我内心的创痛！

在这时期，陈登恪先生和谢寿康先生，经常和我通信，让我知道徐先生在牯岭的一切情形。

八月底了，我接到谢先生的通知，说是经过大家商量的结果，嘱我带孩子上牯岭玩几天。我立刻写信给我母亲，请她到南京来陪我们去，然后告诉朋友，说是丹麟弟葬在庐山，母亲和我要去上坟。我们搭轮船到九江，一路上心情落寞，因为我想不出我们还有什么转机 and 希望。

散元先生一家对我非常好，徐先生则默然不理。朋友们极力掇促我们同出同游，我们曾登临五老峰，也曾在巨瀑之下，褫衣冲淋，游兴虽浓，但是这些都不曾使我们之间的僵局，有打开的希望。转瞬间十多天过去了，暑假将尽，中大就要开学，有一天母亲忍不住地问徐先生：“现在怎么办呢？”他竟怏怏地回答：“有什么怎么办？只好大家回去罢了。”就这样，我们算是一齐回到了南京。辞职出国的事，当然也就从此不提。

徐先生的恋爱事件发生之初，他心里未尝没有歉意，他曾经很郑重地向我表示：“我从来没想过要跟谁离婚，要跟谁结婚！”但是渐渐地，他终于无法克制自己，任由泛滥的情感一天天地发展，到了最后阶段，“自以为是”的观念牢牢掌握了他，他不觉得自己的心理行为有变化，反倒认为是我在吃醋捻酸。

这次回南京，孙韵君已正式成为他的学生，他逢人便宣扬她的天才和智慧。由于他自己都毫不隐讳，好事之徒再加以渲染附会，轰动一时的花边新闻便不胫而走。许多小报，绘声绘影，譬如当时的南京《朝报》，就不知道登了多少有关这桩三角恋爱的故事。

吴稚晖先生也听到了消息，他摇头叹息，写了一封长信给徐先生，奉劝他悬崖勒马，善为自处。信中略谓：“尊夫人仪态万方，先生尚复何求……倘觉感情无法控制，则避之不见可乎……弟家中亦有黄脸婆，颇亦自足，使弟今日

一摩登，明日一摩登，侍候年轻少艾，吾不为也……”

平时，我们很少大吵大闹，可是家里的冷战却在与日俱增。每天早晨出门去上课，徐先生总是要东寻西找，忙上一阵，一会儿拿些绘画纸，一会儿带几支画笔，一会儿又取几张画片。后来有徐先生的学生告诉我：这些都是徐先生带去给孙韵君的。

有时晚上参加应酬，他经常也是吃到一半，就藉词要上夜课而退席，把困窘而尴尬的我留下。最令我难堪的是，他会在酒席上趁人不备，抓些糖果橘子在口袋里，后来我知道，这些也是带给孙韵君的。碰到他这样在做的时候，我只好装作视而不见。

有时我也促狭起来，他把带给孙韵君的东西预备好以后，放在桌上。等他有事走出房间，我就悄悄地藏过，他回来一看东西不见，不好意思问我，也就讪讪地走了。

徐孙师生恋爱，闹得满城风雨，孙家当然也会听到消息。一天，孙韵君的父亲，特地由安庆来到南京，下榻鼓楼饭店，通知徐先生的学生蒋仁，说他要见徐先生。

徐先生一听，非常起劲，兴致勃勃的，当时就要去拜访孙先生。但是他的学生们婉加劝阻，他们认为由徐先生主动地去拜访他，似乎不太合宜。经过一番商议，决定邀请孙先生在鸡鸣寺的茶座会晤。

双方初次相见，居然谈得很好，孙先生还向徐先生表示，想和我会一次面。蒋仁立刻打电话回家，征询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好拒绝，请他们一道到家里来。

放下电话我不由满腹狐疑，孙先生是为他女儿的事而来，照理说他应该了然于事实的真相，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进而采取某种有效的措施，这才不失父母管教女儿应有的态度。可是他为什么不从此处着手，反而先则会见徐先生，接着又要来看我，他究竟是什么用意？何种居心？

不久他们来了，孙先生、徐先生、徐先生的学生蒋仁，彼此介绍过后，我招待他们坐定。这时候徐先生显得特别兴奋，笑逐颜开，满面喜色，他并且说今天晚上要请孙先生全家吃饭。不久孙先生辞去，徐先生马上派人到饭馆订菜，一会儿又破天荒地提议打麻将，总之那一天下午，他快乐高兴得像疯了似

的，家里的人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到了六点多钟，请的客人都到了，唯独孙韵君没有来。孙先生之外，陪客中有徐仲年先生、华林先生、蒋仁、郑阿梅夫妇及郑老先生。席间徐先生谈笑风生，只有他一个人最兴备。一直闹到夜阑人静，盛宴已散，我送走了客人，回到楼上，心里有说不出的悲哀，满腹积郁，又增加了新的创伤，于是我走向楼外的阳台，坐在栏杆上暗自落泪。

这时我听见徐先生正在楼上楼下到处找我，大概他也感到自己今天的神情表现，一定会使我伤心。一会儿，他发现了我在楼下，很快地向我走来。他看见我在流泪，默然无语，轻轻地将我扶下栏杆，搀我走回房间。

我忍受着长时期的内心痛苦，瞒着父母家人，竭力地为徐先生保守秘密，唯恐风声泄露会影响到他的声誉。同时孙韵君当时只有十八九岁，来日方长，前程要紧，我也不愿意她蒙受大众的指责，成为她一生中的白璧之玷，所以才极力容忍曲予回护。可是自从孙先生到过南京，消息便扬扬沸沸，越传越广，事情弄到表面化，中大艺术系若干同学也公开地表示对徐先生和孙韵君的不满。徐先生是中大聘请的教授，同学都希望多接受一点他的指导，可是他却一心只在孙韵君，无形中他们受教育的机会被侵占了，于是愤懑的情绪渐积渐深。

起先是有些同学暗里埋怨、批评、指摘，他们说徐先生在中大艺术系只教一个人，其他的同学全是“陪公子读书”的，当然也有许多难听的话，很迅速地在同学中流传。

有一天清早，谢建华先生气急败坏地跑到我们家里，神情非常的紧张，他劈头就跟徐先生说：

“你今天最好不要去上课！”

“为什么？”徐先生也很慌乱地问。

“我刚才听说，艺术系的同学写了满地的标语，他们攻击你——”

徐先生显得很懊丧，那天他果然没有去上课。

孙韵君原住在中大女生宿舍，女生宿舍禁止男士出入，但是徐先生却常到宿舍去找孙韵君，因此也被好事者引为笑谈。后来孙韵君便迁出女生宿舍，在石婆婆巷租了一间房子，由他的母亲从安庆搬来和她同住。

4

一九三二年底，李石曾先生发起，将中国近代名家的绘画，送到欧洲各国巡回展出。徐先生当时建议说：过去中国人到外国开展览会，只知道向艺术家征求作品，展览过后，不但画没卖出，还有遗失或损坏的，使艺术家遭受很大的损失；因此他认为：如果决定举办，他可以代为收集当代名家的佳作，谈好价格，备款收购，然后再运到外国展览。因为设非如此，画家们未必肯拿出好画来，反倒失去了意义。

李先生表示同意，于是徐先生开始筹备，奔走全国各地，搜求名家精品。李先生说徐先生需要多少钱，可以直接向南京农工银行经理萧文熙先生领取，徐先生领了三千元，把应该搜求的画购齐。

第二步便是出国旅费和展览费用的问题，徐先生再到农工银行去拿钱，萧经理就婉言打了回票，推说李先生不曾交代。因为这时李先生已经到欧洲去了，一时无法对证。这一来事情弄僵了，徐先生骑虎难下，大感狼狈，他当时十分气愤地向萧经理说：

“既然如此，那么就算我向贵行借款三千元，我可以拿我傅厚岗的房地契作抵押。”

萧经理无法推托，就答应了，我们的房地契送去，徐先生果然借到了法币三千元。

这一次欧洲之旅，我本来不想同去，因为孩子太小，留在家里实在不放心；而且这时新居刚刚落成，还没有布置好。但是转念一想，假如我不去，万一徐先生带着爱人同行，又怎么办呢？还有，我也想趁此机会，看看我们有否

重归和好的可能。

因此我毅然决定还是跟他一起去。为了孩子们的带领问题，我特地将母亲从上海接来，请她老人家在我们出国时期，帮忙我照顾家里。

张溥泉先生和他的夫人崔震华女士，知道我们有欧洲之行，特地把他们的女公子张瑛和公子张琨，托我们带到法国去读书。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二日，我们一行四人在上海乘法国轮船博多士号启程，到码头来送行的，有张溥泉先生暨夫人、褚民谊先生、盛成先生夫人和许多亲戚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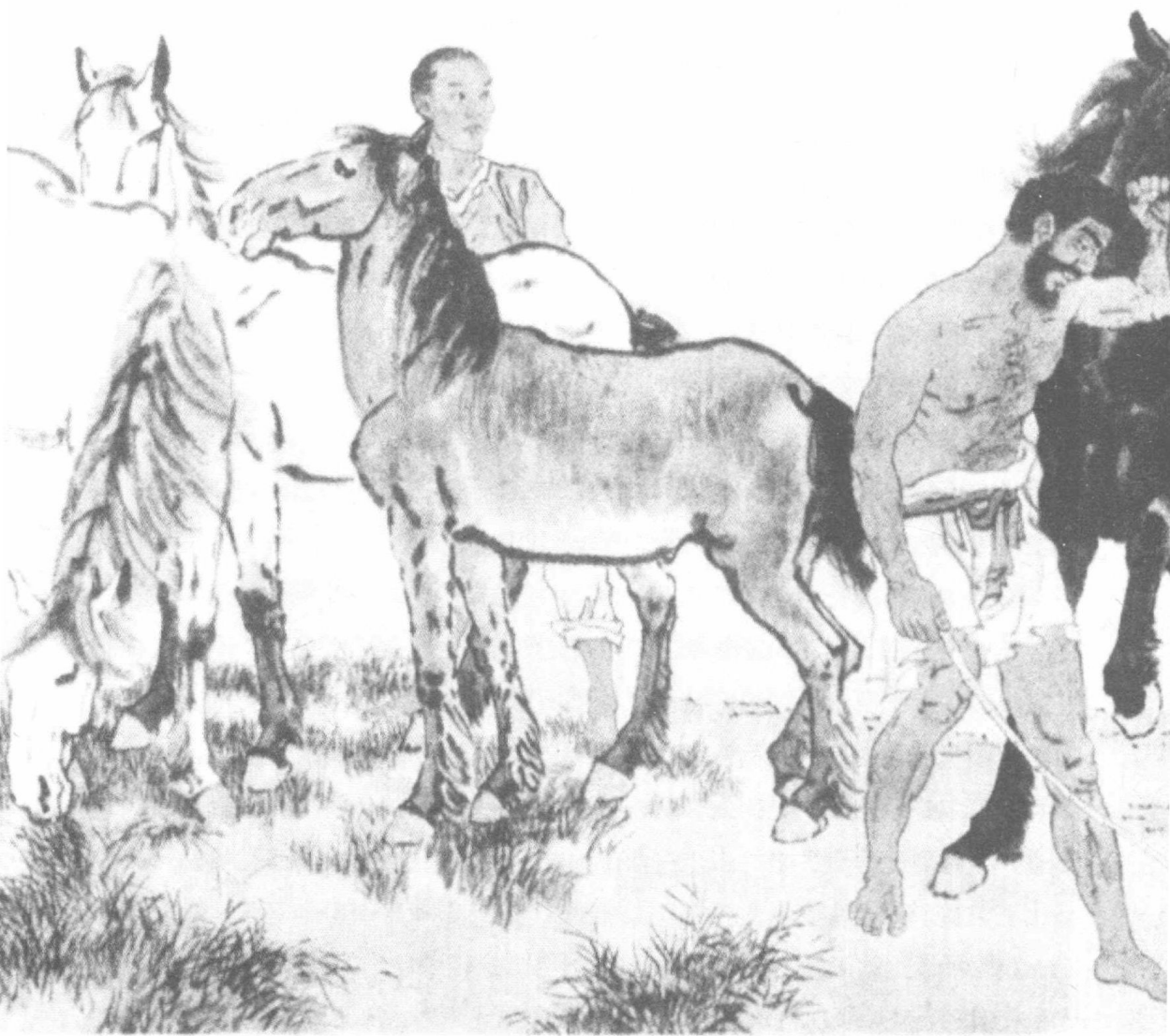
大家把我们一直送到船上，凑巧褚先生认识那位法国船长，他为我们介绍了，并且请他沿途多加照料。

法国船长知道了我们的身份，对我们相当礼遇敬重。旅途中，常常请我们到船长室外面最高的一层甲板上，喝咖啡，吃点心，清风明月，谈古说今。我们曾在他的热情招待下，度过了许多个愉快的海上夜晚。

因为法国船的设备好，所以我们买的是三等舱票。船上有一位法国医生，年龄不过三十岁，为人却很风趣热情，他喜欢到三等舱来找我们谈天，并且很殷勤地把我们邀到船医室去。他那间房子很大，有许多图书杂志，还有唱片唱机。他说他一听到我们在船上，就特地赶来拜访。他又幽默地说：头等舱里都是些脑满肠肥的人，所以他感到缺乏谈天的对象；他请我们不拘形迹，随时到他房里去坐。由于这两位朋友，使我们这次长途旅行，过得一点也不寂寞。

我生平最重然诺，“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是我一向奉行不懈的。张溥泉先生将他的男女公子托付给我们，我就不免要尽心尽力，除了照料他们两姊妹的生活起居，我还特别注意他们的言行举止。因为我曾在法国住过八九年，航行欧亚之间的长程海轮我也乘过两次，我懂得法国人的作风，并且深知长程航行中常有罗曼蒂克的故事发生。

张瑛女士长得很漂亮，高个子，方脸，有明艳照人的风韵。她在北京念法国天主教学校，法文、中文、英文都够水准，性格开朗，富于少女的幻想，因此每每使我为她担心，唯恐她感情浮动，把握不住自己。有一次她在医生的房间中耽搁了很久，而且还说了一句：“我真想一直留在此地呢！”我便怕被那位年青的法国医师听了，会错了意，因而引起问题。有时船长请吃晚茶，医生



也总在座，张小姐每每无意地离座走向黝黯的船舷，那位医生必定跟过去陪伴。固然，在外国人来说这是男士应有的礼貌，女士离座独行，男士是应该跟过去陪着的，但我又怕张小姐不懂这种洋人习惯，而又表错了情。

船行三十五天，二月底方才到达巴黎。我们找了一家旅馆住下，刘大悲和张凤举两位先生听说我们到了，便来旅馆访晤，商议举行画展的事，因为他们



▲九方皋（徐悲鸿，1931年）

是巴黎方面的画展筹备人。据刘先生说他已经和近代美术馆商妥，就在那里开展览会。同时我们知道李石曾先生正好在巴黎，当天就去拜访他，报告有关画展的筹备情形。

第二天忽然接到李先生一封信，信上的称呼是悲鸿、大悲、凤举三兄，他说他即日回国，展览会的事情以后请与顾维钧公使接洽，最好是请顾夫人主持。经费预

备两万元，由他负担一半，除去徐先生在国内所领的六千元以外，刘大悲、张凤举两先生在巴黎所花的筹备费用折合法币也有二千余元，剩下一千八百元，等他一回国内，立刻汇寄。其余所需的款项，叫我们去请顾公使设法。

一看这信，我们惊骇慌乱，手足无措，四个人商谈的结果，只好遵照李先生的嘱咐，一同去拜访我国驻法公使顾维钧先生。顾先生看了李先生的信，也很讶异，因为李先生对他并未交代，他当然无法做任何的承诺。不过他答应，将来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时，再为我们设法。

场地早经定妥，消息也已发出，举行展览会有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问题是这以后的行程还长，我和徐先生失去了经济的后援，又将何以为继？弄不好岂非又要流落巴黎，有家归不得？

当时钱昌照先生担任教育部次长，我们写信给他，请他设法接济。钱先生倒是很帮忙，由教育部拨寄了一笔钱来，使展览会顺利进行。后来法国政府买了我们十二张画，成立一个“中国近代绘画展览室”，拿到这一笔售画的款子，经费问题方始解决。

五月间，展览会在巴黎举行，由顾公使夫人揭幕；由于这是第一次将中国现代美术介绍给法国人，因此非常的轰动。报章杂志均以巨大的篇幅加以报导，推崇备至，评论极佳，这次的展览，可以说是极为成功。

算算在巴黎停留的时间相当长，住旅馆既不方便，耗费又大，我们就在十五区租了一间小小的画室。同住在这幢房子里的，还有一位中国女画家黄女士。黄女士就是名女作家张爱玲的母亲，我们是在南京相识的，那时候黄女士已经和他的丈夫离婚。

我们和黄女士异地重逢，又同住一幢房子，非常高兴。当时黄女士住四楼，我们住在二楼。

一天，徐先生要请两位外国艺术家吃饭，一位是意大利画家查依先生，另一位是波兰女雕刻家米格米贡女士，同时请了黄女士和常玉先生作陪，宾主一共六人。因为常玉先生的画室比较大，徐先生决定借用他的地方宴客。

先一天常玉先生在我们家里，我把买菜的钱交给他，并且约好，明天早上九点钟，我到他那边一同去买菜。徐先生呢？他说他中午来跟我们一起吃饭，请客是定在晚上。

翌晨九点，我如约到了常先生的画室，不料常先生起身较早，已经出去了一趟，把那些该烧该炖的都买了回来。我去的时候连鸡子都炖在锅里了，但是常先生说还有许多东西没买，所以我们还得再跑一趟。

于是我们在十点多钟又一道出门上菜场，把东西买齐，十一点多回到画室，开始预备午餐，等徐先生来吃饭。这时又来了一位熟朋友，在巴黎军官学校攻读的龙绳祖先生，三个人说说谈谈，一等等到一点钟，仍然不见徐先生来到。

我不好意思让大家饿着肚子尽等，一点多钟我们三个人吃了午饭。当时我还以为徐先生一定是临时有什么要紧事情，所以不及赶来，因此也并不在意，洗好碗筷，和常先生动手做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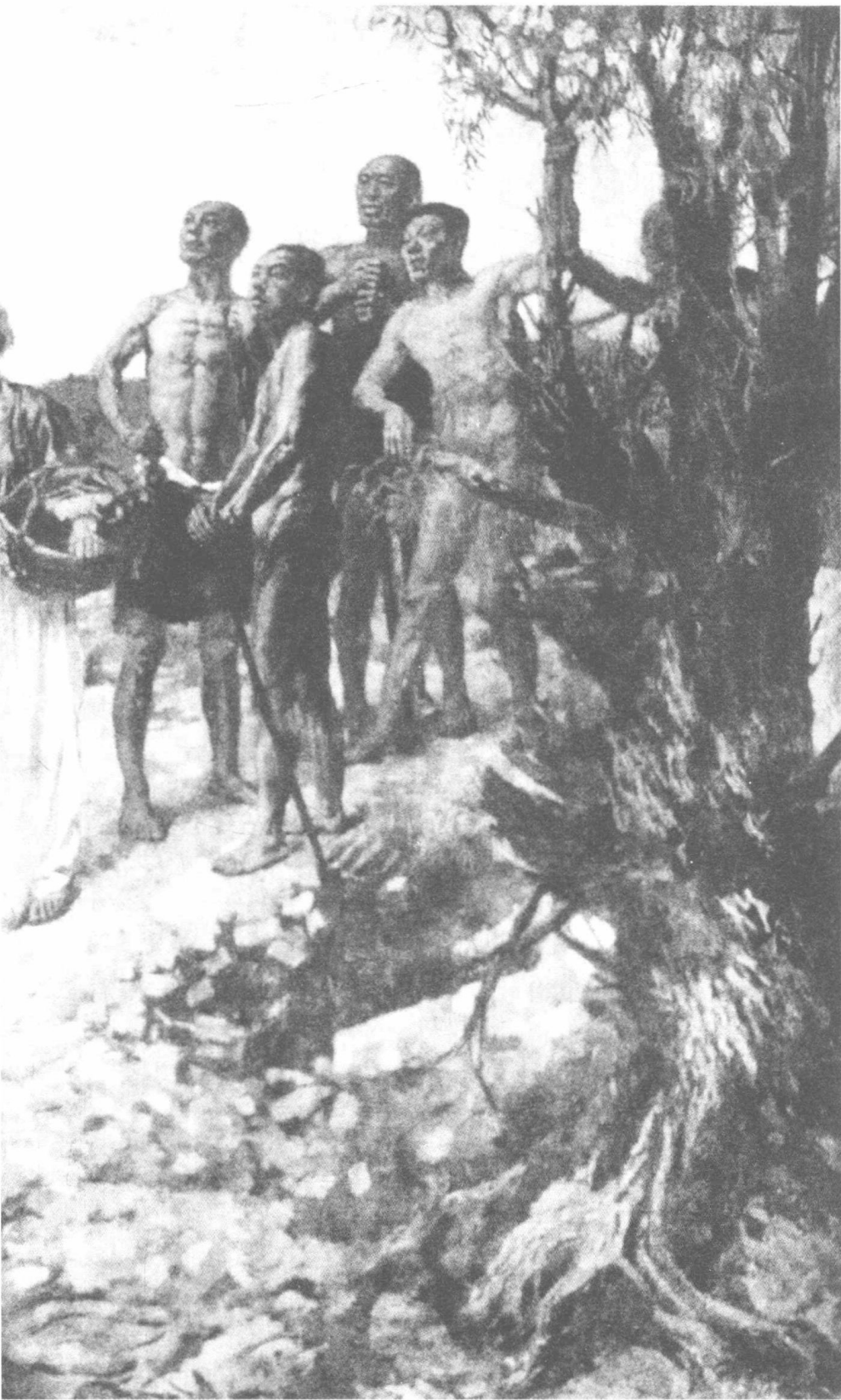
傍晚七点整，约好的客人准时到达，就只有身为主人的徐先生没来，我心里暗暗地开始发慌。当时的情形很尴尬，酒菜齐备，客人反倒在等候主人，这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但是不等他又不行。看看将近八点，我早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手足无措，坐立不安，我跑到厨房去跟常先生商量，我说在这种情形之下，只好请他到前面陪陪客人。我呐，我准备从后门溜走，坐计程车回家去看看，是否徐先生一时大意，忘记了请客的事。

叫了车，一路上直在催促司机开快些。到了家门口，抬头望去，楼窗里漆黑一片，不见有灯。于是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房门外，敲门，门锁住了，侧耳倾听，没有半点声响，房门钥匙只有一把，是在徐先生身上，而且看情形徐先生当然不会在房里，我又担心在那边等着吃饭的客人，迫于无奈，怀着一颗忐忑的心，又急急驱车驶回常先生的画室。

将近九点，我勉强镇定心神，请客人们入座，吃这顿延迟了两小时，而且人人食不甘味的晚餐。饭后，仍然见不到徐先生的踪影，大家见我心绪不宁，非常同情，同时他们也在担心徐先生，不敢想像他会出了什么事。于是大家一道儿送走那位波兰女雕刻家，然后再送我回家，顺便打听消息。

没有消息，因为房间里依然黯黯寂寂，阒无人声，用力地敲门，不闻回应，大家站在走廊里总不是事，于是意大利画家只好愁眉不展地告辞离去。黄女士也回她自己的画室，不过她跟我说，假如徐先生没有回来，我可以到她那里去住。留下常玉先生陪着我，在附近一带的马路上走来走去。





▲我后（徐悲鸿，1930—1933年）

夜幕渐深，恐惧的意念在我心头形成无比的重压，我接连想起许多可怕的灾祸，唯恐徐先生出了什么意外。我请常先生陪我上警察局，问他们今天有没有发生车祸。警官查了纪录，回答说是没有。我再问是否有中国人出了事？回答是迄至如今不曾听说；不过警官又补充一句，说是即使有人出事也不会一下就晓得的，说不定要到明天才能知道。这一来，更使我的心往下沉。

走出警察局，云淡星稀，时间已过午夜，常先生要搭地铁回去，否则便没有车子了，他把我送回家，道声再见。我心情沉重地爬到四楼，就在黄女士起居室的一张睡榻上，歪着身子和衣躺下。灯光熄灭，我的思绪反而特别的澄澈清醒，刚阖上眼，就有许多恐怖的景象，轮番映上我的脑海，讨厌的是任凭怎样都挥洒不开。什么车祸的血迹斑斑，什么被人谋杀的伤痕累累，光怪陆离，怵目惊心，我时而要骇极惊呼，时而要伏枕饮泣，我想起最近两年虽然感情方面暗潮汹涌，但我们毕竟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多年夫妻；在这遥远的异域，我怎能不为他的安全担心害怕？又想起上海亲友们热烈欢送我们上船的一幕，两个人兴高采烈地出国远行，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叫我怎样独自回去？再想想两个无辜的孩子，以及年迈的双亲，他们都在等待我们的归来；假如没有了我们，那他们的心灵将会遭受到怎样深巨的创伤？伯阳、丽丽又将如何长大成人？

在我半生之中，这可能是最漫长的一夜了。整夜，我被痛苦煎熬，被焦灼刺戳，被忧伤压迫，被悲哀淹没；整夜，我敏锐的心灵一直在幻想着，无休无止，直到东方露出鱼肚白。

看看天亮，我立刻翻身坐起，披衣离床。为了怕吵醒黄女士，我蹑手蹑足，推门外出，房门在我身后轻轻地关上。弹簧锁卡嗒一响，我知道自己无法再回转去了。

跑上马路，走到报摊，把所有的报纸每样买了一份。再回到家门口，就坐在楼梯上，翻阅每份报纸的社会新闻版，可是找不到什么不幸的消息。

心烦意乱，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天色大亮，七点多了，闪耀的阳光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灵感。

我再走到街上，找到了一家锁匠铺，但是时间太早，铺子还没有开门。我只好门前徘徊，等到他们一打开店门，我就直冲进去，请他们帮忙，派人去开房门的锁。于是有一位锁匠跟我回去，忙乱中我还想到撬锁应该通知一声女



▲紫兰（徐悲鸿，1941年）

门房，女门房很关心我，自动陪着我们一道上楼。

锁匠低头研究那只门锁，他摇摇头，说是这锁无法开启，要么只有撬开了；这一撬，不但锁毁，而且还会损坏门框。于是他四处打量，回头问女门房说：

“这隔壁的房间有人住吗？”

女房东回说：“没有人住，是空的。”

“那么，请你把门打开，我可以从这里翻窗过去，再从里面打开锁来，免得把门弄坏。”

女门房依言打开空房房门，锁匠正待从窗口往外爬，訇然一声，我们的房门响了。我大吃一惊，锁匠和女门房也呆呆地怔住。俄顷，房门打开，徐先生

站在门里，头发蓬松，面色非常的难看。

当着女门房和锁匠的面，我当时又羞、又气、又恼怒，恨不得找条地缝钻下去。我涨红着脸谢了女门房，付了锁匠一点钱，看他们满脸不胜讶异地走了。那时候我已无法控制自己愤恚的情绪，我走进房去，冲向他，声声地逼问：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的脸色很难看，可能他也是一夜没睡，他先不做声；后来大概是实在被我逼急了，他才怒气冲冲地反过来质问我：

“我昨天去，你们为什么不开门？”

当时我还在激怒之中，我气愤极了，于是我大声地嚷着：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以为我做了什么？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原来他早一天说好中午十二点到常先生那边吃午饭的，但是临时提前，十一点钟便到了。刚好那时我和常先生出去买菜，房门是锁住的，他敲了半天门，里面不应，使他起了莫大的怀疑。因此他非常生气，存心报复，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听谁来都不理，害我饱受一场虚惊，足足着急了半日一夜，同时还让他自己在外国朋友面前失礼。

不一会儿，常先生也是悬了一夜的心事，早早地赶来，打听消息，他一跨进门就发现我和徐先生正在生气，他十分惊讶地问：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

叫我怎么说好呢？我只好伸手一指徐先生，说：

“你去问他！”

可是徐先生铁青着脸，一语不发，我想常玉先生直到今天，恐怕还不知道那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吧！

这时我想起了黄女士昨夜为了怕我受凉，好意借给我一件大衣。只怕她一会儿起来也要寻根问底，叫我难以解释，于是我就将大衣抛给徐先生，我说：

“请你替我把这件大衣送还给黄女士，至于她要问你昨天的事，也请你向她说明！”

不久，徐先生和常先生都出去了，我一个人独坐房中，越想越生气，越想越委屈。十一点多钟，忽然有人敲门，我打开门一看，原来是大使馆的职员，他是专诚送护照来的，因为在此以前，我们计划到比利时的京城布鲁塞尔去开

画展，将护照送请比国大使馆签证，这时正好送回。我接过护照，灵机一动，匆匆地收拾衣物，拎了一只小皮箱，留一张字条给徐先生，我在字条上仅仅写着三个字：“我走了。”

然后跑出家门，雇车到巴黎车站，坐上巴黎驶往比京的特别快车。四小时后，我抵达了布鲁塞尔，找到沈宜甲先生，他看见我一个人飘然而来，非常惊讶，一再追问，我终于告诉了他所有的事情。

沈先生很机伶，他立刻就说：你这样来怎么行呢？你来了这儿倒没有什么，只是悲鸿没有护照不能来呀。因为我们两个人是合用一张“徐悲鸿暨夫人”的护照的。于是沈先生便向我要回护照，给他寄到巴黎。后来据刘大悲先生告诉我说：徐先生为了我的出走，也紧张了两天，还到熟朋友处找过，可是偌大的巴黎，想找一个人，岂非大海捞针？后来接到了护照，才算放下心，当即赶赴比京，和我会合。

常玉和沈宜甲两位先生，是我们第一次留法时期的好朋友。沈先生经常住在布鲁塞尔，他听说我们到了巴黎，便赶来相见，同时也就认识了张瑛、张琨两姊弟。他对于这两姊弟的事非常热心，听说他们要找学校，找房子，他便自告奋勇，到处奔走。我们在巴黎十五区租到了那间画室，沈宜甲先生也为张瑛姊弟在我们的附近，租了两间公寓房子。由于这两姊弟年纪还轻，对于家务事一无经验，我还得常常去为他们料理。然而就在这段时期，我发现沈先生对张瑛小姐显得特别的殷勤，这大概就是他俩未来那一段“不愉快婚姻”的萌芽时期。

在巴黎先后住了好几个月，有一件令我耿耿难忘的事情，也有一记的必要。徐先生早年念过的巴黎美术学校，有一位门房，我在第一次旅法时就已经认识了他，他还请我们吃过饭，他是个和蔼可亲、热心诚恳的老人家，对待徐先生相当的好。在美术学校前后看了几十年的门，跟所有的教授学生都很熟，他有个习惯，认识一位学生便求一幅画，几十年下来早已收集甚丰。我常常想，如果他所有的画能够留存到今日，那他不但是个大收藏家，同时也富埒王侯了。当徐先生在校的时候，也曾赠过他一幅画的。

我们第二次来到巴黎，所有信件都由使馆代转。令我意想不到的，后来我竟会在无意间发现，徐先生还有个秘密转信的人，那便是美术学校的这位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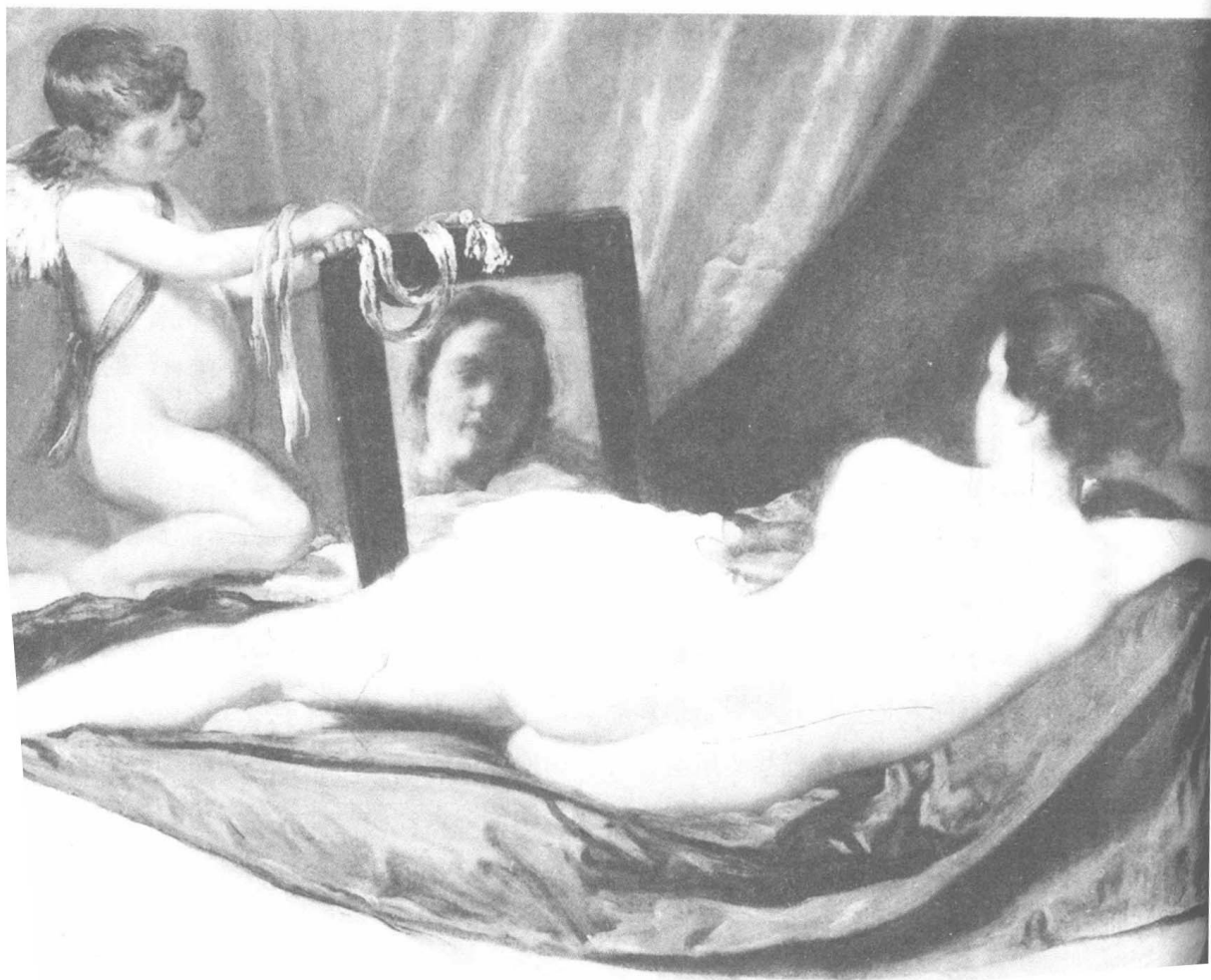
门房。说来有趣，有一天有人敲门，徐先生把门打开，便立即冲了出去，我只听到外面噉噉喳喳地说了几句话，徐先生便回房来了。我问他是谁，他答说是美术学校的门房。过了两三天，我在壁橱里找到了一只信封，捡起来一看，原来是孙韵君从国内寄给他的，我这才恍然大悟，徐先生和孙韵君一直都在书信往来，而那位老门房便是他们的转信人。

在比京开完了展览会，我们又回到巴黎，收拾好行李，匆匆动身到伦敦。

这是我们第二次旅游伦敦。十四年前赴欧，伦敦曾是我们抵达欧洲的第一站，但是只住了两天，就离开那里到巴黎去了。

徐先生这一趟到伦敦，是为了临摹一张西班牙名画家佛拉斯盖司所画的《维纳斯与镜》，这幅画很有名，徐先生大概临了十天左右便告完成。我们住在熊式一、蒋彝两位先生合住的家里，蒋先生后来也成了画家。他们的住宅宽大，设备齐全，厨房里火旺水足，而且有冷热水龙头。我在欧洲好几个国家旅

▼ 镜前的维纳斯



居时都曾自己烧过饭，其中就以这次在伦敦时最方便，最痛快。尤其是英国人不喜欢吃猪腰，所以腰子的价格特别便宜，于是我得其所哉，常时买许多腰子回家，卤炒蒸炖，什么样的做法都试过。

除了到博物馆临画，徐先生还买了许多艺术典籍，我常陪他同去，帮他挑选购买。我也深知他的嗜好，以前我有时反对他漫无限制地搜购，那完全是因为我们经常濒临饥饿边缘的关系，把买面包的钱移作收集艺术品，我当然无法苟同。

熊式一先生为我们介绍了英国最著名的水彩画家戈纳先生，这位大画家当时已经六十多岁，精神矍铄，他邀我们到他画室参观，我们见到了他的模特儿，非常美丽。后来有一天，戈纳先生突然打电话来，通知熊先生说是他结婚了，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过两天熊先生请新婚夫妇到家里来吃中国饭，还请了一位以前做过香港总督的英国爵士夫妇作陪。这才知道，新婚的戈纳夫人，便是那位绮年玉貌的模特儿。

在那顿愉快的聚餐中，我发现了英国人性格的另一面，因为我注意到爵士夫妇始终不曾和模特儿夫人交谈一语，因为门第和阶级的观念在英国是很深的。后来听说，戈纳先生的子女，对于他这一次的婚姻也一致反对。

在伦敦，我时常独自一人搭乘电车或公共汽车，因为我每天都要去买菜。在公用车辆上，我更看出了英法两大民族基本性格的歧异。英国人绝对不像法国人那样，对我这个不常见的东方女性投以好奇的眼光，同时他们不轻易与人交往；但如结交成了朋友，则又非常地重视友谊，不像法国人看看笑笑，攀谈两句，甚至也会请回家里吃饭，在外表上尽管热情，事实上却很难建立真正的友谊。

我们离开伦敦，乘轮船驶向荷兰的故都海牙。我们的目的是去参观荷兰大画家伦勃朗的画，以及他的故居。在海牙博物馆参观过后，又到国际法庭去拜访王宠惠先生，他见到我们，十分高兴，特地陪我们坐火车到荷兰国都阿姆斯特丹一游。

在阿姆斯特丹，有一家中国饭馆，备有广东名菜糟白鱼。王先生是广东人，他很喜欢吃这种鱼，并且告诉我们，这里的糟白鱼，是轮船上中国水手自己做的，但是味道仍然很好。吃过饭，王先生再陪我们去参观一个专门陈列古代刑具的博物馆，气氛阴森而可怖，无奇不有的各式刑具，看了令人毛骨

悚然。

从荷兰回到巴黎，由于住处尚未退租，还有许多琐碎的事情需要料理，而米兰方面的画展日期已经决定。大家商议的结果，请我留在巴黎，处理未了事项，徐先生和沈宜甲先生先去米兰布署一切。

我将所有的事情办理清楚，一个人动身赴米兰，去和徐先生他们会合，由巴黎到米兰途中须经瑞士，路程相当的远，因此我买的是卧铺票。欧洲的卧车，夜里在卧铺上睡觉，白天则请到另外的车厢里，车厢隔成一间间的小房，有门有窗，设八个座位，对面而坐，中间靠窗的地方有一张可以折叠的小桌。

清早由卧车换乘车厢时，只有我一个旅客。一会儿，上来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外国男士。

他面貌清秀，举止彬彬有礼，他在我对面坐下，燃着了一支香烟。将烟盒随手搁在座位上面，小房里寂静无声，两个人就这么默默地对坐。

忽然听到啪的一响，我回头一望，发现他的烟盒滑到座位下面去了。他为了捡回烟盒，站起身来，背对着我，双手很吃力地抬起了活动椅垫。

但是他没有办法伸手去捡烟盒，因为他腾出手来椅垫又要落回去。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当然不能不帮他一个小忙，于是我站起来上前两步，把他的烟盒捡起，他放下椅垫，接过烟盒，连声向我道谢。

借此机会，他开始和我攀谈，他首先问我的国籍，我说我是中国人。他脸上露出讶异的神情，紧接着再问：

“你祖上是否有白种人的血统？”

我笑笑，摇摇头说：“没有”。

“你的皮肤很白，”他蔼然地笑着解释：“你不像是黄种人”。

“中国人皮肤白的多着呢！像我，还不算很白。”

于是我们接下去谈中国，谈瑞士，谈旅行的趣事，谈法国和意大利，斗室里充满和谐友好的气氛。不久，他抵达了目的地，站起来向我告辞，当我们握手道别的时候，他两眼闪闪有光，热情洋溢地对我说：

“今天我度过了一次最愉快的短途旅行。”

在那个瑞士小站，我目送他的背影渐渐远去，心里不禁兴起一种奇异的感觉，人类的感情是多么的微妙！像我和这位萍水相逢的异国人，极偶然的邂

逅，一席闲谈，除了国籍以外，我们对于对方一无所知，不问过去，也不作重逢再见的打算，然而彼此都留下了隽永深刻的印象。

我们这次意大利之行，是因为意大利国立米兰博物馆馆长，听说我们在巴黎举行画展获得极高的评价，很客气地写信到巴黎，邀我们到米兰去举行展览。米兰是意大利第二大城，有“意大利之巴黎”美称。这次邀请，对于国家和对于徐先生本人都是很光荣的事情，可是徐先生和沈宜甲先生，却另外有他们的一套做法。

早在巴黎时，由沈宜甲先生执笔，和米兰博物馆信件往还，开始磋商。徐先生、沈先生开出许多条件，要米兰方面负责我们的旅费，以及在米兰时期的生活费用。讨价还价，锱铢必较，使我觉得非常不满，我以为像徐先生这样一位闻名国际的中国画家，他应该保持自己的身份地位，不必为这几个钱斤斤较量，我们即便再苦，也用不着向外国人低头要钱。但是他们两位并不赞成我的意见，同时又怕我阻挠他们的计划。于是从此以后他们总是避着我筹商大计，三个人在一起竟然形成泾渭分明的两派。我心想这样也好，凡事不闻不问，落得耳根清净。

我们在一家当地人家，分租了三间房子，两房一厅，厨房公用，由我负责烧饭。和外国人合用厨房，使我感到许多不便，因为他们看我做中国菜，总觉得新奇有趣，问这问那，脸是都挂着诧异惊奇的表情，我在厨房里已经觉得浑身不自在。沈先生还常爱跑进来看看，有时候我炖鸡汤，外国鸡都是杀好冰冻过了再出卖的，炖汤极不相宜，不但味道不鲜美，还有一股怪味。沈先生戴深度近视眼镜，进厨房耸鼻噉唇地先闻菜味，嘴里直在嚷着：“好臭好臭！”然而鸡汤端上了桌，偏就数他吃得多吃得多。

意大利盛产佳酿，有些红白葡萄酒，比法国的产品更胜一筹。我和徐先生都不善饮，唯有沈宜甲先生得其所哉，每天买酒来喝，我们看他一杯在手，乐也陶陶。

这一段时期，我的心情一直不愉快；唯一庆幸的事，便是近代中国美展在米兰也获得盛大的成功，参观者络绎不绝，报章纷纷给予佳评。展览会结束的时候已经是急景凋年，我们决定就在米兰度岁。

米兰有一座大天主堂，这教堂是闻名世界的胜迹，全部用大理石建成，建

筑之宏伟，雕塑之精美，令人目不暇给，叹为观止。听说这座教堂的建造，历时达四百余年，差不多可以说它是“兴工半世纪”方始完成的。

我和徐先生不信任任何宗教，但是圣诞夜，在这宏伟的教堂里，有着规模盛大的圣诞弥撒，这是难逢的机会，所以决定去参观。那天有成千上万的天主教徒在做弥撒，仪典之繁缛隆重，教徒之信仰虔诚，在这崇隆华丽的古老教堂拱顶之下，构成了无限庄严曼妙的气氛，令人深切地感动。可是当时我心里却浮现出两个滑稽可笑的意念：我在想，这“望弥撒”，竟和我国和尚拜忏放焰火的情调有些相仿；同时我也不免困惑，他们果真人人都信得这么虔诚吗？

在米兰的画展圆满结束，过完年，大家趁此难得的机会，一游古罗马帝国几处著名的风景名胜。首先到“水都”威尼斯，这座古城建在威尼斯湖的一百多个小岛上，河渠纵横，星罗棋布，大大小小的桥梁，据说有四百余座。绝大部分的建筑物都是古色古香，朴质自然。我到威尼斯的第一个印象，便是罕见车辆，因为这里的交通全靠舟楫往返，根本没有地方可供驱车；第二个印象是一幢幢房子全都建筑在水边，宛如一座座水上的浮宫，真是有趣极了。

三十多年前游威尼斯，河面往来如梭的都是古老木船，船身狭长，两头尖翘，雕镂精致，髹着缤纷的彩色，非常美丽。划船者多为年轻健壮的小伙子，他们的神情活泼愉悦，动作灵活优美，不时引吭高歌，立刻便得到其他船夫的唱和，歌声趁着轻风，在水面袅袅悠扬，看他们真是不知人间愁滋味，把这古老的水都点缀得生趣盎然。

也许因为威尼斯人的热情奔放，加以莎翁脍炙人口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出赚人热泪的爱情大悲剧，就发生在威尼斯这个地方，所以那里的罗曼蒂克气氛极为浓厚。艺术家们留下的风流韵事罄竹难书，连那些英俊健美的年青船夫，都是许许多多热情人所倾心相爱的对象。

我们去参观了威尼斯国立博物院，再到闻名世界的圣马可大教堂，我们在大教堂前流连很久，因为我舍不得离开广场上一群群的鸽子。这些鸽子不但无畏人，还乐于与人亲近，而且也真有灵性。教堂职事每天按时喂它们两次，第一次是在早晨九时，九点一到，圣马可大教堂第一声钟响，千千万万的鸽子便自四面八方飞来，只见黑压压的一片，遮天蔽日，犹如乌云四合，然后似有几

千万片落叶，飘然坠地，那是它们在飞降广场，啄食早餐。

沈宜甲先生为我拍了许多照片，有一张是我肩背头顶，到处都憩着鸽子。另一张拍我抛出玉蜀黍饲喂它们，玉米自空中撒开，相机拍出了犹在半空中的玉米，和几只鸽子振翅飞来啄食。

佛罗伦萨风光宜人，是意大利北部的游览胜地，那里的博物馆、图书馆和宫殿建筑都很有名。由于文艺复兴时代艺术人才辈出，艺术品收藏丰富，因而有“意大利的雅典”之称，在世界艺坛有举足轻重之势的“佛罗伦萨”画派，即以此地为名。可惜我们由于行色匆匆，在佛城停留不久，搭车去看过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比萨斜塔，便换车南下直驶罗马。

谚语有云：“条条大路通罗马”，事实上罗马也曾长时期做过世界霸主，横跨欧亚非三洲最强盛的国家。即使时至今日，她仍然以一座大城而为两个国家的国都，一是意大利共和国，一是梵蒂冈教皇宫廷。

描写罗马景物的文字早已车载斗量，这里不必我再作介绍。我们游过罗马的三大胜迹：梵蒂冈宫、圣彼得寺和科利色姆斗兽场，看过世界上最名贵的画——达·芬奇所绘的《最后的晚餐》，同时更凭吊了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的加里波第纪念像，看他骑着骏马，雄姿英发。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去参观米开朗基罗的不朽名画《最后的审判》。看了这幅杰构，简直使人无法想像人类会有那样至高无上的智慧，和无可比拟的创造力量。

罗马又有专门陈列雕塑的博物馆，我们去参观时，执事人员特地引领我们走进一间小陈列室，室中仅只陈列一座出土方始数十年的维纳斯塑像，胴体线条之美丽，真是笔墨所无法形容。

然后我们又去玩了意大利的第三大城那不勒斯，眼见维苏威火山袅袅地冒烟。坐了十几公里的汽车，直驶维苏威火山之麓的庞贝废墟。庞贝在公元七十九年由于火山爆发全城湮没，直到公元一七五五年才陆续挖掘出土，大概保存了旧迹的三分之二，留供后人浏览凭吊。其中还有颇为完整的房子，墙壁上有壁画，我曾站在那里的走廊上照了一张相片。

意大利之游到此为止，我们转回罗马，再去柏林，沈宜甲先生因为另有要事，他不能再陪我们到柏林走了，他就在罗马留了下来。



▲最后的审判

柏林也是旧游之地，回首前尘，不胜怅惘，老朋友们早已风流云散，而我和徐先生也无复当年的鹣鹣之情。承一位曾姓同学的介绍，在李田丹先主家里分租到两间房子，这就是我们和李田丹先生订交的开始。

李田丹先生是德国人，早年到过中国，和他的法国太太是在哈尔滨结的婚，他爱中国，也爱中国人，所以以后才会归化中国籍。他的母亲是犹太人。非常富有，但是因为不满李先生的婚姻，因此对李先生的一切不闻不问。李先生也很倔强，从不依赖她的母亲。

柏林的画展，李先生帮忙最多，一切的事务工作，奔走接洽，都由他一力肩承。看到他整日忙碌不停，我总觉得很不过意，他却若无其事，他为人之慷慨、热心与好客，于此可见一斑。

和李田丹先生同伴热心，甚至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还有一位又矮又小、脚有点跛的德国老太婆，她披头散发，模样像是电影上的老疯妇。她非常崇拜徐先生，整天跟着他到处跑，碰到记者访问的时候她也会抢着出头当翻译，给外国人看了实在有点奇怪。她也是李先生的房客，独身居住，有一次她问我要徐先生的照片，我找出许多张来让她挑选，她挑了其中之一，我因为只有一张，所以说是我自己想保留的，不意她竟大声地说：

“你还要照片做什么呢？你不是已经有了他的本人吗？”

后来有一段时期，徐先生还瞒着我跟她秘密通信。

好友孙佩昌先生，在国内时便请托徐先生，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博物馆，临摹一张十七世纪荷兰画家伦勃朗画的《参孙与大莉拉》的名画。法兰克福在德国的东南部，商业很发达，市内银行林立，所以有人称它为“银行市”。当时设有一所中国学院，是德国人研究中国学术的中心。

丁文渊先生在中国学院任教，他也是我们第一次旅游柏林的旧识，我们离开柏林前曾写信给他，请他代觅一个短时期的住处。丁先生非常帮忙，他在一位德国富孀的家里找到两间房子。这位富孀是丁先生的朋友，家中陈设相当的考究，她听说徐先生是国际闻名的画家，对待我们十分殷勤，并且声明一切免费招待。

《参孙与大莉拉》这幅名画，是十七纪荷兰大画家伦勃朗的不朽杰作，他所画的是《圣经》故事之一。据说古代以色列士师参孙天生神力，曾经以一



▲参孙被弄瞎眼

只驴腮骨击杀敌军一千，传说他神力的根源就在他的头发，如果将他的头发剪去，他的神力便将消失。大莉拉受敌人贿赂，以千娇百媚的姿容诱惑了他，一夕缠绵过后，参孙倦极而眠，大莉拉趁机把他的头发剪掉，于是四周埋伏的敌军一涌而入，用烧红的利剑戳进参孙的眼睛，几柄刀枪直抵参孙的胸腹，因此他束手就擒，沦为奴隶。

这一幅写尽当时无比残酷的画，画中的大莉拉一手拿着剪刀，一手提着头发，参孙愤恨交集，忍受痛苦，一把利剑正插在他的眼中，鲜血淋漓四溅。包

围他的敌军，脸上有骄矜、狂暴、惊惧、狰狞，种种复杂的表情，不仅栩栩如生，而且活灵活现，令人疑为鬼斧神工。我们到法兰克福的那一段时期，天气一直不好，博物馆里光线不足，所以徐先生临这幅画很费事，前后足足花费了十多天。

完成了临画的工作，我们向居停主人和丁文渊先生再三道谢。然后就乘火车遑返柏林，仍旧借住在李田丹先生家中。

结束了德国的旅程，从柏林启程再回意大利，因为苏联对外文化局已与我国驻苏使馆洽商好，邀请我们到苏联去举行画展，而且事先说明只要我们抵达苏联境内，一切费用都由他们负责招待。

于是我们再坐火车，穿过瑞士抵达意大利的热那亚，因为到苏联的行程是由热那亚乘船，经地中海、爱琴海、达达尼尔海峡和黑海，再从奥德萨换乘火车，北上莫斯科。

第二次柏林之旅，就我个人来说，得到了两项收获，其中之一便是居停主人李田丹夫妇的真挚友谊。这份友谊历久不渝，后来李氏夫妇来到南京，归化中国国籍，我们还曾一同度过许多快乐和忧悒的时光。第二呢，便是当时在德国享誉甚高的一位雕塑家霍夫曼先生，曾经为我塑了一座半身像，我们将它带回国来。

热那亚是意大利北部的要港，濒临热那亚湾。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纪，热那亚州便是意大利共和国的全部，其后曾经被德国和法国并吞，一八一五年方才改隶撒丁王国，最后成为意大利的一州。因为有这许多历史嬗变，所以当地留下的名胜古迹特别多。

我们到了热那亚，画箱却由于转运需时犹未抵达，因此我们必须在热那亚等候一段时日。这时候，徐先生向我提出要求，他要我一个人在热那亚等画箱，让他到西班牙去游历一番。他说马德里的博物院闻名世界，那里藏有许多名画和艺术品，他很想去参观。

这并不是我做不到的事情，但是那时我对他已经事事都生反感。所以我一听他这么说，就立刻表示不同意，我说我不愿单独留在人地生疏的地方。

由于我的不同意，使他未能畅游伊伯利亚半岛。这以后他每一提起都表示非常憾恨，将一生没到西班牙，都归咎于我当时的阻挠。

热那亚有许多巍峨崇伟的大教堂，我们乘机到处参观游览，同时也拍了不少的纪念照片，等柏林运来的画箱一到，我们立刻买好一艘意大利客轮的船票，折向东行。

第一站停泊雅典，我们对这欧洲文明之源的希腊古都，早就深心向往，有这么好的机会，当然不愿轻易放过。船一停，我们立刻登岸，乘汽车走了四英里到雅典市，在市区匆匆绕行一匝，便往游阿克博尔高岗，凭吊最古老神奇的希腊女神庙。到了高岗之巅，只见云天荒草间，一片废墟。但是这种残壁颓垣，却令人发思古之幽情，神庙庙顶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四周的擎天巨柱。我们在那里徘徊留连很久，想到那些久已熟知的美丽神话，叹息岁月悠悠，人生苦短！

拍了几张照片，雇车仍返爱吉那湾。回到船上，翌晨继续东航，过爱琴海，东方与西方的交界处，形势险要的达达尼尔海峡已经遥遥在望了。



▲ 雅典娜神庙

这条达达尼尔海峡，全长四十五哩，宽不过五哩，窄处只哩许；但它中分欧亚两洲，成为天然的界限。达达尼尔海峡西通爱琴海，东抵面积一万二千余方公里的马尔马拉海，两岸筑有坚固的炮台，防御极为坚强。通过这条海峡，穿越土耳其境内唯一的内海马尔马拉，又有一条博斯普鲁斯海峡。再走一两个小时，才到了俄土两国共有的黑海。

博斯普鲁斯海峡全长只有三十公里，最窄的地方则为一公里，它和达达尼尔海峡同为古来兵家必争之地。十九世纪以前，几乎常年战争不休，土耳其的国势积弱，数濒于危亡存绝，可以说大都是因为列强想争夺这两条具有天堑之险的狭长海峡。时至今日，它们仍然紧扼苏联的咽喉，阻遏了其势力向南伸展。

伊斯坦堡旧称君士坦丁堡，公元三三〇年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建都于此。一四五三年土耳其人奋力围攻，灭亡东罗马帝国，自此改为今名，并且定为国都。后来国都迁到安卡拉，伊斯坦堡仍为土耳其的第一大城。

轮船在伊斯坦堡小泊，我们登岸参观了这座建立已达一千六百余年的名城，城中有回教最大的教堂，恢宏奇伟，那种古朴威武的气氛，和基督教堂大异其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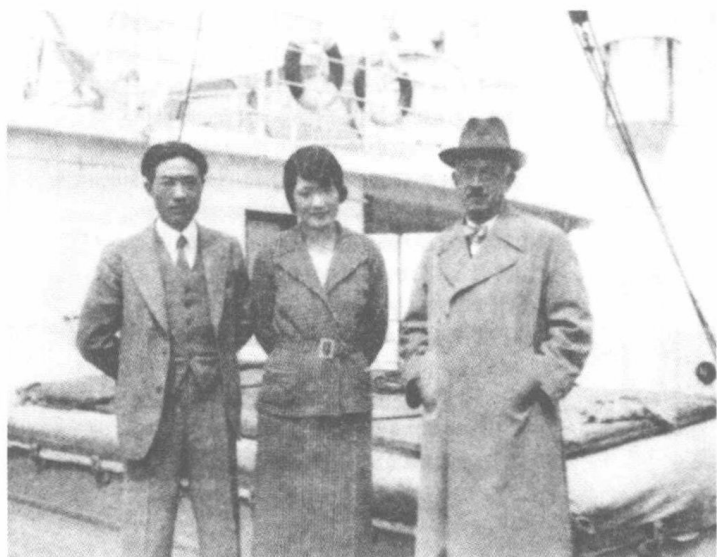
离开伊斯坦堡，我们的船便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但见两岸峭壁巉岩，矗然直立，土色苍黄，草木不生，形势相当雄壮。通过海峡，便到了黑海。

黑海烟波浩渺，汪洋万顷，而海水并不黑。只是近岸之处，山岩黝黯，颇有点像是煤块。黑海名称的由来，可能就是因为这层缘故。

轮船驶到聂斯德河口的奥德萨，这一段曲折迂回的旅程，算是宣告終了。码头上，苏俄对外文化局派有专人迎接，把我们请到沙皇时代的行宫里去住宿一夜。这座行宫富丽堂皇，设备极为讲究；因为苏联大革命后，仍将行宫保持原状，作为款待国宾的行馆。就在招待我们之前，法国总统也曾在那里住过。

翌晨乘火车直驶莫斯科，通过了素有欧洲谷仓之称的乌克兰大平原。平畴万里，一望无际，野阔风摇，麦浪起伏，一派北地春光，和江南的莺飞草长，大异其趣。

到了莫斯科，对外文化局的招待人员，请我们住到红场附近的大都会饭店。大都会是莫斯科最豪华最高级的旅馆，多半为招待外宾之用，一切设备及



▲徐悲鸿、蒋碧微、李田丹摄于赴欧画展途中黑海船上

招待，仍还保有欧洲大陆的水准。

从我们所住的房间凭窗眺望，可以看到莫斯科歌剧院，这是一座白色建筑物。歌剧院前面是一个广场，由广场向左转过去，便到了红场。克里姆林宫是一座灰砖城堡似的建筑，面积也不知道有多大，只是墙垣太高，禁卫森严，看起来不像是政府的所在地，反倒有些儿像座监狱。列宁墓地就在克里姆林宫前，呈长方形，全用绛红色的大理石建造，有宽阔的台阶，可以一步步地拾级而登，每年红场阅兵，贵宾们便在这墓台上观礼。

红场的两端，一座古老的俄式教堂和一幢规模极大的博物馆，遥遥相对。

苏联对外文化局，招待我们十分殷勤周到，我们一到旅馆他们就派来一位女通译员，年纪约有四十多岁，一她可以说很流利的法语。自此以后，只要我们外出，她便和我们寸步不离。我和徐先生都知道：她所负的监视重责，要比她的通译工作吃重得多。

我们所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拜访我国驻苏公使馆，当时的驻苏公使颜惠庆先生，正好回国述职，由吴南如代办理馆务。吴先生也是宜兴人，家住南京，他的公馆就在我们傅厚岗新居的正对门，我们不但是同乡，而且还是邻居，海外邂逅，大家都觉得非常的高兴。公使馆的其他各位先生，对我们也是十分亲切，而且还给予我们不少的协助。有一次，我们还邀请使馆同仁郊游野

餐，在莫斯科郊外，度过了很愉快的一天。

对外文化局局长和该局主要人员，为我们举行一次正式的宴会，从此我们就展开了紧张忙碌的活动。这些活动可以分做三方面：一是筹备画展，二为参观拜会，三为出席宴会及若干私人邀约。

我们到达苏联的时候是一九三三年四月，离开苏联大革命已达十六年。国内经济情形相当恶劣，正在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因此我们参观访问之后，所得的印象，无非是俄国人民太穷、太苦、生活艰难，心情黯淡，很少看到他们的笑容。

但是另有一个现象，明眼人一望可知，那便是三十岁左右是苏联人神情气质的一大分野：三十岁以上的苏联人，大都郁悒寡欢，颓废消沉；三十岁以下的人就比他们轻松活泼得多。

根据我们在莫斯科的耳闻目睹，苏联的商店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普通人民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地方，店里的货物大都粗糙陋劣；另有一种有点像台北的寄卖行，各式各样的货品都有，不过全是旧的，这些东西大概是苏联政府没收来的私人财物，摆在国营商店出售；再有一种铺子，则售卖比较昂贵的珍品，诸如古董、饰物、毛织品、丝绸，以及苏联的特产品皮货、宝石等，偶而也有一些欧洲大陆运来的奢侈品。但是他们营业的对象不是老百姓，而是外国人，因为这里是只能使用外币的，大概这也是苏联吸收外汇的来源之一。

走进苏联的商店，会使人兴起不像一家铺子的感觉。由于商店是国营的，店员全拿薪水，所以人人阴阳怪气，无精打采，对待顾客一点儿也不起劲。你买也好，不买也罢，翻弄也好，搞坏了什么也无所谓，仿佛一切都与他无关。我走过那么多国家和城市，从来就不曾看过这么懒怠懈怠的店员。

但是徐先生和我，都照顾了他们不少生意，多一半是因为价钱便宜，另一方面在那里多少可以发掘一些别处很难找到的旧物。譬如说徐先生买了不少丹麦制的磁器玩具，有各式各样小动物和人的塑像，其中有一座磁像是一个男孩，穿着木头鞋子，两手插入裤袋，神情模样非常可爱。

当时在苏俄，卢布也有官价和黑市，兑率相差很大。我们初到那里，当然无从换到黑市卢布，照官价兑换又心有不甘。因此我们身边总是没有多少钱。有一次，我和徐先生同去逛商店，他选购了许多艺术品，我一看价钱不小，便

连忙提醒他说：“哎，你怎么办啊？”他听了我的话，笑笑，也不回答，当时就从身上掏出大把的卢布票，付清了货款。

回到旅社以后，我忍不住问他，刚才的卢布是从哪儿来的？他这才告诉我，是公使馆吴南如代办给我们的零用钱。当时我很生气，我质问他：“为什么你拿到钱不让我知道？”他这样遇事隐瞒我，使我实在很难堪，于是我数落了他一顿。徐先生大概是无话可说，他一直缄口不语。

徐先生把钱藏起来不让我知道的原因，是他怕我买皮货。

莫斯科的皮货实在太便宜了，一件折合法币百元的皮料，带回中国至少可以值上四五百元。但是没有卢布怎么办？于是我便托使馆的职员，代我向做工的华侨，兑换了一点黑市卢布，才算买了三件狐皮，自己买了一只狐围领。为买这三件狐皮，徐先生还有点不高兴；但是带回国以后，一件送给他的母亲，一件送给我的母亲，剩下一件最好的火狐，为他做了一袭狐皮袍子。有一天，大家在谢寿康先生家里吃饭，张道藩先生偶而谈到他的猢猻狻皮大衣，徐先生忽的伸手一翻自己的皮袍，洋洋得意地炫耀着说：“各位看看，兄弟这件皮袍如何？”我听了立刻便回想起当时买这三件皮货的情形，不禁冷冷地说：“你不想想，这件皮袍是怎么来的？”后来谢先生还责备我说：“你这又是何必呢？”

我还看中了一件灰背大衣，价格很低廉，可惜没有钱了。回国后，因为徐先生订购了苏联博物馆的石膏复制雕塑，要汇款到莫斯科去，于是我也附寄了一百多元给吴南如夫人，请她为我买下这件灰背大衣，后来是由戈公振先生替我带回的。另外我还买了一套纯银餐具，每份十二件，一共有一百四十四件之多，雕镂精细，十分名贵。因为苏联禁止出口，我把它们放在书箱的底层，方始逃过了他们的检查。

当时在苏联，除了统治阶级，各行业中大概以工程师最吃香，他们的月薪可以拿到一千多卢布，而一般工人却只有三四百。工人吃一顿饭约需卢布一个半，但我们在大都会旅社，两个人一饭之费总在三十个卢布。平时能到大都会去吃顿饭的，除了外宾和统治者，恐怕只有那些工程师们了。

莫斯科有四百万人口，房屋问题一向严重，所有的房屋全由政府配给，一家人最多只有一两间屋。由于在苏联离婚是轻而易举的事，夫妻双方如果有一

方希望离婚，只要到婚姻注册处去声明一下，注册处便会代为通知对方，某月某日业已离异。可是如果急切配不到房子，两个人只好仍旧住在一起，这也是在苏联才会发生的怪事之一。

展览会正式揭幕，莫斯科颇有一番盛况，苏联对外文化局局长主持揭幕典礼，中国公使馆馆员也都出席。展览地点就在莫斯科博物馆，接连举行了一个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收到了比预期更为理想的效果。

五月一日，苏维埃政府成立十六周年，斯大林在红场阅兵，受检部队和游行群众就在我们楼下的大道通过。整个红场人山人海，有无数的军警在维持秩序，坦克车和机械化部队徐徐地行进，天空掠过各式各样的飞机，检阅和游行进行了整整一天，我们居高临下，拍了很多照片。

到过莫斯科的人，没有不去参观列宁墓的，我们当然也看到了列宁的遗体。列宁的遗体丝毫没有损坏，他平静地躺在一具玻璃棺材中，好像在睡觉一样，手上的毫毛似乎都还清晰可辨。我们简直不能想像他们用的是什么方法，让他的遗体保持得如此完好。后来听到有人说，一共有六位教授专门负责这件工作，他们都是极一时之选的专家。

苏联政府送给我们两座石膏制的名人头像，一座是列宁，一座是托尔斯泰。像呈暗绿色，面貌维妙维肖。据说苏联政府当时每逢有一个重要人物死去，立刻利用本人浇制一套模型，然后大量复制，作为宣传品。徐先生这时又为中大艺术系向莫斯科博物馆接洽，将该馆若干重要的雕刻用石膏翻成复制品，这事后来总算办妥，所有的费用全由中大负担。

官式的参观节目，除了博物馆、列宁墓，又去欣赏俄国人引以自豪的歌剧院。剧场很大，节目也好，可是和欧洲各国的歌剧院情调不同。在欧洲各国，到歌剧院必须穿着礼服，像出席盛大宴会一般的郑重。但是在莫斯科，有穿衬衫的，也有戴



▲ 蒋碧微拍摄的莫斯科歌剧院

鸭舌帽的，把古老的歌剧院，硬生生地在外观上加以平民化，我想，这也只有在苏联才能做得到。

我们又去欣赏苏联的新型话剧，这以后我们更参观了形形色色的俱乐部，仿佛有一种行业便有一间俱乐部。说起来这是在为人民着想，用意良佳，不过是否有粥少僧多之叹，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

倒是孤儿院里的一项设施，颇令我感到有趣。莫斯科气候酷寒，孤儿院怕孩子夜里踢被窝，于是设计了一种寝具，按照孩子的身材，做一个旅行袋似的棉套，晚上把孩子套进去，颈脖用带子束起，这样可以免得孩子们夜里受凉。

在莫斯科，还有一桩颇为有趣的事情，据说俄国人游泳，不论男女，都不穿游泳衣。大概是因为国家太穷，像这种并非生活必需品的东西，没有出产。大使馆的一些男职员经常在谈论这件事，很想到海边去游泳一次，可以看看有没有裸体美女。有一天，一位先生真的去了，可是当他把衣服脱光以后，自己觉得非常不好意思，但他看见一群俄国的少年男女，一个个光着身子正在海边做抛球游戏，毫无所谓，于是慢慢地他也不觉得难为情了，并且还和他们一起玩。回来以后，人家问他看得怎么样？他说：“实在一点也不稀奇。”

徐先生第一次在欧洲的时候，就已知道苏联有一位人像画家，他的人像画得极好。推算他的年龄，当在六十岁以上，由于仰慕已久，很想借此机会拜见他一次，以了多年的心愿。但是当他把这个要求提出来时，官方的招待人员立刻面有难色，推说这位老先生早就退休，不愿接见任何人士。徐先生不理他们这一套，一再坚持要见。终于有一天，我们在对外文化局职员的陪伴之下，到了这位大画家的家里，他们两夫妇殷勤地出来招待，请我们参观他的画室和作品。他家的房屋已旧，然而布置不俗，看起来他的晚景相当凄凉寂寞，因为他的专长是画宗教人物。苏联大革命后废除宗教，实际上他已早被淘汰，更禁止他与外界接触，他精神苦闷。

和这位被淘汰的老画家情形截然相反的，是那些社会主义的新派青年画家。他们的作品似乎不愁没有出路，这个现象是我参观苏联近代画陈列所时发现的。在那个陈列所里，有许多房间堆置着大批的绘画，其后知道是政府为了保障那些画家们的生活，约定每年交画若干幅，由政府收购，付钱，画得好坏一概不论。这些画放在陈列所无处展览，只好任由它们堆在一边。

我们认识了当时苏联的画家葛拉巴先生，他已六十多岁。见我以后他要求为我画一张像，我答应了；于是每天到他家里去，从六月三日到六日，一共画了四天，完成了一幅半身的油画像。我穿着黄格子的洋装，戴宽边帽，围黄狐皮；据说这幅画后来便陈列在莫斯科博物馆。画像完成，葛拉巴先生特地在我的纪念册上，画了一幅素描，取景是他的画室外望。他在画上写着：“为纪念我们从一九三三年六月三日到六日的合作。”

在莫斯科参加过不少茶会、酒会和宴会，有一次我们和吴南如夫妇应邀出席莫洛托夫的酒会，他当时任职苏联外长，太太是英国人，很漂亮，风度也很好。我平素不大讲究穿着，此次旅欧到柏林的时候，为了举行画展和参加宴会，方始做了几件很平常的夜礼服，带到莫斯科居然被苏联的太太们羡慕，总是围着我问欧洲各国的情形。由此可见当时苏俄贫穷之一斑，以及俄国人对于欧洲大陆的文明与繁荣，是如何的倾倒和向往。

中国近代美展在莫斯科展出了一个月，六月底，我们又应邀到列宁格勒去举行展览。列宁格勒旧名圣彼得堡，位于芬兰湾涅瓦河口，是帝俄时代俄国的旧都，由彼得大帝所建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俄帝尼古拉第二因为圣彼得堡是德语，乃将它改为斯拉夫语彼得格勒。三年后俄国大革命，尼古拉第二被囚杀，苏联政府再改名为列宁格勒，相沿至今。

我们的展览会就在旧皇宫里举行，旧皇宫时已改为冬宫博物馆，宏伟壮丽，是欧洲著名的古老建筑。由于列宁格勒地近北极，夏季昼长夜短，六七月间，更是所谓的白夜时期。前后大概有一个半月到两个月，黑夜如同白昼，不过光度稍暗，路上行人，清晰可见，面目则稍嫌模糊，整夜都这样地如在曙后朦胧之中，午夜过后，公园里还有许多游客。就寝前必须先把厚厚的窗帘拉上，否则的话，便会很不习惯，就像白天里睡觉一样。

招待人员告诉我们，每年一到冬季，“白夜”的情形就会反其道而行之。大抵下午三点多钟，天就黑了，早上天亮，则要迟到九十点钟。同时，列宁格勒虽然濒海，但是冬天里港口会结厚冰，寒气凛冽，土地潮湿，对于人体健康，极不适宜，当年迁都莫斯科，也就是为了这层缘故。

我们参观列宁格勒博物馆，徐先生明知苏联政府在大饥馑时期，为了购买粮食，曾经把许多价值连城的名画，偷偷运到外国出售，其中有一幅伦勃朗的

杰作，便已经卖给了美国。于是他故意问这幅画在什么地方，使得陪行人员很窘，他只好摇头说：“不知道。”

七月底，从列宁格勒折返莫斯科，准备启程回国。这一次我们决定通过西伯利亚，取道海参崴而返上海。在莫斯科上了火车，足足走了九天九夜，这算是我们生平最长的一次铁路旅行。

车厢里分隔许多小房间，我们两个人一间房，有一张六七尺长的沙发座位，晚上侍役进来，将靠背往上一拉，就变成了上下铺两张卧床。我们穿越西伯利亚大平原，正值八月初旬，夏日炎炎，因此不曾看到西伯利亚的饶薄荒凉、冰天雪地的景象。不过一路城镇寥落，人烟稀少，火车每抵一站，侍役和膳厅管理人员必将车门紧锁，惟恐当地人会冲上来抢东西吃。而我们从车窗里往外望，可以看见站上聚集着一堆一堆鹄面鸠形、饥饿瘦弱的人，他们一见车到，便跑过来敲着车窗，听说这都是想来买食物的，有时候他们手里还高举着钞票。这般人衣衫褴褛，鹑衣百结，神情模样极为可怜。当时我心里在想，夏季里已经有钱买不到衣服和食物，到了冬天，他们岂不是只有冻死饿死的份吗？

九日九夜后抵达海参崴，这里是西伯利亚铁路的终点，苏俄在东方唯一的军港。市容很整齐，贸易亦盛，不过冬天也有几个月的封冻。我们在一家旅馆住了两天，等候驶向上海的轮船。想到海参崴原来是我国的领土，在清咸丰年间才莫名其妙地割给俄国，中不免愤慨，因此也就不愿出去游逛了。

两天后，乘上一艘日本轮船，这一次徐先生总算买的是头等舱票。一九三四年八月，终于结束了二十余月的第二次欧洲之旅，平安顺利地返抵国门，回到南京。

5

回国以后，各方好友因为我们这一次巡回举行美展，获得相当的成功，欢宴洗尘，竟无虚夕。有一天戴季陶先生请我们吃饭，他在席上忽然问起徐先生：“你有这么理想的一位夫人，为什么要取名悲鸿？”徐先生听了略微一怔，回答说：“我取这个名字，是在认识碧微以前。”后来我请戴先生在我的纪念册上题字，不料他竟工笔为我绘了一幅《松柏长青图》，笔力之遒劲，布局的生动，较诸名家并不逊色，大家都诧异赞赏不置。只是我捧着这幅画，想起我和徐先生的种种切切，在感激这位蔼然长者的诚挚祝福之余，不禁深心怅惘，慨叹不已。

一九三四年秋天，中大艺术系的学生在徐先生率领之下，旅行浙江省境的天目山，从事写生，一行有好几十人，孙韵君也在其内。事前我曾考虑，是不是也跟着去，经过了好几天的内心交战，最后我仍然决定听任他去，试试徐先生是不是还要继续往下疯？

送走了他们，我心里十分悒闷，一个人无法独留家中。于是我带了伯阳、丽丽，回到宜兴，在姊姊家里住了大约一个星期，我择定他们一行回南京的日期，也在那天赶返京寓。

傍晚时分，我带着孩子坐黄包车回家，车抵傅厚岗家门口，正好碰到孙韵君和其他几位同学出来，其他的同学都跟我打招呼，叫声徐师母，唯独孙韵君转过脸去，没有理我。

走进家门，徐先生很高兴地迎我进去。不久，就有同学很气愤地跑来告诉我，说徐先生这趟天目山之游不但闹了笑话，而且还被一位同学偷偷地拍了一

寒石樹兩株
人間便奇
方圓



▲戴季陶赠蒋碧微画

张山间拥吻的照片。

据说：徐先生和孙韵君一路上都很亲密，根本不在乎别人可能会批评议论。吃饭的时候，孙韵君要是来晚了些，徐先生会把好菜给她留起，于是别同学就吃不到或者不够吃。碍于徐先生是老师，大家都敢怒而不敢言。有一位云南籍的同学杨柳，带了一副照相机，经常窥伺他们的行动，偏偏他们某次在僻处拥吻，这位同学躲在暗里，乘他们不觉，拍了一张照片，事后便拿来在同学之间传观。

在天目山回南京的路上，徐先生买了一对鸟，说这是相思鸟，他很喜爱；可是不知怎么在路上死了，他把鸟尸仍带回南京。徐先生一回家听说我去了宜兴，立刻兴冲冲地打电话到学校，叫孙韵君到家里来，孙韵君便约了几位同学一起来到。事后据吕斯百先生告诉我，那一天下午徐先生疯疯癫癫的，哪里像是一位年过四十的人？他简直天真活泼得仿佛是个十六岁的孩子，他在后园里掘了一个土坑，把一对僵死的相思鸟郑重其事地葬下去，说这是相思冢，其他的同学冷眼旁观，窃窃地在私语：“徐先生返老还童了！”

我听了这许多话，不禁感慨系之。想想一十二年来，家里的事情，徐先生都是叫我做，以前他连电话都不会打，如今他为了要跟孙韵君通话，居然也会摇动电话机，要号叫人。

由于同学们的不满，孙韵君在最后一个学期很少到校上课，但她仍然顺利地在中大艺术系毕业。毕业之前，徐先生整天忙碌，先请中华书局帮忙，给孙

韵君印了一本素描画集，到处分送，用意是提高她的声誉和地位，让她得到有力人士的重视。接下来，他便忙着为孙韵君奔走，争取官费，让她出国。当时比利时退回我国的庚子赔款，设有中比庚款管理委员会，可以选派学生出国。中比庚款的负责人有一位比国神父，和中国方面的褚民谊先生，说话都很有分量。徐先生知道谢寿康先生和他们两位都很熟，便去和谢先生商量。事为谢太太所闻，特地跑来告诉我。我听到消息，就正告徐先生说：“你知道我的性格和脾气，任何事情只要预先和我讲明白，一定可以做得通。如果瞒住我，我可非反对不可！”徐先生听后默无一语，以后照旧积极进行如故。

我觉得他毫不理会我的忠告，未免过分，因此我只好采取行动。我便写了一封信给褚民谊先生，向他说明事实，并且把吴老先生的信附给他，以作证明。不久褚先生下帖子请客，徐先生和我都去参加了，席终人散，我正要回家，褚先生特意请我留下，他用很关怀的态度，问我有关这件事情的详细情形。我很平静地加以叙述，最后我问褚先生：是否徐先生在托他为孙韵君谋官费？褚先生很坦白地说：“是的。”不过他紧接着又说：“这件事本来就没有希望。”于是孙韵君后来也就未能成行。



▲1934年，徐悲鸿、蒋碧微、徐伯阳、徐丽丽、谢寿康等在南京玄武湖

一九三六年春天，我回宜兴探视姊姊。两三天后，突然接到一封匿名信，没头没脑，信上只有这么四句话：“你到宜兴，她便来京，其余情形，更毋用论。”

我看了很生气，原想马上赶返南京，但我不甘心为了他们而奔波劳碌。跟姊夫姊姊一商量，便叫寿安打长途电话给徐先生，说我忽生急病，请他即速来宜。寿安是徐先生的胞弟，这时正好也在宜兴，他很为我们的事情着急。第二天晚上，徐先生匆匆地赶来，见我安然无恙，好生奇怪。他皱着眉头问是怎么一回事，我把那封匿名信递给他看，他自然难以置辩，又是不声不响。

相隔不久，据说回到安庆的孙韵君，同样也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孙韵君恼羞成怒，写信告诉徐先生说：暑假以后她要出去自力奋斗了，字里行间颇有从此诀别的意味。徐先生怒气冲冲地把信拿回家里，也不顾当时还有留法老友孙佩苍先生在座，将信放在桌上，伸手连连地猛拍着信，大声咆哮地说：

“看！看！人家伟大不伟大！”

我拿过信来一看，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朋友之前，我原想容忍，但是徐先生意犹未尽，硬指孙韵君接到的匿名信是我写的；我无法声辩，只好冷冷地问他：“那么我收到的匿名信又是谁写的呢？”于是他哑口无言。

孙韵君既然决心要出去奋斗，徐先生便积极筹备开画展，说是要为孙女士筹措奋斗费用。也就从那时起，他又离开了家。谢寿康、刘大悲两位老朋友曾到处找他，才知道他在沈宜甲先生的寓所，每天到中大去埋头作画，准备举行展览会。

以前，徐先生从来没有卖过画，也不曾在国内举行过画展。这一回，他算是一改自己的作风，为了卖画，不惜奔走权贵豪富之门。展览会半公开地举行，据说卖出了若干幅画，得到了几千元的现款，但这些钱是否寄给了孙韵君，我一点也不知道，至于孙女士究竟到什么地方去奋斗，当然我更不知道。只晓得，不久，徐先生便翩然远去广西了。

提起他这一趟广西行，必须介入宜兴同乡徐子明先生。子明先生是德国留学生，徐先生在谢寿康先生主持中大文学院时，把他介绍到中大史学系担任教授，所以他也住在南京。一九三六年时山东来了一位王神仙，会圆光，会算卦，据说非常灵验，徐子明先生把他请到家里，待为上宾。一些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大学教授，居然都很相信他。曾有一天，徐先生要带儿子伯阳去看圆光。所谓“圆光”就是一种卜术，圆光者对着白纸、白布或镜子，嘴里念念有词，然后叫小孩子去看，等他说出他所看到的形象，圆光者再据以解释吉凶，甚至是治病。

我坚决反对徐先生带伯阳去，我带点激动地向他说：

“孩子是我们共有的，我对孩子也有一半的主权。我不愿意他这么小就接触这种荒诞不经的迷信，这将会对他产生很不好的影响。”

徐先生听了，只好作罢，但是他自己还是去请王神仙为他圆一次光，解决疑难，问的是我和孙韵君前生有什么恩怨？后来朋友告诉我，当时王神仙说：“徐太太前生是个女人，孙韵君是个男的，因为前世里徐太太被孙韵君遗弃，所以今生她为了报复，才这么样地恨孙韵君。”我听了这话，心想真是奇怪，我从来就没有找过孙韵君的麻烦，当前的问题是孙韵君和我的丈夫谈恋爱，照道理他这番话应该反过来说才对。不过我想可能是徐先生告诉王神仙，说他和孙韵君并没有男女间的感情，他只是觉得孙韵君有才华，很想加以培植，他想不通为什么我会这样恨她。王神仙是个走江湖的，事实上他也不晓得我们之间所发生的问题，他只是抓住徐先生的心理，信口胡诌罢了。王神仙还说，南京马上有血光之灾，全城将被夷为平地。这一来吓得教授先生们心慌意乱，立刻准备遵从王神仙的指点，远走西南，避过这一场刀兵灾祸。徐子明先生率先辞去中大教职，带了全家大小搬到西南边陲的云南昆明，后来他就在云南大学教书；徐先生这时也已决定逃难，目的地是广西。

当时他一直住在沈宜甲先生那边，我们已有好久没有见面了。一天，他忽然派一个学生到家里来，指明要拿走他所有的东西；我没有话好说，只是帮着那位学生，把徐先生的东西整理好，交给他带去。

第二次赴德国举行画展时所结交的那位居停主人李田丹夫妇，这时候也已到了中国。他们的寓所离我们很近，因此两家人时相往还，和我们有非常真挚亲密的友谊。他们二位见我们的感情纠纷闹到这种地步，深心极感惋惜。如今听说徐先生要独自一人去避难，李太太便亲自跑到中大去找徐先生。她说徐先生不该这么说走就走，无论如何，她要徐先生在动身之前和我见一次面，两个人好好地谈谈。徐先生说：“可以。”因此李太太再来看我，说明他们两夫妇的安排。我向她道了谢，并且声明说：“离开家庭的是他，我自己从来就没有想要躲避他。”于是由李丹田先生邀约，在徐先生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八点钟，我们在李家见面。当晚我准时抵达，徐先生已经先在。李先生把我接进去以后，两夫妇便到后面去了，让我们两个人在客厅里谈话。



▲湖畔（徐悲鸿，1935年）

时钟滴答，李家大厅里一片静寂，徐先生和我，保持了一段短暂时间的缄默。

后来还是我先开口问他：

“听说——你要到广西去了？”

“是的。”

“要去多久呢？”

“不知道，”接着他又补充一句：“不过，我买的是来回船票。”

于是我便继续说：

“对于你的所作所为，我自己没有什么意见。不过，有许多非常爱护你的朋友，他们所说的话，我不能不转告给你听，也许可以作为你的参考。譬如，章警秋说：你现在应该以退为进，因为你今天的地位已经相当的高，你实在不需要再这么沽名钓誉，到处奔波。再有，华林也曾感慨地说过：你是一位艺术家，最好是不要卷入政治漩涡。”

歇了一会，我又向他严正表明我自己的态度：

“至于你我这样分开，本来是你所要的，我也觉得很好。你知道我的性格，在一起的时候，我对你的作为实在不能忍受；分开了，我可以眼不见为净。我有两个孩子，我绝不放弃家庭，同时我也不会再嫁。假如有一天你跟别人断绝了，不论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随时都准备欢迎你。但是有一点我必须事先说明，万一别人死了，或是嫁了人，等你落空之后再想回家，那我可绝对不能接受。这是我的原则，而且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他又默然，低头沉思了一会，方才带点感伤地说：

“我知道，能够娶到你这么一位太太，我应该满足，但是你未免遇事过于挑剔，使我无法应付。”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心里一声苦笑，决定不再多说，静候他对于家庭的处理，以及对我和两个孩子未来的生活，有什么嘱咐或安排？等了许久，他绝口不提，我也只好忍住不问。当时我便起身走到后屋，将两位异国朋友请了出来，道谢告辞。门外月明星稀，四野寂寂，徐先生送我穿过马路回家，到了大门口，两人握了握手，道声再见，我转身走进家门。

吕斯百先生当时已任中大教授，那晚他特地来带伯阳和丽丽出去看电影，以便我抽身出去和徐先生会面。

我方才到家，吕先生也带着两个孩子回来了。他们争着告诉我说，刚在路上碰到了爸爸，爸爸还跟他们打了招呼。我强笑着叫同弟带他们去睡觉，吕先生没有问我谈话的结果，只叙说方才遇见徐先生的一幕。

他带着孩子看完了电影，坐黄包车回傅厚岗，走到中央路，距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忽然看见徐先生肩背佝偻，凄凉落寞地在街头踽踽独行，他突然觉得徐先生已经呈现出龙钟的老态，仿佛他的双肩上正承担着重大的负荷。孩子们

见到了他，高声地嚷喊爸爸，于是徐先生从沉思中惊醒，茫然地驻足眺望，他看到了孩子，心不在焉地打个招呼，又继续向前走去，渐渐地没入黑暗之中。

第二天我亲自带着孩子到下关车站，为徐先生送行，祝福他一路顺风。车行之前，我们很少交谈。我以为这是我很理智的举措，徐先生要作远行，我和孩子当然要恭送如仪。后来听说徐先生到广西以后春风得意，颇获当时广西军政领袖的推重与礼遇，徐先生的感情一向容易冲动，过分的礼遇和推重，使他觉得颇为荣幸，而有图报知己之感。于是他精心绘制了巨幅油画，题名《广西三杰》，画中是当时八桂风云人物，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三位先生，策马扬鞭，齐辔并驰。

到了那年六月，广西军政当局，由于抗日问题而与中央意见不合，湘桂、粤桂边境重兵集结，形势十分紧张，六月七日桂军入湘，我在南京得到消息，心里非常着急，我想万一酿成事件，徐先生也许永远不能再回南京。我不愿意为了家庭纠纷，影响到他的前途，几经考虑，毅然决然地准备亲到广西，尽我之力，劝他回来。

朋友听说我要在这个时候到广西去，大为惊异，许多人跑来劝阻，说是当前情势这样紧张混乱，我以一介女流，怎能冒险犯难地深入危境？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后果将不堪想像。但是我志已决，我说：“为我的良心着想，我应该冒这一次险。徐先生肯不肯回来是他的事，我但求自己心安。”朋友们又说：“现在许多广西要人的太太都在往香港跑，你反而往那里闯，这是何苦呢？”我听了只好笑笑。

于是我不顾一切地买好船票，于八月中，由上海乘船到香港，在香港得到中华书局经理郑子政先生许多照料。接着乘广九路火车抵达广州，又蒙子政先生的令弟郑子展先生热心招待，他替我买好了去三水的车票，一路把我送到三水，再从三水坐轮船到梧州。

那时候西省政府设在南宁，从梧州到南宁只有小火轮可乘。这种轮船专门载客，只有一节舱房，两边各架上下铺六张，中间是一只长餐桌，船梢有厨房厕所和船家的住处，因此船上最多载客十二位。我一上船，发现全船都是男客，只有我一个女人。

这一段航程，足足要走三天。当时正是南国燠热难耐的天气，三天里我既

不能沐浴，又无法更衣，狼狈困窘可想。住在我上铺的那位先生，有一双黑茸茸的毛腿，清早醒来，一眼望见两条毛腿高高悬在上铺床沿，总使我觉得厌恶万分，浑身都不自在。

十一位男士都很年轻，他们大概是到南宁去出席抗日会议的，思想相当偏激，一开口便是讽评诋毁，措词激烈。因此我抱定决心一语不发，这批人常想和我搭讪攀谈，我佯装不解；可是这样一来，反而引起他们的猜疑，谁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渐渐的，他们自动收敛可晒的狂态，出语也比较谨慎小心，我呢，正好少生闷气。

三天后船抵南宁，徐先生和广西省政府总务处长孙仁霖先生在码头迎接。我这才知道，早在我离开梧州的时候，那里的中华书局便已经打电报通知徐先生，并且告诉他我何时可以抵达。

孙仁霖先生是当时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先生的亲信，为人精明能干，慷慨热情，他和徐先生把我接到他的府上，用过点心。徐先生说他自己住在省政府里，于是他陪我到省政府参观，我们到处走走，虚应一番故事；他又介绍我认识了几位厅处长，然后徐先生带我到他的房间，关上房门。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人，以及一股看不见的僵凝气氛，我们开始了以下的一段对话：

“你知道我的来意吗？”

“不知道。”他直率地回答。

“我来，是想接你回去的。”

“在目前这种局势下，”他脸上有无可奈何的表情：“我怎么能够回去呢？我一走，岂不成了 Lache！”

他说了一个法文字：“Lache”，这个字翻成中文有“负义”之意。他这么一说，我立刻便能了解他的心境。是的，李、白、黄三位先生，当时军书旁午，政务繁忙，他们能谦恭下士，将徐先生奉为上宾，这一份情谊诚然可贵。我一向很赞成做人应以道义为重，徐先生会有这样的表示，使我觉得欣喜，因此就绝口不提他回京的话。

当晚，正值广西当局召集的“抗日会议”揭幕前夕，各地代表均已抵达南宁，李、白、黄三位先生大开盛筵，以资招待。就在省府大礼堂，摆了一二十张酒席，风云际会，群贤毕至。记忆中的当时名人有蔡廷锴、蒋光鼐诸将

军，我和徐先生被安排在第二席，是黄旭初主席做主人。席间，许多人站起来慷慨陈词，主张立即展开抗日行动，我默默地听他们放言高论。

当晚，回到孙家，孙家早已为我准备住处。大家谈谈说说，时间晚了，徐先生也在孙家住下。

在南宁无所事事，闲住了五六天，所见所闻，无非是批评中央政府及其决策人，使我感到万分厌烦。徐先生暂时不愿回京，我任务已毕，便亟想回家，向孙先生一提，他很殷勤地挽留，而且说：

“古语说得好：‘桂林山水甲天下’，你不远千里而来，怎可以不到桂林就走？这样吧，我给你安排一次桂林游，游过了桂林，你再走不迟。”我知道南宁去桂林尚远，向他道谢，并且推辞，孰料孙先生说什么也不肯。第二天一早，便派好一部汽车，指定一位科长随行，沿途照料招待，就这样，我和徐先生匆匆地作桂北行。

先到柳州，柳州是广西工业重镇，离城不远，有一处特设的工业城，绿色的柳江，将柳州南北一剖为二。木制吊桥，无法通行车辆，柳州公园里有李宗元先生的坟墓，园里花木扶疏，风景宜人。

桂林附近的名胜古迹，我们曾一一登临。广西风光和华北、江南迥异其趣，岩石盈野，有山无脉，许多玲珑剔透的奇峰，大都拔地而起，直矗云天，树少，草多。广西省粮产不丰，和土地的饶薄贫瘠，实在大有关系。

我们登独秀峰，俯瞰峰下，桂林市街衢房屋，尽收眼底。又去探七星岩，一尝闻名远近的马肉米粉。车子方便，再驶阳朔。徐先生说：人称“阳朔风景甲桂林”，李宗仁先生送给他一幢房子，就在阳朔镇上。

阳朔市面很小，仅一街数巷，但是山光水色，果胜桂林几分，而且清幽雅秀，令人生出世之想。李宗仁先生送给徐先生的房子，不在山隈，不在水涯，竟座落在市街之中，四周围墙甚高，是中国旧式建筑，有五六个房间，全部空着。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在这种大有静趣的地方，似乎应该住在风景地区，使人时时亲炙自然，陶冶性情，住这种街屋，似乎没有多大意思。可是此事与我无关，所以我也不曾将内心的感觉说出口来。

归途中，再次路过柳州，徐先生不知怎么心血来潮，忽然叫我就此回去。我闻言非常气愤，当时黔桂铁路还没有修筑，柳州对外飞机不通，在这种人地

生疏的地方，叫我一个人如何走法？回想过去，每次和他旅行，总是吃尽苦头，他就从来不曾想到一个女人在生活方面，有异于男人的苦处，以及一个做丈夫的对妻子应有的体贴。于是我直率地拒绝，仍照原定计划，回南宁后再动身。

离开南宁才只几天，汽车进城，我立刻发现南宁的气氛大大地变了。

原来广西当局和南京方面的歧见业已消除，李宗仁先生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先生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漫天风云一扫而空，南宁街头又出现了拥护中央的标语。

回南宁后，我立刻请孙仁霖先生代我买船票，预备仍循原路回南京，孙先生却说：

“你买什么船票呢？明天李总司令他们就职，你可以参观典礼，而且广州还要派容克机来接李总司令。你就搭乘他们的飞机去好了。”

说罢他便去为我安排，回来时兴冲冲地告诉我：

“好了，我已经跟两位主席说好了，请你明天搭飞机。”当时我有点诧异，广西省主席是黄旭初先



▲母食我黍（徐悲鸿，1935年）

生，怎么会有两位主席？于是孙先生告诉我，原来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先生也到了南宁。黄绍竑先生是广西人，大概他是为了宣达意旨而来的。

翌日清晨南宁处处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李宗仁、白崇禧两位先生就任典礼便在当天上午举行，出席参加典礼的人很多，我也是其中之一。他们一一轮流地演说，听众兴奋热烈地欢呼，长串庆祝鞭炮从高楼直垂地面，声响直入云霄。

就职典礼告成，李宗仁先生等立即启程，我乘车抵达机场，果然看到了一架容克机和两架单引擎的飞机，可是人多机少，连他们的随员都挤不下。我正踌躇，孙先生来说：明天飞机还要来接第二批人，他请我多留一天，明天再走。

将行李搬回住处，随即接到一张请帖，是一位夏将军宴客，因为那天他新娶了一位姨太太。我跟徐先生一同去参加宴会，到了夏府，只见筵开两桌，在座的有白崇禧夫妇、李品仙夫妇和许多厅长、师长什么的。因为这是私宴，谈话比较轻松，宾主间十分欢洽，我也不免谈笑风生。有人问我关于男女之间的意见，我曾带点讥讽口吻地说：女人应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徐先生闻言勃然变色，他沉着脸说：

“我不是鸡，也不是狗，我就不要谁来随我！”

大家都知道我们夫妇间的纠纷，所以就佯装没有听见。

第二天早晨，总司令部派人送来一千块钱，说是李、白二位先生送我的程仪。我颇感诧异，因为我是昨天就要走的，怎么程仪会在今日送来。同时我的个性一向来去分明，无功不受禄，于是我婉言地谢绝，再三声明我不能收。

但是送钱的那位先生比我更为坚决，他说白先生关照过的，这笔钱是李、白二位一点点小意思，要我给孩子们买点东西。他把一千块钱丢下来就走了，我只好请徐先生陪我到白先生的公馆去，当面璧还，可是白先生坚持要我收下，无论怎么说他都不许我还回，我拿了这笔钱心里一直感觉到困扰与不安。

下午，广州方面的飞机来了，徐先生他们送我到机场，这次果然顺利成行。临别的时候我们又是无话可说，我坐进机舱，两眼注视前方引擎发动，开始了我生平第一次的空中旅行。

我所搭乘的是单引擎机，半截机舱突出在机身外面，飞机上只有两排座

位，除了驾驶员就只能坐三个人。我坐在飞机上眼望着那只转动中的单引擎发怔，心想这只引擎一坏，倒也是此生一大快事！

越八桂，飞百粤，河流纵横，平畴沃野，回想来时的旅途艰辛，如今几小时的工夫就可以航毕全程。正在遐思，广州到了。

九月，回到南京，重新安排家里的生活，抚育两个孩子。几年前我曾请求朱骝先、张道藩两位先生为我介绍工作，但因为我们的夫妇不和，在未得徐先生同意之前，他们不便为我谋事，唯恐影响我俩之间的和好。现在徐先生已经离家，而我的经济情况也不佳，所以张先生便介绍我到中法友谊会去担任干事。

中法友谊会，系由早期留法人士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诸先生所组成，旨在通过国民外交方式，增进中法友谊，并沟通两国文化之交流，会址设在新住宅区。我担任该会干事以来，每天按时上班，当时有许多外国太太组织了一个联谊茶会，一星期聚会一次，每次由会员二人轮流作东。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不能不参加，聚会以闲谈为主。这些嫁了中国人，具有双重国籍的洋太太们，常常出语讽刺，批评中国，使我听了十分愤慨。有一次，时任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的法籍太太到南京来参加这个茶会的时候，听到了那些无聊



▲风雨思君子
(徐悲鸿，1935年)

的话，她使用国语向我说：

“我真不懂，她们为什么偏要说这些？”

到了一九三七年春天，一日，谢寿康太太打电话通知我，她说刚接到徐先生一个电报，说他明天到南京。我听了非常诧异：怎么他会忽然倦鸟思还？我问谢太太电报是从哪里打来的？谢太太答说是怀宁，她还问我怀宁在哪里？我告诉她，怀宁就是安庆。

安庆，是孙家所住的地方，于是我了然而心。

我打电话请教谢寿康先生，我说悲鸿明天回来，我要不要去接？谢先生一向希望我们重归于好，他坚决主张我去接他，我应允了。

那一天到码头去迎接的人很多，我带着伯阳、丽丽一双小儿女，孩子和父亲离别很久了，他们的脸上显出非常兴奋快乐的神情。

在徐先生到南京的前夕，我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因为徐先生不曾向我表示意向之前，我只好将他当作一位客人接待。我让出了自己的寝室，睡到外面的房间，他所带来的东西，我叫佣人统统搁在画室里。他的衣服，洗熨完毕仍旧放回他的衣箱。

这次，他只住了两个星期，便又要回广西；不过，他将先去上海。住在上海的父亲母亲，听说徐先生回来了，都很高兴，尤其希望我们全家都同到上海去。我因为过去十几年跟徐先生风尘仆仆，到处流浪，吃尽了苦头，如今心有余悸，不想再和他一起旅行。不过想起父母一定很希望见到两个外孙，时值暑假，伯阳和丽丽闲在家里没事，因此和徐先生商议，是否可以请他带两个孩子同行。我知道徐先生最怕麻烦，特地强调，我将派刘妈随行沿途照料，到上海后，一定有人在北站迎接，所以认真说来，只有车上那几个钟头他和孩子在一起，一切不劳他操心。徐先生当时就很爽快地答应了，他说由他派人去买票。

上车的时候，有许多徐先生的学生，陪着我们，送到车站月台。直到上车，我方才晓得徐先生买的四张火车票，其中只自己的一张是二等，孩子和佣人，座位都是三等。起先我不在意，找到了徐先生的车厢，大家把他送上车去，然后我一手牵着一个孩子，刘妈在身后紧紧相随，从徐先生的二等车厢走起，越来越长，越走越远，走了差不多三四节车厢，才找到三等的座位。我安顿刘妈带伯阳、丽丽坐在一个卡座上，望望两个孩子，我不但为他们抱屈，而

且非常生气。等了一会，吴作人先生匆匆地跑来，传达徐先生的话，叫刘妈带两个孩子再去前面，说是二等车厕所旁边有佣人坐的位置，可以让他们坐在那儿；我当时就说不必，然而吴先生坚持，又带着我们一节节车厢往回走。这时我已无法遏止内心的忿怒，所以当吴先生说要为我们全家拍一张照片时，我便愤愤地掉头不顾而去。

我懂得徐先生的心理，他以为小孩子不必坐二等，同时也可以节省三元七毛五分钱一张的票价差额。但是我的想法不同，我并不是要孩子坐二等，要是果真心照料他们，他又何妨也坐三等？而且可以再省个三元七毛五。

这许多莫名其妙的事，没有人可以理解，而徐先生却是一桩一桩地去做。仿佛冥冥中有魔鬼支使他，一直要做到我们的感情全部破裂为止。

徐先生这次入桂是住在桂林，因为广西省政府已经北迁。去后不久，他的学生，当时和他同在桂林的张安治先生写信给我，详细叙述了徐先生的一桩轶事：因为那时候广西北部发生灾馑，每天有大批的难民涌向桂林。有一天，一群难民跑到省政府请求救济，徐先生看中了其中一个女难民，他说她身段好，可以充任他私人的模特儿。省政府的官员们答说这事容易，马上把女郎的父母找来，跟他们一说，孰料女郎的父母以为奇货可居，提出条件要一笔钱，徐先生一听要钱立刻表示放弃。过了几天，那一对难民夫妇自动地把女孩子又送来了，大概他们想想与其跟在一起饿死，还不如让自己的女儿找条生路。

张安治先生不但详细描述，而且还寄来了那个女郎的照片，我看过之后唯有一笑置之，顺手把信和照片搁在一边。因为我早已失却管他闲事的心情了。

七月七日，霹雳一声，抗战爆发，漫天烽火弥漫了全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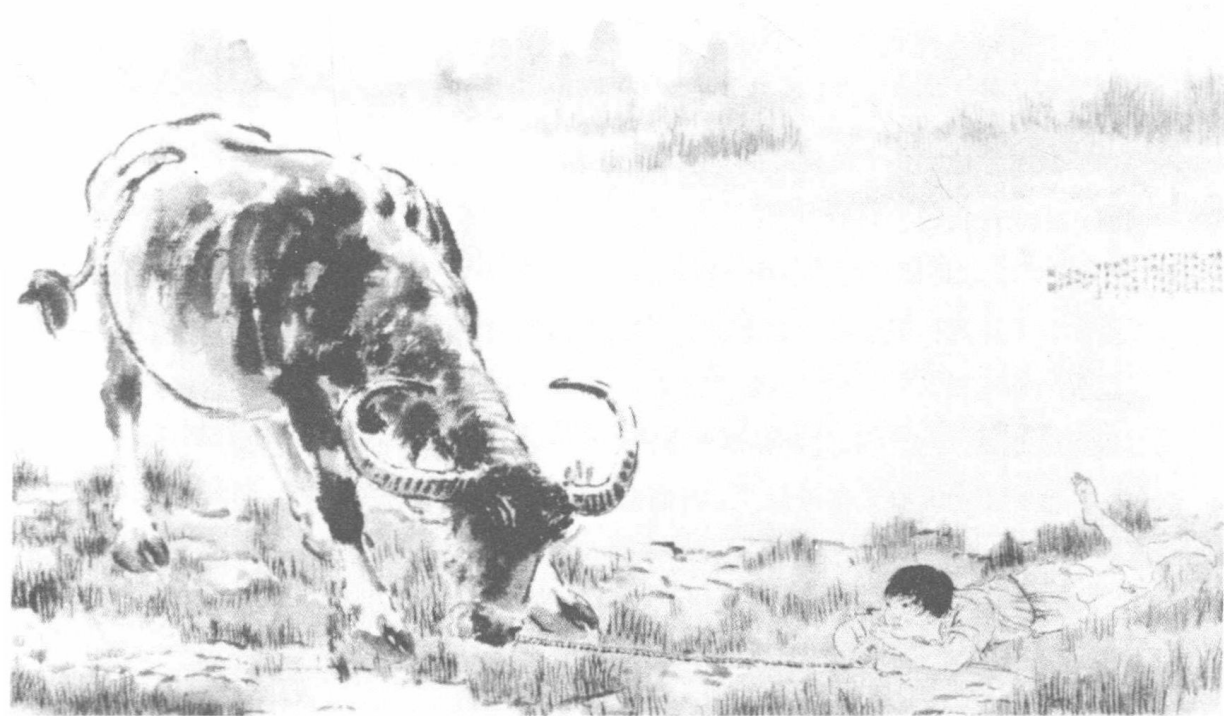
6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军阀在河北宛平芦沟桥燃起烽火，全国军民奋起抗战。战事迅速蔓延，八月三日，敌军在上海登陆，接着便以台湾和航空母舰为根据地，出动飞机，滥施轰炸。南京从八月十四日开始，每天都有空袭警报，只要凄厉的汽笛一响，人人便惊悸慌乱，四散奔逃。居家的人们会在桌子上堆起几条棉被，人就钻在桌子底下，以避炸弹。像这样的防空设备，现在想来，实在有点滑稽可笑。不过当时在南京，却也教人无法可想。我有两个侄儿，因为读书近便的关系，都住在我家。有一天敌机来袭，炸弹落在附近，将窗台上两盒棋子震翻，洒落在玻璃桌上，乒乓哗啦，声响吓人。他们以为房子中弹，吓得仆倒在地，把草地毯拖来盖住头部。于是我想轰炸如此厉害，孩子们的安全要紧，因此就把他们连同伯阳、丽丽一齐送回宜兴。这时谢寿康先生已经把太太和儿子送到上海岳母家去了，他一个人便搬到我家来住，还有徐先生的学生顾了然。他本在中大担任助教，因学校停顿，无处可去，所以也住到我家来。隔壁的郭有守先生则已把太太儿女送回他的原籍四川，所以也成了光杆，白天总在我家逗留。这时郭先生便叫了几个工人来，在我家的园子里挖了一个防空壕，虽然简陋，但我们总算有了避难的地方。

偏偏在这种时候，我又生起病来，接连几天发高烧不退，谢寿康先生怕生意外，便打电话告诉张道藩先生，张先生立刻亲自跑来，把我送进南京最有名的德国医院，医院住了几天，总算把病治好了，回到家里，身体还很软弱，整天躺在床上，很少下楼。

一夜，月白星稀，万籁俱寂，我深宵未成眠，大概在十一点多钟的时候，

忽然听见门铃大响，我怕惊扰了谢先生他们，又不愿叫醒睡了的佣人，于是我就起来，走到楼前的阳台上，先问一声是谁？听到外面短促的回答说：“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徐先生，心里十分纳闷：他怎么会在这时候突然回来了呢？于是我急忙跑下楼去，打开大门，只见徐先生手拎皮箱，一语不发，直往屋子里走。我赶紧把大门关好，跟在他的后面。睡在饭厅里的谢先生已经听到了响声，赶出来看，正好和徐先生劈面相逢，两个人便一道走进了饭厅。我随后跟进去，听见徐先生开口便谈国事，对于广西当局的坚决抗日赞不绝口，我觉得听不入耳，转身就上楼去，用最快的动作，把寝室里我的卧具抱到后间，铺在我起居室的这张小榻上；然后另外取了被褥替徐先生铺好了床，我便自顾自地关门睡觉。



▲村歌（徐悲鸿，1936年）

不一会儿，我听到徐先生登楼的脚步声，推开房门，走了进去，不声不响地睡了。我猜想他见我不在，大概心领神会，懂得我的意思了。第二天一早就他出门，谢先生这下有话说了，他洋洋得意地向我说：

“你看，悲鸿还是很关心你吧，他一知道你生病，马上就千里迢迢地赶

回来!”

我诧异地问：“他怎么会知道我病的?”

谢先生这才透露，他曾经把我的病况写信告诉徐先生，因此他以为徐先生一定是接到信就回来了。可是，后来事实证明，徐先生根本就没有收到那封信，因为就在那一天，当谢先生问我身体好些没有时，徐先生在一旁听了，满脸都是错愕的表情，好像听到了什么新闻似的。

在他回来的第三天，我正躺在榻上休息，忽然他气势汹汹地打开我的房门，板着脸向我说：

“我有话要跟你讲!”

我连忙坐起，望着他说：

“你有什么话请讲好了，我洗耳恭听!”

徐先生怒气冲冲，没头没脑地说了这么两句话：

“你没有尽到做太太的义务，所以，我对你也没有责任!”

我对于他那种无故挑衅的态度早已不满，如今听他这么一说，当然十分生气，于是我正色地向他声明：

“你说这种话，可能事先不经过考虑，因为事实胜于雄辩，放弃家庭的是你，不是我！至于谈什么责任与义务的问题，我要说一句难听的话，除了我没有陪你睡觉以外，我觉得我并没有任何失责之处。”我顿了一顿，然后，直接点破他说：“至于有关那种事，你在广西不是还有自备的模特儿吗?”

他听了，大概无话可说，一时恼羞成怒，伸手指着我大骂：

“你混蛋!”

谢寿康先生这时就在楼下，听到了我们争执的声音，他急忙跑上来，把徐先生拖下楼去。

快到中秋节了，日本人扬言要对南京实施全面轰炸，消息传出，人心惶惶。当天下午，张道藩先生来电话，邀这边天狗会的老朋友，一齐搬到他上海路的住宅去住，因为他家有很坚固的地下室，起先是做厨房下房用的，自从南京开始大轰炸，正好腾出来躲避空袭，陈立夫先生为了方便就住在他家。当时张太太和陈太太都迁到庐山去了。

谢先生、郭先生和徐先生都已答应去张家，只有我一个人表示异议，这倒

并不是我矫情，因为我一向最不喜欢打扰别人，住在人家家里，我总是嫌不习惯，这也是我和徐先生完全相反的一点。不过经过谢先生的再三劝促，使我觉得无法再坚持下去，免得由于我一个人妨碍了大家，无可奈何，我只好说：“去就去吧。”

张先生派车来接，到了他家，他非常高兴，把我们迎进家里，兴冲冲地为我们分配住处，他把自己楼上的卧室收拾出来，让给我们两夫妇，自己住到地下室去，谢、郭两位睡在饭厅里，内政部长陶履谦先生也住楼上，他的房间就在我们的对面。

住不多久，到了阳历九月下旬，徐先生说他要回桂林，在此以前，他对我和两个孩子的问题，始终不曾和我讨论过，他既不提，我也不问，在朋友面前，我只好说不论将来战事演变到什么程度，我决定留在南京不走。

我所以作这样的说法，实在是有我不得已的苦衷。我和徐先生结缡二十年，生活过得一直很苦，日本、北京和巴黎的困窘不谈，回国以后徐先生的名气虽然越来越大，但是他从来没有卖过一幅画，倒是他收购金石书画的支出，反在逐渐地增加。他每个月将薪水交给我，我却要匀出一大部分去支付他收买艺术品或是裱画的费用。因此回国那么些年，我们不但没有储蓄，甚至经常捉襟见肘。他弃家不顾跑到广西，一年多里仅只断断续续地寄了少数几笔钱回来，迫不得已，我才抛下孩子出去工作，以微薄的薪水贴补家用。没想到战事突然爆发，京沪情势危殆，我固然也想往大后方避难，只是徐先生无一点表示，我又怎么敢走呢？

我一生了无长处，只有祖宗遗传给我的一身傲骨。我虽然内心焦急彷徨，对于目前的情势，不知道怎样应付才好，但是我决不愿意向任何人求援或者乞怜。当时我一口咬定不离开南京，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打算：万一战事失利，南京不守，无法生存下去，那我只有一死而已！

可是，有一天，谢寿康先生向我透露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肯到四川去，岂不是有意跟悲鸿为难？”他这一句话使我恍然大悟，原来要我离京入川还是徐先生的意思，他所以透过朋友来劝我，可能是因为最近我们闹得太僵的缘故。

既然如此，我便直接去跟徐先生办交涉，我开门见山地问他：

“如果我带着孩子到重庆去，你一个月准备给我们多少生活费？”

徐先生的回答，仍还是模棱两可，并且拖了一个尾巴，他说：

“以后我能够拿到十足的薪水，我就给你们一半。”

好吧，我就姑且根据他的话而做打算，他能拿到十足薪水，那是每个月三百元，给我们一百五十元，也许可以在重庆活得下去了。

同一天的中午，谢先生他们又来劝我，我毅然决然地告诉两位关切备至的老朋友说：

“我虽然知道此行的艰辛困难，但是朋友们劝我的话，我总愿意听的，现在我答应你们，把家搬到四川去。”

然后徐先生心安理得地先动身回桂林，行前他给了我五十元作旅费。徐先生是九月二十七日动身的，他一走，我就派人回宜兴，把伯阳、丽丽接回南京来。张先生为我们订购船票，我呢，白天回傅厚岗收拾行李，晚间仍回张家住。

十月六日，离别了我们傅厚岗的家，驱车下关码头，登上了江靖轮。由于疏散的人多，船只太少，溯江西行的船票很难购得，张先生费了很大的事，也只买到去汉口的票。我带着两个孩子，以及坤生、同弟，还有顾了然先生和我们同行，路上彼此可以照料；这时谢寿康先生已到上海去了，张道藩、郭有守两位先生送我们上船，张先生还带了照相机，为我们拍了不少照片。

张先生是一位很重感情的朋友，我们在柏林相遇，巴黎聚首，以至于同时住在南京，平素交往密切，一旦远离，不免依依。尤其是当时战局紧张，国脉如丝，他的心情自然是十分沉重，而且看到我独自一人拖儿带女远走西南，和徐先生又闹到这种地步，将来还不知怎样结果，因此他那天的神情显得特别愁虑忧悒。

大家正在谈天拍照，忽然间警报汽笛之声大作，船上乘客登时惊惶失措，乱成一团。船长当机立断，下令开船。混乱之中，郭有守先生机警，抢先跑下船去，张先生迟了一步，竟被留在船上，我们一想这下如何是好？于是顾了然先生连忙去找到船长，告诉他内政部张次长送客上船，方才因为轮船紧急起锚开行，一时未能登岸。

船长一听，知道这事必须立刻设法，然而空袭时间又不能冒险将船开回下



▲风雨鸡鸣（徐悲鸿，1937年）

关，于是他下令减速，从船上放下一只舢板，请张先生上去，再派两名水手叫他们划向江岸。我们凭着栏杆看他坐在小小的舢板上，在辽阔的江面上忽上忽下，渐渐地划向一望无际的芦苇丛中，担心着他的安全，但又无能为力。到了汉口，才获知他那天在芦苇丛里躲过了空袭，舢板才又开回下关，这时郭有守先生还坐在张先生的汽车里等待，两个人才一同乘车回家。

九号，我们到了汉口，立刻便去打听到重庆的船期，据说最快也得在一星期以后才有船西行，我们只好在璇宫饭店辟室住下。当时张溥泉先生的夫人崔震华女士和她的两位小姐张瑛、张玲都在汉口，我们常到她们家去玩，相约着一道逛逛公园，看看电影，伯阳和丽丽还在汉口公园拍了很多的照片。

到了十七号，才算登上民权轮直驶重庆，越沙市，过宜昌，山光水色倏然一变，航经巫峡正值细雨蒙蒙，犬牙交错的巫山十二峰若隐若现，苍茫云霭，益发增添旅人的愁思。

重庆山城在望，房屋层层叠叠，三巴旧治，气象恢宏。船靠码头，一眼便看见徐仲年、张直夫、吴作人三位先生，他们很高兴地站在趸船上向我们招手。我们一行六人依次下船，徐仲年先生为我们雇车，先到郭有守太太的住处。

郭有守先生是四川人，所以他在抗战初起时便请郭太太带着儿女先回四川。郭太太在渝简马路的“光第”租了五间房子。“光第”是一幢西式住宅，业主是重庆名绅刘家。

郭太太租的房子在楼上，房外都是宽阔的走廊。他们除了自住的两间以外，还分租了一间给张直夫先生。我和郭太太见了面，承她热烈的接待。后来我问明白还有两间空着，于是我就请郭太太把它们转租给我。中枢播迁重庆以后，国民政府便设在光第附近，而渝简马路也就改称为“国府路”。

第二天，我便请郭太太陪着，去买了一些应用的家具，总算是在重庆安下了一个家。最初一段时期，“光第”楼上的三家，郭家、张家和我们，为了方便起见，合在一起开伙，就由我带去的佣人坤生、同弟负责炊事。但是一个月后我们的伙食团又宣告解散，原因是各人口味不同，尤其是张太太和她的母亲常年茹素，天长日久，大家都感到不便。

第一件要事便替伯阳、丽丽找学校，我向郭太太一打听，她说巴蜀小学离我

家不远，那儿的师资和环境都不错。但是我刚到学校去一问，才知道三年级还可设法，五年级则已有七十人，再无容纳可能，因想两个人分校，又多不便，所以也没有为丽丽报名，后来便把他们送进了川东小学，一年后又转入巴蜀小学。

那一天办完了孩子们入学的手续，我突然想到青年会去看几位朋友，因为当时中央大学已经西迁重庆，中大的教授先生们多半住在青年会，譬如宗白华、张书旗、徐仲年和胡小石先生等，我们一向都是很相熟的。

乘车到了青年会，张书旗先生最先迎出来，一看见我，便告诉我说：

“悲鸿也来了，他是昨天到的，就住在这里。”他匆匆地说了这几句话，转身就走，一面走一面说：“我去叫他出来。”

不一会，徐先生果然快步走到我的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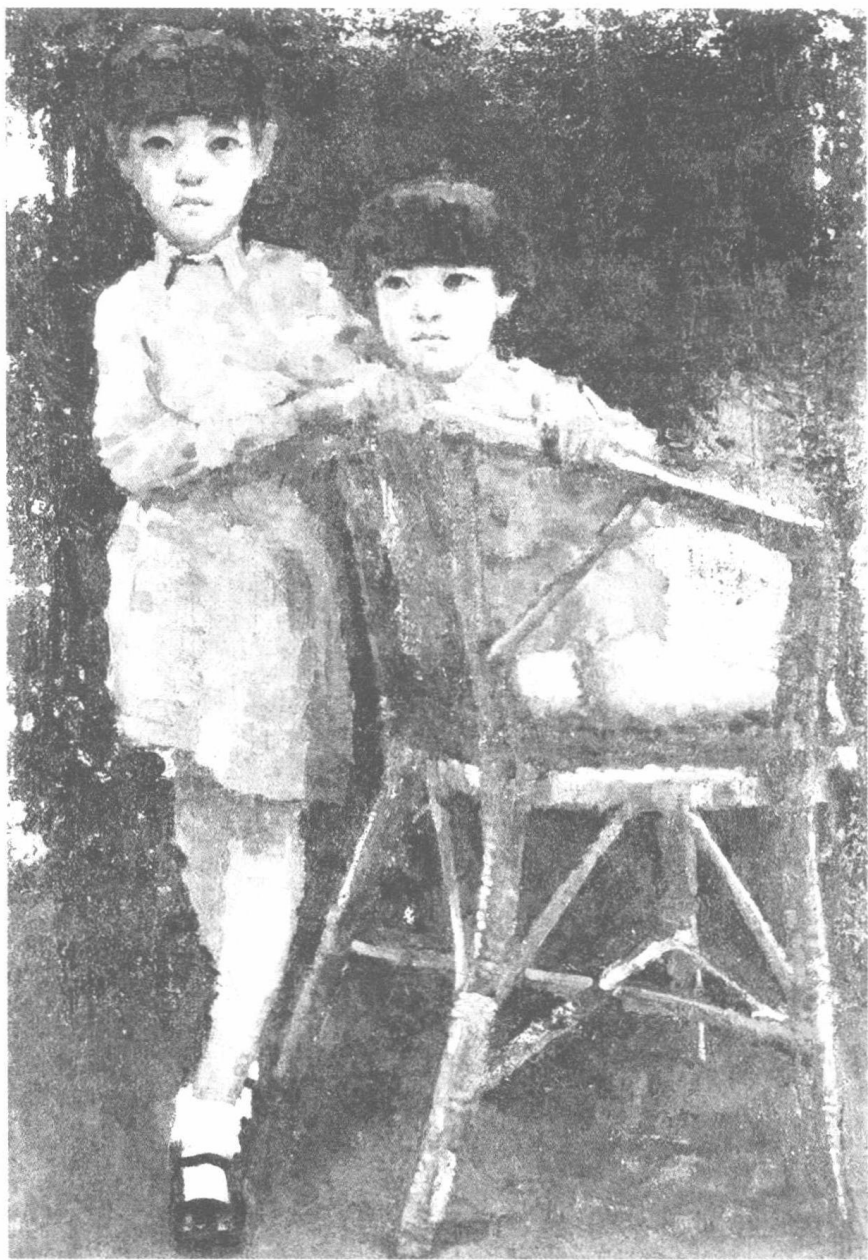
徐先生和我握握手，我向他问过了好，徐仲年先生和顾了然先生也出来了，大家坐下谈天，这时徐仲年先生提议一道出去逛逛马路，于是我们四个人便到大小梁子和都邮街一带随便走走。

重庆虽说是一座山城，街道依山而筑，高低不平，但是几条主要的通衢大道，倒也平坦宽阔，而且相当繁盛，大小商店林立，各色货品俱全。我们走走停停，不知不觉地已经到了中午十二点钟，我怕家里等我吃饭，凑巧这时有一部驶往曾家岩的公共汽车，在我们旁边停下，我急忙向他们道声再见，便挤上车去。

想不到就在当天下午，徐仲年、顾了然两位先生陪着徐先生来看我了，徐先生还送我两管玉屏箫、一件贵州出产的生丝衣料。孩子们见了爸爸非常欢喜，他也略微问了他们几句话。只是对于我们怎样来的，来了以后如何建立起这个家，则是绝口不提，对于我，当然更没有片言只字的温语相慰。

邻居好友郭太太和张太太，听说徐先生到了，连忙跑来看他，于是我们的小客厅里高朋满座，谈笑风生。这许多朋友都知道我们的感情纠纷已经闹了六七年，趁此机会很想为我们尽力拉拢。张太太大概是想替我留住徐先生，所以兴高采烈地提议打麻将，徐先生居然也破例地表示赞成。我没有理由反对，只好吩咐同弟摆桌子，请徐先生、徐仲年先生、顾了然先生和张太太四位入座，我自己便坐在旁边观战。

有说有笑的牌局，继续到吃过晚饭以后九点多钟。牌局散了，徐仲年先生和顾了然先生告辞回去，徐先生和他们一齐往外走，我就跟在徐先生的身后相



▲ 伯阳与丽丽（徐悲鸿）

送。徐先生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停止了脚步。我听到他在说：

“好了，我不送了。”

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当然是表示他今夜就要留住在这“光第”，我一听这话，立刻上前一步，略带笑意地向他说：

“你怎么办呢？我这儿是没有地方可以住的啊！”

徐先生听了，顿时神色大变，他铁青着脸，紧抿嘴唇，像一阵旋风似的，转身拿起自己的外衣，一头冲出门外。

据说第二天徐先生就搬到“光第”对面的山坡上，吴稚晖先生的住处，和吴老先生、吕斯百、吴作人先生等同住，他曾气愤不平地向斯百和作人说：

“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布置了好好的家，不让我住！就算我是个朋友吧，她也应该招待的呀！何况她用的还是我的钱。”

中大开课，第一次发薪水，徐先生实践诺言，拿了一百五十块，请吕斯百先生转交给我，这是全月薪水的一半，我要靠它维持一家五口的衣食住行，以及孩子们的教育费用。幸好当时重庆的物价还低，可以勉强够用。第二个月，斯百送钱来时，我一看却只有一百元了，当时我非常诧异地问：

“这是怎么回事呢？第一个月一百五，第二月一百块，照这样递减下去，到了第四个月，我们不是一文钱也没有了吗？”

斯百闻言只有笑笑，他无法代徐先生向我作任何解释。我想这个问题必须澄清，便亲自跑到徐先生的住处，问问他究竟为什么失信。

徐先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突然间他竟痛哭起来，他抽抽搭搭地说：

“记得在南京大轰炸的时候，我们一道躲在防空壕里，我想我们还是不要再闹了，时局已经糟到这步田地，再闹下去又有什么意思呢？可是——想不到你会那样坚决！”

我凝望着他，心中有无限的感慨，我平静地对他说：“你几时把你的想法告诉过我，或者是有那么一星半点的表示过？难道说你心里所想的事，我就一定应该知道的吗？而且你总该记得，从前我们在南京初次分手的时候，我曾郑重地向你表明过态度：如果你确实和人家断绝，我随时都欢迎你回家。现在，你只要自己问问自己，你就知道应该怎样做了。”

他更伤心了，整个人侧身倒在床上，双手蒙住面孔，直在吞声饮泣。当时我觉得他也真可怜，既然要谈恋爱，又拿不定主意来做决断，因此我再诚恳地跟他说：“人生得一知己确实很不容易，假如你觉得和孙女士结合是幸福的，我决不阻挠你们。但是我和你做了二十年夫妻，我并没有失德的地方，何况我们还有两个孩子，我又不想再嫁，所以请你也为我们谋一个安全之计。”然而

他仍旧不声不响，没有表示。我准备走了，临走之前，我向他说：“我今天来完全是为了生活费的问题，你应该了解我的个性，二十年来我没有为了金钱跟你冲突过，我不是爱钱财的人，不过，你亲口答应的诺言，你应该实践。我还要劝你一句，做人，最好是漂亮一点！”

说罢，我头也不回地转身出外。

第二天，早上七点钟不到，我还睡在床上没有起身，徐先生推门走了进来，他大踏步地走向我床前，面容严肃地俯望着我说：

“现在，我要我的家，至于我们的家应该住在什么地方，我可以听从你的意见，住在这儿也好，另外搬一幢房子也行！”

我一面披衣起床，一面正色地回答他说：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里不是你的家——”

“那么，我明天搬回家来。”

事实上！他来不及等到“明天”，当天下午，一九三七年的十一月二十三日，他便把全部行李搬来了，除了行李以外，手上还拎着几只螃蟹。

重庆虽然有长江和嘉陵江在这儿合流，然而菜市场上，连鱼虾都很少看见，螃蟹更是难得一尝的珍馐，这一点确实使江南来客感到遗憾。物以稀为贵，因此当时常常流传某人某人为了吃顿螃蟹化费若干若干的轶闻，吃螃蟹而成为新闻，重庆螃蟹的价格昂贵，难以搜求，便可想而知了。

现在徐先生居然买了螃蟹回家，想来他不但花了很多钱，而且一定还费了不少事。这个消息立刻轰动了“光第”的朋友们，大家都在说，徐先生这么样巴结徐太太，大概他们俩和好有望了。

晚餐桌上，持螯对坐，我实在有点食不甘味，同时也使我感慨万千。回忆二十年前旅居日本时，我们曾大啖东洋螃蟹，那时虽也有许多烦恼，但我们的感情是融洽的，前途是有希望的。如今呢？——我对他望了一眼，自己问自己，这个人我还能信任他吗？我还希望他给我点什么呢？这么一想，我内心里，就决定了怎样对待他的态度了。

自从他搬来以后，除了迫不得已，我不轻易开口和他说话。同时我把生活习惯也改变过来，过去二十年间，通常都是我先睡而他早起，现在正相反，是我迟眠早起，可是漫漫长夜，如何排遣？于是我便到张溥泉夫人那里，领取了

前方将士的征衣材料，拿回来缝制。当时后方妇女为战士缝征衣的运动风起云涌，因为那是慰劳将士们最直接有效的工作。我做的是棉背心和布袜，借此机会，日夜忙碌不停，以避免和徐先生无言相对的尴尬局面。

中央大学在距离重庆二十多里的沙坪坝设校，徐先生初回家时，他曾说一礼拜要在中大住三天，只有四天在家里。可是这时候他却非常的恋家了，他宁愿每天挤公共汽车，天天回家。我心里不禁暗暗地感叹，回想当年在南京，我曾多么希望他少去中大，而他却非去不可，连晚上也尽可能地在那边逗留，现在我宁愿他在中大多耽搁几天，他反倒每天都要回家来。人，就会这么的矛盾。

在家里住了三个礼拜，徐先生忽然痔疮大发，朋友介绍他到小梁子去找一位中医师，这位医师对于治疗痔疮倒是很有把握，他说只要付费五十元，他可以包医，不过他有言在先，必得天天敷药，而且在敷药三天之后，患部会开始疼痛，以后还越来越厉害，因为他的医法是把痔毒渐渐地集中在痔漏上，等到漏脱，痔疮也就好了。

徐先生很相信他这种医理，决定一切照办，付过医费，每天准时到小梁子去敷药。敷药的结果就跟医师所说的一模一样，痛苦逐日加剧，不但坐车困难，进而步履维艰。徐先生实在忍不住了，这才搬到中华书局去，因为中华书局就在都邮街，和小梁子距离不远，来回方便。

搬去两天之后，乘着星期假日，我带着伯阳、丽丽到中华书局去探望他。徐先生看见我们来了，显得很高兴，特地叫工友去买了许多糖果，请孩子们吃。我们在那里坐了半天，徐先生提起，他还需要一些日用物品，我立刻答



▲1937年底徐悲鸿画徐伯阳像

应，准定在第二天下午，拣齐了为他送去。

第二天下午我准时到了中华书局二楼，白天里宿舍中阒无人迹，楼上是一片寂静。我捧着一大堆东西走进他的房间，推门进去，只见他独自一人愁眉苦脸地躺在床上，仿佛正在忍耐莫大的痛苦，我走到他的床前，把带来的东西交给他，然后在他床铺前的椅子上坐下。

两个人默默地一坐一卧，似乎想不出什么话说，于是我感觉这样未免有点僵窘，我只好告诉他，我要走了。

我站起身，伸出手来和他握手，想不到他一把抓住了我的手不放。我错愕地望着他，见他满脸悲伤痛苦的表情，用一种近乎乞怜的目光盯住我，嘴唇抽动着似乎想说什么话。怜悯与婉惜的念头同时在我的心底升起，可是，我一生不喜欢怜悯这两个字，因为我总认为怜悯别人，即自视强过别人，和被怜悯者是无法站在对等地位的。我可能同情弱者，但我不能对可怜人发生情爱。当时我萌生一丝怜意，然而我对他的爱心却在相形地消灭。我怅惘地站在原处，缄口不语，时间在小小的房间里冻结，终于他废然地放开了我的手，任我转身离去。

由于我曾告诉他，三天以后我要在家里请但荫孙夫妇吃饭，他当即表示那一天一定回来。届时他果然回来了，带回他在中华书局所有的东西，我很高兴地听说他的痔漏已不痛了，而且后来事实证明那位中医所说的话，徐先生的痔疮从此没有再发。

不久以后，我的外甥程康民忽然来到重庆，找到我们家来。康民为了不甘受日军的奴役，小小年纪从家乡宜兴步行到安徽屯溪，冒险越过两军战线，经历苏、皖、赣三省到了汉口。幸好在汉口找到了他的表叔，替他买票乘船到达重庆，当然他是来依靠我的，就住在我家里。于是大家商量着应该怎样安排他的求学问题。一九二八年我们初次回国的时候，康民曾在我家住过，徐先生因为他常爱翻弄画纸绘具，而且又有拣食刁嘴的习惯，对他的印象不好。因此当我提议教康民投考空军学校时，徐先生便以冷漠鄙夷的口吻说：

“算了罢！他还考什么空军学校？你们也不想想，国家买这些飞机多不容易！”

当着孩子的面，他实在不该无故损伤他的自尊心，我听了很生气，立刻

就说：

“你不要管，好不好？”

徐先生登时恼羞成怒地说了一句：“你算了吧！”这使当时的气氛，尴尬到无以复加。

入夜，躺在床上，大家都心绪恶劣，睡不着觉，于是我问徐先生：

“依你看，我们还有和好的可能吗？”

徐先生的回答倒很干脆，他说：

“我知道我的罪恶，让天来罚我好了！”

感情又到了宣告破裂的时刻，我觉得我应该使他明了，我的一切做为，完全是受辱被迫而来，因此我向他说：

“过去你曾向我父母说过，你到哪里都打得出天下，我离开你就不行了。但是我一定要努力奋斗，假如奋斗有所成，那我便离你更远；要是无所成，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自杀，一是向你乞怜，不过以我的个性来说，恐怕是走第一条路的可能性较大。”

天还没有亮，徐先生便起床整理东西，我知道他又要离开这个家了。我默不作声，听他自便。这时郭有守先生已经来到重庆，每天凌晨起来，他总喜欢到我们这边打一转的。这天进来刚好看见徐先生在收拾行李，不禁惊讶地问：“这是干什么呀？”徐先生愤愤地说：

“人心已变，不能再住下去了。”

郭先生听了连忙劝他：“何必呢？”怎奈徐先生去志已决，拎了行李立即就走。郭先生送他下楼，我无言地望望墙上的日历，算算，他这一次回来，前后一共住了五十天。

在这一段时间里，使我最受刺激的是我曾看见徐先生戴过一只极大的红豆戒指。据说红豆是孙韵君送的，徐先生用金子镶成戒指。有人告诉我，戒指里面还刻了“慈悲”两个字，“慈”是孙韵君的另一个名字（多慈），“悲”当然就代表“悲鸿”。

到了重庆以后，我曾托朋友们为我介绍工作，但荫孙先生非常热心，他自己在复旦大学任政治系主任，并兼教法文。复旦大学起先从上海迁到贵阳，后来再迁重庆菜园坝，当时担任校长的吴南轩先生，是父亲早年在复旦任教时的

学生。但先生愿意每星期分三小时的法文给我教，吴校长也同意了，于是我便担任了复旦大学的兼任教授。

一九三八年一月，春季开学，我便开始到复旦去上课，上课才两个月，学校又迁往北碚对江的黄桷树。黄桷树是一座小镇，濒临嘉陵江滨，我为了交通不便，只好把伯阳、丽丽暂时寄宿学校，自己跟复旦搬到乡间去。这时但荫孙夫妇、刘大悲夫妇带他们一位侄子，还有复旦的校医张蓬羽先生，连我，一共是七个人，我们在镇上王家合租了一个四合院的两翼厢房，东西相向，各有三间，两间住宿，中间一间作为起居室，我住的一间是和但氏夫妇对门。



▲贺江景色（徐悲鸿，1938年）

因为我带着坤生、同弟两个佣人，于是我们就组成了小型的伙食团，由坤生、同弟烧饭做菜，但荫孙先生最讲究吃，做得一手中西名菜，于是他便成了坤生、同弟的师傅，兼任小伙食团的主持人。由于我们一向吃得考究，复旦师生便说我们这边是光禄寺，连复旦教务长金通尹先生也慕名自动参加。城里如果有要人或贵宾到复旦视察参观，黄桷树没有好菜肴款客，校方总是借我们的“光禄寺”招待嘉宾。

一群朋友都很要好而且喜欢热闹，平时谈笑风生，放言高论，虽然是乡居，却毫不感到寂寞。刘大悲先生在复旦教了几个月的书，便被聘到贵阳去办农场，离开了复旦，他的太太张振华女士后来也离开复旦到成都去了。

一九三八年七月，朋友介绍我到国立编译馆工作，因为编译馆在重庆，所以我又搬回故居“光第”，八月间，但荫孙夫人在重庆医院生了一位千金，大家又热闹了一阵。

第二学期开始，我仍兼着复旦的课。每星期六，由复旦大学派车在上清寺接几位住在重庆的教授去北碚上课。经常同车的有端木恺、卢冀野、沈伯先和一位黄先生，大家都是同事，在车上谈谈笑笑，一点都不觉得路远。上完课，星期日下午又把我们送回重庆。

就在这年的十月二十九日，父亲同了华林先生，间关万里，从上海抵达重庆，带给我极大的快乐与兴奋。原来一九三八年暑假，上海的南北两区全部沦入日军之手，各处学校纷纷迁入租界，租屋授课，地窄人多，学校形同虚设，有名无实。父亲看到这种现象，十分痛心，所以他有“志士羞与为伍”的愤慨，决心离开上海，投奔大后方。

父亲和华林先生由上海取道香港，经过广州、梧州、柳州而到桂林。他老人家游过了八桂的山水风光，再回柳州乘公路汽车，经贵阳到四川。他以望七高龄，不辞舟车劳顿、道路险阻，沿途寄情山水，忧心国事，写了一卷《西南游草》，成长短歌一百二十三首，抵渝之日，还口占一首五律以纪念这次的团聚。

现在我将原诗录在下面：

抵渝市示碧儿

迢遥八千里，间关四十辰。

侨都觐富庶，赁庑远嚣尘。

难得艰危际，犹能骨肉亲。

云山堪悦性，孤愤未须伸。

父亲到达后，我和房东商量，把楼上正中的一间房，腾让他住。

父亲来了还不到一个月，便接受了重庆大学的聘约，每周授课十二小时。重大校长叶元龙先生，是父亲民初任教大同书院时的学生，重大在沙坪坝，离城二十余里。老人家来回都挤公共汽车，很受奔波之苦。

一九三九年一月，一群朋友发起聚餐小集，每周一次，就在“光第”我

家举行，发起人是方令孺、宗白华、郭有守、章益、孙寒冰、陈可忠、端木恺、徐甫德、蒋复璁、颜实甫和我，一共十一位，刚好一桌，每次另请一桌客人。客人还有区分，譬如某次请的是文学界的，便称为“文学专号”，考古界的称“考古专号”，以此类推，每一次小集又称为一期，每十二期为一卷，主持人因而官拜“主编”的头衔。第一卷的主编是我，第二卷主编为端木恺先生。

小集时宾主非常和谐，谈笑风生，轻松愉快，或则讨论学问，或则评论时局，有时也不免月旦人物，古今中外，无所不及，对于各人的学问见识，都有很大的裨益，不仅是吃吃喝喝而已。

第一次小集是发起人聚餐，不曾请客，第二次请了张道藩、余上沅、穆家瑞、陈丁妩、康学咏、老舍、王礼锡诸先生和我父亲。第三次是考古专号，有蒋梦麟、常任侠、彭汉怀、胡小石、杨仲子、傅抱石、陈石玲诸先生。第四次为参政专号，请的都是参政员中各友好。第六次在三月六日举行，因为郭有守夫妇迁居成都，特别为他们饯行。第八次是教育部专号。四月二十五日的联合会已经是第二卷的开始，由端木恺先生出任主编，然而就在这一次以后，重庆大轰炸开始，大家忙于疏散避乱，小集同仁风流云散，聚餐会也就中止举行了。

我在国立编译馆工作了两个月，又转到教育部设立的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工作。到了一九三九年初夏，五月三日和四日，接连两天，重庆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大轰炸，城中精华地区尽付一炬，生命财产的损失不可胜数。我们在“光第”走廊上，眼看大重庆陷于一片火海之中，烈焰冲霄，浓烟蔽天，想起那些被难的同胞，心中真有无数的悲愤！

从五三、五四大轰炸以后，政府积极疏散人口，机关学校纷纷下乡，水陆要道，展开了空前壮观的疏散行列。教育部迁移离城百里的青木关，编辑委员会搬到北碚。我为了工作关系，也只好放弃“光第”的房子，先送父亲迁入重大宿舍，孩子仍旧住校。我自己带着佣人，雇了一条木船，溯嘉陵江北上，搬回黄桷树旧居。这时，王家四合院厢房的房客，就只剩下但荫孙夫妇和我了，因此我们每家各住三间，分别举炊。

那一年的暑假，父亲从沙坪坝到黄桷树度夏，伯阳、丽丽也都回家，一家

团聚，和乐融融；当时陈云屏先生的尊翁漱六公已经到四川，他们就住在北碚，听说父亲来了，非常的高兴。漱六公是父亲的表兄，而且我有一位姑母嫁给漱六公的令侄，所以漱六公又是我姑丈的令叔。漱六公本姓任，因为过继舅家，承祀香烟，方始改姓陈。他和父亲年龄相仿，把父亲和我们殷勤地邀到北碚，盛宴款待，一夕盘桓，两位老人的心情十分愉快。席间还有诗作唱和，记得父亲写的一首是《北碚喜遇漱六表兄赋赠》，原诗录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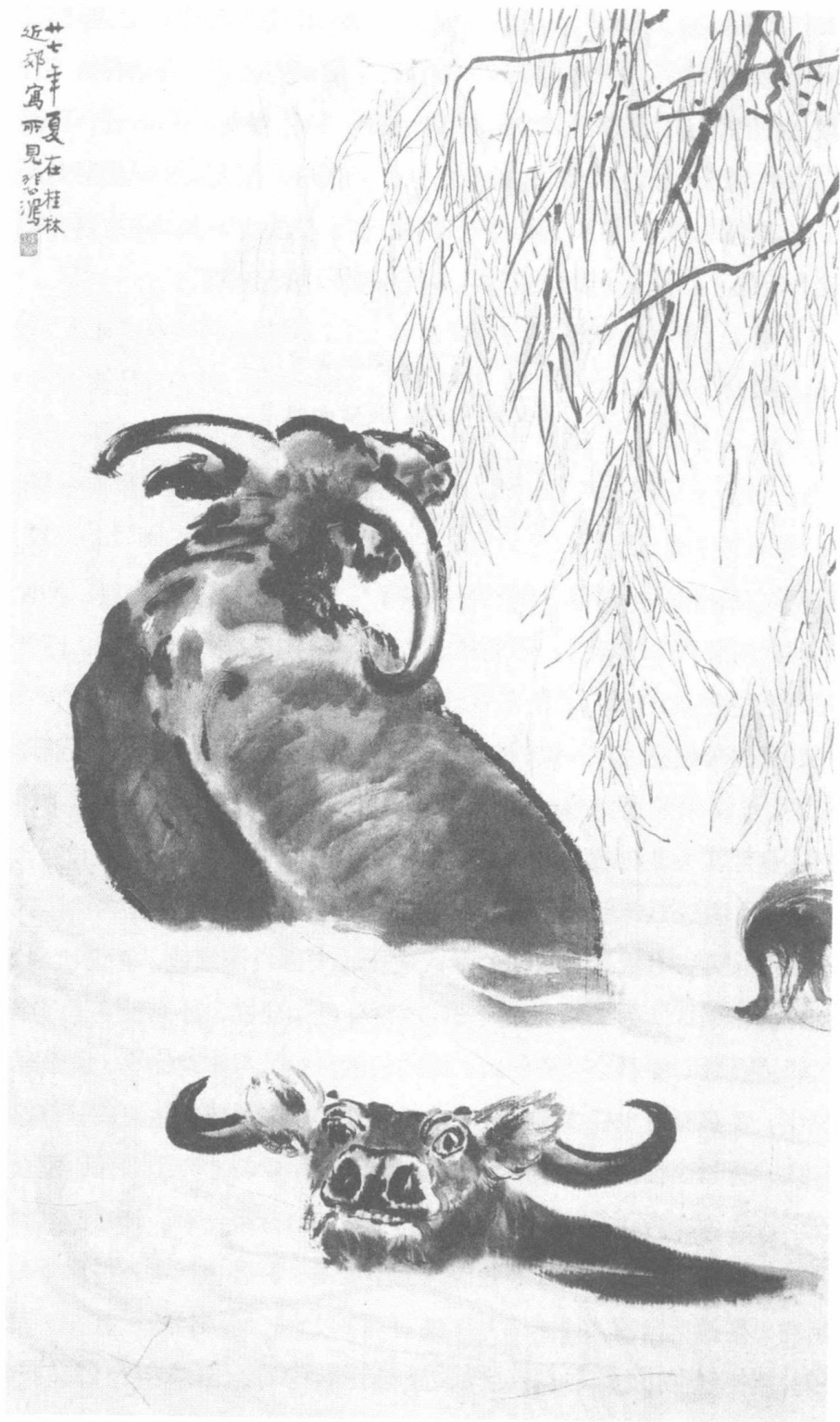
渊源溯中表，相识各衰龄。
 清远北碚地，晶莹南极星。
 辞官身更健，话旧涕俱零。
 未死聊槃礴，糟醅莫漫醒。

两老依依惜别的时候，漱六公还送了父亲一支名贵的灵寿杖，据说产自剑南，似木实藤，多节类竹，不施斧斫，浑然天成。父亲欣然接受，回黄桷树又做了一首诗致谢。

转瞬间暑假已过，一家人劳燕分飞，父亲回重大执教，伯阳、丽丽也回重庆巴蜀小学，我自己则留在黄桷树。除了在复旦兼几点钟法文课以外，我天天要渡过嘉陵江去北碚教科用书编委会上班。

早在一九三八年一月，陈立夫先生出任教育部长，鉴于国内沦陷区的大学多已关闭，许多有成就有造诣的学人教授，大都投闲置散，有的已到了后方，有的则仍留陷区。为了使这些人安定生活，继续研究，因而设立了一个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委员会共分四组，即实验教材组、青年读物组、民众读物组和戏剧组，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人，由教育部次长张道藩先生担任，每组各设主任一人，青年读物组最初是陈之迈先生，后改由赖特才先生继任；民众读物组由王向辰先生主持；戏剧组为赵太侔先生，各自分组办事。凡已撤退到后方尚无正式工作的教授学人，都被延揽到会中编纂各种著作读物，按月领薪。留在陷区的，则请其撰稿，如能每月寄稿一万字以上，即可付给一百五十元的生活费用。稿件经过审核，如有佳作，立予出版印行，出版后作者还可以得到版税。

由于张道藩先生的介绍，我被派在青年读物组工作，职责是审查稿件。



廿七年夏在桂林
近郊寓所見悲鴻
悲鴻

▲牛浴（徐悲鸿，1938年）

在这一段时期，我的心情相当愉快，因为我结交了许多朋友，复旦方面除了但荫孙夫妇，还有张友三、孙寒冰、端木恺、熊子容、陈子展、李亮恭、陈国荣、温崇信。编委会这边又有方令孺、梁实秋、王向辰和赵太侔，以及赵太太俞珊，这些朋友彼此不拘形迹，时相过从。尤其是方令孺女士，我们朝夕相处，同行同止，差不多有两年时间。方女士是安徽人，她也在复旦教书，在编辑委员会我们又同组办公。她极重感情，有文人的气质，她的作品词藻华丽，热情洋溢，颇受当时青年读者的推重和爱戴。但是她的个性和思想却和我截然不同，因此复旦教务长孙寒冰先生（孙先生是继金通尹先生接任教务长）对于我们两个曾有一个对照式的批评，他说：

“方令孺犹如清溪涓流，蒋碧微则似高山巨瀑！”

方女士嫁给一位陈先生，陈是金陵世家，两夫妇曾在美国留学。陈有一副科学头脑，思想缜密，做事有条不紊，最重秩序，方则大而化之，一副“名士”派头。两个人在性格上有基本的歧异，因此始终格格不入，虽然不曾离婚，却也分居很久。除此以外，据我冷眼旁观，和方令孺经常接近的一批复旦学生，思想言行，可能都有些左倾，所以我和她交往的那段期间，绝口不谈政治，以免由于各人观点的不同，损害了彼此的友谊。

编委会起先在重庆办公，后来因为空袭频仍，才搬到北碚。方女士就住在会里，我则因为北碚黄桷一水之隔，不妨早出晚归，通常都是一早到达北碚，中午的时候，男佣坤生为我送来午餐。方女士则在会中包饭，我们两人就在她房间里共食。下午下班，已是薄暮时分，她总要把我送到江干，两人走过一道长长的沙滩，等我登上渡船，她还在岸上连连挥手，情意绵绵。

大概在一九三九年以后，敌军占领了我国沿海各省，中路敌军掠武汉而据宜昌，就此陷身泥淖，无法再越雷池一步。在沉滞胶着的战况之下，侵略者为了企图瘫痪我们的后方，开始了疯狂的轰炸攻势，渐渐地连学校、民房、医院、郊区都成了目标。一九四〇年五月僻处黄桷树的复旦大学被炸，一时弹片横飞，硝烟四起，教授学生死伤枕藉。孙寒冰先生就在这次罹难，死状之惨，令人不忍卒睹。孙先生平时来看我，总是一走进大门，先叫一声“蒋公！”他死以后，我常常有一种幻觉，仿佛他蓦然走进来叫我一声的样子，这使我不但悼念良友之永逝，而且还有点恐怖。

我们住处附近，就是复旦大学的医务室，轰炸过后，一批批的同事同学以及老百姓被舁抬搀扶而来，施以紧急救治，肢体破碎，血流如浆，惨况真是怵目惊心！有一位同学大概已被震死，全身毫无伤痕，眼睛也睁着，救伤人员还想予他人工呼吸，助他苏醒，可是终于回天乏术，废然放弃。另一位同学两膝中了弹片，皮肉翻开，变成两个血球，看了他的伤势，我只感到头皮发麻。而呻吟呼号之声，更是时时刻刻萦绕在耳边。女佣同弟受了重大刺激，放声痛哭不能自止。这一次面临从未有的惨剧，给我精神上的打击实在太大，于是我决心辞去编辑委员会及复旦的职务，搬到磁器口，接受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聘约。

磁器口是巴县一大镇市，坐落在青葱蓊郁的歌乐山麓；也在嘉陵江畔，以出产落花生而闻名。歌乐山一峰突起，有如屏障，磁器口恰在山隈水隈，大家都以为像这样的地方敌机一定不会光顾了。我迁居磁器口，除了避空袭以外，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父亲任教重大，伯阳进了南开中学，重大、南开全在沙坪坝，距离磁器口只有两华里的路程。我搬去了，对于他们的生活照料，就方便得多。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院长颜实甫先生，是一位学兼中西的文人，他留学法国十七年，曾在巴黎大学、里昂大学毕业，身材矮小，生活俭朴，不惑之年，仍单身未婚，经常一袭海昌蓝布袍子，除了做学问和搜集古董，别无嗜好，又很刻苦，纯粹是个学者。

颜先生是四川人，当时郭有守先生担任四川省教育厅长，深知颜先生有学问才能，所以拉颜先生出来，主持省立教育学院院务。颜先生聘请复旦同仁熊子容先生为教务主任，教务处设注册与出版两组，注册组主任是余书麟先生，熊先生建议颜院长聘我为法文教授，兼出版组主任。等到开学以后，图书馆一时找不到人负责，十数万卷书籍，乱七八糟地堆着，师生们都不能借用，于是熊先生再跟颜院长商量，请我出来主持图书馆的事务。我费了很大的事，才将这十数万卷书整理出头绪，分门别类编号做索引卡，总算粗粗有了点规模，后才开馆借书。

我在教育学院住的宿舍，是一排五间的平房，前后有院子，最末一间是厨房和下房，每间房分隔成两间，前后有门，前院面临小河，隔河就是教院的农场和另一部分宿舍，远山近水，风景清幽。

同事中只有我带着两个佣人，坤生和同弟便住在那间下房里，并且利用厨房做饭，颜院长和我比邻而居，起先他在伙食团搭伙，我看他们的伙食不太好，因此建议他到我家吃饭，前后吃了一年多，直到他结婚以后方才自行举炊。

在教育学院工作相当繁忙，不过精神倒还愉快。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四日，是父亲的七十诞辰。事前，朋友们很热心地提议给他做寿，我回想父亲五十初度，我远在国外，曾买一只瑞士金表，托朋友带回为他祝嘏。六十大庆，适值丹麟弟和姑母先后逝世，全家正笼罩在悲哀伤惨的气氛之中。这次父亲寿登七秩，虽说国难期间，但是友好的诚意既不便却，我自己也想尽点孝心，希望给他老人家一点欢慰，于是就在十一月四日，假沙坪坝饭店准备了寿筵。自动参加的友好约三十余人。就在这一天朋友们还为父亲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事，那便是由张道藩先生发起，承伍蠡甫、余井塘、吴南轩、沈亮、但荫孙、宗白华、金国宝、范存忠、徐仲年、徐辅德、郭子杰、章益、梁实秋、程天放、叶元龙、华林、端木恺、颜实甫、罗家伦诸先生解囊分金，醖资四千五百元，花了一年的时间，把父亲六十岁以后的诗稿辑印问世，是为《理斋近十年诗词》，内载《欠死集》一百二十一首，《西南游草》一百二十三首，附《游记》三篇，合共二百四十七首，全集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印竣。

转瞬到了一九四一年，暑假开始，颜实甫先生提起父亲以七秩晋一高龄，独自一人住在重大宿舍，起居饮食乏人照料，而且轰炸频繁，因此殷殷地劝他搬到教育学院来住，他将为他在楼上准备一间房子。

父亲接受了颜先生的建议，在七月一日迁来教育学院，暑假后并在教育学院兼课三小时，以便长期和我住在一起。

然而这时日本飞机的轰炸越来越厉害，连磁器口也接二连三地挨了炸弹。

在我们那一排房子前面，学校沿着院中的小坡筑了一个简单的防空壕，顶上撑起木板，这个防空壕只能挡挡炸弹碎片，如果直接命中当然不可想像。不过它离我们的住处很近，距厨房门口只有两三丈远，所以坤生、同弟警报来时仍然照常做饭，听到飞机声音再逃进洞里都还不迟。八月二十一日敌机轰炸教育学院，大楼被毁去一隅，父亲损失了很多东西。

这以后，大家就不敢贪图近便躲小防空壕，一发警报，要步行一里多路，跑到一处军事机关所构筑的大防空洞，洞里曲折深邃，洞门有三四座，躲在里



▲霜草识秋高（徐悲鸿，1939年）

面当然很保险。有一天敌机再炸教育学院，飞机去后我们走出洞口一看，只见烟尘滚滚，灰蒙蒙的一片，教育学院的房舍全都被掩遮得看不见了。一时大家都在提心吊胆院长是否安全，因为他总是等到敌机来时，才肯躲到院中防空壕去的。好不容易等到警报解除，急忙赶回宿舍，知道颜院长平安无恙。但听他说，当时防空壕被震得摇摇欲坠，壕里的人被一阵强风压倒在地，大家都以为这次一定是洞毁人亡，想不到最后还是吉人天相，逃过了这危险的一关。

每次学校挨炸，躲警报回来总要大扫除，房子受到震动，天花板和墙壁的石灰泥块纷纷坠落，地面一片狼藉，家具蒙上厚灰。往后日本人更变本加厉，实行所谓疲劳轰炸，敌机每两小时一批轮番袭击，警报整天整夜不能解除。我们躲在防空洞里，经常是日以继夜地不饮不食，挨到天黑，实在撑不住了，冒险回家吃点冷东西，休息一下。万一飞机再来，我们就只好再躲小防空壕。

当时全重庆的人都是这么咬紧牙关，忍受痛苦，房子炸掉了重新盖，敌机飞走了立刻开始工作，就凭这种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使我们赢得抗战胜利，国土重光。

直到一九四二年，美国的陈纳德将军组织飞虎队志愿空军东来，我国神鹰健儿获得了美国战斗机的补充，几次空战，打得日机落花流水，警报方始渐渐地稀少，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空军南移，重庆的警报终于宣告绝迹。

7

许多年来，徐先生的学生和我经常往还，而且始终很亲切地称我“徐师母”。他们对徐先生和我之间的僵局，大都表示惋惜。因为他们觉得徐先生当时正值鼎盛之年，倘能给他安定的生活环境，一定会在艺术上有更深的造诣。可是自从徐先生闹了“恋爱”之后，一直都在茫无目的地东奔西跑，席不暇暖，最明显的一点是他不再从事需要全神贯注的油画创作。这对于他自己和中国艺坛，都是相当重大的损失。所以关心他的同学常来跟我谈天，并且零零碎碎地告诉我些有关徐先生的消息。

徐先生自从一九三七年底迁出“光第”，到一九三八年四月国民政府部分机构还在汉口的时候，据说郭沫若和田汉曾经邀他到政治部去共事。徐先生到了汉口，大概他自知不适宜于这种工作，于是就离汉入湘，在长沙会见避难而来的孙韵君和她的父母，然后把他们一家接到桂林。

孙家抵达桂林的那天，徐先生当晚假借广西省府一位朋友的家里，摆下酒席，欢宴洗尘。有一位当时旅居桂林的留法老朋友，那晚凑巧到那人家去，走到门口，碰见在徐先生画室里的那个模特儿，也就是徐先生以前所“收容”的女难民。只见她神情紧张，痛苦万分的样子；他心里有点奇怪，跑过去隔着窗户一看，看见客厅里面摆了一桌酒，孙韵君居然在座。他这才明白，那个女孩子所以会那样难过，一定是因为孙韵君来了的关系。他不禁感慨系之，悄悄地退了出来。

不久，徐先生为孙韵君设法，在广西省府谋了一个差使。据我们那位老朋友说，后来他认识了孙韵君的父亲，彼此很谈得来。孙老先生曾一再向那位朋

友强调说：“徐先生和我女儿是师生，要想打破这层关系，我是决不许可的。”他不仅态度大变，而且对待徐先生很不客气，常常疾言厉色地逼徐先生回重庆去。徐先生迫不得已，才在一九三八年五月返抵重庆，再到中大上课。可是一到同年七月放了暑假，他又匆匆地跑回桂林。

徐先生回到桂林，忽于七月廿九日写信给好友郭有守先生，通知他：“兄得此函后，弟即与碧微正式脱离”。令郭先生为之愕然，他立刻将这信拿来给我看，原文是这样说的：

子杰（郭先生的号）吾兄大鉴：

弟不才，累友人以极度无聊之事，良深惶愧。弟家庭之变，早至无可挽救，且分离日久，彼此痛痒不复相关。今幸碧微振起奋斗，力谋自立，又蒙诸至友如兄等扶持，有所工作，亦足以慰藉其痛苦之心灵。弟精神日疲，不能自存，而责任加重，命运偃蹇，日暮途穷，辄思得人为助。惜两全之计，竟不可得，故拟解决不可挽救之局，以应未来逆运。兹拟处置家庭办法，恳兄转告碧微，情缘如此，天实为之。碧微必欲恨我，我亦只得听之，虽弟初心，岂敢如此？抑如去冬之隐忍，犹且无济，宁非天乎？惜适当国难严重之际，允称无聊之极者也。

一、不论碧微有无收入，弟以每月三分之一与之，两孩归碧微抚养，用费由弟负担，但以俭约为原则。

二、兄得此函后，弟即与碧微正式脱离。弟之隐痛，乃在未受法之束缚，但为余生计，不能不解决，亦想不到更善办法，诸好友向来盛意，只是铭记肺腑，倘加责备，弟又何辞？临书悲梗，不尽缕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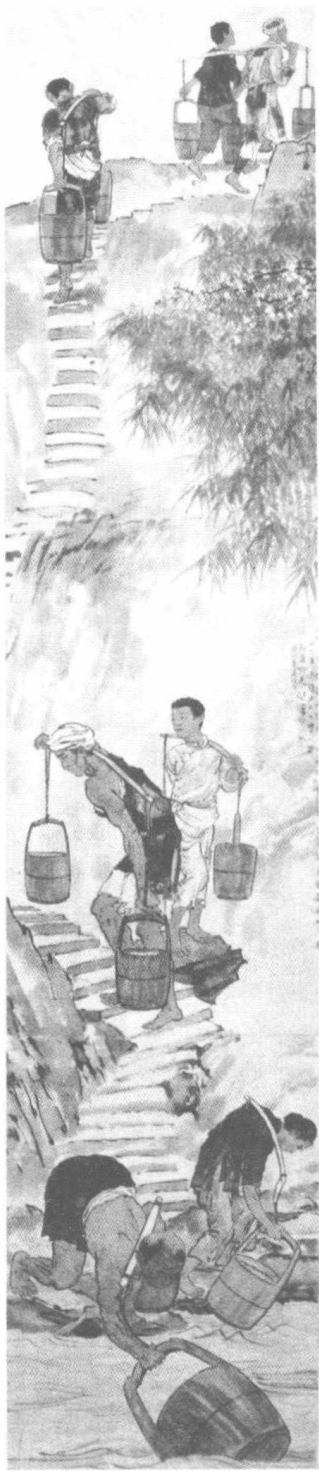
敬颂暑祺！

此书请不必告夫人。

悲鸿拜启 七月廿九日

我看了这封信，但觉啼笑皆非，于是我向郭先生说：“怎么办呢？”

郭先生认为站在朋友道义的立场，他有义务给他做最后的忠告，请他悬崖勒马，早回重庆。于是他洋洋洒洒，写了一封文情并茂的长信，复给徐先生，这封信的原文如下：



▲巴人汲水
(徐悲鸿, 1937年)

悲鸿兄：

接到七月廿九日的来信，读了以后，实在有受宠若惊之感！我既不是法官，也不是受任徐府家庭法律顾问的执业律师，要像你信上所说“兄得此函后，弟即与碧微正式脱离”！试问，我哪来这种权力？又哪有这种责任与义务？这不但使我深感骇异，还必需向你否认！因为此项名义，我是受之有愧，却之亦不算不恭。我在你的来信中可得而推测的，计有数点，请为你一一陈说：

一、你说“家庭之变早至无可挽救……”是不是真的到了如此严重地步，真的不可挽救了呢？我看你还要三思！假如在某种情况与条件之下，才能夫妇言归于好，我虽然驽钝，仍愿与诸友好向嫂夫人进言，希望能尽最大之努力，以达到你的愿望。但是必需请你将某种情况与条件明白告知，才好进行；恐怕嫂夫人并未认为夫妇绝对不能复和，而且希望恢复旧日情感，也未可知。你之所谓不可挽救，仅是片面的说法而已！

二、你的信中有“……辄思得人为助”，不知是否有意再结婚？结婚之对象是否即为孙女士？请你也明白告知。你与孙女士的感情，究竟进展到何种程度？这是老朋友们所深切关怀的，你能告诉我吗？以我之意，结婚一层，似可从缓，因为原配之脱离手续，如未办得十分妥当，为此惹起纠纷，实在是不值得！这种自投罗网，即使为了爱情，也应该郑重考虑。像你这样高明的人，总不能说我的话不对吧！

三、你又说“不论碧微有无收入，我以每月所得三分之一与之”。此处所谓“每月所得”，应该是指你的全部一切收入而言，想来不是单指某一处之薪俸而计，因为时局不定，薪金收入可能减少，或者竟至完全没有。嫂夫人生活攸关，到了这种情况，她又怎么办呢？

所以只有祝你永远收入不断，但这究竟不可靠。像你这样的当代艺术大师，作画所得，应当远较月薪为多，因此盼你能对这一点加以明白解释，否则将来不知每月三分之一究有多少？以我等朋友之意，总希望不至于有这一天。

四、两个小孩归嫂夫人抚养，用费由你负担，这很妥当。但也应由你规定一个数目，交给嫂夫人分配，倘若毫无规定，在执行上似颇困难。两个侄儿资质甚佳，如能善加培养，前途必然无量。你是他们的父亲，当然会关怀他们，无须乎我这么过于顾虑。总而言之，在我等朋友的立场，都盼望你们和好如初，消除一切意见。所以我在得到你的信后，还未敢告诉嫂夫人。因此请你将心中所要提出之和好条件，明以相告，使素蒙不弃之老友如我者，可以做最后一次调解之努力。

倘使万一双方都不愿言和，那就要订定一项解决办法，则一般所通行者有两种：甲、分居，由夫方供给赡养费一次若干，以后每月各若干，但男女均不得婚嫁，即使各有相好，赡养费亦不得变更。乙、协议离婚，赡养费及每月供给若干，与分居相同，但男婚女嫁，可以各听其便。以上两种办法，均须双方同意。条件说妥之后，然后请出法定数目之证人，写立合法之契约，然后才可生效；决没有片面致友人一信，就算离了婚的。如果以上两种办法双方不能择定一种，势必闹到法庭相见，徒然给别人看笑话，那才是最下乘的离婚手法。

阁下的事使我不能不有所感者，以我们出洋吃面包十几年，平素号称天狗，还不能脱世俗之见，非要离婚另娶，这又何苦！天下到处都有美女，又怎能个个娶来为妻？你实在太傻了！以一个大艺术家竟这样看不开，恐怕将来会受累无穷，实在为你可惜，还望悬崖勒马，早日返渝，并希望你答复。

祝暑安！

弟有守再拜 八月十二日

尽管郭有守先生苦口婆心，晓喻利害，劝徐先生莫要闹到“对簿公堂，贻人笑柄”；然而我们还不知道，在他那一封信之后，还有更莫名其妙的行动

传来。发信后的第三天，一九三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徐先生在广西报纸刊登了一则两行小字的广告，其文曰：

徐悲鸿启事

鄙人与蒋碧微女士久已脱离同居关系，彼在社会上一切事业概由其个人负责，特此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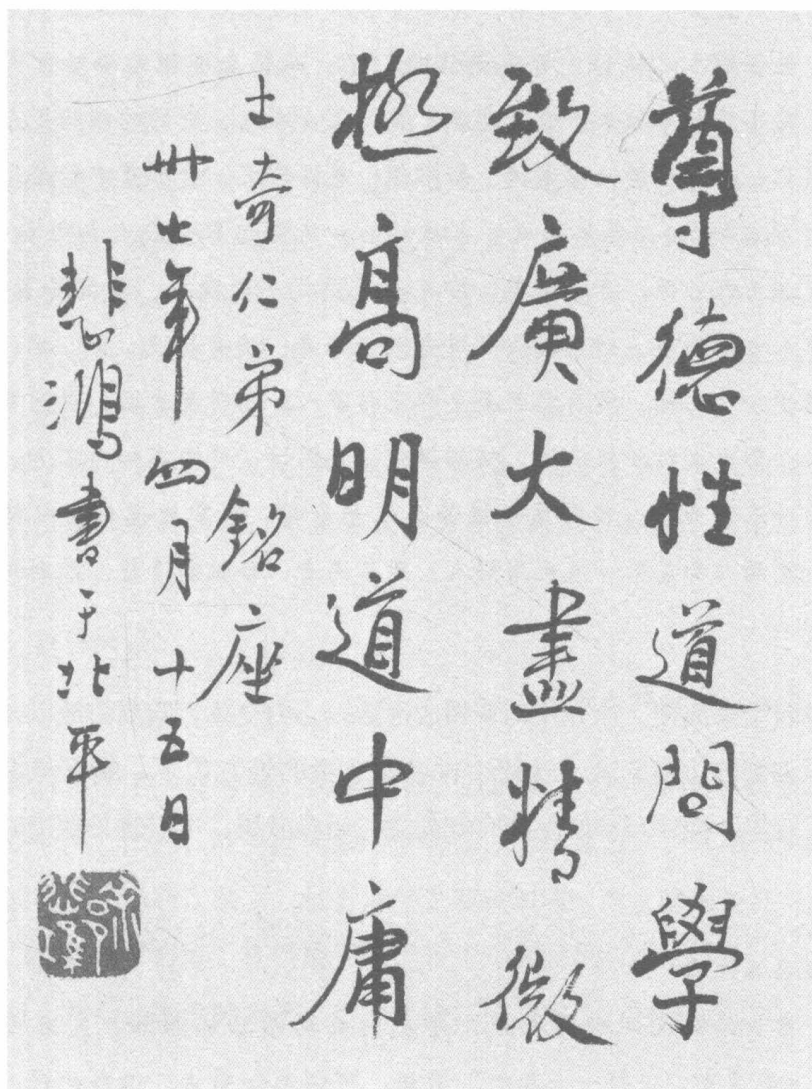
朋友将他刊登那则启事寄给我，当时我并没有惊奇，也不曾想要采取什么行动，只是感叹他的作风未免欺人太甚。回想二十年前，以一个不出闺门的十八岁少女，跟他跑出去到处流浪，共患难，挨贫穷，生儿育女，谁要是不承认我是他的太太，他能不感到侮辱？可是他到今天，居然登出脱离“同居”关系的广告，想就此抹杀自己的责任，其居心，其用计，令人是可忍，孰不可忍！当时我便这样想，这一件事即使将来我睡到了棺材板上，我也不能忘记！他算是做尽做绝了。

消息传播开去，朋友们都为徐先生的行径齿冷。傅斯年先生和我并不太熟，四年之后，父亲逝世，他因为不知道我的住址，写信请张道藩先生转致唁函，他在那封信上便这样写着：

阅报惊读蒋碧微女士之讣，凄怆之感，出于衷心，于是连读三日希腊人论人生哲学之书，亦可笑也。蒋先生去世，只有碧微在左右，而悲鸿先生之登报词，使人惊心动魄，故弟亦深感人生之惨酷耳。吊伊一信，不知如何称呼？嫂固不可用，而弟之交谊又不能姊之，于是措词难矣。凡人之家务，他人皆不可置词，然如悲鸿之登报词，岂止薄幸，直可为人道悲矣！

傅先生的寥寥数语，沉痛万分，足可为当时士林评议之代表。

广告刊登出来了，沈宜甲先生兴冲冲地拿着报纸去看孙老先生，他胸有成竹地提起婚事，不料竟被孙老先生泼头浇了一盆冷水。他顿足大骂，把沈先生骂得狗血喷头，撵了出去。孙家随即准备行装，不几日后，离开桂林，远远地跑到浙江丽水，在那里定居下来。从此徐先生不但“两全之计不成”，反而弄得两头落空。



▲徐悲鸿书法（1948年）

事后，沈宜甲先生大感狼狈，写信向朋友们解释种切，信中对孙韵君的家庭颇有微词，我心里明白，这只是他的聊以解嘲而已：

××兄：

接廿日函，知现在贵阳甚佳，悲鸿固已在桂林登报与蒋女士脱离同居关系（事先曾请教几个法律专家，皆云无违法之处），但与某女士结婚，乃外间揣测之辞，事实上恰恰相反。此报登后，不数日，某女士即独自离开桂林，大约永不再回矣。悲鸿现埋头乡间，拼命作画，局外人焉知其中

痛苦。即使某女士千肯万肯，无奈其家人混蛋无聊，较张某夫妇尤卑污下流，处任何人之地位，皆不愿认此门亲。而将来即便结婚后，因女儿关系，又不能断绝往来，真是悲剧！至某女士本人，则的的确确是个十成的安琪儿，幽娴贞静，旧道德，新思想，兼而有之，受尽家中折磨，外间刺激（原文如是），泰然处之。来桂林后，凡任何男女友人与之相处愈久，愈觉其为人可佩，身世可悲，即无与悲鸿之一段痛史，单就其家人情形，已非人之所能堪。伊自云决定终身做受难者，确有此境，父、兄、母……皆恃伊一人生活，所有之薪金全部交与家人，仍时受责骂，世间竟有如此父兄？彭太太对伊极认识，极端佩服，表同情，外间不知内容者，以为此定系一浪漫女子，实则系一极苦痛之女子耳。我常把她与我以前的妻子比，觉两人都是第一流无用好人，所不同者，孙脑筋清楚，张则神经病较剧耳……

孙韵君全家离桂，徐先生幻梦顿成泡影，心力交瘁，跑到河池以西，黔桂接壤，极偏僻的边境矿区，一处小村名叫八步的地方住下，颇有与世隔绝之概。到了这里，他才写信回复郭有守先生，语多激越，可以想见他当时心情的懊恼：

子杰吾兄左右：

奉长函极讥讽嘲骂之致，老友因关切而壮怀激烈，夫岂可怪？惟“天下多美女，安得一一妻之”数语，可谓不知弟者。但弟此时，亦不暇辩，承兄愿为最后之努力，至为纫感。弟明知无益，不敢烦劳，盖碧微从前虽对弟切齿痛恨，究亦尚具恩爱。自去年八月后，便只有恨无爱，弟当年容有二心，但未尝无爱，且从未甘心如来书所指之俗气。嗣后日夜思维，觉得虽说不是冤家不聚头，毕竟不能完全以恨结合，若谓相处可似朋友，而世上实无气味全不相投之朋友，至于兄弟姊妹，我又不必如是怕她！弟因国难之故，回心转意，尽量卑鄙，以冀复修旧好，侍候月余，不特毫无影响，且变本加厉，借题发挥，以是知人心已变，不能挽回。况寄人篱下，全无辞色，胡能腆颜久留（其实完全用我的钱）。故最后之努力，弟已亲身试验，完全无效。所以兄不必多此一举，弟良心不泯，她虽

对我如此，我总不忍抛弃，故甘愿担任其生活所需，亦因弟之收入较之为多，否则一受辱被逐之我，宁来供养逐我之人？尤不可以为弟之态度，为缓和法庭见面，此固非弟所愿，惟人家以为非如此不行，我也没法，在事前须得请教过高明些的律师。总而言之，“光第”生活，弟决不再试，弟愿多保持些碧微好的感想，至于没世。若兄以弟所陈为不尽善，敬恳兄集弟亲友一二人，若白华兄、斯百弟，商议一更好办法，不必令任何一方吃亏，交弟执行，无不乐从。未来如何，此时不得而知，结果恐亦难别雅俗，不问其为天狗为土猪，总是那么回事。弟因心力交疲，孙女士已离开广西，来八步小住，此地为矿区，不烧煤，故甚清洁，工人生活，亦可入画，但其工逸而不劳，与世隔绝，每日杀死几多虾仁，毫不所知，亦到罢了。

敬候俚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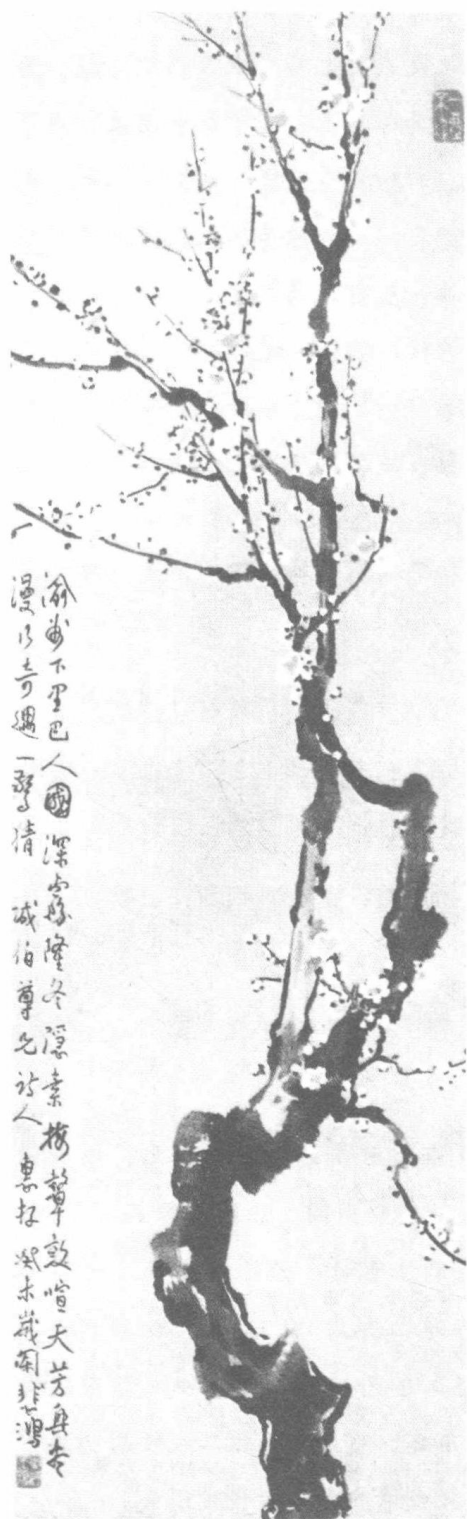
弟悲鸿拜启 九月二日

他在八步住了一些时候，回到桂林，这时新加坡和印度都请他去开展览会，于是他决心出国，准备以售画所得的钱，捐献给国家，以尽他做国民的义务。他的行程是沿西江东下，经香港而先到新加坡，路上碰到封锁，耽搁了不少时间，辗转到了香港，在香港报上发表了一篇《西江飘流记》。一九三九年元月四日，乘荷兰轮直驶星洲，行前他给孩子们寄了一封简短的信：

伯阳、丽丽两爱儿同鉴：

我因为要尽到我个人对于国家之义务，所以想去南洋卖画，捐与国家。行未到半路（香港）便遭封锁，幸能安全出国。但因未曾领得护照，又多耽搁了近两个月，非常心焦，亦无别法可行。兹已定今夜（一月四日）乘荷兰船 Van Heufze 赴新加坡，在路上有四日。如能一切顺利，二月中定能返到重庆。国难日亟，要晓得刻苦用功。汝等外祖父母亲想安好，我虽在外，工作不懈，身体不好亦不坏，可勿念。你二人须用功算学及体操，旧邮六张两人分之，外祖父前代我请安，母亲代我问安。

到新加坡，他仍住在黄曼士先生家里。画展相当成功，新加坡总督夫妇



▲白梅（徐悲鸿，1943年）

亲临参观，并且和徐先生合摄一影，登在报上，占据很大的篇幅。同时他也筹了一笔钱，汇回国内，捐给政府。

他在给孩子的信上，说是二月中定能返回重庆，然而他这次飘然去国，往返于印度星洲之间，前后历时达三年之久。一九三九年底，又接到了他写给丽丽的一封信。

丽丽爱儿：

你的信甚好，但是你又留级，我能常常看见你在小学里，原也不错，但要你不断向上长高才好，否则一个大孩子，恋恋在小学里，会令人看轻。从此以后，除非因生病，或特别情形，不准再留级，否则你便无权利受高等教育了！

你做的手工甚有趣，我谢谢你这可爱的礼物，我现在没有什么赏给你玩，但你能好好用功，你将来玩的东西，一定很多。

我常常想到你小时候的哭声“姆妈哎——”，那时候实在讨厌，谁想你那种哭声，令我感到无限的伤逝情绪。

国家大难临头之际，各人须尽其可能尽的义务，事变之后，我们不见得会比人家更不幸福的。

父字 八月廿五世界大战前

在这封信里，他又附寄了一包荷兰邮票，而且用大字写着他的叮咛：

“荷兰邮票不可浸水。”

旁边另有一行，算是安慰伯阳的，他说：“因此信包着者是丽丽的，将来每封信都有，而两人结果所得是同样的。”

一九三九年八月，有一天我从北碚进城到曾家岩，去看吕斯白先生。吕先生刚刚接到徐先生的来信，拿给我看，我一看原来是徐先生转寄来孙韵君的一封信，信中有几句重要的话，大意是说：

“我后悔当日因为父母的反对，没有勇气和你结婚，但我相信今生今世总会再看到我的悲鸿。”然后徐先生在信末批上了三句：“我不相信她是假的，但也不信她是真心，总之我已作书绝之。”

我看完信如坠五里雾中，心里十分纳闷，我问吕先生说：

“这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要把孙韵君写给他的信转寄给你？”

“这你还不懂吗？”吕先生耸肩笑着说：“他还不是想要我拿给你看。”

当时我非常感慨，我很坦白地告诉吕先生说：

“我这个人大概是有点特别，在我看来，像徐先生这种行为，是最不可原谅而且最不道德的。徐先生如果不再爱孙韵君，他尽管把她的信退回或烧掉，决不可以将这种信寄给任何人去看。他不要以为我看到他侮辱了我的情敌，便会觉得高兴。他应该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人，相反的，我将更看轻他！”

与此同时，母亲从上海写信告诉我，她说她接到悲鸿的信，埋怨我脾气太大，分开了那么多年，他也想到我的好处。他并且在信上说，他愿意将孙韵君送给他的红豆，由他镶成了金戒指的转赠给我，表示他和孙韵君的决绝。

我捧读母亲的信，到最后一段，心里真有啼笑皆非的感觉：徐先生想把红豆戒指送给我，难道他要我戴着这只戒指，一天到晚纪念着他们的恋爱？

一日，和梁实秋先生闲谈，谈起了这件事，我还开玩笑地说：“假如徐先生真把这枚戒指送给了我，我把红豆挖下来送给你，金子换钱用。”当然以后徐先生并没有真的把戒指送我，而且，三年后他从南洋回国，大家都不曾见他再戴过。



▲泰戈尔像（徐悲鸿，1940年）

二十年后，一九五九年我作马来亚之旅，在曼士先生家中谈起往事，黄太太曾经告诉我，当年徐先生旅星时期到过槟榔屿，结识一位华侨小姐。据说徐先生和她订过婚，而且把那女郎带到黄家，曼士夫妇都见过。那女孩子既不美，又平凡，所以黄太太劝徐先生打消原定计划。她说：“这位小姐和你的夫人简直不能相比，你怎么会看中这种人呢？”后来，大概因为南洋战事激烈，徐先生急于离星，这桩婚事便不了了之。

徐先生在一九三九年远赴印度，开画展，并为印度诗人泰戈尔画了一幅素描像，其后又于一九四〇年仍回新加坡。

我和徐先生自一九三六年，他离开南京到广西去的时候起，除了一九三八年暑假他去桂林留了一封信给我以外，无论他到哪里，我们从来没有通过信。但在一九四一年六月，我突然接到徐先生一封航信，情词恳切，令我为之愕然；原信如下：

碧鉴：

三年以来，汝率两儿在轰炸之中，坚苦支持，虽增强了汝之志气，却

愈刺激我之悲痛。而此两孩曾亘一年无一书，想起终日遭受空袭之烦闷，无论如何，远方之人毫无恐怖，便不当以大较悠闲之情，以责备挣扎者之任何一切，逝者如斯，言之惆怅！吾今特致慰于汝，并告汝一重要之事，林语堂兄来函，美国援华联合会邀吾赴美，举行中国现代第一流画展。我之川资由各方友人相助，至美后便无问题。汝倘踟躇前嫌，我竭诚邀汝同行相助。所悲两孩皆在成长之时，携之同行，力所不能，必须托一好友。我此时想起杨德纯先生（庐山会过），或吴蕴瑞先生（杨先生住弹子石群力工厂，交情够得上），我希望在八月二十可以起程，汝如同意，须在得书后三日之内（七月二十以前），给我如下一电：Oni, Jupeon Chinese Consulate. Kuala Lumpur, malaya Pillevi（译文为：徐悲鸿、中国领事馆、路名、马来亚、碧微）；便即于八月十五日以前乘飞机至港，在中华书局可询得我住址也。吾今假定汝能同行者，进行护照等事（我自己有护照），美国签证颇难，但似乎可设法，如有其他一切困难，可往见季陶先生，并托黄君璧先生代办一事，及征求吕凤子先生精作数件。祝汝安善，老丈前请安，两孩并此吻之。

悲鸿 六月廿五日金马仑山中

我读完了信，觉得他的要求实在无法照办，虽然他用了“竭诚邀汝同行相助”的字样，但我也只好婉言谢绝，我立刻回了他这样一封信：

悲鸿先生大师道席：

辱承惠书，荷蒙邀赴新大陆观光，盛意隆情，良可感激。然微所以不敢奉命者，诚因福薄之人，既遭摈弃如前，无论处境如何，难再妄存荣华富贵之想。抑且老父子女，咸赖侍养，责任所在，固亦不容轻离也。日昨奉书后，本欲先行电复，孰意问询之下，一电十字，须耗百金，在此米珠薪桂之秋，百金本不足言数，无奈在穷人观之，此区区者已足影响生计，故不得已，只有作罢矣。两儿已渐长成，年来颇少疾病，丽丽下年亦将入中学肄业，此二人者倘有日成立，则微毕生之责已尽，他无所望矣。

此复敬叩旅安！

蒋碧微拜启

一九四〇年除夕，我由重庆乘飞机到成都，这次旅行是奉公差遣。因为在四川省教育厅的主持之下，以省立教育学院的名义，在成都举办了一个图书管理人员训练班。我是教育学院的图书馆主任，校方派我去主持该班的毕业典礼。

公事办妥，趁着假期，郭有守夫妇留我在成都多玩几天，一延再延，我竟在郭家前后住了十多天。郭氏夫妇陪着我，遍游成都近郊的风景名胜。我们游过锦官城外的武侯祠，百花潭上的薛涛井，英雄美人，把秦蜀古城点缀得十分生色。少城公园树木蓊郁，春熙大街行人如织，真不愧小北平的美称。大概是严君平曾经卖卜蓉城的关系，成都的半仙铁口者流特别的多。郭先生介绍了一位“不需来人开口”的神卜给我，据说当时在成都大大有名，命相极为灵验，许多达官显要都请他看过相。我一时好奇，便也去请他看一看。当我和那位神卜隔案坐下，把我的生辰时日报给他以后，他注视了我好一回，并不问我什么，他说我生性刚强，是女生男相，并且指我的性格是“一事不遂，三日不忘”，他又说我不宜早婚，如果早婚的话，不但夫妻不和，甚至将来连儿女都不是我的。他说得活灵活现，煞有介事，倒使我将信将疑，有点迷惑。最后他说我在七八年以后将会服丧；后来回到重庆，我将这些话报告父亲，父亲笑笑说：“那我还有好些年活呢。”但是后来事实证明他的断语不确。

我们去游灌县，参观了二郎神庙，途经川北最有名的竹索桥。那竹索桥和台湾的吊桥约略相仿，没有桥墩，临空架设，全部用竹子做的粗缆绳，两旁护以稀疏的竹栏杆。桥上横铺着木板，但有的断缺，有的腐朽。我们有意步行通过，试一试走索桥的滋味，我和郭太太便一左一右地拉着郭先生的两臂，把他夹在当中，三个人并排往前走，因为桥身有弹性，一经压力，便抖动起来，踏上去后，长桥立刻摇摇晃晃，下望百丈深渊，的确有些吓人。越往前走，抖动得越厉害，一面还得留神足下，唯恐一脚踏空，或是踩到了腐朽木板掉下去，势将粉身碎骨。郭先生被我们两边牵牢，颇有点儿身不由己，心里又怕，情急了，他便高喊：“你们把我抓得这么牢，叫我怎么办呢？”我看他满脸惊惶，不由放声大笑，觉得实在有趣。

回程，滑竿夫毫不在乎地在桥上飞跑，把我们抬到对岸。

在成都我曾大快朵颐，因为成都的小吃极其精美，饭馆小摊，情调都非常

好。我们尝过真正地道的姑姑筍、麻婆豆腐、吴抄手、赖汤圆以及名实相副的“不醉不归”。

还有一项奇特的尝试，便是郫县之游时坐过鸡公车。那是一种独轮的车辆，一脊中分，两旁有木架支座，可以载人，也可以运货。相传诸葛孔明当年的木牛流马，所谓木牛，便是这种古老的交通工具。鸡公车的由来一定相当久远，因为在那些青石板上，中间的一道深槽，便是一辆辆鸡公车通过时留下的轨辙。

最难得的是，某日逛游书肆，居然给我发现了一部宋拓本的《郑文公碑》，当时不禁大喜，马上将它买了下来。这部碑帖是北魏荥阳郑道昭所书，碑存云峰山，一向是习北碑者所宗。我买下它，因为忆起我在一九一七年和徐先生出走日本，旅居半年，整天关在下宿，唯有习字自遣。当时我所临的，便是这部郑文公碑，因此我在回重庆后，于卷首写了一段小记：

岁初漫游成都，得此殊喜，犹忆二十年前，曾临此半载，未尝间日，今则不复有此闲心绪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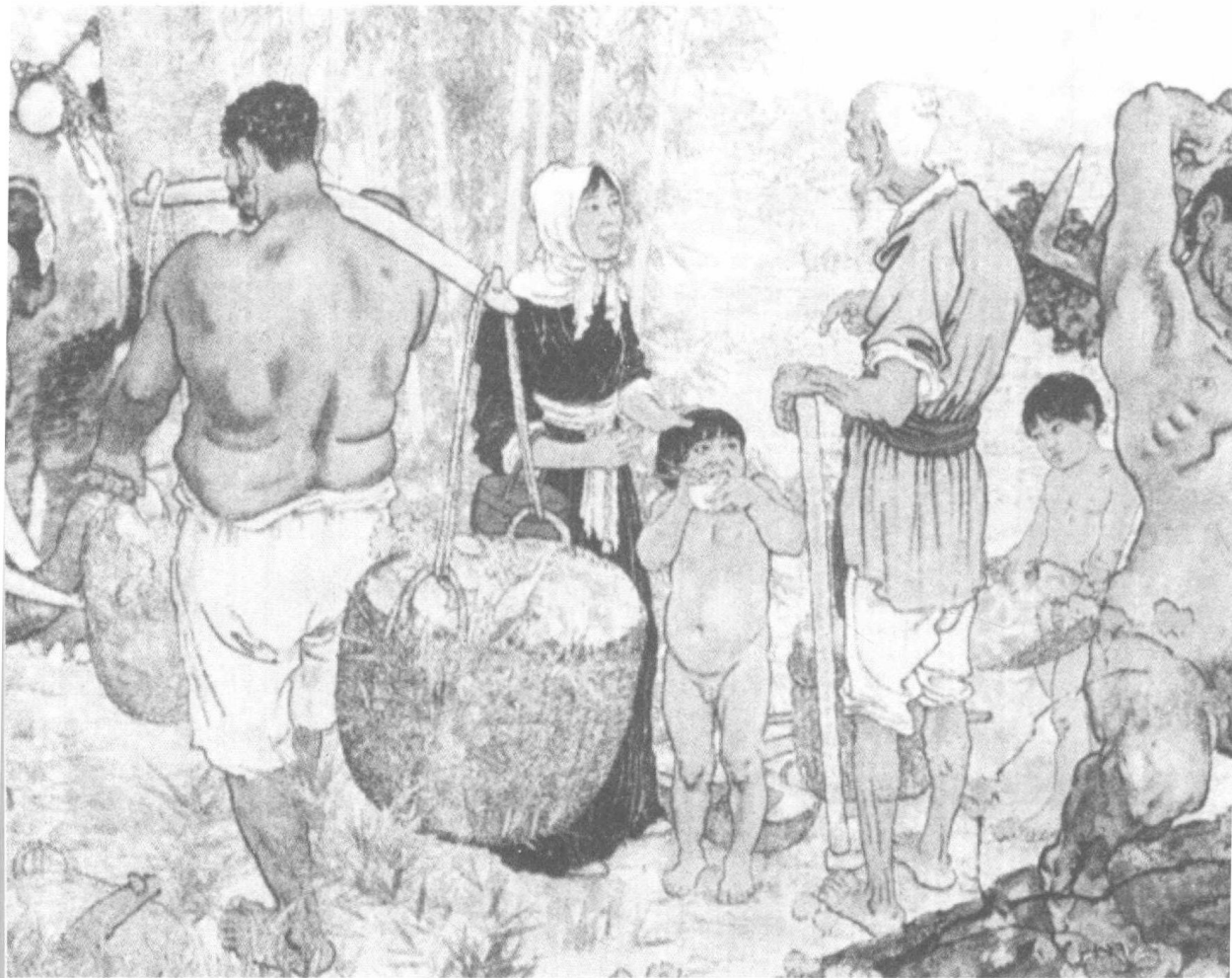
卅年二月碧微志于蜀省之教育学院

漫游成都近二十天，谢过郭氏夫妇的殷勤招待，我又回到了重庆磁器口，继续教读生涯。

一九四一年三月卅一日，一群朋友在中国文艺社聊天，徐仲年先生提起明日就是西俗万愚节，想到徐先生片面登报离婚，他要趁此机会开个玩笑，替我们登一则结婚启事。当时大家起哄，我便说：你四月一日登结婚广告，我四月二日就登报否认。徐仲年先生说不要紧，我登我的，你登你的。于是他当场拟稿，四月一日果然在《中央日报》第一版，登了这么一条大字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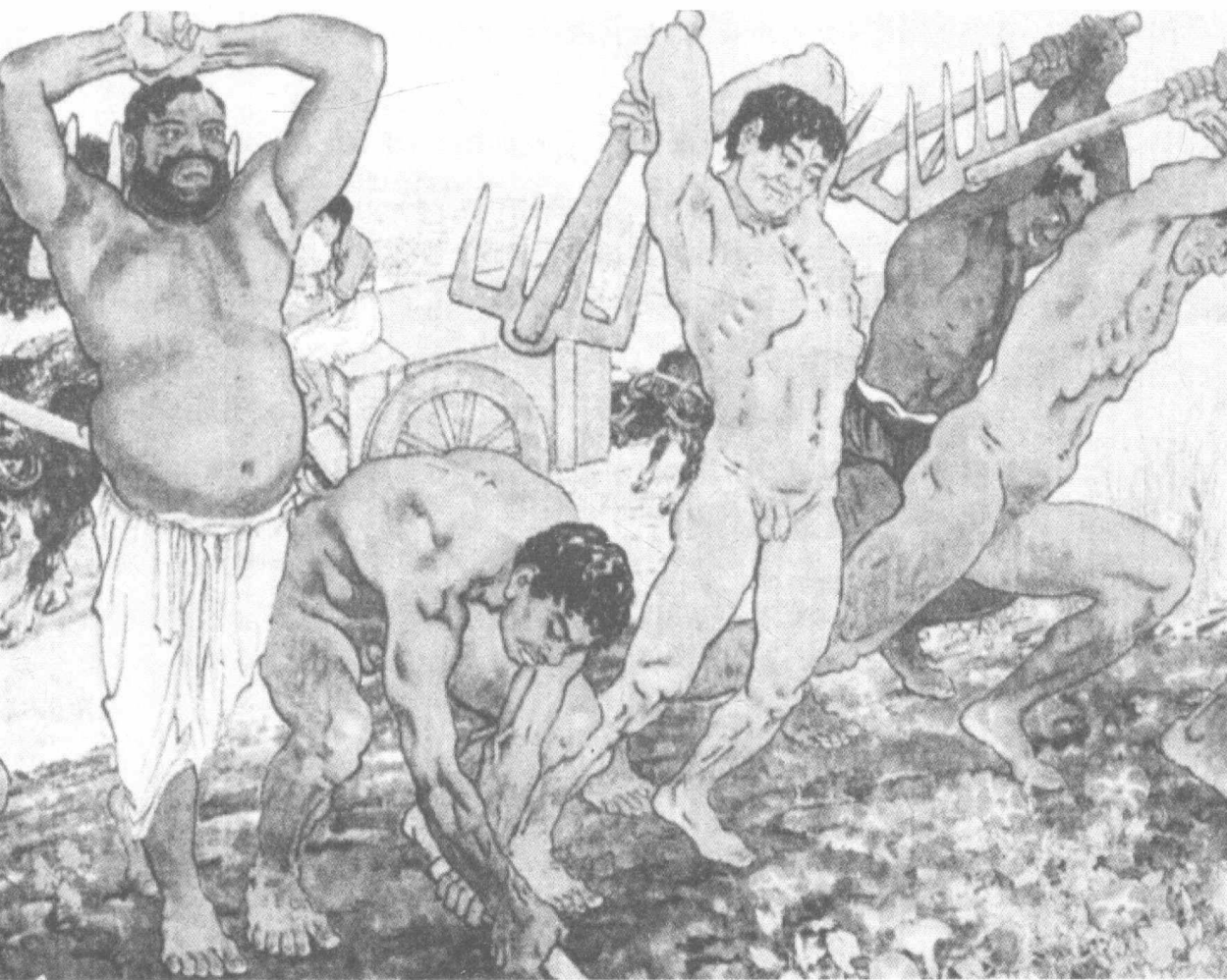
徐悲鸿蒋碧微结婚启事

兹承吴稚晖、张道藩两先生之介绍，并征得双方家长同意，谨订于民国三十年四月一日在重庆磁器口结婚，国难方殷，诸事从简，特此敬告亲友。



结婚启事刊出后，因为当时在国内很少有人想到这是开玩笑，不免有人信以为真，当日中枢举行某项会议，张岳军先生看见张道藩先生，便问他说：“至少徐悲鸿与蒋碧微是相爱的，别人才会开这个玩笑。”也有稍知内容的人说：“如果登载徐悲鸿和孙韵君结婚，大家一定相信。”吴稚老则说：“这样很好，他们正可以借此和好起来。”另一方面，在成都的郭有守先生和刘伯量先生更写信来道贺，郭有守先生并且热烈地欢迎我们到成都去度“蜜月”，他说他将“扫榻以待”。

四月二日，我的否认启事也在《中央日报》第一版刊出，文曰：



▲愚公移山（徐悲鸿，1940年）

蒋碧微启事

昨为西俗万愚节，友人徐仲年先生伪借名义，代登结婚启事一则，以资戏弄，此事既属乌有，诚恐淆乱听闻，特此郑重声明。

一九四二年四月廿六日，徐先生的得意门生，宜兴同乡画家顾了然先生，遽尔逝世，英年物化，令人痛惜悲悼不已。顾先生自与我们一家西迁重庆，一向在中央大学艺术系担任助教，他的健康情形很好。一九三九年间忽然咯血，经过检查，知有肺病，便到歌乐山疗养院长期治疗，后来竟会神经错乱，狂呼乱叫，打医生，纵火，疯癫怪态不一而足，闹得医院无计可施，只好把他手脚

吊起。他在大后方并无可靠亲人，经我请托同事马寿征妥为照料，并且略予济助。

后来，吕斯百先生为他筹开展览会，替他募集医疗费用，得到张道藩先生的竭力帮忙，连国民政府林森主席都买了他的画所以这一次画展卖了不少钱，使他维持了一年多时间。然而他的病却毫无起色，终于撒手西归。他死去以后，一切丧葬各事都由我亲手料理，他落葬在歌乐山上，墓碑是父亲的手笔，上书：“画家顾了然之墓”。

顾先生少一目，装上假眼，所以取名了然，采一目了然之意。他天分颇高，又肯努力，绘事精湛，和当年同学张安治、费城武都是徐先生的得意门生。奈何天不假年，死时还不到三十岁，尚未娶亲。他曾为我及外甥女程静子绘过油画像，都能酷肖传神。静子的像经我携来台湾。

8

一九四二年春夏之交，新加坡形势危急，徐先生因为随身携带的金石字画、艺术珍品数量既多，体积又大，运送回国势所不能，舍弃了又心有未甘，进退维谷，陷于困境，几乎已经决定留在新加坡，与他收藏之物共存亡。就在这紧要关头，他认识了一位大名鼎鼎的某“抗日将军”。

我有一位朋友也认识这位将军，据说抗战前他在夫子庙当茶房，是一个文明戏子的外甥。九一八事件发生以后，全国抗日情绪高涨，这位将军大概跑过一趟东北，回来的时候头戴翻皮帽，身穿军大衣，拍了一张照片，在杂志一登，说他是抗日游击队的×将军。以后辗转到了南洋，目的在募款接济抗日游击队，但是他后来一直留在新加坡，在那里和徐先生结识。

他听说徐先生要留在新加坡，大感讶异，连声地问徐先生：这是什么缘故？他说：别人可以留下，你徐先生怎可不走？像我们这样的人死多少都无所谓，但你是国际闻名的大画家，万一牺牲掉，那将是国家多大的损失？徐先生答说他本来是想走的，可是他所带的东西太多，没法携运。这位将军当时就拍胸脯，他说：我负责替你运回国。

有这么一位热心肠，而且有办法的朋友帮忙，徐先生当然非常高兴，于是自己带了部分收藏动身回国，安然抵达昆明。不久，这位将军也到了，他果然言而有信，将徐先生托带的大部分东西一一运来。

两个人住在云南大学一间楼上，龙云时任云南省主席，他的公子绳祖和绳武，都是留法同学。他们对于徐先生十分礼遇，招待隆重优渥，并且帮徐先生的忙，在昆明举行画展。正在高兴之际，忽然有一天，徐先生发现他珍藏的李

龙眠白描手卷，竟会不翼而飞。李龙眠是宋代大家，画佛直追吴道子，他这幅手卷画的八十七位神仙，男女皆有，形貌各异，活灵活现，在徐先生的收藏之中，大家都公认这是第一精品。这幅名画失踪，使徐先生焦灼万分。事闻于云南省府，派人调查，限期破案，然而查了许久始终不得结果。无法破案的关键，便是徐先生所住楼上，除了某将军以外，绝少有别人上去。

徐先生和这位将军到了重庆，朋友们和他的学生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觉得愤懑不平，于是有人出来找将军说话，责成他设法寻觅。闹了很久，一日他突然跟徐先生说，画已经有了着落，可是现在成都，如欲取回，必须付代价十万元。

徐先生无可奈何，只好照办。这位将军到了成都，果然就把原画带回。这期间不知是何道理，徐先生欣然于珠还合浦，当然也不再深究。

徐先生初回重庆，住在观音岩中国文艺社。第二天，颜实甫先生就去看他，徐先生见了颜先生，并不曾问起我们。还是颜先生开口告诉他：老伯和两个小孩都好，现在都在教育学院住，“尤其碧微，身兼三职”。徐先生听后，一声不响。大概他想起了从前我说过话：“倘若我将来奋斗有成，我只有离你更远！”

当天晚上，徐先生接到我的请帖，请他次日中午到磁器口便餐。据说他当时十分兴奋，和华林、陈晓南两位先生商量，明天到磁器口，应该带什么东西送给我。最后还是他自己决定，挑了一张自己的画，画中有几株芭蕉，一畦草地，草地上疏疏落落地憩着几只麻雀。这幅画裱工很考究，画轴两端是玉石的，由他自己随身带来。

翌日中午，徐先生由华林、陈晓南两位先生陪同，到了磁器口我的家里。他显得神情愉悦，送了父亲一张复印的泰戈尔画像，那是一张明信片，同时亲自把送给我的画挂在我起居间的墙上。他得意洋洋地说：过几天，等他的行李运到，还有成挑的东西送到这边。

我请他坐，奉茶，当时在座的陪客，还有颜实甫、王临一、吕斯百、华林、陈晓南等诸先生，连自己家里的人在一起，圆台面坐了十四五个人。

在客厅迎门的书架上，最高一层，放着一只玻璃镜框。镜框里一张白纸，贴着徐先生在桂林报纸上登的片面离婚启事，左下角，我自己写了“碧微座右铭”五个大字。镜框放置的位置很明显，照理说，他一进门就可以看见。



▲八十七神仙卷局部（徐悲鸿藏画）

十二点，准时入席。大家坐定以后，徐先生端起酒杯迅速地站起，这时坐在他旁边的颜先生拉了他一下，他不理，举起杯来对我说：

“过去我有好多事情对不起你，今天，我向你道歉！”

我望着他苦笑笑，然后跟他说：

“过去的事现在不必再提了。不过，你知道我今天请你来的目的吗？”

“不知道。”他说，放下杯子，同时坐回了原位，他在等候我的下文。

“我今天请你来，是为了办理移交的。因为我已经把两个孩子带到这么大，他们现在离开母亲不要紧了。我自己前途黯淡，孩子们跟着你也许比较好些，因此，我希望今后由你负责教养他们。”

他听我这样说，知道不是和好的征兆，于是，默不作声，饭菜也很少吃。直到席终，他仍然一语不发，我无可奈何，只好主动向他建议。我说：“我有三个办法，请你择一而行。第一，孩子由你带去；其次，你让我带两个孩子，但是你要负担他们的教养费用。如果这两个办法你都办不到，那么，我请你明天登报声明，否认这两个孩子是你的。后天，我再登报声明将孩子改姓蒋，以后就由我负责抚养。”

但是徐先生自始至终，不作任何表示。饭后不久，朋友们散去，徐先生也跟着走了。

徐先生走后，父亲告诉我说：悲鸿借了一支墨水笔给他。当时我还不相信，我问：“怎么会是借的呢？”但是父亲说确实借的，再问孩子，伯阳、丽丽也都说爸爸借了一支笔给外公用。我听了只好苦笑笑！

为什么会发生借笔的事，我必需把父亲这一段小小故事说一说。父亲曾在上海买了一枝廉价钢笔，已经用了许多年。在徐先生回重庆以前，那枝笔就坏了，父亲拿到沙坪坝一家铺子去修，谁知道修理费竟比原价超过好几倍。父亲想想不合算，所以就没有修。大概那天父亲提起了这件事，因此徐先生才借了一枝笔给父亲。后来父亲逝世，我便把这枝笔以及徐先生送给父亲的那张复印泰戈尔画像一起送还给他。

不久徐先生得到朱家骅先生的帮助，由中英庚款拨一笔经费，创设一所研究性质的中国美术院，院址就设在沙坪坝对岸，风景宜人的磐溪，由徐先生担任院长。当时院中的研究员，大半都是徐先生的得意门生，在艺术方面已有相

当造诣，而且绝大部分和我都十分稔熟，诸如吴作人、张茜英、陈晓南、费城武、冯法祀先生等人。

有一天，徐先生忽然又来到我家，那时父亲和我正在前面房里。徐先生把我叫到后房，我便在床沿坐下，他站在房中央面对着我，双手叉腰，神情凝重，把嘴抿了几抿，才说：

“我今天有话要和你谈。”

“我在听着。”



▲牧童（徐悲鸿，1941年）

“我晓得，我已经把你的心完全冷了下去，现在能不能够重新温起你一点心，我实在是毫无把握。不过，过两天我要到广西去，在我临走之前，我想知道你对于我究竟是……”他没有说完，但是我已经懂得他话里的意思，于是我婉转地向他解释：

“关于我们两个人的事，我有一个譬喻，仿佛一件很精美的瓷器，不幸被你打破了。尽管你找到最高明的工匠把它修补好，但是，这条裂痕永远是除不掉的，我宁可将它打碎，也不愿有假的完整。”

他听了，嗒然若有所失，默默地穿过后门，走到后面的院子。

颜实甫先生正在院子里小坐，徐先生走过去，对颜先生说：

“老兄，我最后的努力也做了，最后的希望也没有了！”

“你做了什么努力呀？”颜先生抬起头来望望他说：“到今天为止，你这才是第二次来。《圣经》里说的话：当人掴你的左颊，你不妨把右颊也送上去，你竟连这点勇气都没有？”

徐先生感慨地说：

“年龄不同啰！”

颜先生深沉地向他笑笑：

“要说谈情说爱，还讲什么年龄大小？”

徐先生当天回到重庆，第二天便动身去桂林。临走之前，他很“客气”地写了一封信给我：

碧微女士慧鉴

汝伤痕太深，有如铜镜破碎，不能再治。我自知每被见面，必致汝增加愤恨，抑吾并知关于我之一切，亦将令汝厌恶。我之于汝，将成一魔，便令吾自责，亦徒然也。吾此往当力知自处，然此半关命运，非全属人事。兹托斯百弟携上五千金，备两儿入学等之用费，伯阳须俟开学后，我方完全负责。此两月中尚须偏劳，诚自愧也。

敬祝暑安并敬为大人祝福！

悲鸿启 八月十一日

吕斯百先生送来了那法币五千元的学费，至于徐先生信上所说的“力知自处”是何指呢？不久以后，有一天，我进城到中国文艺社，看到华林先生。闲谈之间，华先生告诉我徐先生在离渝之前跑到磁器口去找我谈话，他确是想试探一下我们还有没有重圆的希望。如果有，他将继续留在重庆，否则的话，他就急于要去桂林，因为他看中了唱桂戏的一个女戏子，艺名叫冬渡兰。他想

和冬渡兰结婚。

华林先生又说：他曾力劝徐先生：“你何苦这样呢，娶个唱地方戏的女戏子，怎么成呐？”徐先生感叹地说：“现在再不找女人不行了。”他举出例证，说是最近他分别在昆明成都两地开画展，几乎就没有一个女人写信来向他表示崇拜和钦慕。我向华林先生说：他这种想法是绝对错误的。因为他应该了解，女性钦慕或崇拜画家，跟钦慕崇拜演员明星截然不同，因为后者是以他们的自身在表现，而画家需透过作品博得观者心理的共鸣。甚至可以这样说，观者爱好倾倒的仅只是画家的作品，在情感交流上，和画家本身无异是脱了节的。

桂林方面的朋友写信告诉我：徐先生一到桂林便央托欧阳予倩的太太，为他做媒，向冬渡兰求亲，其结果，是冬渡兰不愿嫁给徐先生，很直率地拒绝了。但是欧阳夫妇不便明说，在徐先生面前，就是说她已经心上有人，别有所恋。

婚事绝望，徐先生意兴阑珊，再回重庆，继续在中央大学任教，同时主持中国美术院院务。

父亲在重庆时，唯恐抽香烟容易起痰，所以总是抽土产的小雪茄烟。九月的某一天，父亲亲自到磁器口街上去买烟。从后门出去，必须经过一座小桥，再爬十几级石坡，就到了磁器口大街。老人家买好烟回家的途中，刚走下三级石坡，遇见一个挑担子的在往上走，为了让他的路，一侧身，便从数级高的坡上摔到田里，因此左手腕扭了筋，开始浮肿。照老人家的意思买了梔子来吊伤，后来渐渐地好了。可是从此身体更弱，胃口不好，食量也减少，虽然没有什么病，总是觉得浑身乏力。十二月十日，张道藩先生来磁器口，我谈起老人家的情形，问他是否可以找名中医师张简斋看看。于是张先生约我们坐他的座车进城，到张简斋诊所诊视。张医师也说不出是什么病，开了药方，买药回家煎服。

进城看过了病，回到家里，吃过饭后，八点多钟，徐先生和陈晓南先生突然来了。据徐先生说，他们是在对面山上，吕斯百先生那里吃晚饭，听说老人家不舒服，特地赶来探望。父亲身体一向很好，他有一个习惯，即使生病也不肯上床休息。所以徐先生他们来时，他正坐在藤椅里面，面对着隔开后房的墙壁，墙上悬着徐先生送给我的那幅画。



▲紫气东来（徐悲鸿，1941年）

徐先生和陈晓南先生在右边的沙发上坐好，他问起老人家觉得怎样？父亲叹了口气说：

“现在身体真是不行了，越来越感到衰弱。”

于是徐先生安慰他说：

“老人家不必太辛苦了，我看，您以后就别再教书了吧。”

“不教又怎么成呐？”父亲十分感慨地说：“从前生活倒还简单，现在是谈何容易啊！”

我在一旁听了，心情非常沉重，父亲以七十二岁的高龄，还在过那艰辛清苦的粉笔生涯，不遑休息，岂单为他老人家自己的衣食问题而已！

当时徐先生却很轻松地说：

“老人家不要想得那么多嘛！”

谈了一阵子闲话，忽然，徐先生的视线落在他送我的那幅画上，他说：

“这画不要总是这么挂着。”

我以为他是在说一幅画挂得久了，可能会弄坏，所以我连忙接口说：

“好的！我明天就换上一幅。”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种场合和这样的气氛之下，他忽然把脚一蹬，从沙发上欠身而起，向陈晓南说：

“把这幅画取下来。”

我听他这么一说，一声不响，立刻起身走到后房，拿出画叉，递给陈晓南先生。陈先生把画叉下，徐先生还用鸡毛帚子掸了掸灰，两个人把画卷起来，由徐先生拿在手中，随即告辞离去。走到门口，徐先生还回过头来说了一句：“明天我叫临乙再拿张画来！”

我被激起无限反感，心里暗暗地在说：“明天，即使有再好的画送来，我也不要。”

他们刚从前门离去，五分钟不到，颜实甫先生夫妇便自后门穿过房进来，探视父亲的病，刚好就坐在徐陈两位先生方才所坐的地方，我告诉他们说：

“徐先生刚来过，才走一刻。”

颜太太还在惋惜地说：

“徐先生才走呀！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呢！”

当颜先生殷殷慰问父亲的时候，老人家像是有点激动，右手徐缓地抬起，指向他对面空白一片的墙壁，由于虚弱无力，手臂和手指都有点发抖，他语音低沉地说：

“看看！连画都给拿走了！”

我们三个人都不敢言语，移时，老人家的眼眶里闪闪的有着泪光，他一声浩叹，无限懊恨地说：

“偏偏今天我又提到了生活问题！”

我陡觉心酸难过，咽喉梗塞，一句话也说不出。

二十四小时以后，父亲溘然逝世。这一晚的种种经过，给予我极大的憾恨和痛心，使我毕生难忘。

稍后，颜先生不胜感慨地说：“老年人病了，在他四周的东西最好不要移动，尤其是这里面还牵着情感问题。徐先生这一举措，实在是有点……”

吴稚老也说：“假如蒋老先生能够看开一点，不恼那些闲气，也许他还能多活几年！”睿智长者的感慨，意在言外！

翌日下午，我在图书馆上班，五点多钟，张茜英、吴作人两人同来看我，走进我家，看见父亲歪倒在沙发里，仿佛衰弱至极。他们看看情形不对，急忙跑到图书馆叫我回去，建议我立即把老人家送到重庆住医院。我听他们这么一说，心慌意乱地抛下手头工作，快步奔回家中。果然见到父亲神色不好，气息急促，于是我们把他先扶到床上睡好。由于磁器口地点偏僻，交通不便，我只好打电话去向张道藩先生借车。张先生答应尽快来接，可是他当时刚刚膺命出掌中央宣传部，公务极为繁忙，到晚间八点多钟才匆匆赶到教育学院。颜院长两夫妇和许多同事都来帮忙，大家一商量，唯恐路上颠簸，老人家体弱支持不了，于是请校医来先打一针强心剂。校医把了把脉，说是脉搏很细微，我听了心中又是一急。十二月间，正值隆冬，寒气凛冽，朋友们七手八脚将父亲抬进车里。张先生坐在司机座旁，我坐在后座，父亲就横躺在我身上，全身用棉被紧紧地裹住，我记得我还问老人家一句：

“爸爸脚冷不冷呀？”

他老人家有气无力地答了一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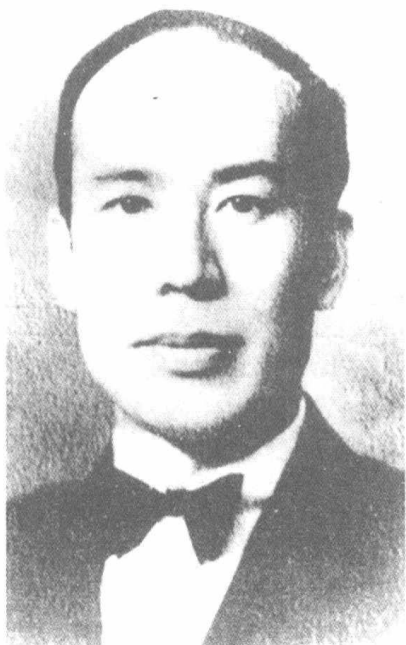
“不觉得冷。”

这就是他老人家在尘世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了。

汽车加速行驶，到了重庆市立医院，已是晚上十时。老人家被抬进急诊室，值夜医生来诊察过，劈头便说：

“已经很严重了。”

我自诩平时很能克制自己的感情，然而在那种悲怆绝望的时刻，我一听到医生的宣布，立刻便失声恸哭起来。医生连忙劝止，他说：你必须抑止悲声，因为恐怕病人听了难过。这时，张道藩先生请医生全力施救，务求竭尽一切的努力，以保全老人的生命。然而父亲毕竟年事已高，心力俱竭，医生也是回天乏术，束手无策。一小时后，时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子夜十一时整，父亲撒手人寰，溘然长逝。在他老人家旁边的，只有我和张道藩先生。



▲张道藩像

霎那间，悲痛和哀伤，啃噬着我的心。有生以来，也只有父亲瞑目不起的那一刻，使我感到从所未有的无助与自怜。一位护士小姐以悲悯的目光望我一眼，她拉起覆盖在父亲胸前的白被单，轻轻地罩上了他的脸，那张苍白、瘦削、失却生命的熟悉的脸。他曾生我育我，教我慰我，以他无比的慈爱护持我度过苦难的岁月。“从此刻起，我已成了无父之人”，这个意念，像闪电一般袭入我的脑海，我太伤心了，我号陶，呜咽，饮泣。不久外面走进来两个工友，用熟练而迅捷的动作，他们毫无表情地把父亲的灵床，徐徐移向太平间。

一只微微颤抖的手，搀扶着我的左臂，我知道那是张道藩先生在给我深切的安慰。他导引我紧紧地跟随在灵床之后，小小的送灵行列肃穆得简直没有半点声响，我机械地移动着脚步，我不相信周遭的一切是真实的，然而它们却又鲜明得使我无从置疑。

不知何时，我们已经伴送灵体来到了阴森可怖的太平间，不知何时张道藩先生离开了我的身畔，一灯如豆，淡黄的灯光在偌大的空间散布着朦胧的光影。我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傻气与胆量，突然我担心那幅白布阻塞了父亲的呼吸，我竟伸出手去揭开它。奇怪！仅仅是这么一瞬间的事情，我发现父亲的面貌和生前已有显著的改变，他已经固定于永恒的那一点，再也不见慈颜笑貌，再也没有声音警效，他已不属于我所存在的这个世界。太平间里一切都是静止的，只有我那孤独的身影，正在地面上摇曳，继续地摇曳……

蓦地有几张熟识的面孔映入我的眼帘，冰封的心扉，透过一丝暖意，满脸悲怆忧伤的好朋友，华林先生、陈晓南先生……原来张道藩先生方才是打电话通知中国文艺社的朋友们去了……朋友们从睡梦中醒来，惊闻噩耗，赶到了市立医院太平间。

“张先生亲自选购棺木去了。”华林先生语音喑哑地告诉我，“因为太平间里停灵不能太久，灵体很快就要入殓。”

我点头，表示我能理解，挂在脸颊上的热泪，跟着滚滚地抛落下来。

恍惚中又看到了徐先生，他就在我的面前，严肃的面容是我从未曾见的。就在这时，陈晓南先生说今夜陪我守灵，徐先生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愿，我无言地接受了他们的决定。有人进来又出去，有人落泪，有人发出深沉的叹息，有人走近我的身边，低声而恳切地向我说些什么，我只是点头，茫然地点头。

暗淡的灯光下，我看到徐先生在为老人家留下静静的永恒的肖像，他画了一幅素描。

五点钟了，窗外透进来一线曙光，这惨淡的曙色该是我有生以来所看到的最凄凉的一次了。我正在哀切地想着，陈晓南先生突然说他要去做办丧葬的事了。于是太平间里，除掉我父亲静静地躺着，就只剩下了我和徐先生两个人。

忽然耳朵里传来了徐先生低沉的声音：

“你不要难过了！老人家的后事哩，总得好好地办！钱的问题，你也不必担心。”

刹那间我的头脑像窗外曙色一般的清澄，我立刻想起了前天晚上，在我家里，他那不可宥恕的行为，为那幅画。

愤怒急遽地从心底升起，但是我仍忍耐着向他说：

“不然！老人家生平轻易不用人家一文钱！现在他过世了，我必须遵照他平素的意志行事，我认为这比什么都重要！至于丧事，我只求尽哀遵礼，有钱是有钱的办法，没有钱就做没有钱的打算。我必须预先声明，我决不接受任何人的帮助！”

他默然无言，东方天际，太阳涌出了云层，有一缕灿然的光，恰巧照射在父亲的脸上，他的面孔好像有点红晕，仿佛他又复活了。

“现在，我替你想想，也为孩子们着想，”徐先生又打破了岑寂，像是在对我加以试探：“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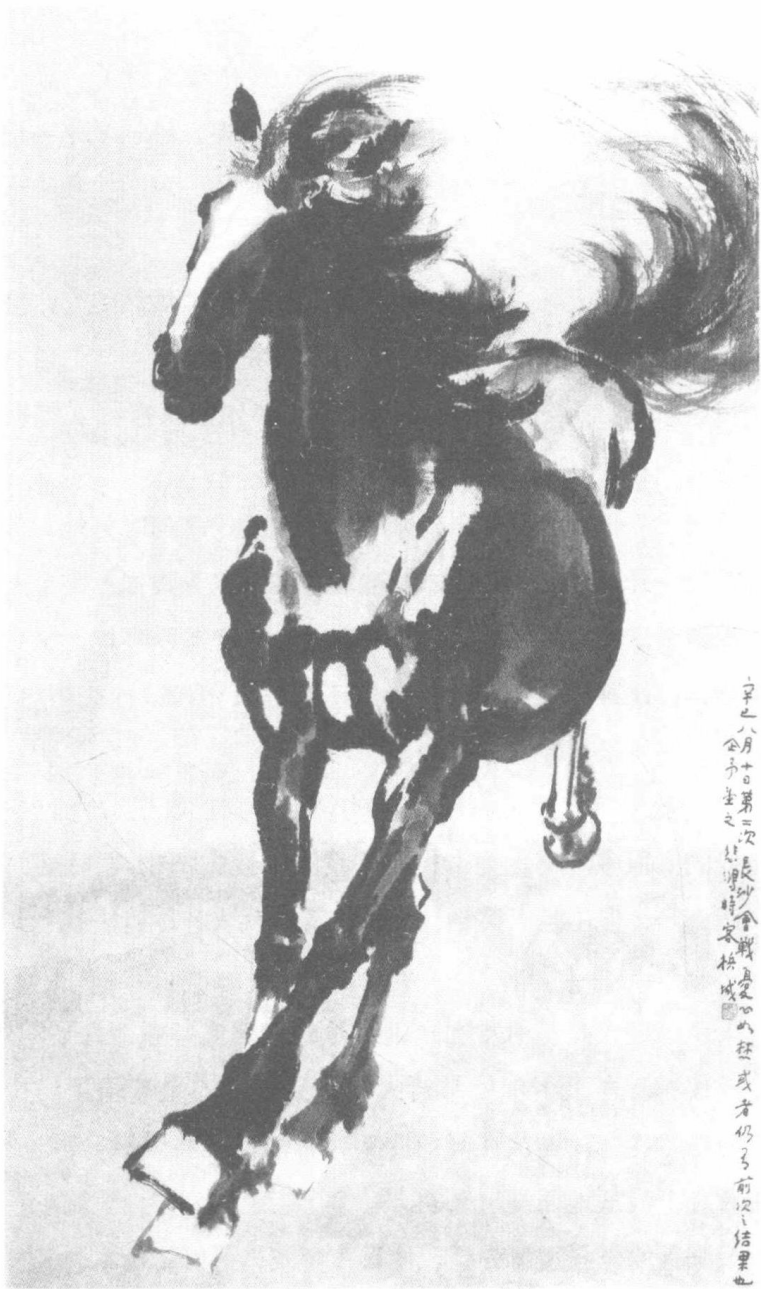
我恨恚已极，为什么二十年来他永不更改，无论在何时何地，什么样的情境，他只要跟我一开口，便是以他本身的利害或意向为前提？完全不顾我的心境和情绪？我遭了这样大的变故，心里的悲哀，正在难以支撑，父亲还僵冷地躺在我们旁边，在这种情况下，他居然还有心来和我谈什么情感上的问题，我真为父亲二十六年来对他的错爱而抱屈。

“算了吧！”我义正辞严地打断了他的话：“我们既已分开，一动不如一静！天下离异的人很多，不足为奇！你和我的个性太不相同，勉强再在一起，将来万一又闹离婚，岂不是大笑话！如果你需要女人，尽管去找吧，难道我还会跟你捣乱不成！”

这时，天色已经大亮，朋友们闻讯纷纷赶来帮忙办事，太平间停灵不便，重庆又没有殡仪馆。当天中午就举行大殓，父亲穿的是蓝袍黑马褂，盖棺以后，朋友们纷纷行礼，我匍伏在灵前叩头，悲恸得几将晕厥，再也抬不起身，记得还是张茜英把我从地面拖起来的。

那一天最辛苦的是张道藩先生，他日夜奔波，买好了棺木，又和马寿徵先生到歌乐山去勘定莹地。马先生也是早年留法比的同学，而且也是我的同事，歌乐山一带都归他管理，因此在他的鼎力协助下，十三日圹穴便已做成，吉时安葬。

出殡那天，我从市立医院扶灵到上清寺，再改乘汽车。有大批送葬的朋友护送灵柩，直驶歌乐山巅。徐仲年先生刚好路经上清寺，看见了我们，才知道父亲的逝世，他临时参加了我们的送葬行列。



▲前进（徐悲鸿，1941年）

父亲一生，除了潜心经史，于诗古文辞致力尤多。他在任教之暇，还喜欢研究医书，因此兼擅岐黄之术，只是从来没有悬壶济世。抗日军兴，后方医疗设备不足，他老人家在重大教院执教时期，两校师生和工友，常来请他诊病，夏天暑热，求诊者更多，而老人家向来不收诊金。所以他逝世以后，接受过他

诊治的人，感念他的恩惠，不知有多少人远道亲来吊祭，盛意非常感人。此外，国民政府行政院曾予明令褒扬，颁发恤金，更是无上的哀荣。

老人家平生淡泊自甘，宁静致远，当了四十多年教授，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私人积蓄总共只有一万余元，加上四川省教育厅的抚恤，行政院恤金，凑集起来，仅够丧葬费用。徐先生在落葬之前日，请陈晓南先生送来两千元，我敬表心领，当即退回。

父亲逝世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内心的悲恸难以言宣，想起平素父女相依，朝夕相对，如今只剩下我茕茕一人。每天早上一觉醒来，眼泪便夺眶而出。最艰堪的是坐上饭桌，独据一方，仿佛老人家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筷子还没有举起，就情不自禁地心酸落泪，简直使我茶饭无心。后来想想，我生来不是多愁善感的人，那段时期的哀痛逾恒，无疑是父女情深，天性使然。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一日，亦即父亲逝世百日之期，承叶楚傖、陈立夫、张洪沅、颜实甫、章桐、程天放、余井塘、章益、张道藩等诸先生发起，举行追悼会，会场在重庆夫子池新运服务所。

也不知道是由于巧合，还是徐先生的故意安排，偏偏他的画展也选在那一天揭幕，因此他当然很忙，追悼会时间已到，仍不见他的踪影，只有他所送的花圈，引人注目地放在礼堂正中，他在下款用的是“甥”字。

大家等他等得心急，傅斯年先生在批评他的不是，还有许多朋友也在议论纷纭；最后徐先生匆匆地赶到，我已带着伯阳、丽丽跪在家族席上答礼。徐先生步入礼堂显得有点进退两难，踌躇不决，因为他不在家族席上恐怕受人批评，走到我身边又怕我当面拒绝。终于他还是站在来宾群中行的礼。参加公祭者除上列诸位发起人之外，还有吴稚晖、陈树人、潘公展等诸位先生，共约三百余人，各方致赠的诔辞挽联多达数百件。

行礼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老人家膝下只有姊姊和我两个女儿。儿时父亲特别怜我，长大成人也与我沐受父亲的慈晖为最多。在这漫天烽火，万里流浪的大动乱时期，也只有我一个人替他料理后事，因此更增加我的哀痛。

父亲的著作有《国文法教本》、《学诗法》、《庄子浅训》、《诗范》、《理斋类稿》、《国学入门》、《理斋近十年诗词》、《词学概论》，以及尚未出版的《诗苑释词》等书。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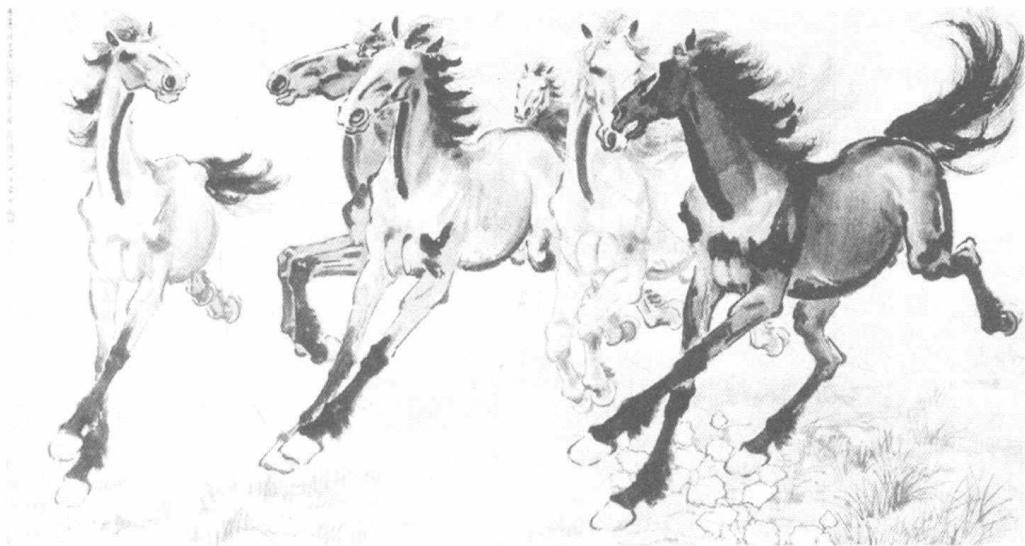
父亲逝世才九个月，我又一次遭受了无可比拟的悲痛。有一天接到姊姊从沦陷区辗转寄来的信，告诉我母亲在南京一病不起。母亲的弃养，是我终身无法弥补的憾恨。父亲间关万里逃抵西南的那年，母亲因为年高体弱，路途遥远而未能随行。从此她老人家便陷落在上海，茕然一身，乏人照料。尤其是当时上海食物缺乏，食油荤腥很难买到，她老人家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后来二堂兄在南京任职，二哥二嫂想到母亲独居上海，实在寂寞，于是便把她接到南京去奉养，对待她老人家非常之好，闲居无事，便打打牌，听听戏。父亲过世以后，南京方面早就得到了消息，只是始终瞒着她不敢讲，因此母亲经常惦念父亲，为何那么久没有信来？情绪不宁，忧心忡忡。九月间突然中风，二哥二嫂连忙请医生为她诊治，并立即电告在宜兴的姊姊，姊姊接电赶到南京侍疾，起先好了一些，后来又起变化，竟然医药罔效，她老人家就这么撒手西归。

自从我到重庆以后，私心一直在盼望，等到来日胜利复员收京，我要好好地侍奉父亲母亲再过几年安乐的日子，以娱他们的晚年，想不到昊天罔极，上苍竟连这个小小的愿望也不让我达成！

姊姊告诉我说：他们已将母亲的灵柩暂厝在南京上海路边的荒地上。

父亲逝世前后，伯阳、丽丽两个孩子都在沙坪坝南开中学读书，家里面只剩下我一个人，坤生、同弟实在闲得没事。有一天，坤生进来告诉我，说是有人介绍他到中国银行福利社工作。我觉得他也应该出去找个求上进的机会，当时就表示赞许，准他去了。

两三个月以后，突然有人带信来说，坤生不知为了什么，跟人家打架，被人一拳击中肚皮，顿时昏厥过去，现在已经抬到了市立医院。我听了之后先劝同弟不要着急，派人陪她去探视。她们见到坤生在医院没有病房住，就躺在市立医院的走廊地上。这时候坤生已经苏醒，他吵着要回家，同弟她们别无办法，只好雇车把他带回家来，将息了好几个月，方才渐渐地康复。到这时我们才发现他既患肺结核，又有气喘的毛病。



▲群奔（徐悲鸿，1942年）

不久，张道藩太太带着女儿，到兰州去养病，张先生自己一个人住在文化会堂，需要雇用一个人能够负责照料他的人，又要会做饭，又要能够应对洒扫，同时更须信任得过。我想坤生可以适合这么多的条件，因此便将他介绍过去。张先生果然觉得他很得力，从此就把坤生留下，一直跟随着他，由重庆而南京，由南京而台湾，都是在张先生的办公室工作，直到一九五五年六月一日——史坤生病逝台北新店乡间。

一九四三年暑假，伯阳在南开中学初中部毕业，我当然很高兴。不过这孩子读书不大用功，一九三七年我把他和丽丽带到重庆，起先进的是川东小学，后来又转到巴蜀小学住读。小学毕业，考上沙坪坝南开中学，功课都不算好。尤其是他生一种夜溺症，每夜都要遗尿，住在宿舍里，乏人照料，他自己又怕

羞，潮湿的被褥不好意思拿出来晾晒，因此身心双方都觉得痛苦，使我也极为难过。父亲说给他吃白果、吃龙虱，什么药方都试过，可是全不见效。放假时被褥带回家中，总是全部烂掉。这个毛病，直到他十四岁以后方始渐渐地痊愈。

初中毕业，身体较好，我们很为他庆幸。回到家来，他却一刻也待不住，成天想往外面跑。当时教育学院有一位毕业同学郑先生，他的太太在教院任助教，所以他们也住在教院宿舍里。他家弟妹很多，非常热闹，于是伯阳便一天到晚待在郑家。我见了生气，责骂他，他置之不理。我为这件事心里很不愉快，同时又恐怕他老不读书，暑假后考不取高中，所以我就把他交给好友郭有守先生，带他到成都，考入华西中学。

刚刚念了一个学期，大后方如火如荼地展开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大字标语，贴得满街都是。忽然有一天，我接到郭有守先生的电报，他通知我说：伯阳瞒住了他，偷偷地报名从军去了！那时候，他的十足年龄，还不满十六岁！^①

接电之后，我内心有无比的伤痛。诚然，别人的儿子可以去当兵打仗，我有什么理由阻止自己的儿子从军报国？不过，午夜扪心，我不能不自疚与惭愧，由于我的性格比较严峻，生平最不善于表现感情，更不会以温言细语去对待人，加以十多年来遭受家庭变故，心理上一直悲哀沉重，而且为了独立谋生，又常把孩子寄居学校，因此对于孩子的抚育照料，难免有所欠缺。孩子们处在这样残破不全的家庭里面，当然是得不着多少温暖的，因此我不讳言，伯阳的从军，与其说是由于一时的冲动，不如说这是家庭环境所造成的必然后果。

伯阳从军以后，受过短暂的训练，旋即编入孙立人将军所率领的新一军，开拔到缅甸，转战于蛮荒异域的丛林草莱之中。抗战胜利后，新一军返国接收广州，随即又开往东北。一九四六年底我复员返京，才托钱昌照先生致孙立人将军，请准伯阳退伍。一九四七年夏他回到南京来，我们母子才重逢。那时候他简直是个大人了。

一九四三年，徐先生专程再到桂林，登报招考中国美术院图书管理员，规定只收女性。笔试由张安治先生主持，口试由徐先生亲自评审。报名者多达五十余



▲ 鹅闹（徐悲鸿，1942年）

人，最后录取了一位湖南籍的女学生，徐先生给她改了名字，叫做廖静文。

廖静文当时十九岁，高中程度，家世大概还不错，她母亲早逝，因为不满她父亲所娶的后母，姊妹二人先后离开家乡，自立谋生。她姐姐在贵阳，就读于贵州大学，她应征投考中国美术院图书管理员，目的在得到免费赴重庆的机会，当时她一心只想升学。

徐先生亲自带着图书管理员回重庆，在桂林上车，买的是卧铺票。送行的

朋友，亲见他们同一卧车，而且在上车的时候，管理员的行李，是徐先生帮她提着的。

到了重庆，住入中国美术院，院长和管理员先分开来住，廖静文和张蓓英女士同住一个房间。每天一大清早，徐先生就要过来找廖静文，他们的关系渐渐公开化。

翌年暑假，徐先生的一位四川朋友杨德纯先生请他到南岸山上避暑。一日，遇见一位留德医师谭守仁，谭医师看徐先生面部浮肿，气色不好，就在杨家为他检查，检查的结果说他病势相当严重，劝他立即进医院治疗。但是，徐先生说他自己并不觉得怎样，另外请了中医、西医看病，据说有一位中医师把过了脉，说：徐先生的病不可忽视，调养得好还可以拖个十年八年，否则的话也许只有三年两载。

杨先生看看徐先生健康越来越不行，只好将他送到中央医院。医院为徐先生检查，说他是肾脏病，后来渐渐地影响到心脏，最后更形成血管硬化。

徐先生在中央医院住了几个月，病况稍有进步，又回磐溪。

此后不久，徐先生忽然向我提出离婚的要求，他委托沈钧儒律师跟我开谈判，于是我便敦请端木恺先生担任我的法律顾问，两位大律师通信商议，我提出初步条件为赡养费一百万元，另外要他一百幅画。谈到伯阳、丽丽的教养费用，我告诉端木先生说：我们先不提出条件，且等徐先生看他如何主张？孩子们现在都已经在念中学了，一个月需要多少费用？徐先生不难算得出来。不久沈钧儒先生写信通知我们，说是徐先生愿付两个孩子每月各两万元，全年一共是五十万元。我当即表示同意按照他的条件办理。但当端木先生复告沈先生以后，徐先生竟然翻悔，反说数目太大，他没有那么多钱。

徐先生为了这件事，还在沙坪坝请了一次客，请的都是多年老友，如宗白华、徐仲年、吕斯百、王临一等诸位先生，席间徐先生大骂我敲竹杠，不应该问他要“那么多的钱”。

宗白华先生对于我们历来的情形都很了解，他当时就语重心长地说：

“悲鸿，假如我处在你今天这样的地位，哪怕写文章，赚稿费，我也要解决离婚问题；何况，你是画家，多画几张画不就行了？”其余的几位先生也都

劝他还是答应了，早点办好手续好。他一听，觉得大家并没有以为我不对，因此，这一顿饭也就毫无结果而散，而离婚的事件又再延搁了下来。



▲徐夫人像（徐悲鸿，1947年）

转瞬间，到了一九四四年初，徐先生又去登报，再度声明与我断绝“同居关系”，这一次的广告用特号字体的“悲鸿启事”，刊于二月九日的贵阳《中央日报》，其文曰：

悲鸿与蒋碧微女士因意志不合，断绝同居关系已历八年，中经亲友调解，蒋女士坚持己见，破镜已难重圆，此后悲鸿一切与蒋女士毫不相涉，兹恐社会未尽深知，特此声明。

三天之后，在当月十二日，再登启事正式宣布和廖静文订婚，广告是一行大字：“徐悲鸿廖静文在筑订婚，敬告亲友”，当天还请了两桌客。

接二连三地刊登启事，可能徐先生自己想想也觉得太不应该，于是他在给吕斯百先生的信上最后说：“又做错了事情，准备回重庆挨骂，赔罪。”

当时刘大悲先生还在贵阳办农场，一见报上所登的启事，顿时就剪下来寄给我。我见到了剪报，真是气得发昏。时值中国美术院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举行画展，美术院的全体同仁都在场，我匆匆地跑到那边，把剪报拿出来，请所有的朋友过目，我说：

“徐先生毫无理由地一再给我侮辱，这一次，我实在不能再容忍了。我要控告他，但我不是控告他重婚罪，而是要控诉他侵犯我在社会上独立生存的自由。”

所有的朋友全都无话可说，脸上有着不胜惋惜的神情。就在这时有人告诉我，徐先生今天要从贵阳赶回重庆，主持这一次展览会。

大家正说着话，徐先生忽然在会场门口出现，他一眼看到了我，惊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朋友们提议，一齐到中国文艺社去吃晚饭。当时已近傍晚六点，一群人簇拥着徐先生和我，由两路口转赴观音岩。走到半路，徐先生趁机说了一声“我还有事”，急急忙忙，一溜烟地跑了。

我被朋友们请到文艺社，他们叫了菜，又备了酒，劝我不必生气。徐先生的学生们频频向我敬酒，代替他们的老师向我赔不是，我为这些朋友的热情深深感动，因此我向他们说：

“你们老师的种种行为，实在是太不应该。不过，你们都是我的朋友，我要是有所举动，于你们的面子也不好看，我虽不再顾惜徐先生，但我还不愿失去你们的友谊。所以，请你们尽管放心，我不会使他过分难堪的。”我还说：“徐先生的举动不仅轻率，而且缺乏常识。他最令我气愤的是，第一次为了追求孙韵君，片面刊登启事和我脱离关系，如果那一次的启事具有法律效力，他

又何必再登第二回？如果第一次的启事不能生效，那么再登一百次也没用！可恨的是，他连这种最简单的法理都不懂。”

当时在场的人，对于我所说的话，都表示深具同感。饭后，我回磁器口，当即写了一封信给徐先生，向他表明我的态度，我在信上写着：

书奉怀慈室主人座右：

敬维垂鉴，窃碧微与君结縞二十余载，其间经过，初则恐惧忧惶，继则辛酸困苦，虽未极人世之惨痛，然何尝有一日之安宁？而浩天不悯，尤以为未足，令君中途变心，至破家室。碧微自知罪孽深重，岂敢怨天尤人，是以捐弃以还，唯知振奋，力图自存，冀能不仰给于人，而两儿之教养，亦自认为天职，未尝一日忽怀。乃不蒙谅解，反对微怨恨日增，疾嫌备至，不特利我之摧毁，抑且置儿女于不顾。窃思我遭天谴，应受苦厄，弱小何罪？被此无辜！伯阳既绝望投军，不知生还何时？丽丽虽深知奋发，可怜担负无人！此情此境，凡我友人，莫不洞悉，然屡请



▲懒猫（徐悲鸿，1943年）

人转达微忱，君咸听若罔闻，毫无责任之心。以微之识君，固难信其绝无良心，然证诸事实，则又似人性全泯，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君所以至是者乎？碧微迫不得已，乃延律师致书于君，而所提条件，咸为君力所能，至其价值，实卑不足论，因微只求度过抗战难关，初不望此区区者，能惠及将来。然君犹以为苛求，不惜诉苦言穷，一再议价，至令闻者，莫不窃笑。因此等事，固不能如货物之贸易，其理甚明。碧微素性率直，言出必行，行必不改，然事先亦必有深长考虑，然后出之，非若君之全凭冲动，随口声诺，信手书凭，而事后无一践行，此则应请熟虑是幸！至于诉诸法律，非碧微初意，抑亦所有友人不愿吾人有此结局。故多年来，虽屡受登报之辱，终无报复之行，盖碧微一本古人“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之训，初非因无把握而不敢为也。且微向不为损人利己之事，倘欲快一时之心，又何尝不能令人一尝铁窗风味？然自问良心未泯，纵此时与君，生有嫌隙，然究曾为夫妇二十年，亦未能忍情若此也。抑君此时，已爱助有人，心焉可慰，体健康复，幸福绵长，当可忘怀于碧微之罪戾衍尤，亦以见君子之恕道也，冒昧陈辞，诸准谅宥。专此即请

艺安

蒋碧微敬启 卅三年七月十六日

我也曾去看过朱家骅先生，告诉他徐先生登报的事，我并且说：

“我今天来，并不是要请你帮什么忙，只因为悲鸿是你所器重而支持的人，当然不愿见他以私害公，由于个人的行为，而有损中国美术院的声誉。所以我是来告诉你，我对于他的行为已经超过了我能容忍的限度！”

朱先生婉言地劝慰我，请我不必生气，他说他要和张道藩先生商议商议，应该怎样处理这件事情。他并且十分痛心地说了一句：

“我看悲鸿恐怕是有神经病了！”

女儿丽丽已经十六岁了，从学校里放假回家，听到了这件事情，当时觉得非常气愤，她写了一封信给她父亲，信上悲恻地写着：

爸爸，我要问您，为什么您每次追求一个女人，就要登报跟妈妈脱离

一次关系？假如您还要追求十个女人，您岂不是还要登十次报吗？

徐先生读过了信十分尴尬，无从答复，他请陈晓南先生帮忙，“快去安慰安慰丽丽”。

一直拖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我的律师端木恺先生已经飞回上海去了，我们的问题仍未解决。有一天，我直接去看沈钧儒先生，商议我和徐先生的离婚问题。沈先生跟我谈得很好，他告诉我上次所提子女教养费，是徐先生请他代拟一个数目，于是他便亲自去向许多有孩子念中学的朋友打听，打听的结果一个中学的孩子每月至少要用两万元，因此他才提出伯阳、丽丽教育费一年五十万元。不过事先他没有征求徐先生同意，想不到徐先生竟会拒不应承。

说到这里，沈先生突然向我说：

“你们两位好不好不离婚呀？”

“那为什么？”我很惊异地说：“我答应离婚，完全是为了成全徐先生，好让他和廖小姐结婚。”

沈先生连连地摇着头说：“我看你们最好是破镜重圆。”

“现在事情已经闹到了这个地步，”我无限慨叹地说，“确实是无法挽回了。”

最后我托沈先生转告徐先生，我们的问题闹了十四五年，如今抗战胜利，我再也不愿把这个问题拖回南京，我坚持要在最短期间解决。

终于徐先生同意了一切的条件，不过他保留一点，那是因为伯阳正在从军，他说伯阳的教育费，需等他退伍回家继续升学时再起付，我听了之后，淡



▲1948年在齐白石家，右起：徐悲鸿、
吴作人、齐白石、李粹

然一笑，也就无可无不可地应允了。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签字离婚仪式在重庆市沙坪坝重大教授宿舍张圣奘先生的家里举行，到场人士除了我和徐先生，证明律师沈钧儒先生以外，还有张氏夫妇，以及两位证人马寿徵、吕斯百两位先生，以及我的女儿丽丽。



▲1947年徐悲鸿、廖静文和孩子在北京

徐先生到得很早，他神情颓丧，脸色苍白，手里拎着一重庆流行的粗布口袋，那里面盛着一百万块钱和一卷不曾裱过的画。自始至终，他一直低着头，四点多钟的时候，有关人士签字盖章完毕，手续告成。徐先生匆匆地先走，然后马上回歌乐山，吕先生回磁器口。我谢过了主人，带着丽丽就便搭乘沈先生的汽车，直驶重庆。在中国文艺社度过了胜利后的第一个除夕，

又到钟宪民、钱英夫妇的观音岩寓所，打了一夜的牌。

必须补充一点的是，由于上海乱造谣言，说我问徐先生要了几万美金。事实上当时的国币一百万元，大约可抵普通公务人员一年的薪水，或者是复员回南京两三个人的旅费。至于争执最久的子女教育费，在一九四六年一二三月每月都寄了二万元，四月因为他已动身东下，分文未付，后来到了北京，曾陆续寄过数十万元，但因币值跌落，已经不值几何。等到女儿丽丽考取了金陵女子大学，徐先生曾在信中附寄了十元金圆券给她，而那时我为丽丽缴付的第一个学期学费，即为金圆券一百七十余元。

徐先生是于一九四六年春买棹东下，回到上海，和他的二弟寿安见过了面，乘津浦路车到北京，就任北京艺术学院院长。徐先生留在北京，于一九五三年九月逝世，得年五十九岁，恰在他患肾脏病十年以后，那位中医师的预言果然灵验。

在徐先生画室里，他经常挂着一副对联，那是他集前人句亲笔写的八个

大字：

——独持偏见，一意孤行。

横额是他的斋名：

应毋庸议！

注释：

①在母亲写的《蒋碧微回忆录》中，说我是1943年参加远征军的，这是她记错了，实际上我是1944年参加远征军的。为了说明情况，特将我的入伍情况补充如下。

1943年7月，父亲带领中国美术学院的全体正副研究员，一起去灌县青城山写生，那位刚从桂林带回来的“秘书”、19岁的廖静文小姐当然也一起去，因此母亲心中十分不甘，于是托人带话给父亲，要他将两个孩子也带去，父亲答应了。出发那天，母亲带了我和妹妹，还有我们两人的简单行李，从磁器口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教职员宿舍走到沙坪坝集合的地方，将我们两人交给了父亲。

出发时，父亲和廖小姐，还有我和妹妹，坐上了一位企业家杨公庶（杨度之子，也是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的大舅子）的面包车，其他人坐了另外的车，出发到青城山。

灌县青城山是川西著名的风景胜地。到了山上，我和妹妹，跟着父亲还有廖小姐住在天师洞，其他人住在上清宫和其他的洞中。那些正副研究员们安排好住处后，即各人背了画箱、画架、画布到山上去画写生，父亲就留在洞中画画，我和妹妹就到山上去玩。当时只顾得玩，却完全忘记了我那年已是初三毕业，暑假中必须要重考高中，等我记起来时，已经来不及了。当时我从青城山赶回成都，住在华西前坝郭有守伯伯的家中。他见我因无法赶回重庆沙坪坝去参加入高中的考试而发愁，就劝我说：“你就不要赶回去了，我这里华西坝上

就有一所华西协合高中，我保证让你进去。”他的意思是不管我考不考得取，他都能让我进去。我想了一会，没有别的办法，于是就答应了。这样我就没有和父亲、妹妹一起回重庆，而是一人留在了成都。后来我参加了华西协合高中的入学考试，居然考取了，没有要郭伯伯帮忙。华西协合高中是一所教会学校，由几个教会联合办的，每个教会盖了一座宿舍楼，我住的是圣公会，其他还有英美会、美以美会等。刚入学时，父亲托了他的另一个好朋友，四川省防空副司令陈离将军照顾我，于是我每到星期六就到陈副司令的大儿子陈隆培的家中去住一晚，星期日晚再回学校。白天一个人去看电影，什么《钟楼怪人》、《魂断蓝桥》、《翠堤春晓》……都是那时看的。后来渐渐地出现了许多描写太平洋战争的美国片子，如攻打中途岛、塞班岛、瓜达尔康那尔岛等的战争片，感到特别过瘾，而同时对美军装备的精良产生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那年的寒假，实际已是1944年，我一个人在学校中过的。但在暑假将临时，郭伯伯告诉我一件事，说张伯伯（张道藩当时已是海外部长）来电话，要他帮我买一张到重庆的飞机票，我听后真是高兴极了。

动身那天，郭伯伯用他的车送我到机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滋味很不好受，幸好时间不长，很快就到了重庆的珊瑚坝机场。可是降落时才发现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下机时十分狼狈，只好冒着雨跑到出口处，母亲和张伯伯早已在等我了，大家立即上了车，回到磁器口的家中。

一个暑假很快就过去了，张道藩伯伯给我联系了一辆邮车，坐它回到成都，回到了优美的华西坝的学校宿舍。没过几天，就爆发了一场成都市空前的大学潮，起因我已记不清，就是记得有一批警察到一所中学去抓男生，而一群女生站出来排成一排挡住了警察，不让他们去抓男生，警察就动手打这些女生，打伤了几个女生。消息传出，引起公愤，学校间互相串联，决定发起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向当局讨回公道，而我们华西高中最积极，到华大、金大、金女大、川大等多所大学去发动。

到了那一天，各学校的游行队伍纷纷走上街头，我们学校更是积极，首先集队走上繁华的春熙路，一边走，一边喊口号：“打倒方超（成都市警察局长）！”“打倒余中英（成都市长）！”马路两边站满了看热闹的市民。那些平时

受警察的气的人力车夫看到我们最高兴，主动要我们把标语贴在他们的车身上，好出出气。游行一直继续到傍晚，各校的游行队伍已各自解散，惟有我们学校的队伍走到当时的西南长官公署的门前，代表们进去谈判，要求解决问题。等待了很久，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大家也就都散去了。

两天后，报上登出了一条消息：方超与重庆市警察局长对调，余中英与重庆市长对调。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

大家回到学校后，都没有心思上课了。一天，我一个人从学校所在的华西后坝闲逛到前坝，正走到离校门不远的金女大的大楼前，见到一名穿灰棉军装的青年军官，在那里高喊：“有谁愿意参加远征军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报名。远征军是全副美式装备，由美国军官训练的。”我一听“全副美式装备”，立即联想到我看的那些描写太平洋战争的美国电影中那些场面；再由于自己长期生活在破碎家庭中，得不到父爱，得不到母爱；又赶上那时日本鬼子大举进攻华南，占柳州、陷桂林，一直打到了贵州的独山，而盟军中国战区的指挥部也发出一个响亮的号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爱国的青年教师、学生参军打日本鬼子；这时我又想起我们一家原来住在南京傅厚岗6号那座“危巢”的花园洋房中，多么幸福，是可恨的日本鬼子，把我们赶到了重庆，不把日本鬼子打垮，根本别想过好日子。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走到那位年轻军官面前，说：“我报名。”那位军官看了我一下，然后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他，他写下了我的名字，并把我带到一个地方，发给我一套灰棉军装，让我回家等待，到出发那天，会通知我。

我高高兴兴地领了那套棉军装，回到学校宿舍，立即脱掉了身上的校服，换上了棉军装，而且十分得意地跑到郭伯伯家，告诉他我参军了。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一看到我换了军装，脸色立即变得我都几乎不认得了，他立即发出命令，把我看守起来，让他的司机把住前门，另一个男佣人把住后门，绝对不准让我离开这个屋子。

接着他就立刻打长途电话到重庆，告诉了张道藩。张伯伯知道后也十分吃惊，于是就在电话中和我直接通话，大意是：我现在不能走，因现在我父亲正在患重病，母亲也离不开我，想参军可以将来参加青年军，等等等等。可是我对自己在一个破碎家庭中长大的痛苦滋味已经忍无可忍了，我得不到家庭的温

暖，得不到双亲的关爱，我活着也是活受罪，还不如走上战场，打日本鬼子，真的牺牲了，那也是为国捐躯。所以张伯伯在电话中虽然一再地劝说，但我毫不心动。

最后我作了妥协，答应了脱去军装，仍返校读书，但他规定我必须每天回郭伯伯家住。这样我每天仍到学校上课。

过了没有几天，忽然接到那位青年军官的通知，说：“今天下午就出发！”我告诉他，我的棉军装已被扣了，他于是又给我拿来了一套，换上后，即把我带到中央军校成都分校。我从那里给郭伯伯家的老女佣徐妈（她是我们住在南京傅厚岗的“危巢”时，就已很熟的女佣）打电话，说我今天晚上要和陈副司令的侄儿一起去看电影，看完就上他家去住，因此今晚就不回来住了。就这样，我和其他十几个来集合的报名同学，坐上了一辆面包车，一直开到新津机场。当晚也没有地方睡，我和一个同学就穿着棉军装，躺在用大块鹅卵石铺成的停机坪上睡了一晚。碰巧那晚天空发生了空战，只看到一串串红色、绿色的子弹链在空中穿来穿去，十分好看。

第二天早上，开始上飞机。这是陈纳德飞虎队的运输机，机舱内没有座位，我们就沿着机身的两边坐在地上，背靠着机身。不一会就起飞了。中午开始降落，下机一看，原来是到了昆明机场。等飞机加了油，大家吃了点东西，又上机接着飞。于是看到窗外的高山，我们的飞机就在山峰间穿过去。原来这就是被飞虎队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空中走廊——“驼峰航道”。到下午，飞机开始降落，有一排美国的十轮大卡车早已在等我们了。下了飞机，爬上大卡车，在车行途中，看到一个站牌，才知道这里是印度的汀江。一会儿车开进了一个新兵营，营里全是一排排白色的帆布帐篷。下车后，营里的美国兵把我们带到一个大坑边，要我们把身上穿的衣裤鞋袜，一起脱了扔进坑里，然后走进坑边的一个浴室，要我们把全身洗干净，特别是头发。据说他们发现过有的中国兵头上长了虱子。

在浴室里洗了一个痛快的澡，出来时每人领了一身英国军装，从头到脚，里里外外，全部是和英军一样的制服。最令我不解的是每人发了两双十分厚的白毛线袜，高统的黑皮靴。印度的气候是十分热的，可是我们却一年四季都穿着厚羊毛袜。

我们穿上了英国军装后，就被带到帐篷边，按人数每10个人住一个帐篷。然后发粮食，每个帐篷一大袋面粉，各种美国罐头，一口大桶锅，要自己做饭。我们的帐篷中，有一位华西高中的同学，是当时贵州省主席杨森的儿子，叫杨汉华，他主动承担起了这个任务。每顿饭都是先烧一大锅水，再和一大盆面粉，等水开了，就把和好的面，用手捏成一小团一小团地往锅里扔，再开几个美国牛肉罐头，把肉全放进去，熟了就每人舀一碗来吃。

有一天，营里来了一个军人，自称他是远征军重炮团的，要找一个文书，问谁愿意去？当时没有一个人出来。又过了一两天，又来了一个军人，自称是战车营的，也是要一个文书，同样没有人愿意去。

住了约一个星期，突然在一个早上，来了十几辆美军十轮大卡车，营里要大家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准备出发。不一会就一个接一个走出帐篷，顺序上了美军的军车，等全部约五百多人都上车后，车即开动了。

路径雨多，突然天空下起了大雨，幸好我们的车都是带篷的，不怕雨淋。只是翻野人山时，却遇到了谁也没有料到的麻烦：原来野人山的汽车路都是泥地，被大雨淋湿后，路面变得特别滑，遇到了一个斜坡，头一辆车开上这个斜坡时，半途就上不去了。只见车轮打转，车就是不动，急得那个美军黑人司机冒着雨，下车在前轮上缠上一条铁链子，但开起来仍不动，试了几次都不行。大家见了这样的情况，也都十分着急，怎么办？正在这时，突然耳边听到一阵履带声，大家伸头往车外一看，原来开来了两辆推土机。推土机就把第一辆卡车用大铲子顶住车身一阵往上推，很快就推上去了，一直推到山顶，再推第二辆……

我们就是这样过的野人山。下山后不久，又上了公路，只见路边有一个牌子，写着“孟拱”。车一直往前开，终于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密支那，车停在一个紧靠着森林边的大操场上，军营门口的牌子上写着：“中国驻印度远征军，陆军新编第一军，军部直属干部教导总队。”

我们下车后，即开始编队，我被编入学生第7队第3区队第7班，任轻机枪第三兵（国内编制一挺轻机枪配备一名枪手、一名弹药兵，而美军的编制是两名弹药兵）。

接着就是搭盖军营，很简单，都是用竹竿搭盖起来的，床是竹片排成的大

统铺，屋顶铺的草。一切弄好后，就开始发枪，还每人发一副绑腿，是深绿色呢子的，和当时国内宪兵用的一样。

教导总队的编制，一个队相当于一个连，三个区队相当于三个排，每个排按国内的编制都是三个班，可是远征军是按美国编制，每排四个班，三个步兵班，一个小炮班，即有两门60毫米小口径的迫击炮。

接着就开始了正式的极严格的军事训练。

这就是我的入伍经过，当时是1944年的11月，而不是1943年，特此更正。

徐伯阳 2005年10月31日 天津

附录

最后，我要介绍徐先生一生中所画的，比较重要的和比较巨大的几幅油画，以及他为我所画的油画像：

1. 《田横五百士》油画，绘田横一袭红袍，满面悲愤，身后侍立五百徒众。大约有六尺高，九尺宽。

2. 《伯乐相马》油画，绘一人牵马，马作怒嘶状，伯乐顾而相之。大约有五尺高，八尺宽。

3. 《若大旱之望云霓》油画，旱魃为虐，泥土龟裂，有羸牛渴喘，农人以手遮目，怅望天际骄阳高悬。大约有七尺高，九尺宽。

我的画像：

1. 《凭桌》油画，在巴黎郊外麦浪避暑时作。我坐在一张红木桌旁，桌面漆光鉴人，当中置一盆大红花，和我头发上一个大红夹子，相互辉映。大约有二尺高，三尺宽。

2. 《箫声》油画，在巴黎第八区六楼画家作。绘我在吹箫，画面于朦胧中颇饶诗意，法国大诗人伐莱理见了极为欣赏，曾在画上题了两句诗。大约有三尺高，一尺五寸宽。

3. 《裸裎》油画，作画地如上。写我赤裸之半身，大约有二尺宽，三尺高。

4. 《慵》油画，作画地如前。侧卧之半身像，大约有二尺宽，一尺五寸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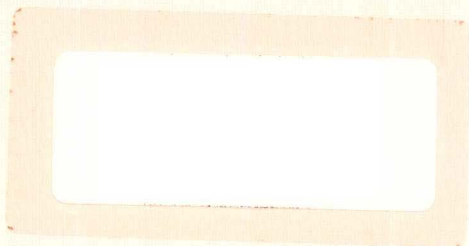
5. 《静读》油画，作于巴黎。我穿着沪上所制之宽袖短衫，静坐读书。大约有二尺宽，一尺五寸高。

6. 《韵律》绘于巴黎。写我奏小提琴之侧影。此画现为我所藏，有一尺

五寸宽，一尺三寸高。

7. 《传真》绘于南京丹凤街寓所。此画画幅最大，写我斜坐沙发扶手，仅较真人实景略微小些。徐先生一九四八年旅星期间，据当地友人见告，他曾将这画高悬壁间。大约五尺高，三尺宽。

非 心 鴻



人生是悲痛的，但是悲痛给予我很多启示，使我受到了教训，得着了经验，认清了途径，增强了勇气，而没有被它所摧毁。

我以真实为出发点，怀着虔敬之心，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我半生的际遇，因此我会说：“我一心坦荡，只有忠诚感恩之念，毫无睚眦必报之心，我在我的回忆录中抒写我所敬、我所爱、我所感、我所念的一切人与事，我深信我不会损害到任何一位与我相关的人。

——蒋碧微

碧微女士可以说是三四十年代中国艺术界的传奇人物，敢爱敢恨，特立独行。她与徐悲鸿、张道藩两先生的感情经历，尤可谓曲折动人，透过她的回忆录的记述，亦曾撼动千万读者的心灵。

——著名作家 琼瑶